

欧亚译丛

（第二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内亚区域的范围及其自然景观的多样性促使人们在俯瞰这一地区地理背景时，更多地关注那些有助于理解人类利用这些土地的、更复杂的环境特征方面。

——《欧亚地理背景》

（罗伯特·塔斐著，蓝琪译）

草原上的权力被广泛地承认了，也就不再需要宣扬它们的强力。权力拥有者担心他的陵墓可能会被盗墓贼劫掠。随之，他选择了一种不那么具有代表性的坟墓，也就是低矮的坟丘但是更深的墓室，更有甚者修建于森林中。这显示了游牧政权的一种成熟。

——《欧亚草原游牧政权的出现与成熟》

（林俊雄著，卓文静、刘文锁译）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2664-9

定价：70.00元

上架建议：丝绸之路研究

欧 亚 译 丛

第二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译丛. 第二辑 / 余太山，李锦绣主编.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664 - 9

Ⅰ. ①欧… Ⅱ. ①余… ②李… Ⅲ. ①东方学—文集
Ⅳ. ①K1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2431号

欧亚译丛
（第二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664 - 9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70.00元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古代内陆欧亚史研究”创新工程经费资助

顾　　问：陈高华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副 主 编：李花子

主编助理：李鸣飞

编者的话

欧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学科。该学科原始资料涉及的语言文字特别多，研究者也遍及世界各地，不用说论著也多数是用他们的母语写成的。由于思考的角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的学者往往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其成就也各有千秋，均有不可取代的参考价值。除了一些专门的语言学家外，一般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语言，从而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适用于一切学科，但对于欧亚学研究来说尤其不可或缺。

显而易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翻译，依靠一些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劳动，利用自己精通的语言，为不熟悉这门语言的学者提供值得参考的资料。对此，我们首先会想到厚重的或自成系统的专著，这当然是学术翻译的主要努力方向，但这显然不够。一些重要的论文只是以单篇的形式存在，一些刚发表的文字还来不及结集，而这恰恰是每一个企图站在前沿的学者不能不认真对待、及时注意的。于是，我们这本小小的刊物便自告奋勇，挑起这副并不轻松的担子。

由于篇幅、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们只能挑选我们认为较有价值的或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我们希望推介最新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不排斥一些发表时间较早但依旧给人启迪的作品。若非情况特殊，我们会尽量保持原文的完整性。不言而喻，译文的信、达、雅，将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应该指出，我们寄予这个小小的刊物上的理想，并不仅仅是成为攻玉

之石。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劳动，让国际欧亚学者体会到中国学者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尊重和热情，使他们转而更加关心中国的欧亚学研究，进而为开展欧亚学的国际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单向的借鉴毕竟还是消极的，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合作必将成为潮流。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本刊成为一座桥梁，起到一种促进沟通和理解的作用。

2014 年 7 月 10 日

目　录

欧亚地理背景*

罗伯特·塔斐（Robert N. Taaffe）著　蓝琪译

内亚区域的范围及其自然景观的多样性促使人们在俯瞰这一地区地理背景时，更多地关注那些有助于理解人类利用这些土地的、更复杂的环境特征方面。为此，人们的注意力最初集中于内亚最常见的五个地理特征：规模、远离海洋运动影响的距离和气候、河流问题、地理多样性和一致性、大面积农业种植的有限能力。接着关注的问题是讨论内亚自然带的几大环境要素。

常见的地理特征

内亚在欧亚大陆腹地和欧亚北部区域占据了很大面积，囊括了8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或者说，占据了世界陆地面积的大约七分之一。这一地带东西绵延大约6000英里，几乎是南北最长距离的两倍，只有欧洲“探索时代”的少数海上冒险船只横渡的距离可以与之相比。然而，内亚长距离交通的最佳方式却一直是陆路交通，因为，地球上没有任何地区像它这样周边缺乏易于通行的海洋。民族大迁徙、文化创新，以及来自太平洋、

---

* 本文译自丹尼斯·辛诺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Denis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原文题目为“The natural zones of Inner Asia”，出自该书第二章第19—37页。罗伯特·塔斐系地理学家，此处引文系他发表的《地理背景》（The Geographic Setting）一文。——译者注

冰雪覆盖的北极和印度洋[1]的货物都经内亚陆路传播。在内亚的欧洲部分，黑海和里海的航路得到了充分利用，不过，实质上仍局限在内亚的边缘地带。

除了海路的有限作用外，作为陆路交通的一种替代，河流的作用也因一些困难而受限。最明显的问题是在大部分干旱和半干旱地带缺乏可供航行的水路。此外，在西起里海流域东至兴安岭的巨大内陆水系中，没有一条大河通向海洋。遗憾的是，一些注入海洋的河流在流向上对主要运输几乎起不到有益的作用。典型的例子是包括鄂毕—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在内的西伯利亚的众多河流，它们注入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处于冰封状态的北冰洋。即使是向东流的黑龙江也在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处拐向北流入泰加森林，而不是向南流经自然条件极好的海参崴港和纳霍德卡港（Nakhodka）肥沃的乌苏里—兴凯湖（Khanka）低地。幸运的是，黑龙江分支、向北流的乌苏里江流经这些低地。在很大范围内，在西伯利亚及内亚欧洲地段的交通活动通过利用河流之间的陆路可以补偿河流流向的不足。相应地，短途陆路的搬运可将西伯利亚北流大河的那些东西向大支流连起来，形成了东西移动的途径。然而，这些河流有限的通航季节（从南西伯利亚的 6 个月到北西伯利亚的 3 个月）又成了运输的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封冻河面所形成的道路常常被用于陆路运输。在乌拉尔山以西，注入封闭里海的伏尔加河流域上的河流通过便利的陆路交通与流经俄罗斯平原的水系连起来。不过，伏尔加河每年有 3—5 个月的冰封期。

---

① 早期经丝绸之路运输活动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是经印度洋港口，见布尔努瓦夫人（Boulnois），1966 年，第 40—60 页。

布尔努瓦夫人系法国汉学家，参考书目中没见到布尔努瓦夫人 1966 年的著作，此处引文可能是她 1963 年的著作《丝绸之路》，此观点在《丝绸之路》第 4 章中出现，见《丝绸之路——西方发现中国丛书》，耿昇汉译本，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 页。——译者注

相对而言，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带，广阔内陆地带的大多数交通不可能使用河流和水陆联运，陆路实际上无可争辩地成了最好的运输方式。幸运的是，内亚草原的通行几乎没有自然障碍。在许多方面，狭长的草原地带、与世隔绝的绿洲、内亚大山脉的隘口和走廊都与海路、港口和运河起着同样的作用。

从不同的角度看，有限的海洋影响和偏北的纬度对内亚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地表上看，最大陆性率[①]是该地区的特征，意味着在此遭遇了冬夏季最大的平均温差。内亚大部分地区的冬季寒冷或相当寒冷，夏季温暖或炎热。远离海洋，加之山脉阻碍了海洋气流的运行，导致森林地带以南的内亚地区缺乏潮湿气流的渗透。使干旱和温度问题更糟的是，欧亚大陆内部处在以蒙古为中心、每年冬季出现的高压地带，高压带来了晴朗的天空、零度以下的低温和无雨雪天气。干冷风来自高压脊，它影响着内亚大部分地区的冬季气候。

从该地区令人印象深刻的地理范围的意识中可以预见，在南缘贫瘠的荒漠和积雪覆盖的山峰与北部北冰洋附近荒凉的苔原地带之间，内亚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地理景观。由过渡地带分隔的森林、草原和荒漠完全按自然带的纬度方向排列。在景观上，很难想象还有哪两个地带的差别比西伯利亚泰加林的沼泽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光秃秃的沙丘更大。

除位置方面的原因外，内亚地理的多样性因多山的地形而扩大。分布在地理空间上，具有自然特色的大生态带可以在这一地区山脉的纵向坐标缩影上看到，在此，植物、土壤和湿气等海拔上的差异取代了自然带纬

---

① 陆性率是用来量度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气候之间区别的指标，即在陆地与海洋上温度的上升幅度差别，在大部分地方，陆性率可以解释平均气温及1月至7月间气温的改变。——译者注

度的差异。东天山北部山脉地形的垂直生物带可以作为例子。[①]在这些山脉的迎风坡或北坡，低坡草原可以延伸到海拔 1600 米的高度，在此，低坡草原与稀稀落落的树丛混在一起。以后，草原被一片向上一直延伸到 2600 米林线的松树林取代。在林线以上，植被开始减少，从高山草甸向光秃秃的岩石地带转变，在 3600 米以上是原始山地土壤，其最高峰和山脊常年被积雪覆盖。在干燥的背风面，或者说山脉的南坡，荒漠沿坡度向上一直延伸到它背面（即迎风坡）森林开始的相应高度。这些高海拔荒漠让位于亚高山草原，最后是草木不生的山坡。

除了垂直分层自然带的形成，与盆地毗邻的高耸山脉无疑也是导致突出差异的显著因素。在干旱地带，在源自附近山脉的河流两岸，翠绿的绿洲与周边荒漠或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景观在干旱地带常常可以见到，促使这种景观形成的内亚山脉增加了这一地区地理的多样性。这类景观最明显的地区是塔里木盆地边缘、天山北坡附近的准噶尔平原，以及沿内亚南部山脉边界的黄土山麓平原。

内亚绿洲主要依靠为它们提供了生命之水的山脉。当平原上空很少降雨或根本不降雨的气团向上穿越山脉的迎风坡时，气团冷却下来，一旦达到了低饱和点，就常常在这些山坡和山的核心区降下暴雨，而在背风坡则有相对较少的降水。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高山作为蓄水池以季节性雪和长年累月冰川的形式将雨水积攒起来，冰雪到温暖季节解冻，以山溪的形式往下经过沙砾、山麓流入绿洲。即使更远的下游绿洲或三角洲（如阿姆河三角洲）都依靠山涧溪水。除了地理学上的湿度影响外，绿洲肥沃的土壤常常也是随坡度下流山溪的沉淀淤积物形成的冲积土层。在某种意义

---

① 地理研究所，1969 年，第 1 卷，第 236—237 页。

此处指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 A. A. 格里戈里耶夫的倡议下，于 1918 年成立，是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1963—1972 年出版了《苏联的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丛书》，共 15 卷。——译者注

上，靠山绿洲代表了一种局部补偿型，补偿了中国新疆和蒙古利亚的大多数干旱地区，干旱的部分原因就是其周边被高山环绕。

应该指出沙漠绿洲与草原绿洲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的那些绿洲，后者是与山脉毗邻的绿洲，如天山北缘或准噶尔。沙漠绿洲在地理意义上可说是与外界隔离，可以自给自足，而草原绿洲通过易于穿越的草地互相连接起来。在两类绿洲上的定居和密集农业与草原畜牧游牧之间的互补性贸易发展起来。而在抵御草原游牧入侵者的定期征服上，草原绿洲甚至比与之对应的沙漠绿洲存在着更大的困难。[①]

在高原地貌的另一个极端，内亚地理的一些多样性还可以归结为低海平面地形，或归结为那些接近具有理想平坦度属性的土地的存在。前者最典型的例子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缘的吐鲁番低地，在此，地面水平低于海拔 505 英尺。[②] 免受严寒的地形保护、漫长而炎热的生长季节和绿洲的生活，它们共同使吐鲁番低地成为特别肥沃的古定居地，并以水果、瓜类和棉花著称。

在不同规模上，拥有地表最大沼泽地的西西伯利亚平坦低地具有使人产生疑问的区别。它们占去了从瓦休甘沼泽地（在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之间）到北冰洋海岸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一个明显的地理异常是这片水盈余的巨大地区紧挨着图兰低地北部的沙漠。尽管把西西伯利亚的水输送到这些沙漠地带的愿望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产生，这将部分地改善沙漠的地质环境，然而，以 20 世纪的技术这一问题尚无法解决。

矛盾的是，内亚地区如此广大，以致它包含了地理多样性和更大范围

---

① 欧文·拉铁摩尔，1940 年，第 155—158 页。常常伴随着征服草原绿洲的情况是，畜牧游牧的侵入取代种植业。

此处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美国地理社会系列研究》（*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Research series*）第 21 卷。——译者注

② 地理研究所，1969 年，第 2 卷，第 4 页。

的地理统一性两个方面。空间一致性的显著表现形式是沿相同纬度的环境自然带的相对统一。例如，从太平洋海岸起，向西旅行 6000 英里都不会走出泰加森林。森林的南缘，草原地带从满洲里（Manchuria）一直延伸到匈牙利平原。虽然在绵延的草原带可以看到覆盖草被种类的变化，但草原各区段的物理地理的类似性比其差异性更加明显。

内亚地理在地形方面的一致性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即占主导地位的陆地在海拔上的变化相对平缓，山脉地带的地面具有连续性。俄罗斯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图兰低地连在一起汇成了一片大平原，大平原围绕着西起喀尔巴阡山、东以叶尼塞水系为界的巨大切割高地。依照惯例，乌拉尔山被认为是这一大平原欧、亚部分的分界线。然而，乌拉尔山的低海拔和易于穿越使这片大平原的欧、亚部分只有适度的地形中断。中亚以东，一条细长的干旱高地草原和高原从中国新疆西部边界山脉一直延伸到东北中心和太平洋海岸的黑龙江盆地，还经过了蒙古高原的南部和东部。这一地带相对较低的地形被蒙古荒漠边缘山区地带的天山和阿尔泰山，以及将蒙古高原与东北低地隔开的大兴安岭打断。

内亚山脉地带由大量形形色色的地质结构和不同时代的山系组成。但就地理位置而言，这些山脉在很大程度上是均衡的。除一些例外，内亚山脉从西南向东北[①]呈直线绵延伸展几千英里，偶尔出现间断带；除了一些大山分脉偏离这一轴线外，这些山脉从高加索和中亚南部边缘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其间穿过新疆、蒙古和东北。相对于这种明显的地质连续性而言，最大的例外是喀尔巴阡山。喀尔巴阡山与匈牙利平原和低矮的乌拉尔山接壤，乌拉尔山仅仅在其北端才像一座真正的山脉。

山脉地带海拔最高的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山，其最高峰达到了大约 25000 英尺。在一定程度上，内亚的许多山脉呈现出地理上的连

---

① 此处原文是西北，可能有误，似乎应该是东北。——译者注

接性，尽管结构上未必如此，它们以帕米山为中心，以弧形螺旋地向外延伸。呈弧形向西延伸的山脉包括高加索山、里海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Elburz）、中亚南部边缘的涅比特达格山（Nebit-Dag）和兴都库什山。这些山脉的最大高度在10000—18900英尺之间。从帕米尔向中部延伸的山脉可以提到的有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它们不属于本研究的范围。从帕米尔中心向东辐射形成的巨大山脉带包括了环绕着塔里木盆地边缘高耸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 (Astyn-Tagh)[①]、甘肃河西走廊的南山山崖和蒙古高原边界的山脉。帕米尔山脉及其横穿阿尔泰山的支脉与延绵了1100英里进入新疆（在此获得海拔超过了24000英尺的高峰）的山顶积雪的那些高山的起点相连。山脉连续带从帕米尔—天山接合点以较低山脉的形式（其间一些大走廊使之间断）向东北延伸，最后抵达阿尔泰山。阿尔泰山深入西蒙古利亚，最高海拔几乎达到了14600英尺。在阿尔泰山与萨彦岭（在阿尔泰山西起点与贝加尔湖之间萨彦岭形成一个弧形）之间有蒙古利亚最高海拔稍稍低于13000英尺的大杭爱山和萨彦岭正南方的唐努山（Tannu-Ola）。这一山脉带继续向东穿越外贝加尔、雅布罗诺威山脉（Yablonovy Range）、斯塔诺夫山脉（Stanovoi），直到它转向东北经泰加森林和冻土带抵达白令海峡海岸。偏离这条西伯利亚轴线的许多余脉延伸到蒙古利亚、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的南部。这类山脉包括了蒙古北部的肯特山（Kentei），它在地质上是雅布罗诺威山向南延伸的余脉，还有满洲里多山的边界。海拔相对较低的大兴安岭（海拔没有超过6500英尺）将满洲里与蒙古利亚分隔，甚至海拔更低的热河（Jehol）山脉也是通往中国北部平原的障碍。小兴安岭从北面包围了中国东北，西锡霍特山（Sikhote-Alin）和东北东部山脉从东面阻碍了满洲里和乌苏里低地通向太平洋海岸。如果注入黑龙江的松花江没有提供穿越小兴安岭的通道，如

① Astyn-Tagh 疑为阿尔金山（Altyn-Tagh），第22页也是如此。——译者注

果辽河流域没有流经大兴安岭的地段，如果狭窄的海岸低地没有延伸到中国北部，那么，东北草原与邻近地区的隔离将远远超过现在的状况。

内亚气候一致性的突出表现是，从里海东岸到戈壁西缘有一块被沙漠覆盖的干旱地带。这条干旱地带在许多方面都是撒哈拉大沙漠和中东沙漠在中纬度上的延伸，在这些沙漠中，内陆的位置和地形障碍取代了低纬沙漠的干燥信风成为致旱的主要因素。就气候而言，地理一致性的另一种类型是遍及内亚的冷或极冷的漫长冬季占据了主导地位。除南极洲外，地球上平均最低气温的记录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例如，维科扬斯克（Verkhoyansk）1 月份最低气温是华氏零下 59 度，有时候，气温会降到接近华氏零下 100 度。即使远在南方的蒙古乌兰巴托城（库伦），1 月份的平均气温也达到了华氏零下 17 度。[①] 在同一纬度上，冬季平均气温有向西逐渐升高的倾向，在内亚的欧洲地区几乎很少遇到凛冽的冬季。例如，阿拉木图和敖德萨 1 月份平均气温分别是华氏 20 和 28 度。[②] 只有中亚南部边缘、高加索低地和沿海地区 1 月份平均气温在冰点以上。如上所述，寒冷的冬季和温暖或炎热的夏季综合起来被描述成大陆性影响，这也是内亚最普遍的热的特征。

通过定居文明的侵蚀和草原种植的开发，内亚文化疆域的范围在不断缩小，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教益是，对定居农业自然地理的约束既不准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切地说，土地的使用方式反映了历史传统、社会面

① 穆尔扎耶夫（E. M. Murzaev），1954 年，第 237 页。

穆尔扎耶夫是俄国历史学家，著作有：《在遥远的亚洲》（1956），《在亚洲腹地》（1990）。此处指 1954 年著作：《蒙古人民共和国：物理—地理描述》（*Die Mongolische Volksrepublik：Physisch-geographische Beschreibung*），译自俄文。——译者注

② 韦恩斯泰特，1972 年，第 4 卷，第 283、288 页。

韦恩斯泰特（Frederick L. Wernstedt）系美国人类学家，此处引文为《世界气候数据》（*World Climatic Data*）第 4 卷。——译者注

貌、技术支配状态，以及自然特征等相互的综合作用。随着这些告诫深入人心，对限制性可归因于自然环境特征的内亚农业，一些推广仍是可行的。在内亚发展定居农业，最重要的自然地理障碍是供水不足、生长季节短、土壤问题及险峻的地形。

在内亚浩瀚沙漠及大多数草原，由于靠天农业或扩展大灌溉网的不可能或不切实际，农作物的生长被局限在分散的绿洲。历史上频繁提到的，农耕进入草原的定期入侵主要发生在与中国长城毗邻的较潮湿的草地，而草地的大部分至今仍未发生任何变化。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带，妨碍农业发展的另一个自然问题是受到了源自沙漠或沙漠草原带频繁吹来的风暴或被称为苏柯维（Sukhovei）的强劲热风所侵蚀，苏柯维风发端于里海附近，它将经过的草地吹干。干旱地带土壤大面积的盐化是阻碍农业发展的另一个困难，对绿洲农业也是长期的问题。

冻土带和泰加森林地区比南部干旱地区更不利于定居农业的发展。在这些异常寒冷的地区，发展农业的众多障碍有生长季节短、永久封冻的土壤、巨大的沼泽和湿地。在这些人迹稀少的北部地区，农耕的障碍至今仍未能克服。

与供水不足、土壤盐化、水涝或封冻、干冷气候等相关问题相比，复杂地形导致的农业问题是相当温和的。如上述所讨论的，作为高地牧场和干旱地带的水源，山脉的积极作用超过了它限制耕地大幅度扩展和阻碍贸易等方面的消极作用。在内亚的许多地区，尽管地势起伏较大，包括冰封的北部土地和沙漠，然而，地形因素在发展定居农业的潜力方面是一个最小的问题。

相反，内亚土地更加适合于大面积的粗放农业，而不适合于与中亚毗邻的定居文明所采取的精耕细作。畜牧业在水草丰美地带的优势与驯鹿和狩猎在冻土带的优势很好地反映出利用土地的局限性及其机会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同时也取决于技术、组织和内亚社会的价值标准。

内亚的自然带

将内亚细分为许多自然带是按自然地理分区的主要方式，这些自然带被视为包括自然环境相互关联部分的大范围的生态综合体。尽管这些地带以其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植物命名，但它们代表了包括气候因素、土壤、植被，以及水资源和地形等方面的整个自然系统。[①] 这些地带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然因素是气候，气候在其他大多数自然特征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气候的核心作用从宽广自然带共同的边界上反映出来，还从由柯本等人区分、使用最广泛的气候分类系统的那些主要气候类型上反映出来。[②] 在许多方面，自然带变化唯一重要的气候指标是降水量与蒸发量的比率，或者可以称之为有效湿度。只考虑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顾另一因素可能是相当有误导性的。例如，在苔原地带，4 英寸的降水量可能因为低蒸发量产生大量水分，而同样的降水量在戈壁沙漠也可能出

---

① 对自然带做了最经典研究的学者是贝尔格，1950 年。

贝尔格（Lev Berg）系苏联自然地理学家，首先提出景观学说，认为自然带及其景观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自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他还提出气候分类，并以自然植被带划分和命名世界气候。著有《苏联景观地带》（1931）、《苏联自然界》（1950）等。此处 1950 年著作指《苏联自然界》（*Natural Regions of the USSR*）。——译者注

② 柯本与盖格尔合著，1930 年。

弗拉迪米尔·彼得·柯本（Wladimir Peter Köppen）又译科本，德国气象学家、气候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其中以气候方面的成就最大，发明了柯本气候分类法（Effektive Klimaklassifikationen），成为广泛使用的气候分类法。盖格尔（R.Geiger）系德国气候学家，1927 年首次提出小气候的概念，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一批研究小气候的专著，作为气候学一个重要分支的小气候学形成，小气候学研究内容主要是局部地区近地气层和土壤上层气候。此处著作是柏林出版的、柯本与盖格尔合著的 4 卷本《气候学手册》（*Handbuch der Klimatologie*）。——译者注

现，那儿有强烈的光辐射和很大的蒸发量。一般而言，有效湿度的大小从北向南呈带状递减，在相当程度上与内亚自然带保持一致。[①] 在北方，即内亚苔原带边缘，实际降水量比蒸发量大 50%。而在另一极，沙漠地带的降水量是可能蒸发量的八分之一，草原的降水量与蒸发量比率也相当低。有效湿度线（指降水的 60% 与热诱导的蒸发一样大的地带）与高草草原（the tall-grass steppe）和森林草原的分界线对应。这条特别的有效湿度线从乌克兰草原的北缘一直延伸到贝加尔湖和中国东北平原的东北边缘。在有效湿度线与内亚南部边界之间地区，湿度问题普遍存在，尽管强度不同、类型各异。在这条 60% 的有效湿度线以北，热对人类活动的妨碍超过了湿度对人类的限制。[②]

在分别讨论各个自然带之前，还应该提到内亚自然地理区划的四个方面，它们使这些地带的边界不像地图学上根据粗略审视而假定划分的那样

---

① 此段中的降雨蒸发率引自格里戈里耶夫与布迪科（Rudyko）1960 年合著的文章。

A. A. 格里戈里耶夫（A. A.Grigoriev）系苏联地理学家，苏联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长，倡导必须对自然环境进行综合定位研究的思想。1926 年发表《地区综合研究》一文，提出的自然—人为综合体的概念模式，1936 年又提出建立自然地理学新分支——化学地理学的想法。继格里戈里耶夫之后，苏联学者在水文化学地理、景观地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等方面做了较多研究，其中元素迁移转化规律、生物地球化学等学说和生物地球化学区划等理论成为化学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布迪科（此处的 Rudyko 应该是布迪科 Budyko）系苏联物理学家，全称麦克海尔 · I. 布迪科（Mikhail I. Budyko），他在列宁格勒的地球物理观测台提出，每年将几百万吨二氧化硫投入平流层。此处指两人于 1960 年合著的《苏联气候分类》（*Classification of the Climates of the USSR*），载《苏联地理学》，第 1 期，第 3—23 页。——译者注

② 胡森，1966 年，第 38 页。

胡森（D. J. Hooson）系美国地缘政治学家，认为人口地理学不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按他的观点，人口地理学会成为整合地理学的趋势，著有《人口地理世界分布形式》等书，此处指 1966 年出版的《苏联——人口与地域》（*The Soviet Union: People and Regions*）。——译者注

有清晰的边界。山脉地势中垂直的自然带这一特征前面已经提到。其他特征是：自然带上人类活动的限制，自然带边界的变化，明显的自然带与过渡带的类型。

总的来说，由于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反映林中空地、草原和森林草原的耕作、水资源的地理分布这三类变化），所以世界上许多人口稠密地区的自然带更容易以历史迹象去划分，而以当前的自然景观划分却很困难。例如，匈牙利盆地的草地显然是取代原始森林覆盖的一块古老的人工草地。[①] 尽管存在着一些例外，但内亚是人类对自然环境改造只有适度重要性的世界最广泛地区之一。就绝大部分而言，内亚的大规模侵犯，以及在潮湿草原和森林边缘的永久性旱地农业直到 19 和 20 世纪才发生。内亚的苔原、森林、草地、荒漠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原始特征。

在这些区域生态综合体中发生的另一种变化可以归因于相对短期的气候波动。气候区的边界常常随湿度的短暂变化而移动，在相当小的程度上，还随热的条件而变化。相应的变化出现在自然带上。尽管并不局限于干旱地区，但在内亚干旱地区和半干旱地区，气候边界的变化特别明显，并反映了降水的年际变化与降水的大小成反比的气候法则。因此，草原和沙漠的低平均降雨量与每年有效湿度的剧烈变化有关，与这一地带边缘而不是中心发生的频繁变化有关。在某些情况下，区分以下情况是困难的，即由自然引起的边界位移，或通过诸如农业或草原过度放牧等行为导致的自然植被迁移所产生的界线变化。还要提到的是，气候变

---

① 庞兹，1961 年。

诺尔曼・庞兹（Norman J. G. Pounds）系地理学家，此处引文为 1961 年的著作《匈牙利平原的土地利用》（*Land Use on the Hungarian Plains*），载入他本人主编的《东欧地理学文集》（*Geographical Essays on Eastern Europe*），即印第安纳大学，《俄国与东欧丛书》第 24 卷，第 54—74 页。——译者注

化是短期的，常常具有代偿性。它们没有为早期一些富有想象力的理论提供凭证，这些理论引用未经证实的长期气候变化，对内亚历史的变化寻求浅薄的解释。[①]

对于内亚自然带系统，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把明显地带与将苔原、森林、草原和荒漠地带更清楚分离的过渡自然带加以区分。从北到南，生长受阻的苔原植被逐渐让位于泰加森林广阔的针叶林，转而向南接近了混合林和落叶林地带。在森林和草原草地之间的过渡区被宽广的森林草原带占据。这一地带间歇性的树林覆盖向南依次递减，最终被草地的高草草原取代。在草原的干旱边缘地带，丰茂草地被沙漠过渡带（有时习惯称半沙漠）上稀疏的、相对来说分散的短草草地取代。由于四面都与过渡带密切相连，草原边界在两个地带之间缺乏精确或稳定的界线，草原一名常常（有理由地）指包含了三种草类的地带。沙漠草原逐渐汇入浩瀚的内亚沙漠带。即使在沙漠带中，也可以明确区分极端干旱或特别干旱的沙漠，正如经常没有降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有些湿润的内亚沙漠。[②] 可以肯定，内部变化在各自然带内发生，但它们不足以破坏这些

---

① 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是亨廷顿，1917 年。

埃尔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系美国气象学家，1903—1906 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1907 年在波士顿发表划时代巨著《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此书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变化与天气的异变有极大关系，例如东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北宋时期契丹与女真族。1917 年他在《经济季刊》上发表《气候变化和农业衰落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文。此处引文从年代看应该是后文，但本书第 430 页第 2 章的参考文献写的是 1917 年的《亚洲的脉动》，可能误为 1917 年。——译者注

② 梅格斯，1953 年，第 203—210 页。

彼微里尔·梅格斯（Peveril Meigs）系气候学家，他将地球的干燥地区分为特干燥(年降水量 100 毫米以下)、干燥（年降水量 250 毫米以下）和半干燥（年降水量在 250—500 毫米）3 类。此处指 1953 年《干旱区水文》(*Arid Zone Hydrology*),《世界干旱区和半干旱区气候分布图》(*World Distribution of Arid and Semi-Arid Homoclimates*)。——译者注

自然带的基本统一性。

苔原[①]

苔原是内亚最北端的自然带，占据了从拉普兰（Lapland）至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s）、围绕北冰洋的海岸平原和山脉，以及西伯利亚东北角南下至堪察加半岛（Kamchatka Peninsula）的地区。就绝大部分地区而言，苔原是一块以稀疏和基本无树植被为特征的北极荒地，植被主要由诸如苔藓、矮灌木、长出浆果的矮树丛等多年生植物组成。在一些地方可以见到极小的白桦树。苔原地区的气候相当寒冷，冬季气温可降到华氏零下100度。夏季短而凉爽，7月份的平均气温低于华氏60度。强烈的北极风横扫没有任何保护的苔原。邻近北极的寒流也使附近陆地经常出现多云和雾的天气。虽然苔原降水较少，但蒸发量很小，使这块贫瘠的永久冻

---

① 有关此地区的许多讨论基于：贝尔格，1950年；苏斯洛夫，1961年；穆尔扎耶夫，1954年，1958年；阿努钦，1948年；王启无，1961年；谢觉民，1973年；另，科学院1974年编制的两个地图集特别有用。

贝尔格，《苏联自然界》，1950年；苏斯洛夫（S. P. Suslov），《亚洲俄国的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 of Asiatic Russia*）英译本，旧金山1961年版；穆尔扎耶夫，《蒙古人民共和国：物理—地理参考》，1954年；阿努钦（U. A. Anuchin，1913—1984）系苏联地理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曾提出“统一地理学”的观点，反对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隔，反对把经济地理学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学科，主张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统一，1960年发表著作《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书中抨击了“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学和“非自然”的经济地理学，此处指《地理论文评审》（*Geograficheskie ocherki Man hzhurii*），莫斯科1948年版；王启无系中国植物学家，1939年发表《云南植被的初步研究》，著作是《中国森林：草原和沙漠植被调查》（*The Forests of China with a Survey of Grassland and Desert Vegetation*），1961年；谢觉民系浙江上虞人，旅美地理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1973年美国麦克乐公司出版了他的《中国地图集》。——译者注

土带产生涝渍，也使这一地带的某些地区形成了深而持久的积雪，特别是西西伯利亚的苔原。驯鹿是苔原带的主要动物，它们在稀疏的苔原植被上自由生活，为在这片居民稀少地区艰难生活的诸族提供了特殊的供给品。他们还通过猎取诸如狐狸和旅鼠之类可提供皮毛的动物补充了放牧驯鹿的不足。

苔原带展示了自然区域系统特有的过渡变化的类型。以厚密灌木丛为主的灌木苔原逐渐取代了北部光秃秃的北极苔原，它转而又让位于森林苔原，在森林苔原可以见到零星出现的针叶型树林。

森林带

泰加森林的针叶林不仅构成了这一地带的主导性特征，也是世界上森林覆盖面最广阔的地区。针叶林景观的树木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起，沿着一个连续不断扩展的区域延伸至鄂霍次克海（Okhorsk），距离将近 6000 英里。在北极圈与其南面的黑龙江上游流域和贝加尔湖之间，南北方的最大宽度达到 1700 英里。此外，山地针叶林还渗入蒙古利亚和满洲的北缘。在此巨大的森林带，大量的区域变化发生在树木的优势种群中。挪威云杉、松树和冷杉支配着欧洲部分，而在乌拉尔山以东，耐寒的西伯利亚落叶松是最优秀的，它们非常适合于永久冻土带。就在针叶林南侧的森林带，或者见到了混合林带，像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中国东北，或者可以见到显示亚洲边缘特征的、相对比较窄的阔叶落叶林带。西伯利亚最惊人的生物特征是长度超过了 1500 英里的细长的白桦林带，它把针叶林与森林草原隔开。在远东，把东北平原上的大草原和乌苏里江盆地与山地针叶林隔开的是宽广的橡树、白桦树以及混合针叶落叶林带。在区域或更小范围内出现的主要差异也发生在针叶树木覆盖浓密的地区，以及森林带的其他地方。相对于北方的一些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只有不阻碍交往

的分散森林或一棵棵树木；而在北方的一些地区，浓密的森林覆盖，崎岖的地形和涝化的土壤成为局部运动的障碍。

针叶林具有以严寒冬季和短促凉爽夏季为特征的亚北极气候，1 月份的平均气温从北方雅库特斯克（Yakutsk）的华氏零下 40 度到南方赤塔（Chita）的华氏零下 14 度，夏季 7 月份的平均气温均衡在大约华氏 65 度。总的来说，由于低蒸发量弥补了有限的降水量，因此，这是一个相对潮湿的区域。针叶林和苔原带的严酷气候导致了占据针叶林大部分地区的、巨大和永久冻土带的形成。这些土壤由表层的解冻带和表层下面坚如岩石的未解冻带组成。由冻土层产生了排水问题，夏季，融化层成了阻碍陆路运输的泥泞海洋。在东西伯利亚针叶林的中部和北部，在寒冷的季节，陆路是首选的交通。相反，在温暖的季节，河流网大范围的解冻致使河上运输成为此时节最好的方式。幸运的是，西西伯利亚只有北部边缘处在这条冻土带上，即使在冻土带上占据了优势的叶尼塞河东部地区，在强度上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终年封冻的土地从北向南逐渐解冻，直到多年冻土只出现在被解冻的南方针叶林带围绕的一些零散的岛屿上。然而，即使在不常年结冰的地区，覆盖整个针叶林的灰化土也是不肥沃的。①

在乌拉尔山以东，森林带可以分为四大自然地理区：通过鄂毕—额尔齐斯河水系排水的大范围西西伯利亚低地；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宽广流域之间严重分割的中西伯利亚高原，以及该地区多山的南部边界；占据勒拿河以东及东南主要景观的一连串白雪覆盖的山脉；以太平洋和延伸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鄂霍茨克海为界的低地。正如上述讨论的，这些地理学上的次区域利用西伯利亚北流河的东、西支流和通过有相对较短的分隔、存在了几个世纪的陆上运输互相连起来。然而，西伯利亚河流的

① 落叶树林带和混合林带的大部分地区有更肥沃的灰棕色灰化土，它们比针叶林的灰化土更加不易滤走（即它们的上层有不被剥夺的矿质营养）。

上游至少有半年的封冻期，在北极圈出口附近至少有 9 个月是封冻的。下游被冰阻塞的时间比上游长，由此导致了每年的大洪灾。

传统上，森林带已经成为饲养驯鹿和狩猎的地区。它是许多大型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有赤鹿、鹿、熊、山猫，以及西伯利亚南缘和中国东北闻名遐迩的老虎。然而，诸如黑貂、狐狸、貂鼠和随处可见的松鼠等可以提供皮毛的小动物，对俄国早期的迁移运动所产生的诱惑更大。

草原带

草原带以草地或典型草原区的大草原为中心。在其北面，湿润的森林草原过渡带将草地与连绵不断的落叶林带或混合林分开，并兼有两个地带的植被特征。在较为干旱的草原南缘，沙漠草原的矮草充当了内亚大草原与沙漠之间的生物分区体。一般而言，草原草被的丰富程度随远离内亚沙漠的距离而增加。这一概括也可以引申到向上直抵山脉森林起点的纵向带地貌。

有树草原（或者说森林草原）是一条弯曲的狭窄带，它从北乌克兰经北哈萨克斯坦，一直到西西伯利亚平原和蒙古高原的南缘，在此地带上，草与落叶树杂生在杭爱山、肯特山适度上升的山坡上，还在阿尔泰山的较小范围上出现。匈牙利平原也可以归为有树草原。

实际上，这一地带的各种特征都表现出它处于森林和草原地带的中间位置。草甸草原（或混合草原）构成了其典型地貌，最初，羽毛般覆盖的草被星罗棋布的落叶树隔得断断续续的。在西方是橡树，在东方取而代之的是桦树和白杨林。森林草原的地貌大多数是肥沃的退化黑钙土。气候也具有森林和草原两个地带的特征。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相当温暖。森林草原比与之相邻的森林有较高的蒸发率，而比草原有更大的降雨量。以年平均降水量 60% 到 99% 蒸发率，就导致了相对较低的有效湿度。

与过渡边界相比，草原地带是一个有明显特色的生态系统，它包括从黑海北岸地区到中国东北平原的宽广草原带。在内亚西部，草原主要的次区域包括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南乌拉尔山区，以及哈萨克（或吉尔吉斯）大草原。东部草原包括蒙古利亚东部和中部绵延不断的草地和中国东北平原。此外，天山和准噶尔边界的阿尔泰山逐渐升高的草原与郁郁葱葱的伊犁河谷同样也应该在此之列。

草的不间断覆盖是草原带最显著的特征。虽然这些草地在类型和质量上有变化，但共同的特征是饲料基地，它们为畜牧游牧业提供了大量易于使用的饲料。草原的黑土地区一般由高羽状草、牛毛草和杂草覆盖。在草原较干旱的南部地段，不同品种的羽毛草和其他谷类植物在生物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通常从 5 月到秋季，不同的草类在草原各地连续不断生长，提供了广泛的饲料条件。

除了丰富的牧草外，土壤肥沃是草原的又一个特征。在从乌克兰延伸到西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开始的地方发现了非常肥沃的黑钙土，或称黑土。大面积的黑土带在东部的东北低地中心也有发现。乌克兰南部和哈萨克草原像几乎所有的蒙古草原一样有相对肥沃的深栗钙土。在草原带的干旱南缘，淡栗钙土占据了优势。

草原的气候属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在漫长的冬季，北极气团侵入草原，使草原的大部分地区 1 月平均气温降至华氏零下 10 至 10 度。欧洲部分的草原是草原带上最温暖的地段，1 月份的平均气温是华氏 20 度。由于蒙古草原所处的内陆位置、山的边界、晴朗的天空和深受蒙古高压带影响的冰冻天气，冬季最严寒的草原地段在蒙古。正如上文提到的，乌兰巴托 1 月的平均气温达到华氏零下 17 度，而一年中月平均气温在摄氏 0 度以下的时间有 6 个月（10 月至次年 3 月）。在准噶尔草原的乌鲁木齐，1 月的平均气温是华氏 5 度，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1 月份平均气温降到华氏零下 4 度，此两地在一年间有 5 个月的平均气温在冰点以下。相反，

草原夏季气候普遍温暖，几乎整个草原地区7月份的平均气温都在华氏65至75度之间。尽管在欧洲草原，夏季比草原带的其他地方要长些。应该特别注意东北的异常气温。在冬季，由于冷风从蒙古季节性高气压一直吹到太平洋的陆地，泰加林型气候盛行。反过来，温暖而多雨的夏季随太平洋气团移向邻近地区而开始。在向内陆推进时，夏季季风的影响迅速被驱散，蒙古的大部分和新疆草原只获得中等强度的夏季降水，降水的大部分源自大西洋。

内亚草原是一个湿度不足的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10至20英寸。欧洲草原和中国东北草原的降水量处于上限，而蒙古的大部分和新疆草原的降水量接近较低数。从整体来看，草原带的降水量只有蒸发量的30%到59%。幸运的是，湿度问题并非像从这些数据猜测的那么严重。许多大河水系流经西部草原，这些水系都有密集的支流网络。在欧洲草原上，这些河流包括多瑙河、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及其他河流。至于东部，鄂毕—额尔齐斯河水系注入哈萨克草原。东部草原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内流地带，只有黑额尔齐斯河和蒙古北部边缘的河流（特别是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以及辽河和黑龙江支流松花江等河流注入海洋。然而，从水文学来看，还存在着其他的补偿。准噶尔草原从湿润的欧洲气团受益，细长的草原绿洲常常得到从近旁天山北坡流下的河水。在蒙古草原，水位与地表相当接近，已经被利用了几个世纪。最后，草原的湿度问题主要与种植农业有关，与这一地带兴旺发达的畜牧游牧业没有多大关系。

除草原植被外，草原大部分地区相对平缓的地势也有利于草原运动的总体缓和，即使山区低海拔草原带也易于穿行。主要的地形差异是草原东部的高海拔，尽管这些抬升的地区实际上都被山围住，地区地势相对平坦或略有起伏。例如，蒙古高原从附近平原的底部急剧上升，平均高度达到了海拔5000英尺。然而，除了山间草原外，蒙古高原的大部分草原伸延地在地势上只有中等程度的变化。

在南面的干旱边缘，草原牧场融入了沙漠或半沙漠草原的断断续续的矮草草甸之中，沙漠或半沙漠草原成为从草原进入沙漠的自然过渡带。沙漠草原带始于里海北岸，占据了经新疆、甘肃草原，以及蒙古利亚南部和西北部的宽广地带。在中亚，沙漠草原带将草原与图兰沙漠分开，而在东部，它把潜在的戈壁沙漠及其延伸部分与蒙古草原分开。在沙漠草原的淡栗钙土层，主要植被是羽草草甸和苦艾。这里是大陆性气候，而夏季比草原带热一些，这一点从7月份的华氏75至80度的平均气温反映出来，冬季也没有草原那样严酷而漫长。年降水量在6至10英寸之间，降水量只占蒸发量的13%到29%。这一数字使沙漠草原被列入干旱地带。著名的甘肃走廊，即一条宽不到50英里长600余英里的结构性洼地，位于这条干旱地带的两条平行山脉之间，甘肃走廊上分布着一系列出产丰富的绿洲，绿洲的水源主要来自邻近的南山。绿洲系列提升了甘肃走廊作为干旱地区大通道的地位。比较而言，把沙漠草原上更干旱的边缘与真正的沙漠加以区分，比把湿润的沙漠草原与草原带的草原进行区分更加困难。草原带的三个地区养育了多种动物群。然而，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游牧民驯养的动物。当然，草原的马闻名世界，在沙漠和诸如甘肃走廊这样的沙漠草原，巴克特里亚双峰驼的饲养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草原带的自然环境特别适宜放养牛、绵羊和山羊。

沙漠带

一条巨大的沙漠带覆盖了从里海到戈壁东缘和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的内亚南部大部分地区。沙漠带的中亚地段主要由图兰低地占据，图兰低地环绕着具有大面积沙丘的卡拉库姆沙漠和具有稳定的砂、石地面的克孜尔库姆沙漠。植被密集的阿姆河冲积平原将以上两大沙漠隔开，锡尔河沿岸的落叶林带起到了与它相同的作用，它把克孜尔库姆沙漠与朝向西北

的卡拉库姆沙漠分开。中亚干旱带延伸到巴尔喀什湖以西荒凉的别特帕克达拉（Betpak-Dala）高地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萨雷耶希库特劳沙漠（Sary-Ishikotrou）[①]的巨大沙化区。在中亚西端，乌斯秋尔特高原从咸海西岸和里海卡拉博加兹戈尔（Kara-Bogaz-Gol）水湾东部边缘急剧上升，与邻近的卡拉库姆沙漠相比，乌斯秋尔特高原更加贫瘠。

在卡拉库姆和克孜尔库姆沙漠的中心区，以及咸海以东以南地区，每年获得的降水量不足 4 英寸。然而，在中亚沙漠带的一些外缘地区，年降水量高达 8 英寸，以春季降水量最大。即便如此，降水量也只是当地蒸发量的大约 15%。中亚的普遍干旱导致了地貌的盐化和土壤的高度盐碱化。然而，通过灌溉可以变成肥沃土壤的灰色沙漠土壤比比皆是。幸运的是，中亚最好的土壤分布在南部山脉山脚的绿洲和大河的冲积扇平原上。这些肥沃绿洲主要在黄土山麓平原上发展起来，其中，由锡尔河灌溉的有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绿洲，阿姆河和泽拉夫善河流经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绿洲。此外，阿姆河三角洲的冲积平原自古以来就哺育着生活在三角洲的人类。中亚河流有两个流量最大的时段，首先是基于降雨高峰和低坡融雪的春季，其次发生在冰川融化的仲夏。绿洲被生长着稀疏植被的沙漠环绕，沙漠中主要生长着灌木和半灌木植物。

季节和昼夜温度变化明显，它们构成了中纬度中亚沙漠的特征。然而，冬季一般很短，在南缘地区，冬季只有一两个月的温度在冰点以下。在南方，夏季炎热，7 月的平均气温超过了华氏 85 度。在个别日子，温度高达华氏 120 度。

经过一组山脉的阻隔之后，沙漠带继续向东，被天山及其相邻沙漠草原分隔为两个沙漠带。它们在塔里木盆地的东部出口汇合，然后继续向东

① 疑是萨雷耶西克阿特劳沙漠（Saryesik-Atyrau Desert），地处伊犁河下游，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译者注

延伸，形成了一系列不间断的沙漠，其中，蒙古南部的戈壁最为突出。这些高海拔的中纬度沙漠具有干旱、严冬酷夏，以及季节和昼夜温度悬殊等特征。虽然各类沙漠混杂的情况普遍，但一般来说，在西部，这类沙漠的表面由沙覆盖，在中部戈壁由石子和沙砾覆盖，在东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沙漠由沙和砾石覆盖。

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封闭的塔里木盆地中心区，在盆地边缘，有高度时达 300—400 英寸的移动沙丘。除了注入罗布泊（Lobnor Lake）的塔里木河及其支流沿岸生长着茂密的柽柳属植物（tugay）植被外，这一巨大沙丘带几乎没有植被。由于远离海洋，加之周围高山地形对海洋气团的阻碍，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它一年中获得的降水量不足 2 英寸，在很多年份甚至完全没有降水。与之相反，在沙漠的南、北两缘，与昆仑山、阿尔金山、帕米尔山以及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天山内部山脉相连的一些肥沃绿洲构成了一个跳板系列。在南部和西部，这些绿洲有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克里雅（Keriya），以及位于塔里木河断断续续支流上的其他绿洲。诸如库车、阿克苏这些更小的绿洲与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界上的天山南坡相连。在天山与准噶尔盆地中部的阿勒泰山之间发现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沙和砾石沙漠，草原将它与两个山脉隔开。

沙质沙漠与石头—沙砾沙漠之间的过渡地在荒凉的北山沙漠中，正好在塔里木盆地的外面。这一无水沙漠及其附近地区，包括甘肃走廊西部边缘，表层有着闪亮的黑色鹅卵石，它给这些贫瘠的沙漠土地带来了黑色戈壁的名称。另外，这一地区经常有强风暴，尤其是在过渡季节。

尽管沙丘只覆盖了蒙古戈壁沙漠表层的一小部分，但看上去好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平原，它获得的年降水量不足 4 英寸，实质上含有石头和砾石的表面产生一个沙漠的路面。在很大程度上，底层的沙子和粉土因风蚀而移动，显然，在中国长城的南面堆积成了黄土丘陵。戈壁的表面在地形模式上显示出巨大变化。特别显著的是，这些土地被相对较低的山脉和

丘陵分隔成广阔的盆地。反过来，这些盆地又有相对浅的，无法向外排水的洼地，在这些洼地中形成了间歇性湖泊和盐湖。戈壁的某些地段既没有植被也没有土壤，而在另一些地段则生长着梭梭灌木和草类作物。

再往南，戈壁融入了甘肃走廊北部的阿拉善沙漠及位于长城以北的黄河拐弯处的鄂尔多斯沙漠。阿拉善沙漠西部被称为小戈壁，它由表层有稀疏植被的大面积砂石构成。在戈壁的东部边缘以长着灌木植被的沙丘为主。鄂尔多斯沙漠是一个巨大的几乎没有被阻断的一望无垠的固定沙滩和沙丘，大部分地区没有植被覆盖。这些沙漠中的一些干涸河床形成了洼地，上面长着稀疏的杂草。

在讨论位于从帕米尔到阿尔泰山分界山脉两侧的这些干旱和半干旱自然带的自然地理差异和相似之处时，还应该强调穿越山脉之间的交通或相互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可行性。尽管这些山脉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度和地貌模式，但穿越它们的大通道仍然存在，并且一直频繁地发挥着作用。穿过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和绿洲的路线从喀什噶尔延伸，经高耸入云的捷列克通道和宽阔而蜿蜒的帕米尔山谷可以穿越雄伟的帕米尔高原，直抵出产丰富的费尔干纳盆地。穿过固尔扎（Kuljia）[①] 的一条北方路线经富饶的伊犁河草原，穿越天山的平行山脉，把巴尔喀什湖与经甘肃走廊、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的距离很长的重要线路联系起来。这条线路的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使乌鲁木齐成为穿越著名的准噶尔盆地大门的一个小站。准噶尔盆地大门位于天山延伸地准噶尔—阿拉套山与巴尔鲁克山（Baylyk Maili）之间。准噶尔盆地大门通往七河地区（谢米列契耶，Semirechye）和地域辽阔的哈萨克斯坦草原。这一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起于艾比湖（Ebi-Nor）附近东部通道的地方强风区，这些风比较温暖，即使在冬季也足以融化地面的积雪。

---

① 伊宁市原名固尔扎，得名于固尔扎庙。——译者注

在巴尔鲁克山与阿尔泰山之间有两条山间走廊。其中之一是楚古恰克线（Chuguchak，即塔城），它的北部边界是塔尔巴哈台山脉。交通更加频繁的另一条是朝东北方横穿草原的线路，它沿阿尔泰山南坡，顺着流向斋桑（Zaisan）湖的黑额尔齐斯河的宽广河道延伸，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草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一般来说，在内亚不同自然带上的南北运动，或者碰到了较少的自然障碍，或者在遭遇阻碍地形干扰之时，与上述讨论的东西交通遇到的那些困难相比，不需付出更大的艰苦努力就可以克服。

欧亚草原游牧政权的出现与成熟*

——精英封堆的发展与衰落

林俊雄（Hayashi Toshio）著　卓文静、刘文锁译

导言

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上何时开始出现骑马游牧民族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有些学者认为，骑马的原始印欧人（Proto-Indo-European）与强大的军事权力一起，于公元前5000年晚期至前4000年间出现于欧亚草原的西部。[①] 另一些学者认为，骑马人间的战斗仅仅是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的初期。[②] 库兹米娜（E. E. Kuz'mina）提出，青铜时代的末期（公元前12—前9世纪），一场生态和经济的危机迫使一些草原部落转以游牧业为生，此过程完成于斯基泰时期（Scythian Period）。[③]

在古代世界，统一王国的第一个君主通常会兴建纪念性建筑，如雄伟

---

* 本文译自《塞西亚至西伯利亚的古代文明》第19期（*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19［2013］），第105—141页。原文题目为"The Beginning and the Maturity of Nomadic Powers in the Eurasian Steppes: Growing and Downsizing of Elite Tumuli"。——译者注

① 金布塔斯（Gimbutas），1997年，第355—356页；安东尼（Anthony），2007年，第236—237页；不过，安东尼把铜石并用时代的骑马劫掠者视作部落战士（非同于后世的有组织的骑士）。

② 哈扎诺夫（Khazanov），1994年，第90—95页；德鲁兹（Drews），2004年，第68—69页及以后。

③ 库兹米娜，1994年，第44页。

的陵墓。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是引导民众了解王国起源的象征物。埃及古王国时代早期的国王们修建大型金字塔。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最雄伟陵墓的墓主是弗里吉亚（Phrygian）和吕底亚（Lydian）的国王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兴建了巨型的陵墓。在朝鲜，新罗早期的国王们修建了大墓。在日本，最大的古坟建造于古坟时代的早期，即3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古坟规模的不同清晰地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差异。我们可否于欧亚草原中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呢？[①]

在蒙古，发现了许多被圆形或方形的石围墙环绕的石堆，它们规格不一，蒙古的考古学文献里将它们称为"克列克苏"（khereksur）。[②] 克列克苏的年代[③] 和功能目前尚不清晰。一些考古学家相信，克列克苏不是墓葬而是祭日的遗址。譬如，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的乌鲁格·霍仑（Ulug Khorum，大封堆）克列克苏，以圆形克列克苏为中心，环绕排列成放射线状的若干列石头，类似装有辐条的车轮或太阳。[④]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克列克苏，特别是规模较大者，也许可以视

---

① B. M. 莫佐列夫斯基（B. M. Mozolevs'kii）和 A. Yu. 阿列克谢耶夫（A. Yu. Alekseev）依据高度和被杀殉的随从数量，将黑海北部地区的斯基泰大型封堆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参见莫佐列夫斯基，1979年；特雷诺日金（Terenozhkin）与莫佐列夫斯基，1988年；阿列克谢耶夫等人，1991年。

② 蒙语称之为"吉尔吉斯—忽勿尔"（khirgis-khüür），"吉尔吉斯（人）的尸体（或坟墓）"。19世纪的俄国考古学家从当地人那里听说这个名称，把它转写成了"克列克苏"（khereksur）。此后，"克列克苏"一词就被俄罗斯考古学家们所使用。中国中天山尤勒都斯高原的蒙古人，称这种类型的遗址为"柯尔克孜牙石"（kirgis-yas），"柯尔克孜的尸骨"。参见林俊雄，1998年，第32页。

③ 在断代上有两方面的难度。一是发掘的克列克苏很少，二是在克列克苏里几乎未发现任何东西。

④ 格拉齐（Grach），1980年，第62页。

为最初的游牧政权象征。日蒙联合考察队[①]设定的考察目标，是阐明克列克苏的年代和功能，探讨游牧政权的起源。



图 1　围绕乌兰乌石山的 I—X 组遗迹（高滨秀等人，2006）

乌兰乌石 I 组（Ulaan Uushig I）

乌兰乌石 I 组位于木伦市（Mörön）附近的乌兰乌石（“红肺”）山山脚，在乌兰巴托市西北 550 公里处，地处库苏古尔省（Khövösgöl Aymak）的中部。经过我们考古调查，在山的附近共发现了 10 组各类考古遗迹（I—X）（图 1），主要集中于山的东部和南部，山北没有考古遗存。这些遗迹组环绕着山分布，类似于环绕克列克苏分布的石堆。

在每一组遗迹中，均包含不同规格的克列克苏，包括大型（图 2）、中型和小型。一般而言，较大规格的克列克苏位于地势稍微低平的山脚，较小的位于地势稍高的斜坡。规格差别也许揭示了社会组织的等级体系。

---

① 日本方面的负责人是林俊雄（1999）和金泽大学的高滨秀（TakahamaShu）教授（2003—2007），蒙古方面的负责人是乌兰巴托大学（University of Ulan-Bator）的狄马加夫 · 额尔德尼巴特尔（Diimaajav Erdenebaatar）博士。我们的研究实施于 1999 年和 2003—2007 年。参见高滨秀等人，2006 年；高滨秀，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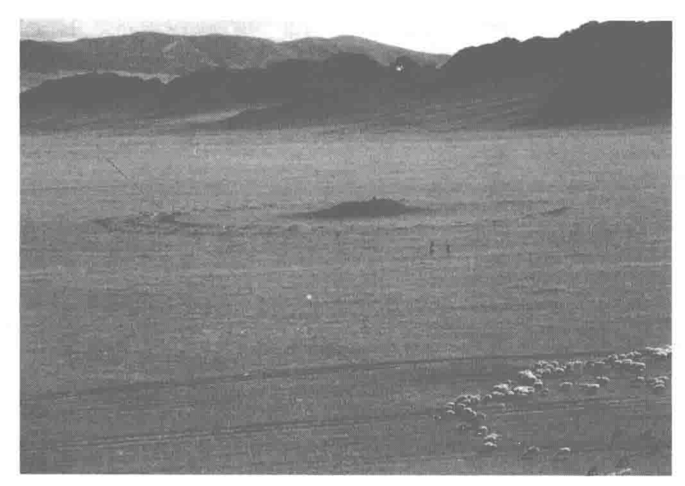


图 2　乌兰乌石 V 组，最大的克列克苏，带圆形石圈和成百的石堆（林俊雄摄影）

我们主要考察了乌兰乌石 I 组（北纬 49°39′32″，东经 99°55′42″），其中包括了 15 座克列克苏、15 通鹿石和许多小型石圈和石堆（图 3）。其中的一块鹿石因为雕刻有人面而广为人知（图 4、5）。[①] 俄罗斯考古学家沃尔科夫（V. V. Volkov）和诺夫戈罗多娃（E. A. Novgorodova）于 1970 年曾考察过此遗址。[②] 他们绘制了遗址的平面图和复原图，在一些鹿石周围做了小范围的考古发掘。但是他们的平面图和复原图不够精确，他们将此遗址命名为“乌石之南”（Uushkiin-Uver）。由于今天我们了解到乌兰乌石山的南部存在若干组遗迹，所以，我们将此遗址更名为乌兰乌石 I 组。

① 有人面的鹿石是很罕见的，已知在总数 600 余通中仅有 4 或 5 通。

② 沃尔科夫和诺夫戈罗多娃，1975 年；沃尔科夫，1981 年，第 61—66，195—202 页；2002 年，第 78—83，187—194 页；诺夫戈罗多娃，1989 年，第 203—2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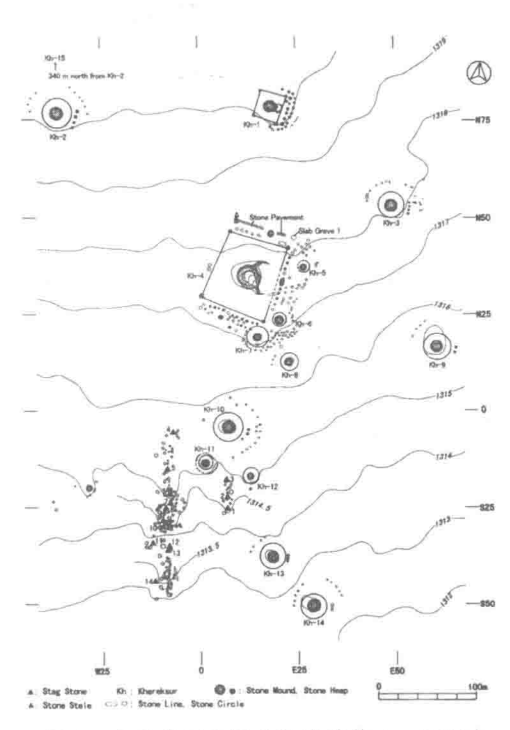


图 3　乌兰乌石 I 组（高滨秀等人，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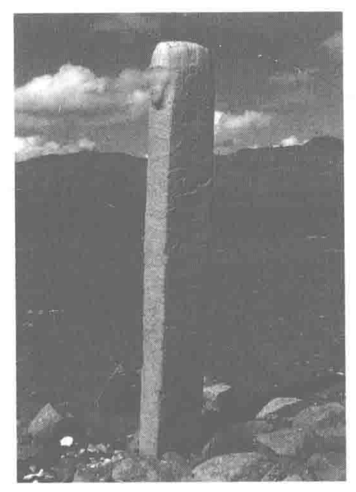


图 4　14 号鹿石（林俊雄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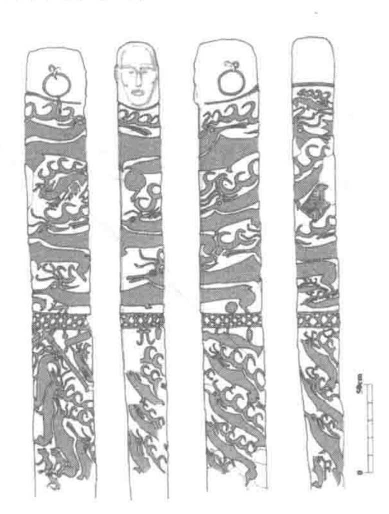


图 5　14 号鹿石线条图（高滨秀等人，2006）

乌兰乌石 I 组，1 号和 12 号克列克苏（Kh—1, Kh—12）

我们发掘了有石堆围绕的克列克苏 1 号（Kh—1，中型），没有石堆的 12 号（Kh—12，小型），带有石圈的鹿石 4 和 7（图 6、7）。

1 号克列克苏直径为 13 米，高 1.5 米。其东部有两条角形的突出部分。在发掘 1 号克列克苏时，我们发现了 2 组（件）有助于 1 号克列克苏断代的重要文物。第一组为散布于克列克苏中的陶片（图 8、9）。陶片属于一件或两件类似于“石板墓文化”（Slab grave culture）陶器的容器。[①] 此容器的年代相同于或晚于 1 号克列克苏。

第 2 件为雕刻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圈的鹿石。鹿石出土于克列克苏的边缘，长 82 厘米，宽 36 厘米，厚 13 厘米（图 10）。沃尔科夫将鹿石分为三大类型，没有动物图像的 A 类鹿石属于第一类。[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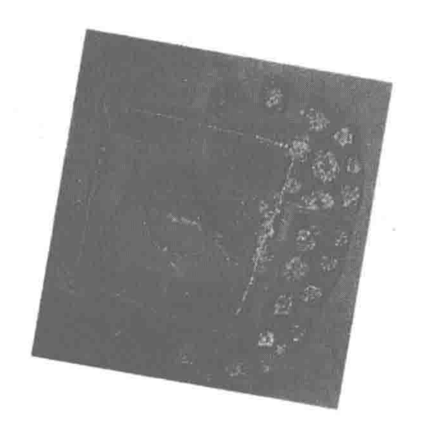


图 6　乌兰乌石 I 组，1 号克列克苏（凯特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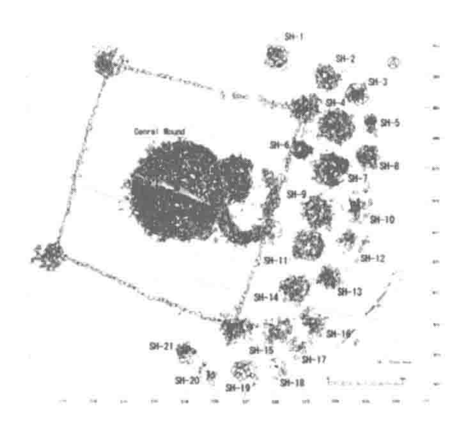


图 7　乌兰乌石 I 组，1 号克列克苏，平面图（高滨秀等人，2006）

① 策比克塔洛夫（Tsÿbiktarov），2001，图 29。石板墓文化断代为青铜器时代晚期和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第 2 千纪末至前第 1 千纪中叶。

② 沃尔科夫，2002 年，第 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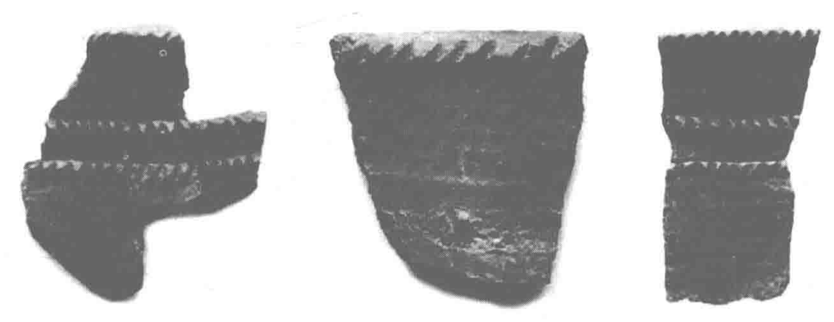


图 8　陶片，出自 1 号克列克苏中心石堆（林俊雄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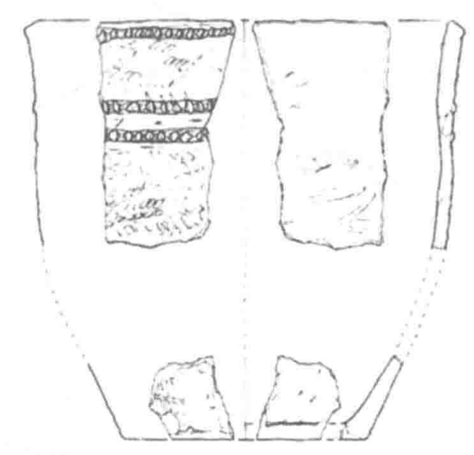


图 9　陶器复原图，高约 24 厘米（高滨秀等人，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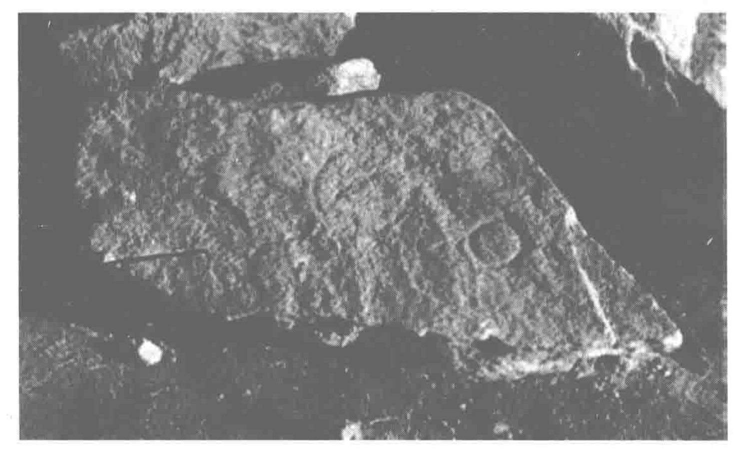


图 10　雕刻大、小圆圈的鹿石（林俊雄摄影）

在克列克苏石堆中央的地面上，我们发现了一座方形石室（长 141 厘米，宽 72 厘米）。石室的内部空间虽然狭小，但足以容纳下一具屈肢葬者（图 11、12）。令人遗憾的是，在石室内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考古遗物。我们继续发掘了石室底部的地层，只找到新鲜的青草，和一个土拔鼠[①]的巢穴，内藏有我们一年前使用过的现代鞋带与棉手套。土拔鼠也喜欢移动尸体的骸骨。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告诉我们，之所以在石室内罕见人的骸骨，就是因为土拔鼠的这个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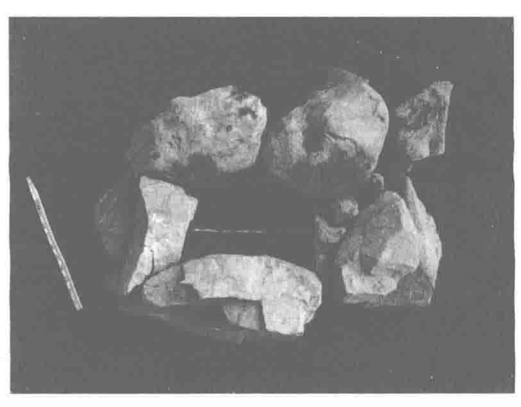


图 11　1 号克列克苏中心石堆下方建于地面上的石室（林俊雄、高滨秀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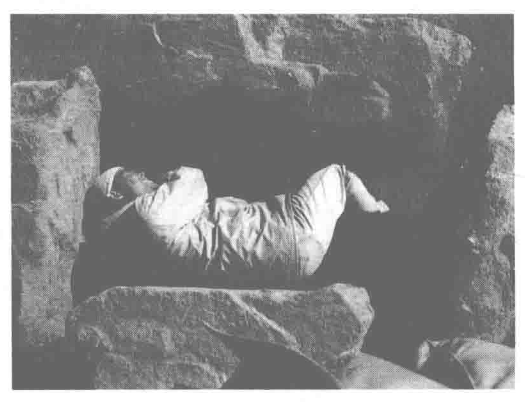


图 12　1 号克列克苏中心石堆下方建于地面上的石室，虽小但足以容纳一个屈肢的人（林俊雄、高滨秀摄影）

① 学名 Marmota bobak，旱獭的一种。

在 1 号克列克苏的东部有 21 座石堆。除第 1、6、19 和 21 号石堆外，其余的 17 座石堆中均出土有马的头骨、下颌骨和一节颈椎骨等，部分石堆里出土了第三节趾骨（图 13），一座石堆里出土了尾骨；马骨葬于地面之上，或是地面下的小坑内。[①] 所有的马的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之间均被斩断。[②] 头骨和与第一颈椎相连的下颌骨一起，与其他颈椎骨平行排列，马鼻朝东。动物考古学家杭高（H. Hongo）认为，马颈在下葬前虽然可能被剥皮和剔肉，但是在下葬时它们的关节仍然彼此相连。同样的马殉也可见于布里亚特（Buryatia）的南部地区。[③]



图 13　1 号克列克苏的第 13 号石堆。
马的头骨、下颌骨、颈椎骨和蹄子（林俊雄摄影）

第 1、6、19 和 21 号石堆被严重扰乱。因此，这 4 座石堆原本也许与其他石堆一样，同样葬有马骨。也就是说，1 号克列克苏共葬有 17 至 21 匹殉马。杭高分析了其中的 4 具马骨，1 具为成年马，3 具为马驹。根据

① 在石垣四角的石堆里，我们未发现任何遗物。

② 杭高，2006，第 79 页。

③ 达涅洛夫（Danilov），1995 年。

马的出齿情况，推测3匹马驹在殉葬时年龄相当，这就意味着，马的殉葬仪式是在一年当中的某个特定时间举行的。[1]

下面，我们将讨论12号克列克苏。其直径为9米，被一直径为16米的石圈所环绕（图14）。通过发掘，我们在克列克苏中找到了一把长16.7厘米的铁刀（图15）。铁刀的形状与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的青铜刀类似。类似的铁刀在内蒙古毛庆沟墓地也有出土[2]，但是难以确认铁刀与12号克列克苏之间有着直接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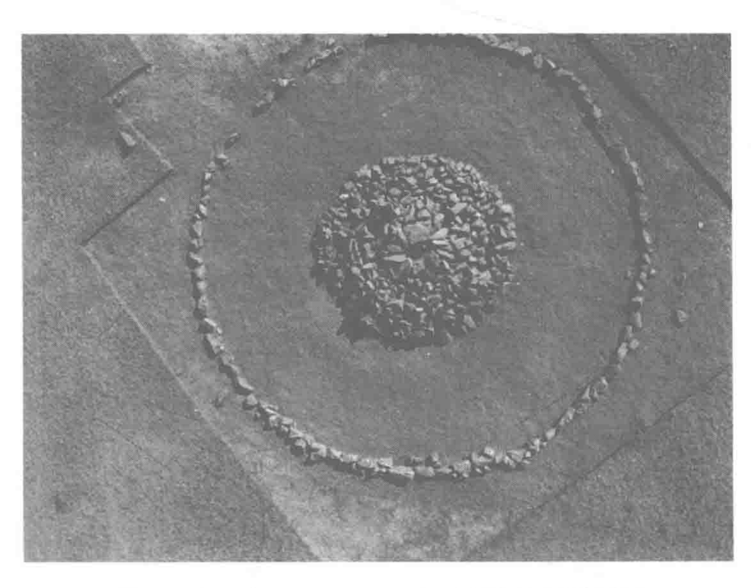


图14　乌兰乌石I组，12号克列克苏（凯特摄影）

① 杭高，2006年，第79页。

② 田与郭，1986年，第295页。

此处指北京出版的田广金与郭素新编著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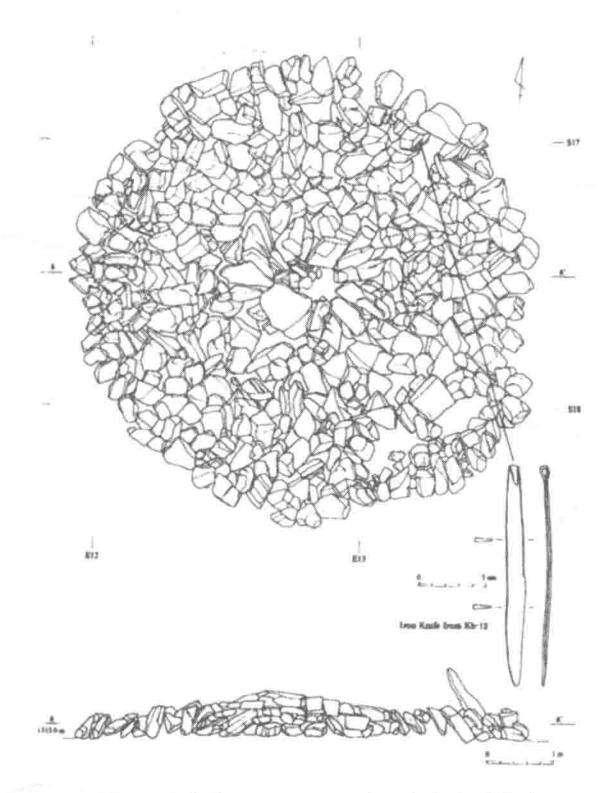


图 15　12 号克列克苏，平面图，铁刀（高滨秀等人，2006）

克列克苏中心石堆中部的地面上，置有一座椭圆形的石室（120 × 60 厘米）（图 16）。石室内发现有骸骨（图 17），其主要属于一名 5 至 6 岁的儿童。[①] 此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其支持克列克苏基本上应该是墓葬遗址的观点。据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的介绍，此为蒙古境内第 4 例在石室中出土人骨的克列克苏。

---

① 人类学家 D. 屠门（D. Tümen）博士研究了这具骸骨。他是蒙古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的教授。参见屠门，2006 年，第 8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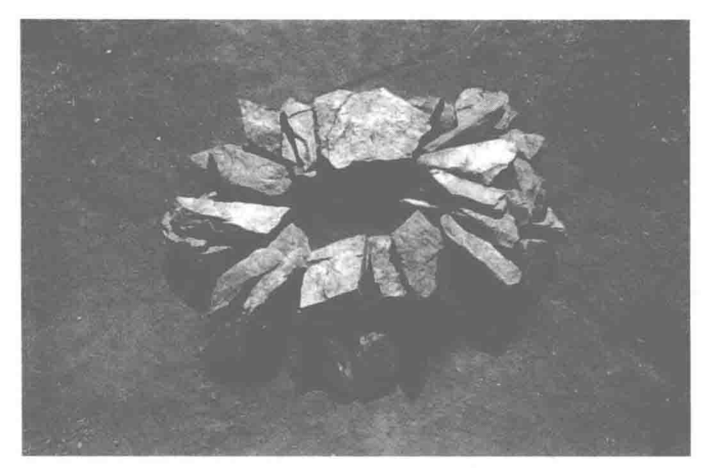


图 16　12 号克列克苏，石室（林俊雄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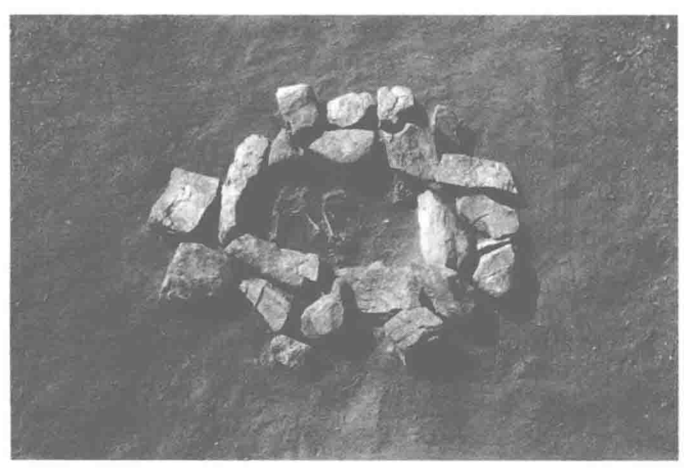


图 17　12 号克列克苏，一位 5 至 6 岁儿童的尸骨
（林俊雄摄影）

乌兰乌石Ⅰ组，4 号和 7 号鹿石

鹿石通常立于克列克苏附近，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仍然模糊不清。因此，我们通过发掘4号和7号鹿石周边区域，试图确认二者是否存在关联。

当1970年沃尔科夫发现4号鹿石时，其正埋于地下，从地面上很难看到。[①] 也正因为如此，4号鹿石上的图像得以完好保存。[②] 除了鹿像外，鹿石上还雕有耳环、盾、腰带、斧头、刀和卡拉苏克（Karasuk）文化类型的短剑（图18、19）。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末叶至前1000年初叶。图像中鹿折叠的腿部，与斯基泰早期的动物图像（前8—前6世纪）的腿部类似，但是牡鹿的其他部分则远远脱离自然界中的原型：鸟喙似的口鼻，超长的脖子，非常纤细的腿。这些特征未见于斯基泰早期艺术。



图18　4号鹿石，高240厘米
（林俊雄摄影）



图19　4号鹿石线条图，高240厘米
（高滨秀等人，2006）

鹿石的周围环绕着石圈和石堆。我们发掘了环绕4号鹿石的8个石圈。其中6个石圈内均出土了马的头骨和颈椎骨，有1个石圈内还出土了趾骨

① 沃尔科夫，2002年，第79页。

② 之后此鹿石被重新竖立起来，并像乌兰乌石I组的其他众多鹿石一样，被水泥加固了，可能是当地政府所为。

（图 20）。马鼻总是朝向东方，与 1 号克列克苏相一致。



图 20 4 号鹿石的 7 号石圈，马的头骨、下颌骨、颈椎骨和趾骨（林俊雄摄影）

7 号鹿石附近的石圈和石堆内，我们发现了 5 具马骨（头骨、颈骨和趾骨）。马鼻也是朝东。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马，不论是环绕克列克苏还是环绕鹿石者，都没有被套上笼头。

克列克苏和鹿石的年代

我们认为，在环绕克列克苏的石堆内，以及环绕鹿石的石圈与石堆内，都曾举行相同的马殉仪式。依据卡拉苏克文化类型的短剑，可以推测克列克苏和鹿石的年代相若，为公元前 2000 年末叶至前 1000 年初叶。

此推测被发掘自乌兰乌石 I 组的动物骨骼的碳 14 测年结果所证实，实验结果由东京大学提供，见表 1。

表 1 乌兰乌石 I 组动物骸骨碳 14 测年结果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动物种类	实验室代码	^{14}C 年代（距今）	95% 校正年代范围（2σ）	$\sigma^{13}C$	C/N
乌兰乌石 01	SC-7	家马	MTC-12531	2749 ± 50	1005—810（公元前）	-20.3	3.2
乌兰乌石 02	Kh-1 SH-18	家马	MTC-12814	2871 ± 59	1259—903（公元前）	-21.0	3.2
乌兰乌石 03	SC-5	家马	MTC-12815	2923 ± 59	1312—936（公元前）	-20.3	3.1
乌兰乌石 04	Kh-1 SL-1	家牛	MTC-12816	2069 ± 57	347—57（公元）	-19.5	3.1
乌兰乌石 05	Kh-1 SH-11	家马	MTC-12817	2835 ± 57	1193—842（公元前）	-20.8	3.1

注：由东京大学前沿科学研究院检测。

乌兰乌石 01 与 03 号的样品，均采自环绕 4 号鹿石的石圈内。乌兰乌石 02 与 05 号的样品，采自环绕 1 号克列克苏的石堆内。上述 4 个样品表明，克列克苏与鹿石均建造于公元前 13—前 9 世纪，也就是卡拉苏克时期。样品 04 可能是在稍晚的年代被放置在 1 号克列克苏之上，因为它出土于 1 号克列克苏的表土层。

在蒙古境内，许多克列克苏的规格远大于 1 号克列克苏。这些克列克苏之中的两座，位于后杭爱省（Arkhangay aymak）温都尔乌兰县（Öndör-Ulaan sum）的乌尔特·布拉津山口（Urt Bulagyn am）。南面的克列克苏（图 21，位于北纬 48°04′47″，东经 101°03′32″），其规格稍大于北面者（图 22、23，北纬 48°05′34″，东经 101°03′24″）。蒙古—美国（匹兹堡大学）联合考察队曾发掘了南边的克列克苏。它有一道大型的长方形（长边为 200 米）石垣，并为超过 1700 座石堆和石圈所围绕。[①] 克列克苏中心

① 阿拉德（Allard）与额尔德尼巴特尔（Erdenebaatar），2005 年，第 549 页；菲兹修（Fitzhugh），2009 年。

石堆的最高点高 4.9 米，地面直径约 30 米。[①] 考察队发掘了其中的 7 座石堆，各发现一具马骨，包括头骨和颈骨，马骨都朝着东北东方向。[②] 也就是说，大约有 1700 匹马为一名死者殉葬。该死者一定是蒙古草原上最初的王当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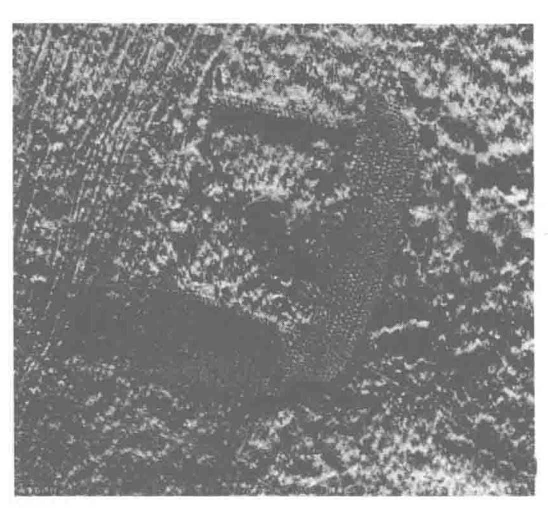


图 21 南面的大克列克苏（谷歌地图）



图 22 后杭爱省温都尔乌兰县乌尔特・布拉津山口的大克列克苏（北面）（林俊雄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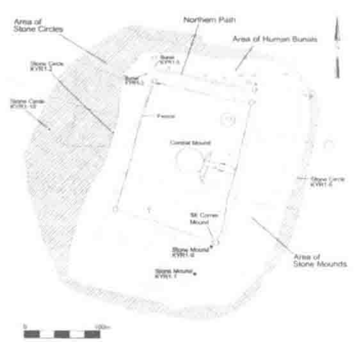


图 23 北面的大克列克苏（阿拉德等人，2006）

① 阿拉德等人，2006 年，第 209 页。

② 阿拉德等人，2006 年，第 214 页。

上述乌尔特·布拉津山口两座克列克苏的不同石堆中出土马骨的碳14测年，显示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040—前850年和公元前975—前680年。[1]此年代与乌兰乌石I组非常接近。因此，在结论部分我们提出，强有力的政权和社会结构的等级体系，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末至前1000年初出现在了蒙古。

斯基泰时期早期的大型封堆

一些克列克苏必定是建造于一个较晚的时期，因为它们伴随有年代较晚类型的鹿石。那种更为写实的、双腿挺直的鹿的形象，是公元前8—前6世纪早期斯基泰艺术的典型代表（图24、25）。



图24　克列克苏和鹿石，库苏古尔省新伊德尔（Shine Ider）县多尔瓦勒津山口（Dorvoljin am）（林俊雄摄影）

---

① 阿拉德与额尔德尼巴特尔，2005年，第551页。

依据最新的碳 14 分析结果，图瓦的阿尔然 1 号墓（Arzhan-1）（北纬 52°03′45″，东经 93°35′59″）中年代最早的斯基泰封堆，年代为公元前 9 世纪与前 8 世纪之交。[①] 阿尔然 1 号有一座低且平但是大型的石封堆（高 3—4 米，直径 110 米），封堆内的地面上还发现了一座复杂的原木结构。[②] 在封堆内发现了 17 具人的骸骨，其中 2 人为“国王夫妇”，其余 15 人可能是随从。此外，从封堆内还发现了 160 具马骨，均配有笼头。封堆的北、东和南侧都被许多小型石堆所围绕，石堆内可能葬有动物尸骨。格里雅子诺夫（M. P. Gryaznov）推测，在葬礼中大约有 300 匹马被屠宰，可能有超过 10000 人参与。[③] 格里雅子诺夫称阿尔然 1 号为“王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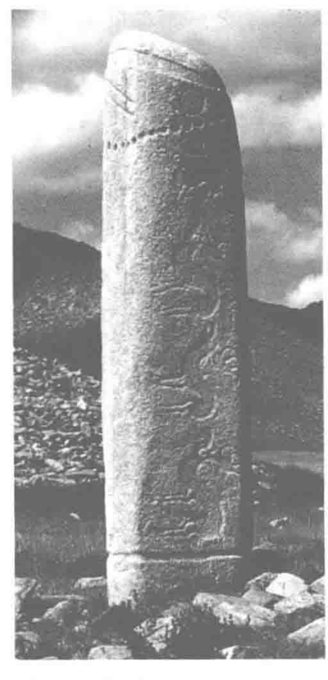


图 25　带有早期斯基泰样式鹿纹的鹿石，库苏古尔省新伊德尔县多尔瓦勒津山口（林俊雄摄影）

另一座规模较小的封堆是阿尔然 2 号墓（Arzhan-2），直径为 75—80 米，高 1.5—2 米，于 2000—2004 年间被发掘。[④] 其位于阿尔然 1 号墓的东北 9 公里处，被 200 个以上的石圈和非常多的石堆所环绕。[⑤] 封堆的近中心处有两座大型的方形坑，深度分别为 2.4 米和 2.6 米。坑内未发现任何遗存。发

① Zaïtseva 等，2007 年，第 648 页。

② 吉尔加兹诺夫（Grjaznov），1984 年，第 17 页。

③ 格里雅子诺夫，1980 年。

④ Čugunov 等，2010 年，第 15 页。

⑤ 南部和东南部的石圈或石堆可能毁于道路施工。参见丘古诺夫（Chugunov）等，2004 年，第 8 页。

掘者认为，这两座方坑可能是欺骗盗墓者的假墓穴。[①]真墓穴为一深 5.5 米的方形坑，坑内置一原木搭建的木椁（墓室），“国王夫妇”长眠于内。墓内发现了 14 具随从的骸骨，14 具马骨和奢侈的随葬品。阿尔然 2 号墓内的“国王夫妇”墓建造于公元前 7 世纪的中期或晚期，最可能的校正年代为公元前 622 年、前 659 年和前 634 年。[②]

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贝斯—夏提尔（Bes-shatyr）墓地，有几座大型库尔干（kurgan，封堆）(图 26)。规模最大的一座（北纬 43°55′22″，东经 78°12′39″）高 17 米，直径 100 米，被称为“大封堆”(图 27)。这座最大的封堆目前尚未被发掘，但是其他规模较小者已被发掘。规模略小于“大封堆”者为 3 号库尔干（Kurgan No.3），由 17 层相互交替的石头层和土层堆砌而成，地面之上用原木搭建了一座墓室[③](图28)。其他规模较小的墓葬内也发现了被石头层和土层交替覆盖的圆木墓室。

哈萨克考古学家阿基舍夫（K. A. Akishev）认为，此墓地的年代大致属于萨迦（Saka）时期，即公元前 7—前 4 世纪。他还提出，因为上述原木墓室的结构类似于斯基泰时期的早期墓，如扎博津（Zhabotin）524 号库尔干和乌勒斯基·阿乌勒（Ul'skii aul）1 号库尔干，所以墓地的年代应介于公元前 7—前 6 世纪之间。[④]本文认同他的观点，认为此墓地年代属于斯基泰时期的早期，公元前 8—前 6 世纪。[⑤]最近的碳 14 分析结果证实了此年代判断。俄

---

① Čugunov 等，2010 年，第 125 页。

② Zaïtseva 等，2007 年，第 652 页。

③ 3 号封堆的原木墓室曾被焚烧过。依阿基舍夫的观点，这是因为盗墓贼想要掩盖他们非法挖掘的痕迹（阿基舍夫与库沙耶夫，1963 年，第 46 页）。不过，据南乌拉尔（Ural）的菲力波夫卡 1 号墓地（Filippovka-1）、东哈萨克斯坦的奇里科塔（Chilikta）及图瓦的阿尔然 2 号墓（Arzhan-2），其原木被烧焦系出于火崇拜或耐久的目的。

④ 阿基舍夫与库沙耶夫，1963 年，第 80 页。

⑤ 林俊雄，2006 年，第 3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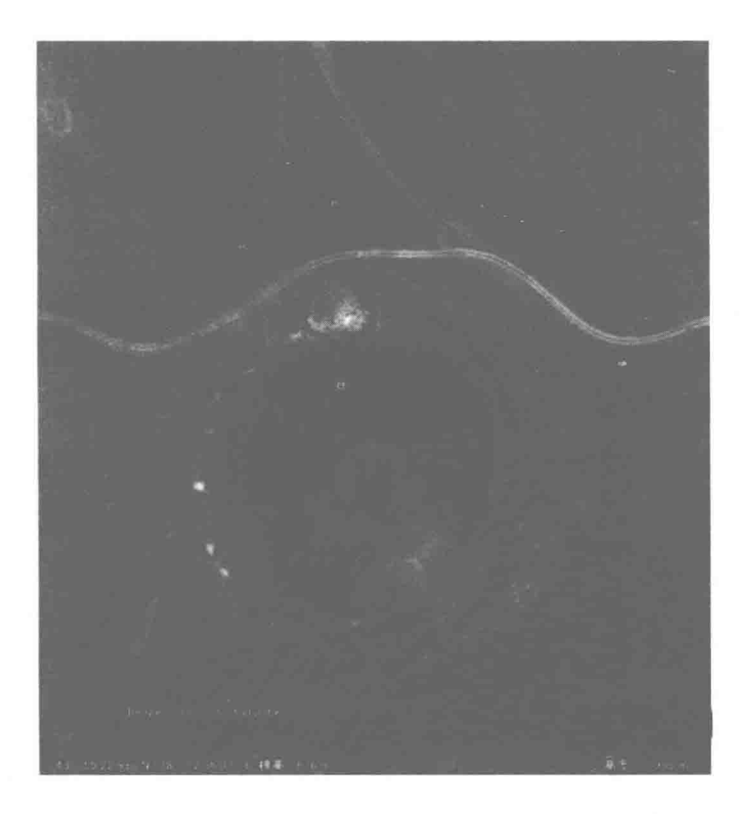


图 26 贝斯—夏提尔（“五顶帐篷”）的早期萨迦墓地，约公元前 8—前 7 世纪。哈萨克斯坦东南阿尔屯—爱梅尔（Altyn-emer）国家公园（谷歌地图，2009）



图 27　贝斯—夏提尔墓地最大的库尔干，高 17 米，
直径 100 米（林俊雄摄影，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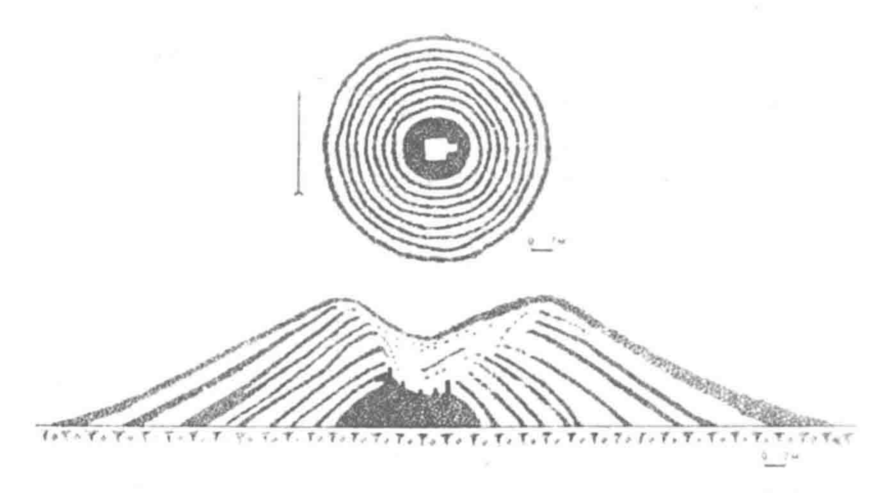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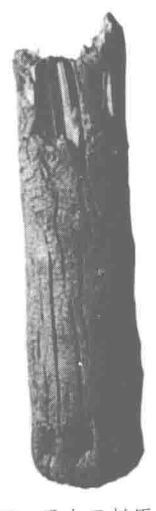


图 28　贝斯—夏提尔墓地 3 号库尔干的平面和剖面图，封堆由石和土构造，建在原始地面上的原木墓室被石头盖住，被焚烧过（阿基舍夫、库沙耶夫，1963）


图29 天山云杉原木，出自贝斯—夏提尔3号库尔干，高117厘米，公元前8世纪（阿里木拜，2011）

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分析结果，将贝斯—夏提尔3号墓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8世纪（图29）。[①] 在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奇里科塔（Chilikta, Shilikty），其原木墓室修建于距地面1米深的墓坑内（北纬47°10′34″，东经84°31′04″）。[②]

在北高加索地区，矗立着三座斯基泰时期早期的巨型封堆：乌勒斯基·阿乌勒1号（图30），克拉斯诺·兹纳姆亚1号（Krasnoe Znamya No.1）和乌阿石西图（Uashkhitu）。乌勒斯基·阿乌勒1号的高度可能超过了15米，在地面上修建有一座原木墓室，殉葬的马有360匹。[③] 克拉斯诺·兹纳姆亚1号高约14—15米，直径为70米，地面上有一座由石板和木头修建的墓室。[④] 乌阿石西图库尔干中发现了一座帐篷状的原木墓室，及一座较浅的墓坑。[⑤]

著名的克列尔梅斯（Kelermes）库尔干没有如此巨型的封堆，高4—7米，直径小于70米，但是在墓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尸体被置于地面上或浅坑内，除了木地板以外，未发现其他木质结构。[⑥] 科斯特罗姆斯卡亚1号（Kostromskaya No.1）库尔干也有一小型封堆，地表也有一座帐篷状原木结构（烧焦）（图31）。1号库尔干封堆被建在另一青铜时代的小封堆上。[⑦]

---

① 阿里木拜（Alimbay），2011年，第46—49页。

② 切尔尼科瓦（Chernikov），1965年。

③ 彼特连科（Petrenko），1989年，第221页。

④ 彼特连科，1983年，第43—48页。

⑤ 埃立克（Erlikh），1994年。

⑥ Galanina，1997年，第25—26页。

⑦ Il’inskaya与Terenozhkin，1983年，第68页；彼特连科，1989年，第2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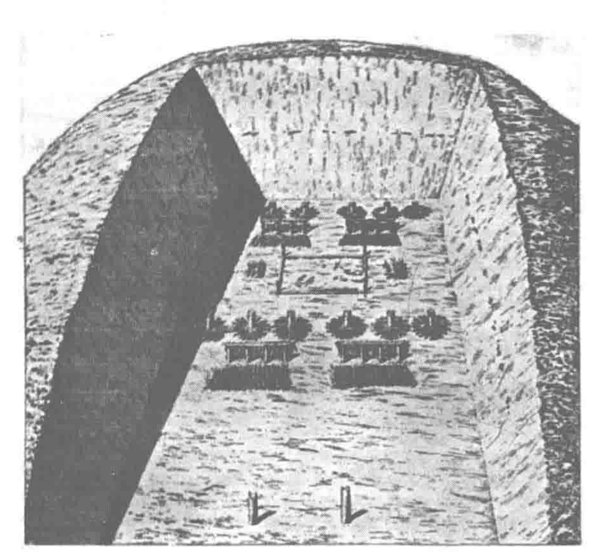


图 30　乌勒斯基·阿乌勒 1 号库尔干（Minns 1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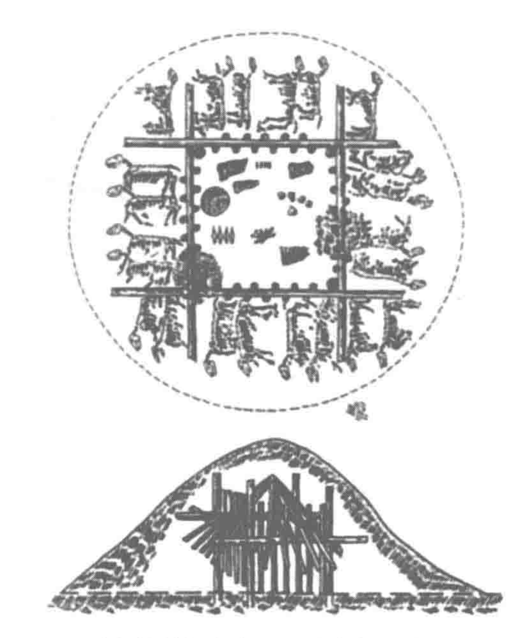


图 31　科斯特罗姆斯卡亚 1 号库尔干（Il'inskaya & Terenozhkin 1983）

位于第聂伯河（Dnepr）中游的年代最早的斯基泰库尔干，扎博津524号（Zhabotin No.524）和利托伊（Litoï, Mel'gunov），在封堆下的地面上都有用原木建的墓室。[①] 斯塔伊金·威尔赫1号（Staïkin Verkh No.1, Starshaya Mogila）（图32）高逾20米，直径逾40米；斯塔伊金·威尔赫2号（Staïkin Verkh No.2）高10.5米。二者在地面下均有一个木结构的墓室，但是均不深。[②] 奥勒荷夫斯基（V. S. Ol' khovskiï）指出：在黑海地区北部发现的斯基泰早期和中期墓葬中，有64座为竖穴土圹，7座为木椁（或木室），8座为偏洞室墓。大部分的原木木室墓修建于地面之上，非常少见修建于地面之下者。[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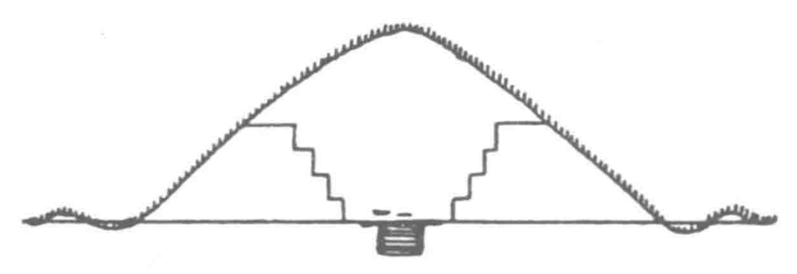


图32 斯塔伊金·威尔赫1号剖面图（Il'inskaya & Terenozhkin 1983）

斯基泰时期晚期的大型封堆：公元前5—前3世纪早期

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大量属于斯基泰时期晚期的库尔干被调查过。以下我将简要地描述它们的形制。

在黑海地区北部，曾建有几座"王室库尔干"（royal kurgans）。其中最大型的一座，切尔托姆雷克（Chertomlÿk），高21米，直径100米。封

① Il'inskaya与Terenozhkin，1983年。

② Il'inskaya，1983年，第24—27页。

③ 奥勒荷夫斯基，1978年。

堆由土堆砌而成，再覆盖以石头。墓室建于地面以下 12 米处。[①] 根据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的重新调查，它的封堆是由自某处草坪割取的 15×25 厘米大小的“草皮”堆积而成。堆积 1 立方米需要大约 270 块草皮，即大约需要割取 10 平方米大小的草坪（0.15×0.25×270=10.125）。切尔托姆雷克封堆的体积，计算为 75000（或 84000）立方米，共需要超过 75（或 84）公顷的草坪。[②] 为了建造体积为 140000 立方米的乌古兹库尔干（Oguz kurgan），需要毁坏 140 公顷的草地。[③] 这显示了斯基泰君主们的强大势力。

在阿尔泰巴泽雷克（Pazÿrÿk）的库尔干中，第 5 号封堆被认为是“王家库尔干”，是由于墓中出土了一张描绘国王具有非凡力量的画面的挂毯。该封堆的规模不算大，高 3.75 米，直径 42 米，但墓室深 4 米。墓坑内有一个原木的墓室。通过与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艺术题材的比较研究和树轮年代学，巴泽雷克的精英墓（巴泽雷克 1 号至 5 号）年代在公元前 5—前 4 世纪。[④] 不同的是，吉谢列夫（S. V. Kiselev）将 1 号库尔干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 3 世纪。[⑤] 卡瓦米（T. S. Kawami）也认为，1 号和 2 号库尔干中出土的格里芬（Griffen）图像与希腊艺术的比较表明，其年代不可能早于公元前 4 世纪，很可能更晚近一些。[⑥] 最新的碳 14 测年结果显示，年代最早的精英墓，巴泽雷克 2 号库尔干，大约建造于公元前 300 年；年代最晚的巴泽雷克 5 号库尔干，大约建于公元前 250 年。[⑦] 本文认为，巴泽雷克精英墓的年代可以推测为公元前 4 世纪，因为在巴泽雷

---

① 阿列克谢耶夫等，1991 年。

② 罗尔（Rolle）与穆尔金（Murzin），1991 年，第 172 页。

③ Boltrik 和 Fialko，1991 年，第 177 页。

④ 阿扎佩（Azarpay），1959 年，第 339 页；Rudenko，1970 年；Marsadolov，2000 年，第 21 页。

⑤ 吉谢列夫，1951 年，第 391 页。

⑥ 卡瓦米，1991 年。

⑦ Hajdas 等，2004 年，第 114 页；Panyushkina 等，2007 年。

克艺术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阿契美尼德艺术的图案和少数古典希腊时期的图案，但是未见希腊化时代的图案。[①]

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米奴辛斯克（Minusinsk）盆地，有一座巨型的长方形封堆，名为萨尔比克大库尔干（Great Salbyk kurgan），高11.5米，长和宽各是125米。在浅穴中，有一座帐篷状的原木结构。[②]它被断代为公元前4世纪，但是最新的碳14检测结果表明，其年代还要更加久远，为公元前750年至前400年前后。[③]

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16号库尔干（Issÿk kurgan No.16）高6米，直径60米，因为墓中曾出土"金人"而颇为出名。[④]其中发现了两座用原木做的墓室，均建于浅坑里。阿基舍夫认为，此墓的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但是他的儿子，A. K. 阿基舍夫（A. K. Akishev）更严谨地提出，其年代当为公元前4世纪末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期。[⑤]本文认可后者的观点。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阿尔泰地区的贝雷尔（Berel）库尔干，其结构也与伊塞克16号库尔干类似。[⑥]

南乌拉尔地区的两座"王家"库尔干，菲力波夫卡1号墓地（Filippovka 1 cemetery）的第1和4号，曾被发掘过。1号库尔干的封堆高7米，直径103—120米。墓穴为圆形，较浅（深1.8米，直径为17—18米）。墓穴可能被一层帐篷状的原木屋顶所遮盖。[⑦]4号库尔干（高6米）的墓穴为四角呈圆弧状的长方形。墓穴可能被原木顶遮盖。[⑧]

---

① 林俊雄，2012年。

② Chlenova，1992年，第211—212页；Devlet，1976年。

③ Svyatko等，2009年，第272页。

④ 阿基舍夫，1978年。

⑤ 阿基舍夫，1978年，第39、128页；A.K. 阿基舍夫，1984年，第5页。

⑥ 斯塔克（Stark），2011年。

⑦ Pshenichniuk，2000年。

⑧ 亚布隆斯基（Yablonski），2011年。

匈奴（亚洲匈人）和萨尔马特时期的王陵

自公元2000年以来，在蒙古境内先后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匈奴王族墓地；[①] 而在20世纪，我们仅知道有2座：诺音乌拉（Noyon-uul, Noin-ula）和伊勒莫瓦亚·帕德（Il'movaya pad'）。匈奴大墓的共同特征如下：

（1）墓地分布在山的北麓或西北麓森林里（图33）。（2）封堆呈长方形，有一道向南延伸的坡道（图34）。此形制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3）封堆并不算高（1.5—3米），但是墓穴出奇的深，达到10—20米（图33）。（4）主要封堆的东西两侧有陪葬墓。



图33　位于布里亚特（Buryatia）伊勒莫瓦亚·帕德的最大的墓葬，深20米（林俊雄摄影）

① 关于后杭爱省郭勒·莫德1号墓地（Gol Mod 1），参见Desroches *et al.*, 2002；郭勒·莫德2号墓地（Gol Mod 2），参见Miller *et al.*, 2006；中央省（Töv）的诺音乌拉，参见Polos'mak *et al.*, 2006；肯特省（Hentii）的都乌尔里克·纳尔斯（Duurlig Nars），参见Kim *et al.*, 2010；布里亚特的察拉木（Tsaram），参见Minyaev, 2009年。



图 34 蒙古后杭爱省郭勒·莫德 1 号墓地（Gol Mod 1）的长方形封堆，低矮并带有斜坡（林俊雄摄影）

匈奴的精英墓并不惹眼，其封堆较为低矮，位于山北坡的森林内；相形之下，精英的克列克苏和斯基泰精英墓（库尔干）则能够清楚地被辨认出来，因为它们的封堆雄伟，或分布在山的南麓或东麓，或矗立于广袤草原上。但是，匈奴精英墓的墓室特别幽深。

最后，我们略为回顾一下与匈奴同时代的游牧部族的王陵。

在阿富汗北部著名的黄金之丘（Tillya Tepe）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出土丰富随葬品的王陵和五座女性陪葬墓。这些墓葬在地面上都看不到任何的建筑。[①] 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均未遭到过盗贼的光顾。长眠于王陵中的"王"，可能是大月氏（the Great Yuezhi）人或贵霜（Kushan）人的后代。墓葬被断代为 1 世纪。

萨尔马特（Sarmatia）时期中期（公元前 2 世纪末至公元 2 世纪初）的库尔干规模不大。大型的高 1.5—2.5 米的封堆并不多见，而高逾 3 米者

① 萨里安尼迪（Sarianidi），1985、1989 年。

更是凤毛麟角。[①] 萨尔马特时期晚期（2—4 世纪）的库尔干规模更小。封堆高于或等于 2—2.5 米者非常罕见。[②]

结论

蒙古境内的第一个游牧政权，出现于公元前 2000 年末至公元前 1000 年初，时当卡拉苏克时期。这一游牧政权自蒙古通过欧亚草原带迅速扩散到了乌克兰。

率先拥有权势的精英们，想要通过可视的手段，展示和宣扬他们的势力。其象征就是一种大型的带有众多牺牲的封堆。草原上的平地被选来用作王族墓地。但是，这样显而易见的目标非常容易被盗。因此，原本建于地面的墓室被迁至地下。

几个世纪之后，草原上的权力被广泛地承认了，也就不再需要宣扬它们的强力。权力拥有者担心他的陵墓可能会被盗墓贼劫掠。[③] 随之，他选择了一种不那么具有代表性的坟墓，也就是低矮的坟丘但是更深的墓室，更有甚者修建于森林中。这显示了游牧政权的一种成熟。

匈奴—萨尔马特时期之后，突厥—蒙古君主们不再建造大型的封堆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斯基泰和斯基泰时期也就是大封堆的时期（表 2）。

① Moshkova，1989 年，第 178 页。

② Moshkova，1989 年，第 191 页。

③ 正是在公元前 78 年之前，乌桓劫掠了匈奴前任单于的陵墓。由是，匈奴怨恨乌桓。参见《汉书》卷 94《匈奴传》。

表 2 草原精英封堆在规模和形制上的变化

	前 13—前 9 世纪	前 9—前 8 世纪	前 8—前 6 世纪	前 5—前 3 世纪	前 3—前 2 世纪	前 1—3 世纪
黑海北部			石—土封堆，地面上或浅墓穴原木墓室	大型石—土封堆，带洞室深穴		矮石—土封堆，竖穴墓
北高加索			大型石—土封堆，地面上或浅墓穴原木墓室			矮石—土封堆，竖穴墓
南乌拉尔				大型石—土封堆，浅墓穴原木墓室		
哈萨克斯坦			大型石—土封堆，地面上或浅墓穴原木墓室	石—土封堆，浅墓穴原木墓室		
阿尔泰 / 哈卡斯 / 图瓦		石封堆，地面上原木墓室	石—土封堆，地面上原木墓室	石—土封堆，地面上原木墓室		
蒙古	石封堆，地面上石墓室					矮石—土封堆，深穴原木墓室

参考文献

Akishev, A. K. 1984 *Iskusstvo i mifologiya sakov* (Alma-Ata).

Akishev, K. A. 1978 *Kurgan Issÿk* (Moscow).

Akishev, K. A. and Kushaev, G. A. 1963 *Drevnyaya kul'tura sakov i usuneï dolinÿ reki Ili* (Alma-Ata).

Alekseev, A. Yu., Murzin, V. Yu. and Rolle, R. 1991 *Chertomlÿk: skifskiï tsasrskiï kurgan IV veka don. é.* (Kiev).

Alimbay, N. (ed.) 2011 *Culture of Saka and Wu-sun of Kazakhstan in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of Central State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Scientific Catalogue* (Almaty).

Allard, F. and Erdenebaatar, D. 2005 Khirigsuurs, Ritual and Mobility in the Bronze Age of Mongolia. *Antiquity* 79, 547-563.

Allard, F., Erdenebaatar, D. and Houle, J.-L. 2006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Khunuy River Valley, Central Mongolia. In D.L. Peterson *et alii* (eds.), *Beyond the Steppe and the Sown: Proceedings of the 2002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ference on Eurasian Archaeology* (*Colloquia Pontica* 13) (Leiden–Boston), 202-224.

Anthony, D. W. 2007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Boltrik, Yu. V., Fialko, E. E. 1991 Der Oguz-Kurgan: Grabmal eines skythischen Königs. In R. Rolle, M. Müller-Wille, K. Schietzel (eds.), *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Schleswig), 177-179.

Chernikov, S. S. 1965 *Zagadka Zolotogo kurgana* (Moscow).

Chlenova, N. L. 1992 Tagarskaya kul'tura. In M. G. Moshkova (ed.), *Stepnaya polosa aziatskoĭ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e vremya* (*Arkheologiya SSSR*) (Moscow), 206-224.

Chugunov, K., Parzinger, H., Nagler, A. 2004 Arzhan 2: la tombe d' un prince scythe en Siberie du Sud. Rapport préliminaire des fouilles russo-allemandes de 2000-2002. *Arts Asiatiques* 59, 5-29.

Čugunov, K. V., Parzinger, H., Nagler, A. 2010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kurgan Aržan 2 in Tuva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26. *Steppenvölker Eurasens* 3) (Mainz).

Danilov, S. V. 1995 Zhertvennÿ kompleks u sela Nizhniï Burgultaï i nekotorÿe voprosÿ drevnikh obryadov i verovaniï. In *Kul'turÿ i pamyatniki bronzovogo i rannego zheleznogo vekov Zabaïkal'ya i Mongolii* (Ulan-Ude), 92-101.

Desroches, J.-P., André, G. 2002 Une tombe princière Xiongnu à Gol Mod, Mongolie (campagnes de fouilles 2000-2001). *Arts Asiatiques* 57, 194-205.

Devlet, M. A. 1976 Bol'shoï Salbÿkskiï kurgan. In *Iz istorii Sibiri* (Tomsk) 21, 146-154.

Drews, R. 2004 *Early Riders: The Beginnings of Mounted Warfar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Erdenebaatar, D., Grizeaud, J.-J. 2002 La Tombe T1 de Gol-Mod. In *Gol mod: Nouvelles découvertes en Mongolie 2000-2001* (Paris), 18-22.

Erlikh, V. R. 1994 *U istokov ranneskifskogo kompleksa* (Moscow).

Fitzhugh, W. W. 2009 Pre-Scythian Ceremonialism, Deer Stone Art, and 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Northern Mongolia. In B. K. Hanks, K. M. Linduff (eds.), *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 Monuments, metals, and mobility* (New York 2009), 378-411.

Galanina, L. K. 1997 *Die Kurgane von Kelermes.»Königsgräber« der frühskythischen Zeit (Steppenvölker Eurasiens* 1) (Moscow).

Gimbutas, M. 1997 The Fall and Transformation of Old Europe: Recapitulation 1993. In *The Kurgan Culture and the Indo-Europeanization of Europ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1952 to 1993* (Washington, D.C.), 351-372.

Grach, A. D. 1980 *Drevnie kochevniki v tsentre Azii* (Moscow).

Grjaznov, M. P. 1984 *Der Grosskurgan von Aržan in Tuva, Südsibirien (Materialien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23) (Munich).

Gryaznov, M. P. 1980 *Arzhan: Tsarskiĭ kurgan ranneskifskogo vremeni* (Leningrad).

Hajdas, I. *et alii* 2004 Chronology of Pazyryk 2 and Ulandryk 4 Kurgans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Radiocarbon Dating and Dendrochronology: A Step towards More Precise Dating of Scythian Burials. In E. Marian Scott, Andrey Yu. Alekseev, Ganna Zaitseva (eds.),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O Advanced Research Workshop on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 St. Peteresburg, Russia, 15-18 November 2003 (NATO Science Series IV.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42) (Dordrecht), 107-116.

Hayashi, T. 1998 New Discoveries in the Tianshan Mountains *Sinica* 9 (7), 30-35 (in Japanese).

Hayashi, T. 2006 First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umuli: Especially Focusing on Scythian Tumuli. *Helis* V (Sofia), 324-332.

Hayashi T. 2013 Griffin Motif: From the West to East Asia via the Altai. In C. Lippolis (ed.),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Boris A. Litvinsky* (*Parthica* 14) (in print).

Hongo, H. 2006 Equid Burials at Ulaan Uushig I Excavated in 1999. In S. Takahama, T. Hayashi, M. Kawamata, R. Matsubara, D. Erdenebaatar,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Ulaan Uushig I (Uushigiin Övör) in Mongolia.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Kanazawa* 28, 79-81.

Il' inskaya, V. A. 1983 *Skifÿ dneprovskogo lesostepnogo levoberezh'ya* (Kiev).

Il' inskaya, V. A. and Terenozhkin, A. I. 1983 *Skifiya VII-IV vv. do n é.* (Kiev).

Khazanov, A. 1994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2nd ed. (Madison).

Kim, K. *et alii* 2010 A Western Eurasian Male Is Found in 2000-year-old Elite Xiongnu Cemetery in Northeast Mongoli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42 (3), 429-440.

Kuz' mina, E. E. 1994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Stock-breeding Husbandry and

Ecology of the Steppes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aeological and Palaeoecological Data (4th Millenium BC-8th Century BC). In B. Genito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Naples 9-12 November 1992.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 Series Minor* 44*)* (Naples), 31-71.

Marsadolov, L. S. 2000 *Arkheologicheskie pamyatniki IX-III vekov do n. é. gornÿkh raïonov Altaya kak kul'turno-istoricheskie istochniki* (St.-Petersburg).

Menghin, W. *et alii* 2007 W. Menghin, H. Parzinger, A. Nagler, M. Nawroth (eds.), *Im Zeichen des Goldenen Greifen. Königsgräber der Skythen* (Munich, Berlin, London, New York).

Miller, B. K., *et alii* 2006 A Xiongnu Tomb Complex: Excavations at Gol Mod 2 Cemetery, Mongolia (2002-05). *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Ulan-Bator) 2/2, 1-21.

Minns, E. H. 1913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Minyaev, S. S. 2009 Tsaram: A Burial Ground of the Hsiung-nu Elite in Transbaikal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 (2), 49-58.

Moshkova, M. G. 1989a Srednesarmatskaya kul' tura. In A. I. Melyukova (ed.), *Stepi evropeïskoï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e vremya* (*Arkheologiya SSSR*) (Moscow), 177-191.

Moshkova, M. G. 1989b Pozdnesarmatskaya kul' tura. In A. I. Melyukova (ed.), *Stepi evropeiskoi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e vremya* (*Arkheologiya SSSR*) (Moscow), 191-202.

Mozolevs'kii, B. M. 1979 *Tovsta Mogila* (Kiev).

Novgorodova, E. A. 1989 *Drevnyaya Mongoliya* (Moscow).

Ol'khovskii, V. S. 1978 Ranneskifskie pogrebal' nÿe sooruzheniya po Gerodotu i arkheologicheskim dannÿm. *Sovetskaya arkheologiya,* no. 4, 83-97.

Panyushkina, I. *et alii* 2007 Floating Larch Tree-ring Chronologies from Archaeological Timbers in the Russian Altai between about 800 BC and AD 800. *Radiocarbon* 49 (2), 693-702.

Petrenko, V. G. 1983 Skifskaya kul 'tura na Severnom Kavkaze. *Arkheologicheskiï sbornik Gosudarstvennogo Érmitazha* 23, 43-48.

Petrenko, V. G. 1989 Skifÿ na Severnom Kavkaze. In A. I. Melyukova (ed.), *Stepi evropeïskoï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e vremya (Arkheologiya SSSR)* (Moscow), 216-223.

Polos'mak, N. V. and Bogdanov, E. S. 2006 Na 18 metrov v glubinu vekov. *Nauka iz pervÿkh ruk*, no. 12, 14-23.

Pshenichniuk, A. 2000 The Filippovka Kurgans at the heart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J. Aruz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New York), 21-30.

Rolle, R. and Murzin, V. Yu. 1991 "Pyramiden" der Steppe und Viehweiden für die Ewigkeit. In R. Rolle, M. Müller-Wille, K. Schietzel (eds.), *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Schleswig), 171-176.

Rudenko, S. I. 1970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 (London).

Sarianidi, V. 1985 *Bactrian Gold from the Excavations of the Tillya-tepe Necropoli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Leningrad).

Sarianidi, V. I. 1989 *Khram i nekropol' Tillyatepe* (Moscow).

Stark, S. *et alii* (eds.) 2011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New York).

Svyatko, S. V. *et alii* 2009 New Radiocarbon Dates and a Review of the Chronology of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from the Minusinsk Basin, Southern Siberia, Russia. *Radiocarbon* 51 (1), 243-273.

Takahama, S. 2010 Research of Ulaan Uushig I (Uushigiin Ovor) in Mongolia. In *Drevnie kul'turÿ Mongolii i Baĭkal'skoĭ Sibiri: Materialÿ mezhdunarodnoĭ nauchnoĭ konferentsii (Ulan-Ude, 20-24 sentyabrya 2010 g.)* (Ulan-Ude), 126-131.

Takahama, S., Hayashi, T., Kawamata, M., Matsubara, R. and Erdenebaatar, D. 2006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Ulaan Uushig I (Uushigiin Ovor) in Mongolia,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Kanazawa* 28, 61-102.

Terenozhkin, A. I. and Mozolevskiĭ, B. N. 1988 *Melitopol'skiĭ kurgan* (Kiev).

Tian, G. and Guo, S. 1986 *Ordos Bronzes* (Beijing).

Tümen, D. 2006 Observations on Bones from Ulaan Uushig I in 2005. In *Takahama et alii*, 81-82.

Tsÿbiktarov, A. D. 2001 *Buryatiya v drevnosti. Istoriya (s drevneĭshikh vremen do XVII veka)* (Ulan-Ude).

Volkov, V. V. 1981 *Olennÿe kamni Mongolii* (Ulan-Bator).

Volkov, V. V. 2002 *Olennÿe kamni Mongolii* (Moscow).

Volkov, V. V. and Novgorodova, É. A. 1970 Olennÿe kamni Ushkïn-Uvera (Mongolia). In *Pervobÿtnaya arkheologiya Sibiri* (Leningrad), 78-84.

Yablonskii, L. T. 2011 Novÿe raskopki Filippovskogo 1 mogil' nika. *Estestvenno-nauchnÿe metodÿ v izuchenii Filippovskogo 1 mogil'nika* (Moscow), 7-19.

Zaitseva, G. I. *et al*. 2007 Chronology of Key Barrow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cythian Period in Tuva (Arzhan-1 and Arzhan-2 Barrows). *Radiocarbon* 49(2), 645-658.

斯基泰野兽风格艺术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 *

Г. Н. 古洛奇金（Г. Н. Курочкин）著　孙危译

洛雷斯坦是伊朗西部一处不大的山区，这里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其原因是当地发现并盗掘了大量古代墓葬。按R.迪索提供的资料，共有四五百处墓地，每处墓地中有10到200座墓葬。[①] 在这些墓地发现的随葬品绝大多数是青铜器，它们被称之为洛雷斯坦青铜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有种类和式样繁多的武器，其中包括短剑、矛头、镞、箭囊、盾牌、头盔、斧、镐、钺、锤。此外还有各种工具，如砺石、锯、镰、叉和勺等。还有马具和装饰品，后者的种类包括垂饰、项链、颈饰、耳环、手镯、带扣、铜镜和发簪等。还有祭祀用品，可能是一种偶像或是旗帜，同时它还配合专门的支脚使用。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些物品的第一个感觉是惊诧于它们在造型风格上的不同寻常。此外，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带有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者和神的名字，这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在东方考古学中，古代伊朗是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一个地区。比利时考古学家Л. 万杰别勒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像关于洛雷斯坦青铜器的起源和年代问题一样，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论。"[②]

---

* 本文译自"Скиф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звериного стиля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бронзы Луристан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92, №2。——译者注

① R. Dussaud, The *Bronzes of Luristan: Types and History*//SPA. 1938. V. I（R. 迪索：《洛雷斯坦青铜器：样式和历史》，西班牙，1938.V. I.）第255页。

② L. Vanden Berghe, *Het archeologisch ander zoek naar de bronseultuur van Luristan*, Brussel, 1968.

第一个关于洛雷斯坦青铜器发现地及概况的报道是专家们从一些对古迹感兴趣的商人那里偶然得知的。这些传播消息的人中，有一个是来自德黑兰的商人，他是一个古董爱好者，名叫拉别诺乌。他得到了当地军事首领的特批，去过洛雷斯坦地区。另外还有一个是美国人在德黑兰开办的大学里的大学生，与拉别诺乌不同的是，这个学生亲自参与了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盗掘活动[①]。这些信息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价值。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学者们陆续对洛雷斯坦青铜器展开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这其中第一个对洛雷斯坦青铜器展开细致调查并进行考古发掘的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谢勒·奥列勒·斯杰伊。此外还有美国考古学家艾里贺·西米特，他是研究古代东方的大家。最能体现他成果的是他在苏勒贺·杜姆的发掘，这里位于洛雷斯坦南部的库贺伊·杰什特山谷中。在这里的一处小山丘顶部他发现了青铜时代的石棺墓，此外还发现了公元前10—前 8 世纪的祭祀建筑遗址。对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中断，重新恢复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丹麦考察团（领队是Π. 莫勒杰塞等人）于 1963—1964 年间在中央洛雷斯坦地区发掘了几处遗迹，其中就包括了杰别—古兰遗址，这是个具有多个文化层的新石器时代居址。通过这次发掘，学界弄清了很多关于洛雷斯坦地区生产型经济形成过程中的问题。英国考察团在克莱勒·果夫的率领下调查了比什库和（位于洛雷斯坦东北部），并收集了很多地点发现的陶片。此外，他们为了进行长期的发掘还在巴巴德让镇建立了工作站。比利时考察团在 Л. 万杰别勒克的率领下在布什特库和（位于洛雷斯坦西南部）进行了多年的工作，

---

① A. U. Pope, Remarkable finds from Luristan//ILN. 6 Sept. 1930.（A. U. 蒲伯：《洛雷斯坦的重要发现》，《伦敦图解新闻》，1930 年 9 月 6 日。）A. U. Pope, More light on Luristan Bronzes//ILN. 22 Oct. 1932； 29 Oct. 1932.（A. U. 蒲伯：《洛雷斯坦青铜器的曙光》，《伦敦图解新闻》，1932 年 10 月 22—29 日。）

他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墓葬。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所进行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弄清了洛雷斯坦地区物质文明发展的几个基本阶段。但对于这些通过多次发掘所获得的考古材料来说，其意义并不是相同的。其中 Л. 万杰别勒克在洛雷斯坦西南部地区发掘的墓葬中所获得的材料要比克莱勒·果夫在洛雷斯坦东北部地区收集的材料更加富有成效，且种类繁多。但就比什库和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列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同时还能确定各类陶器的分布范围。而在布什特库和地区，目前只能依靠墓葬中出土的材料来构建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因此尚有许多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诸多关于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研究论著中，最重要的当属 Л. 万杰别勒克和 П. 卡里梅伊勒的著作。①

在发现了洛雷斯坦艺术的发源地后，立刻就有很多学者开始尝试探寻洛雷斯坦地区的古代居民与其他宗教在文化联系上的特点。其中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洛雷斯坦青铜器和克里特文化的遗物有相似之处，有的学者将洛雷斯坦发现的马辔头上的各种形象与伊特鲁里亚以及地中海东岸地区发现的马镳进行了对比，还有研究者在高加索地区、阿拉伯南部地区以及中国都找到了与洛雷斯坦青铜器非常类似的青铜制品。总之，洛雷斯坦青铜器吸引了很多从事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研究的学者的注意力。

A. M. 塔里格雷在《斯基泰野兽纹风格的起源》一文中提到，就斯基

---

① L. Vanden Berghe, Het archeologisch ander zoek naar de bronseultuur van Luristan, Brussel, 1968; P. Calmeyer, Datierbare Bronzen aus Luristan and Kirmanshan. B., 1969.（P. 卡里梅伊勒：《洛雷斯坦和科尔曼沙赫出土青铜器的年代》，1969 年。）B. A. Алекшин, Г. Н. Курочкин, Н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 Луристанским бронзам //CA. 1972. № 1.（B. A. 阿列克西尼、Г. Н. 古洛奇金：《关于洛雷斯坦青铜器的新书》，《苏联考古》，1972 年第 1 期。）

泰风格形成而言，高加索、外高加索以及洛雷斯坦地区均有很多适宜的条件。这些地区既有一般的日用品，又有带有各种野兽装饰纹样的豪华饰物。正如洛雷斯坦青铜器以及外高加索地区发现的一部分腰带、陶器和垂饰所展示出的，这些地区受到了古代东方文明的强烈影响。而南方地区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则提供了狮子、格里芬以及五花八门的具有复合特征的艺术形象。因此应该在古代东方文明与草原文明交界的地带寻找斯基泰野兽纹的起源地。①

1954 年日本学者角田的《洛雷斯坦文化与斯基泰文明》一文面世。②文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斯基泰人对洛雷斯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洛雷斯坦青铜器与斯基泰艺术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通常的解释如下：（1）这两种艺术风格尽管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是各自独立产生的，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应该视为偶然的现象；（2）野兽纹风格从洛雷斯坦地区传播到斯基泰地区途中很可能经过了外高加索地区；（3）斯基泰人在向西亚地区迁徙的过程中，根据他们的喜好把一部分洛雷斯坦艺术也带到了西亚地区。

目前还有这样一种观点：斯基泰艺术是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形成的，这里毗邻洛雷斯坦和亚述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在斯基泰艺术形成的过程中给予它很多直接的影响。③

---

① A. M. Tailgren, Zum Ursprungsgebiet des s.g. scythischen Tierstiel//AA. 1933. IV, 2-3.（A.M. 塔里格雷：《斯基泰动物纹的起源地》，1933 年，第 2—3 页。）

② B. Tsunoda, Luristan Culture and Scythian Culture//Ancient Art of the Northern Eurasia. Kyoto, 1954 (на японском языке).（B. 角田：《洛雷斯坦文化与斯基泰文明》，《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艺术》，京都，1954 年。）

③ R. Crousset, L'exposition iranienne du musee Gernuschi//Oriental Art. 1948. V. 1. № 3.（R. 格罗塞：《赛努奇博物馆伊朗展览》，《东方艺术》，1948 年，卷 1，第 3 号。）

苏联考古学界的 Н. Л. 奇列诺娃和 В. Г. 鲁科尼认为洛雷斯坦地区在斯基泰艺术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Н. Л. 奇列诺娃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的：黑海沿岸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野兽纹风格具有很多共性，这说明野兽纹风格的发源地只有一个，即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伊朗地区。野兽纹风格在这里形成后还派生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随后对近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并被继承了下去。[①]В. Г. 鲁科尼在其专著《古代伊朗艺术》中注意到，奇维伊地区出土物上的所有动物形象都属于斯基泰艺术，而斯基泰艺术正是源于洛雷斯坦，那里发现了很多著名的动物形象，例如鹿、蜷曲着腿的山羊、格里芬、兔和豹。[②] 后来 В. Г. 鲁科尼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洛雷斯坦地区很早就出现了这些动物形象，后来这些动物形象中各自的特点被综合起来遂形成了斯基泰野兽纹风格。例如蜷曲着腿的鹿、准备跳跃攻击猎物的豹和格里芬。[③]

М. Н. 巴格列波娃与 В. Г. 鲁科尼的观点近似。她认为，斯基泰人在前亚地区居住生活时，接触到了很多当地的文化，这其中就包括洛雷斯坦文明。而洛雷斯坦文明正是近东地区艺术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随后近东地区艺术在新的斯基泰艺术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洛雷斯坦艺术对斯基泰人的影响并不大。Е. Е.

---

① И. Л. Членов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племен тат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67.（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的起源及其居民的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 年。）

② В. Г. Луконин, Искусство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М., 1977.（В.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艺术》，莫斯科，1977 年。）

③ М. А. Дандамаез, Луконин В. Г. Куль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М., 1980.（М. А. 达尼达马耶夫、В.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的文化与经济》，莫斯科，1980年。）

④ М. Н. Погребова, Закавказье и его связи с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ей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 1984.（М. Н. 巴格列波娃：《斯基泰时代外高加索地区与前亚地区的联系》，莫斯科，1984 年。）

库兹米娜就持这样的观点，她认为，从总体风格上来看，斯基泰艺术与洛雷斯坦艺术相同之处甚少，这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艺术风格。[①]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斯基泰艺术和洛雷斯坦艺术在肖像构图方面的一系列共性可以看作思想体系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类似。[②]也有研究者以洛雷斯坦青铜器为例，对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将洛雷斯坦艺术与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艺术中所涉及的具体题材进行对比之前，必须要先对这种对比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洛雷斯坦青铜艺术属古代东方艺术的一个分支，而古代东方艺术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兰、米坦尼和伊朗北部等地区文化的影响。而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艺术中的形象、结构、风格等内容同样也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些要素被从这些内容中抽取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序列，而这也正是某些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为了能说明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出现的偶然的或是必然的相似性，就必须仔细审视要进行对比的艺术题材的各个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时代、普及程度以及和其他要素的组合等内容。

目前我们要尝试分析斯基泰和洛雷斯坦两种风格之间的相似性，而这些在考古材料中已经有人提及。

鹿：目前有这样一种观点，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中一些比较普及的形象，例如鹿，是在古代东方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其中就包括洛雷斯

---

① Е. Е. Кузьмина, Встране Каката и Афрасиаба, М., 1977.（E. E. 库兹米娜：《卡卡特地区及阿夫拉西阿卜城址》，莫斯科，1977 年。）

② С. С. Бессонова,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скифов. Киев, 1983.（С. С. 别索诺娃：《斯基泰人的宗教观念》，基辅，1983 年。）

坦艺术。[1]

在早期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艺术中有两种鹿的形象非常普及，一种是踮着脚站立的鹿，另一种是飞鹿。其中第一种在斯基泰人分布的东部地区更为普及[2]。这种鹿所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是：头部后仰，口部经常张开，背部有尖状突起，踮脚站立。而在欧洲地区斯基泰人艺术中，腿部低垂的鹿的形象则很少见，例如格列勒梅斯出土的兵器上就有这种形象。如果说踮脚站立的鹿和腿部低垂的鹿组合在一起算作一个类型的话，那么格列勒梅斯出土的兵器上的鹿的形象（图 1：1）就绝对不是这种类型早期阶段的例证[3]。格列勒梅斯出土的兵器上的这头鹿背部没有凸起，口部没有张开，角的形状好似某种树木，因此这种鹿并不是分布在亚洲地区的斯基泰人的艺术中呈站立姿态的鹿的原型。

---

① В. Г. Луконин, Искусство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М., 1977.（В.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艺术》，莫斯科，1977 年。）М. А. Дандамаез, Луконин В. Г. Куль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М.,1980.（М. А. 达尼达马耶夫、В.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的文化与经济》，莫斯科，1980 年。）И. Л. Членова, Иранские прототипы«скифских оленей»// КСИА. 1983. Вып. 178.（Н. Л. 奇列诺娃：《"斯基泰式鹿"的伊朗原型》，《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简报》，1983 年第 178 期。）

② Я. А. Шер, Ранний этап 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ого звериного стиля//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единство.Кемерово, 1980.（Я. А. 谢勒：《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早期发展阶段》，《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历史的一致性》，克麦罗沃，1980 年。）Д. Г. Савинов, Изображение《висящего》оленя на ритоне из Келермеса// 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ий мир.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7.（Д. Г. 萨维诺夫：《克列勒梅斯发现的牛角杯上的鹿的形象》，《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新西伯利亚，1987 年。）

③ Г. Н. Курочкин,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животных на оленных камнях аржанского тип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чтения памяти М. П. Грязнова. Омск, 1987.（Г. Н. 古洛奇金：《阿尔赞类型鹿石上的动物形象》，《纪念 М. П. 格里雅斯诺夫的历史报告会》，鄂木斯克，198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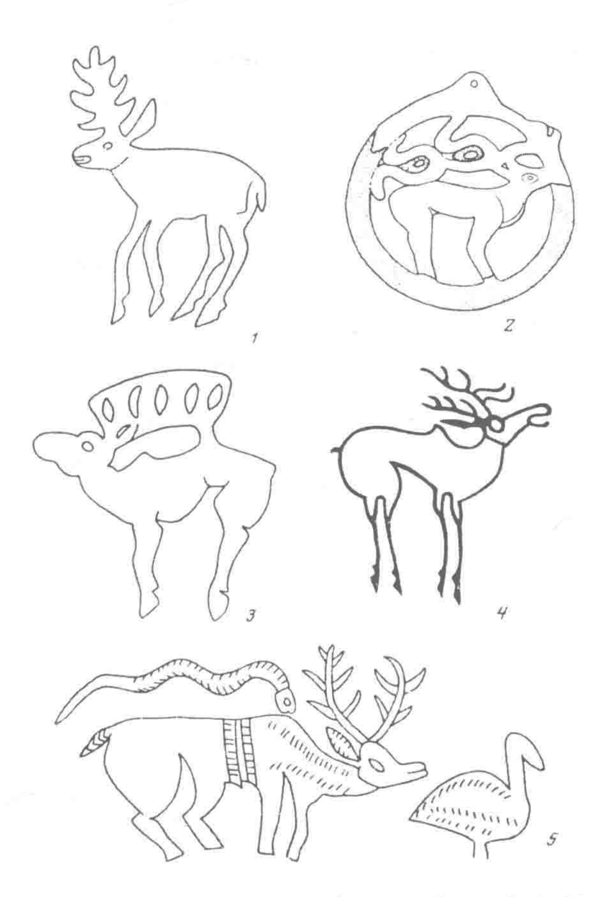


图 1 斯基泰和洛雷斯坦艺术中呈站立姿态的鹿的形象
1. 斧钺（格列勒梅斯）；2. 墓主为塔加尔文化贵族的大颇尔塔科夫巨冢；
3. 乌伊嘎拉克（咸海沿岸）；4. 阿尔赞墓地（图瓦）；5. 青铜杯（洛雷斯坦）

在洛雷斯坦艺术中，呈站立或行进姿态的鹿是非常著名的，其时代为公元前 2 千纪末至公元前 1 千纪初。背上带鸟的呈站立姿态的鹿以及幼鹿形象还出现在一些青铜戒指的装饰上。[1] 其中洛雷斯坦地区发现的一件青铜

① *Dark Ages and Nomads 1000 B. C. Istambul,* 1964.（《公元前 1000 年的黑暗时代和游牧民族》，伊斯坦布尔，1964 年。）

杯上有一头呈站立姿态的鹿，它处在一条蛇和一只鸟之间（图1：5）[①]。而在一些青铜马镳上则有带角的幼鹿形象，它们的角与树的形状很相似。[②]洛雷斯坦青铜艺术中的鹿的形象与斯基泰艺术的比较只能从一些共同的动物特征来进行。其中前者中那种呈站立姿态的鹿没有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的任何典型特征。除此以外，洛雷斯坦艺术中鹿的形象通常仅仅是整体构图中的一个元素而已，在这种构图中常常还有鸟、蛇等艺术形象。

飞鹿形象不仅在黑海北岸地区流行甚广，同时在有斯基泰人分布的较为靠东的地区也很普及，直至南西伯利亚地区。飞鹿形象在分布于欧洲的斯基泰人中被认为是神圣的，而且这种形象也不是在当地起源的。就中央亚细亚地区来说，这种形象是在公元前2千纪初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的[③]，能确定年代的是来自中国的材料，在阿尔赞阶段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艺术中，很大一部分飞鹿形象发展成为了“鹿石”，这是现实主义风格发展的高级阶段。从现实主义的程度和一些典型特征来看，在奇维伊发现的鹿的形象是中央亚细亚及哈萨克斯坦（奇里克德）地区发现的飞鹿形象和黑海北岸（格列勒梅斯）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飞鹿形象之间的过渡形态。同时格列勒梅斯发现的飞鹿形象更具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兵器和一些钵上所描绘的鹿由各类前亚地区的工匠完成，而这些物品正是斯基泰人所订购的话，那么那些马具上的鹿则更有可能是斯基泰的珠宝匠制造的，因此这些艺术形象与奇里克德发现的艺术形象如此相近也就不是偶然的现

① P. R. Moorey, Catalogue of the Ancient Persian Bronzes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971.（P. R. 莫里：《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的古代波斯青铜器的分类研究》，牛津，1971年。）

② 7000 ans d’art en Iran. P., 1962.（《伊朗艺术七千年》，巴黎，1962年。）

③ Э. А. Ловгородова, Квопросу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кифского» оленя // Киммерийцы и скифы. Кировоград, 1987.（Э. А. 诺弗科洛多娃：《斯基泰式鹿形象的起源问题》，《基麦里人和斯基泰人》，基洛夫格勒，1987年。）

象了（图 2）。不久前发现的与公元前 8 世纪末—前 7 世纪的镞共存的鹿石[①]使我们可以最终确定斯基泰人从中央亚细亚地区向东欧和前亚地区迁徙的路线，这就是：萨彦岭⟶阿尔泰⟶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奇里克德）⟶咸海沿岸（乌伊嘎拉克和塔奇斯肯）⟶乌拉尔南部地区（古马洛瓦）⟶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及顿河流域⟶伊朗西北部地区（奇维伊）⟶库班河流域（格列勒梅斯）。飞鹿形象在斯基泰世界是如此独特，以致于很难认为这种艺术形象源自古代东方艺术，并经历了后来那么多的形象演变。М. И. 阿勒塔莫诺夫对这种源于前亚地区的古代艺术题材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如下的解释和说明：这种腿部蜷曲的鹿的形象很早就在东方地区得到了普及，并在那里融入了斯基泰艺术。[②]后来 В. Г. 鲁科尼和 Н. Л. 奇列诺娃还对 М. И. 阿勒塔莫诺夫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正如在奇维伊地区所发现的鹿的形象，这种形象是哈勒辛地区（属洛雷斯坦的范围）出土的青铜牌饰上的代表形象。这种牌饰是洛雷斯坦青铜马镳上的附属物，其年代最晚可到公元前 8—前 7 世纪初。[③]对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相关问题研究得最详细深入的是 Н. Л. 奇列诺娃。[④]她援引了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三个鹿的形象，按照她的观点，这些形象可以作为斯基泰艺术中的

---

① Р. Б. Исмагилов, Погребение Большого Гумаровского кургана в Южном Приуралье и проблем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скиф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А С Г Э. 1988. Вып. 29.（Р. Б. 伊斯马基洛夫：《乌拉尔南部地区发现的古马洛夫巨冢及斯基泰文化的起源问题》，《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考古学集刊》，1988 年第 29 期。）

② М. И. Артамон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киф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СА. 1968. № 4.（М. И. 阿勒塔莫诺夫：《斯基泰艺术的起源》，《苏联考古》，1968 年第 4 期。）

③ М. А. Дандамаев, В. Г. Луконин, Куль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М., 1980.（М. А. 达尼达马耶夫、В.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的文化与经济》，莫斯科，1980 年。）

④ И. Л. Членова, Иранские прототипы«скифских оленей»//КСИА. 1983. Вып. 178.（Н. Л. 奇列诺娃：《"斯基泰式鹿"的伊朗原型》，《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简报》，1983 年第 178 期。）



图 2　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的飞鹿形象和洛雷斯坦艺术中的虚拟造型
1. 格列勒梅斯；2. 马具（格列勒梅斯）；3. 奇里克德；4. 奇维伊；5. 发现于蒙古国的鹿石；6、7. 洛雷斯坦短剑上的飞鹿形象（公元前 13—前 12 世纪）

飞鹿形象的原型。其中第一个形象出自洛雷斯坦北部地区的哈勒辛（图3：3），该形象最早是由A. 嘎达勒刊布出来的。[①]A. 嘎达勒确定这件物品为带扣（B. Γ. 鲁科尼错误地认为它是一件马镳），并认为它是斯基泰艺术作品或是模仿斯基泰艺术的作品。对于我而言，这件物品更多的是让我想起了塔加尔文化中发现的那件鹿形牌饰。哈勒辛发现的这件的鹿形带扣毫无疑问属于斯基泰艺术作品的范畴。实际上，这个飞鹿形象向前伸展的颈部、蜷曲的腿部和后仰的角都非常富有动感，而鹿的躯干上还有一个“S”形的装饰纹样，在“S”形的两端还有螺旋状的纹饰。此外，鹿角的凸起部分也用这种螺旋状纹饰来体现。这些特征，正如H. Л. 奇列诺娃所注意到的，并不是分布在欧洲的斯基泰人的艺术特点，而是古代东方艺术的特点，特别是与公元前1千纪的萨彦—阿尔泰艺术有相似的特点。在谷粒中的螺旋形象曾在雅古尼墓地出土的青铜牌饰上发现过，此外，塔加尔文化中也有类似的形象（图3：2）（图版41：14；图版40：18；图版43：5）。[②]但腹部饰有各种螺旋图案的鹿的形象在斯基泰时代的阿尔泰地区更为普及。例如，图艾克奇1号冢里出土了虎和鹿的形象，在这些动物的腹部绘满了“S”形的图案；而在图艾克奇2号冢中发现的鹿，在肩部和大腿上有螺旋状的图案；此外，还在巴沙达勒2号冢中发现了鹿和其他有蹄目动物的形象。[③]在乌兰德雷克谷地的塔沙尼特2号墓地发现了用木头雕刻的鹿的形象，在鹿的腹部有“S”

---

① A. Godard, Boucle de ceinture en forme de ccrf couche//Athar-e Iran. 1938. T. 3. F. 2.（A. 嘎达勒：《卧鹿形带扣》，《Athar-e 伊朗》，1938，卷3，F.2。）

② A. M. Tailgren, Zum Ursprungsgebiet des s.g. scythischen Tierstiel//AA. 1933. IV, 2-3.（A. M. 塔里格雷：《斯基泰动物纹的起源地》，1933年，第2—3页。）

③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 Л., 1960.（С. И. 鲁金科：《斯基泰时代中央阿尔泰地区居民的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

形的图案（图 3：1）。[①] 这种位于动物腹部的装饰图案出现在萨彦—阿尔泰艺术中的时间已被证实应在公元前 7 世纪以前，同时还可以使我们联想起阿尔赞地区发现的鹿石上的鹿的形象[②]，在这个鹿的大腿和肩部有涡纹线条，而整个鹿的身体也呈“S”形（图 3：4）。洛雷斯坦青铜牌饰上的鹿与萨彦—阿尔泰地区斯基泰野兽纹中的鹿非常相似，这可以表明，斯基泰早期艺术的主题发端于中央亚细亚地区。随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在普及传播过程中，通过洛雷斯坦北部地区时对其产生了影响。证据是洛雷斯坦发现的一对马镳上有驼鹿的形象（这种动物在伊朗地区从未有过）。



图 3　鹿身上的螺旋纹和“S”形象

1. 塔山特 2 号墓地出土（阿尔泰）雕像的木质基座；2. 塔加尔文化季苏里巨冢中出土的青铜牌饰；3. 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牌饰；4. 阿尔赞鹿石上的形象

---

① В. Д. Кубарев, Курганы Уландры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7.（В. Д. 库巴列夫：《乌兰德雷克巨冢》，新西伯利亚，1987 年。）

② М. Л. Грязнов, Аржан, Л., 1980.（М. П. 格里雅斯诺夫：《阿尔赞》，列宁格勒，1980 年。）

还有两个腿部蜷曲的鹿的形象，Н. Л. 奇列诺娃援引了它们。这两头鹿雕刻在短剑上，从剑上的铭文以及形制来看，这两把短剑的时代为公元前 13—前 12 世纪（图 2：6、7）。[①] 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何 Н. Л. 奇列诺娃把公元前 13—前 12 世纪称之为“前斯基泰时代”。古代东方艺术开始影响斯基泰人的时间大致是在公元前 7 世纪，至于谢米波拉德巨冢以及稍晚一些的卡班文化中发现的鹿的形象，Н. Л. 奇列诺娃首先将它们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进行了比对，并确定了前者的年代要晚于公元前 6—前 5 世纪。但实际上，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鹿和斯基泰式的鹿之间是有中间环节的。前者的鹿形象从肖像学的角度来看与公元前 2 千纪后期的米坦尼艺术中的鹿的形象非常近似，这种鹿的姿态显得比较平静；而斯基泰的鹿形象则显得动感十足。

野猪：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野猪形象有时会被与斯基泰艺术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二者表现出了共同的艺术概念。[②] 其实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野猪形象大约在公元前 3 千纪就已出现了，野猪这种题材在自北非至远东的广大地区内非常普及，而且经常出现在各个时期和民族的遗存中。就早期斯基泰艺术而言，其独具特色的元素是：野猪的面部和腿部都呈低垂状，有的野猪腿部还表现出意外的停顿姿势。就斯基泰时代中央亚细亚地区发现的野猪形象而言，其特点是野猪的肩隆较尖且向后低垂（图瓦和蒙古地区发现的鹿石、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发现的岩画中都有所体现）（图 4：7）。在奇里克德发现的野猪形象中也能看到这一细节（图 4：8）。而在以弗所（小亚地区）发现的野猪形象通常与斯基泰人自东方迁来

---

① P. Calmeyer, Datierbare Bronzen aus Luristan und Kirmanshah. B., 1969.（P. 卡里梅伊勒：《洛雷斯坦和科尔曼沙赫出土青铜器的年代》，1969 年。）

② Е. В.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а,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вида животного в скифском зверином стиле//КСИА. 1986. Вып. 186.（Е. В. 别列瓦德奇科娃：《再现斯基泰野兽纹中的动物形象》，《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简报》，1986 年第 18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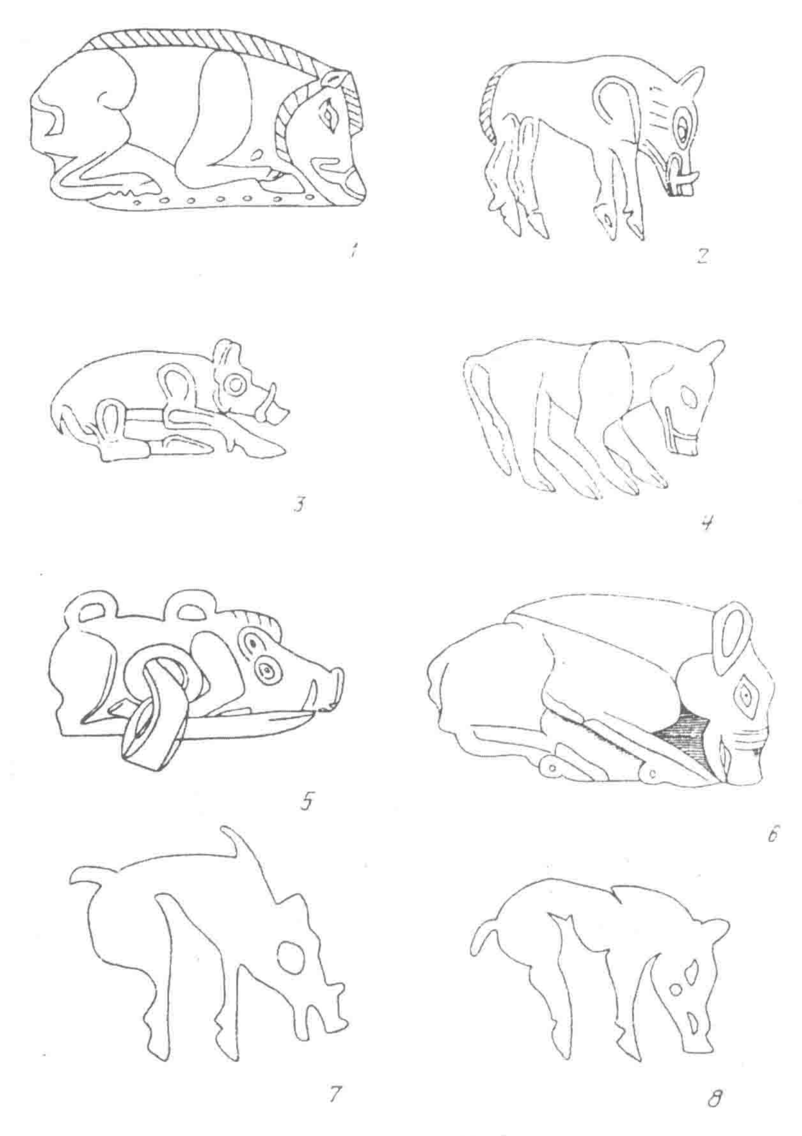


图 4　早期斯基泰艺术和洛雷斯坦艺术中的野猪形象
1. 萨马尔教学实验农场；2、3. 斧钺（格列勒梅斯）；4. 铜镜（格列勒梅斯）；
5. 青铜马镳（洛雷斯坦）；6. 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小亚细亚）；
7. 鹿石（阿尔赞）；8. 奇里克德 5 号冢

有关，例证之一是这里发现的野猪躯干线条，即从肩部到颈部的线条（图4：6）。[①] 如果不了解中央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的这种动物形象，这种线条（野猪的肩隆较尖且向后低垂）的意义就很难明白。从以弗所发现的野猪形象来看，其腿部都是紧贴腹部的，这就使我们联想起了动物休息时的姿态。欧洲斯基泰时期最早的野猪形象是在格列勒梅斯出土的镜子和兵器上发现的，但那上面的野猪并没有尖状肩隆（图4：2、4）。如果说这个细节是作为一个典型特征发展的话，那么其发展路线应该是这样的：萨彦岭—阿尔泰地区（阿尔赞地区发现的鹿石）⟶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奇里克德）⟶斯基泰人迁徙时代的前亚地区（以弗所和萨勒德）⟶库班河流域（格列勒梅斯）⟶第聂伯河流域等地区。洛雷斯坦发现的马镳上有呈卧倒状的野猪形象（图4：5），其时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这个野猪形象与萨勒德和以弗所发现的野猪形象很相似，后者的时代大体上也为公元前8—前7世纪。因而洛雷斯坦马镳上的野猪形象很可能证实了如下情况：斯基泰人对古代东方艺术的影响主要是在斯基泰人统治前亚地区时期。而最早的野猪形象，即呈短暂停顿姿态或腿部蜷曲的野猪形象自公元前2千纪就已在伊朗东北部和巴克特里亚地区为人所熟知了（图5：1、2）。[②]

---

① E. B. Лереводчикова,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вида животного в скифском зверином стиле//КСИА. 1986. Вып. 186.（E. B. 别列瓦德奇科娃：《再现斯基泰野兽纹中的动物形象》，《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简报》，1986年第186期。）

② F. R. Wulsin, The aerly Cultures of Asterabad//SPA. 1938. V. I.（F. R. 伍尔辛：《阿斯泰拉巴德的早期文化》，西班牙，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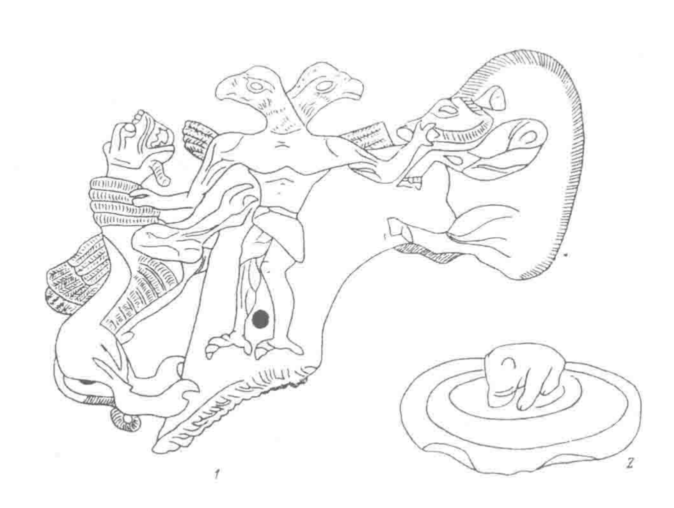


图 5 有可能是四肢呈下垂状或是呈停顿姿态的早期斯基泰野猪形象的原型
1. 大锤（巴克特里亚，公元前 2 千纪前期）；
2. 滑石器盖（伊朗东北部，久列尼格遗址丘，公元前 2 千纪前期）

猫科类动物：B. Г. 鲁科尼认为，斯基泰早期艺术的主要题材的起源与洛雷斯坦的青铜器上呈跳跃姿态的豹的形象具有密切关系。按照他的观点，在巴巴德让居址发现的公元前 8 世纪的青铜饰针上的呈跳跃姿态的豹的形象（图 6：8）是奇维伊地区最早的豹的形象。[1] 而笔者则认为，只有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豹形象的发展史，才能更好地弄清这种斯基泰艺术中非常重要的形象的形成过程。自公元前 2 千纪下半叶开始，呈卧倒状且张牙露齿的猫科类动物形象就已广泛普及于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直至中国的广大区域之内。在前亚的西部地区，这类形象最早出现于具有米坦尼风格的宝石雕刻上。[2] 而在伊朗北部地区，这类动物形象则

① M. A. Дандамаез, B. Г. Луконин, Куль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M., 1980.（M. A. 达尼达马耶夫、B.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的文化与经济》，莫斯科，1980 年。）

② G. Contenau, La glyptique Syro-Ilittite, P., 1922.（G. 孔德诺：《叙利亚—赫梯雕刻》，巴黎，1922 年。）

出现在哈散鲁发现的金杯上，其时代约为公元前2千纪和公元前1千纪之交。[①]在出土金杯的这层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铁饰针，这些饰针上面有呈卧倒状且龇牙咧嘴的猫科类动物形象。[②]而在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器中，与斯基泰艺术中的豹的形象最为相近的当属巴巴德让出土的饰针上的动物形象（图6：8）。此外，洛雷斯坦地区出土的斧子上也有豹的形象，这些斧子的时代为公元前1150—前1000年左右（图6：9）。[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呈卧倒状且龇牙咧嘴、张牙舞爪的猫科类猛兽形象还出现在中国安阳殷墟的王陵和蒙古地区发现的鹿石上，其中前者的时代为公元前2千纪与公元前1千纪之交（图6：4、7）。[④]从肖像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猫科类动物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广泛普及且形象近似，毫无疑问表明洛雷斯坦地区是受这种动物形象影响的地区之一，而这种动物形象的原型则应该在近东至中国之间的区域内来寻找。其中在中亚南部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遗迹中，出土了被称为姆勒卡波风格的印章，这种印章上面有呈卧倒状且龇牙咧嘴、张牙舞爪的猫科类动物形象（图6：10）。[⑤]我们认为，具有这种风格的印章出现在中亚南部地区应与历史上印度—伊朗人群

① Г. Н. Курочкин, К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некотор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Ирана//СА. 1974. № 2.（Г. Н. 古洛奇金：《对伊朗北部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某些形象的说明》，《苏联考古》，1974年第2期。）

② Archeologie Vivante. 1968. V. I. № 1.（《鲜活的考古学》，1968年，V. I，第1号。）

③ P. Calmeyer, Datierbare Bronzen aus Luristan und Kirmanshah, B., 1969.（P. 卡里梅伊勒：《洛雷斯坦和科尔曼沙赫出土青铜器的年代》，1969年。）

④ B. Jacoby, Verveht und ausgegraben, Leipzig, 1964.（B. 雅各布：《Verveht 与发掘》，莱比锡，1964年。）В. В. Волков,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 Монголии, Улан-Батор, 1981.（В. В. 沃勒科夫：《蒙古国境内发现的鹿石》，乌兰巴托，1981年。）

⑤ V. J. Sarianidi, Seal-Amulets of the Murghab Style//*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N. Y., 1981.（V. J. 桑里安尼迪：《穆尔加布样式的密封护身符》，《中亚的青铜文化》，纽约，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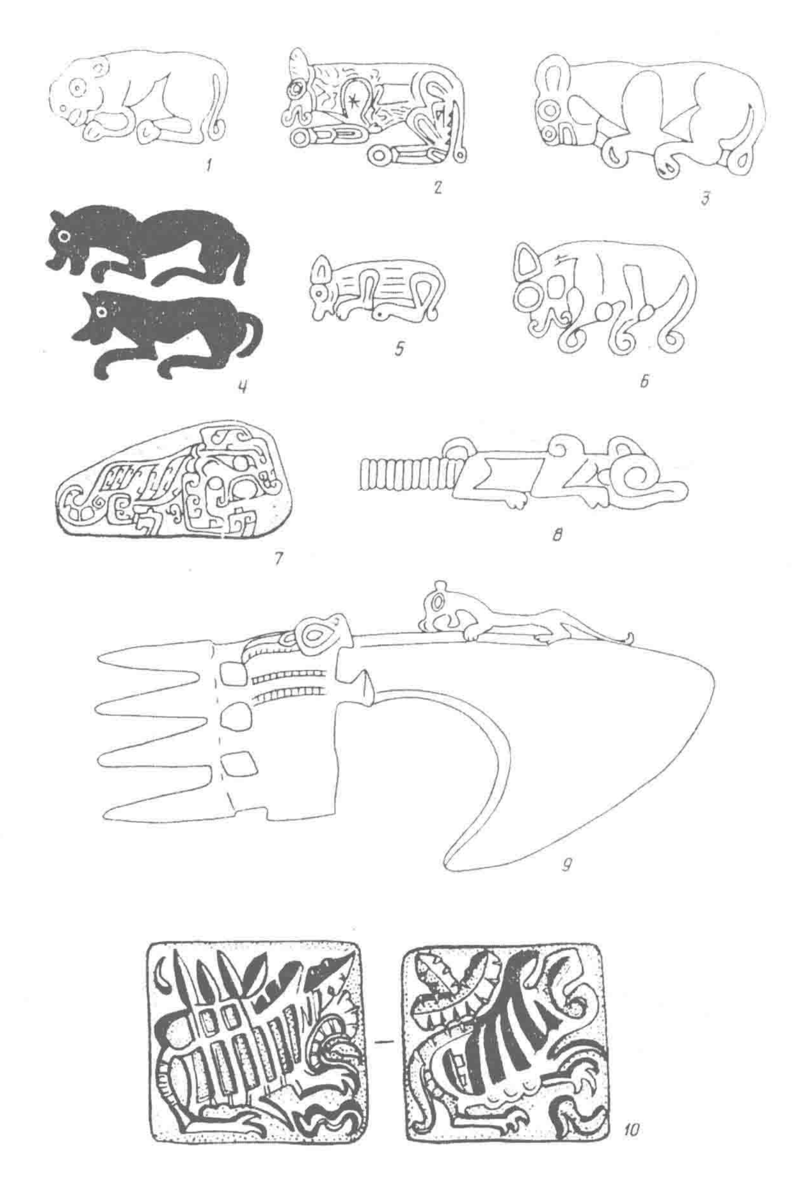


图6 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猫科类猛兽形象及其可能的原型
1. 塔金斯肯；2. 斧钺（格列勒梅斯）；3. 大乌里斯克冢；4. 蒙古发现的鹿石；5、6. 奇维伊；7. 安阳的公元前2千纪末期墓葬中出土的石磬上的形象；8. 巴巴德让发现的公元前1千纪初的青铜饰针（洛雷斯坦）；9. 洛雷斯坦发现的公元前2千纪末期的斧子；10. 马尔吉安那发现的公元前2千纪的滑石印章

的迁徙密切相关。[①]

猛禽类动物和鹰形的格里芬形象：关于斯基泰艺术中这类动物形象题材的起源，B. Γ. 鲁科尼认为与洛雷斯坦具有直接的关系。[②] 需要说明的是，就洛雷斯坦艺术而言，猛禽类动物形象的特点并不是很鲜明。洛雷斯坦青铜器中更常见的鸟类形象是带三缕羽毛的鸟头（特别是在一些人物形象的肩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有时还表现成公鸡头。[③] 说到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中这种题材的起源，我们认为最准确的应该是如下的观点，它是波拉达提出来的。他认为，鸟头形象在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中已为人所熟知，这并不是个偶然的现象。鸟头和鸟喙形象是北方游牧民族艺术中一种非常有特点的形象，这就让人联想起更早时期的格里芬形象。由此可能需要我们重新来认识晚期洛雷斯坦艺术中的公鸡头形象。[④] 由这种联系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斯基泰艺术中的格里芬形象的起源是否与洛雷斯坦艺

---

① Г. Н. Курочкин, Индоиран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в искусстве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ий мир, Кемерово, 1984.（Г. Н. 古洛奇金：《古代东方艺术中的印度伊朗因素及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历史渊源》，《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克麦罗沃，1984 年。）Г. Н. Курочкин, Искусство звериного стиля ранних кочевников Евразийскихстепей и Луристансхие бронзы//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тепной Евразии. Ч. Ⅱ, Кемерово, 1987.（Г. Н. 古洛奇金：《欧亚草原地带早期游牧人的野兽纹艺术和洛雷斯坦青铜器》，《欧亚草原地带考古学问题》，第二卷，克麦罗沃，1987 年。）Г. Н. Курочкин, Ранние этап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киф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Кочевн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и античный мир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1989.（Г. Н. 古洛奇金：《斯基泰艺术形成的早期阶段》，《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人与古代世界》，新切尔卡斯克，1989 年。）

② М. А. Дандамаез, В. Г. Луконин, Куль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М., 1980.（М. А. 达尼达马耶夫，В.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的文化与经济》，莫斯科，1980 年。）

③ R. Ghirshman, Iran (Protoiraner, Meder, Achameniden), Munchen, 1964.（R. 吉尔什曼：《伊朗》[原始伊朗人，米底，阿契美尼德]，慕尼黑，1964。）

④ E. Porada, Nomads and Luristan Bronzes//Dark Ages and Nomads 1000 B. C., Istambul, 1964.（E. 波拉达：《游牧民族和洛雷斯坦青铜器》，《公元前 1000 年的黑暗时代和游牧民族》，伊斯坦布尔，1964 年。）

术有联系呢？ Н. Н. 巴格列波娃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提到，她将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的格里芬形象分为三类：第一类，前亚地区的格里芬形象；第二类，希腊式的格里芬形象；第三类，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① 按照她的观点，斯基泰式的鹰头状格里芬形象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形象，它的起源时间非常久远。直到现在还能看到一种观点：格里芬的形象是从古希腊世界传播到斯基泰世界的。② 但格里芬形象在古希腊首先是一种和平的象征。其与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的区别在于，后者经常被表现成带有攻击性且撕扯猎物的形象；还有一些细节是，希腊式的格里芬形象没有整齐的鬃毛，舌头露在外面且带有两缕螺旋状的卷发。③M. И. 阿勒塔莫诺夫对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源自古希腊的观点产生了怀疑。④ 与古希腊一样，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格里芬形象并没有出现在动物搏斗的场面中。同时也没有斯基泰式格里芬身上那种排列紧密的鬃毛，只有三缕羽毛，此外，后脑勺处同样也有卷发（图 7：4）。⑤ 在前亚地区的西部，格里芬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公元前 2 千纪中叶的赫梯和米坦尼的艺术品上。其中在米坦尼的宝石雕刻上出现的格里芬形象属当时的一个创新，而这种创新从来源上看

---

① Н. Н. Погребова, Грифон в искусстве Северного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 в эпоху архаики// КСИИМК. 1948. Вып. XXII.（Н. Н. 巴格列波娃：《古希腊时期黑海北岸地区艺术中的格里芬形象》，《苏联科学院物质文明史研究所报告及野外研究简报》，1948 年第 22 期。）

② А. М. Хазанов, А. И. Шкурко,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антич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искусство и культуру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го мира//Античность и антич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 куль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народ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78.（А. М. 哈让诺夫、А. И. 石古尔克：《古希腊文明对斯基泰—萨尔马泰艺术和文化的影响》，《苏联东方民族文化和艺术中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莫斯科，1978 年。）

③ Н. Н. Погребова, Грифон в искусстве Северного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 в эпоху архаики// КСИИМК. 1948. Вып. XXII.（Н. Н. 巴格列波娃：《古希腊时期黑海北岸地区艺术中的格里芬形象》，《苏联科学院物质文明史研究所报告及野外研究简报》，1948 年第 22 期。）

④ М. И. Артамонов, Сокровища саков, М, 1973.М.（М. И. 阿勒塔莫诺夫：《塞人的宝藏》，莫斯科，1973 年。）

⑤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1938. V. IV.（《波斯艺术的发现》，1938 年，V. IV。）

与巴克特里亚地区具有密切联系[①]。从考古材料来看，这种形象的起源与古典文献中描写的基本一致。从其鹰形的外形来看，其来源应与巴克特里亚地区有联系[②]。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从肖像学的角度来看，与其最接近的是马勒里克墓地（位于伊朗北部）出土的具有混合特征的一种动物形象（图 7：5）。具有这类形象的一些遗物出现在此可能与伊朗早期居民的迁徙有关[③]。至于洛雷斯坦式的格里芬形象，与其最接近的当属赫梯、米坦尼艺术中的动物形象。



图 7　斯基泰和古代伊朗艺术中的格里芬形象
1. 黄金牌饰（大乌里斯克冢）；2. 镜子（格列勒梅斯）；
3. 石板（法纳科里亚、塔马尼）；4. 马镳（洛雷斯坦）；5. 金杯（马勒里克）

---

① V. J. Sarianidi, Seal-Amulets of V. J. the Murghab Style//*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N. Y., 1981.（V. J. 桑里安尼迪：《穆尔加布样式的密封护身符》,《中亚的青铜文化》，纽约，1981 年。）

② И. В. Пьянков, Бактрийский гриф в анти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 1976.（И. В. 比亚尼科夫：《古希腊文献中记载的巴克特里亚式的格里芬形象》,《中亚民族历史与文化》，莫斯科，1976 年。）

③ E. O. Negakb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Marlik excavation, Teheran, 1964.（E.O. 内加赫班：《马尔利克王陵的发掘简报》，德黑兰，1964 年。）

羊形的格里芬形象：羊形的格里芬形象是欧洲早期斯基泰艺术中最有特点的一种动物形象。[①] 而在亚洲的斯基泰世界，这种动物形象不是非常有名。即使在黑海北岸的前斯基泰艺术中这种形象的知名度也不是很高。因此有些学者就提出了一种假设：这种动物形象的起源与前亚地区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 Б. Б. 毕奥特洛夫斯基就认为，带角的格里芬形象是从前亚地区传播到斯基泰艺术中的。但前亚地区的格里芬形象比较瘦长，有的格里芬耳朵还耷拉着，与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有显著的不同（这是笔者的观点）。后来耳朵演变成了角。[②] 关于古代东方艺术中的一些题材借用了斯基泰艺术的元素的论点有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点没有得到认同。这种对斯基泰艺术的曲解抑或是其他题材的争论也由此开始了。Н. Л. 奇列诺娃还写了关于斯基泰世界中的羊形格里芬形象起源的文章，她认为，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狮首形象和狮口中的上颌骨有时更能让人联想起羊角，有时则会让人想起猛禽类动物的蜡膜。[③] 而 М. И. 阿勒塔莫诺夫则注意到，Н. Л. 奇列诺娃在形式上所做的复原工作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狮子形象与斯基泰艺术中的鸟头形象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④] 同时 М. И. 阿勒塔莫诺夫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羊形的格里芬形象当属一种复合体。很可能其带有凸棱的头部原先位于一个突出的位置上，而在这里还有具有写实风格

---

① В. А. Ильинская, Некоторые мотивы раннескифского звериного стиля//СА. 1965, № 1.（В. А. 伊里伊斯卡娅：《早期斯基泰野兽纹中的某些主题》，《苏联考古》，1965 年第 1 期。）

② Б. Б.Пиотровский, Кармир-Блур. Т. 1, Ереван, 1950.（Б. Б. 毕奥特洛夫斯基：《卡勒米勒—波鲁勒》，第一卷，埃里温，1950 年。）

③ И. Л. Членов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племен тат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67.（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的起源及其居民的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 年。）

④ М. И. Артамон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киф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СА. 1968. № 4.（М. И. 阿勒塔莫诺夫：《斯基泰艺术的起源》，《苏联考古》，1968 年第 4 期。）

的眼睛，这也正是具有模拟风格的环节。鸟的形象则呈简化的态势，只保留了鸟喙和大而圆的眼睛，有时甚至是用两条螺旋来表示。[①]B. A. 伊里伊斯卡娅也认为，羊形的格里芬形象不能证明这是外来形象变迁后的结果，而更可能是斯基泰时代两种最重要的题材，即由蹄类动物形象和猛禽类动物形象组合在一起的产物。[②]M. H. 巴格列波娃推测，这种斯基泰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在形成过程中，前亚地区包括乌拉尔图的题材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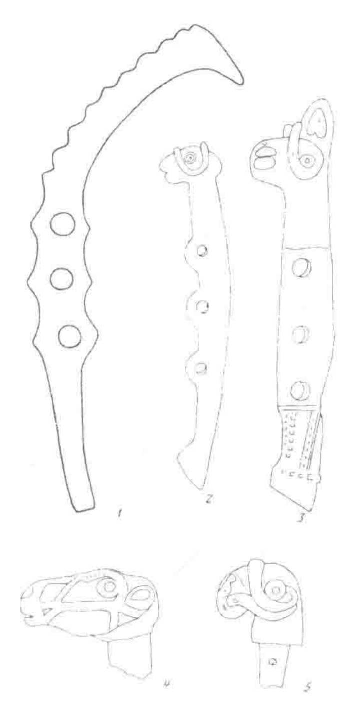


图 8　带有野兽形象的马镳
1. 洛雷斯坦发现的具有欧亚草原传统的青铜马镳；2. 有羊形格里芬形象的典型斯基泰角质马镳；3. 奇维伊发现的角质马镳；4. 阿尔赞发现的戴着嚼子的马头形象的马镳头；5. 卡尔米尔布鲁尔发现的角质马镳头

在分析了所有欧洲地区发现的具有斯基泰艺术风格的羊形格里芬形象后，我们可以认为，首先，羊形格里芬形象出现在马镳上当属一种偶然现象，而且还经常出现马蹄的形象。其次，羊形格里芬形象上的具有虚构色彩的角常常好似皮带环绕一样（图 8：2）。要弄清这

① M. И. Артамонов, Сокровища саков, M, 1973. M .（M. И. 阿勒塔莫诺夫：《塞人的宝藏》，莫斯科，1973 年。）

② B. A. Ильинская, Некоторые мотивы раннескифского звериного стиля//CA. 1965, № 1.（B. A. 伊里伊斯卡娅：《早期斯基泰野兽纹中的某些主题》，《苏联考古》，1965 年第 1 期。）

③ M. H. Погребова, Закавказье и его связи с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ей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M., 1984.（M. H. 巴格列波娃：《斯基泰时代外高加索地区与前亚地区的联系》，莫斯科，1984 年。）

种形象的来源就要注意一下奇维伊出土的时代较早的斯基泰马镳，这里发现的羊形格里芬形象带有很尖的耳朵（图 8：3），而卡勒米勒—波鲁勒除了出土面部缠绕有皮带的动物形象外，还发现了口部缠绕有皮带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刻画在三孔马镳上（图 8：5）。如果继续探究这种形象的发展序列，那就应该看一下马镳上的具有现实风格的戴着嚼子的马头形象，这种形象是在阿尔赞地区出土的（图 8：4）。这种三孔青铜马镳多成对出现，这毫无疑问是欧亚草原地带的制造传统，同时具有马头风格且形体较大的青铜马镳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也有发现，目前藏于英国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图8：1）[①]。洛雷斯坦发现的这些马镳表明，带有马头形象的三孔马镳的变化还有另外一种路线。

图案：斯基泰世界里广泛流行着各种图案，其中最常见者与殉马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图案有可能是用来装饰车辕杆的，而这种车则主要用于运送尸体。源于东欧地区的早期斯基泰图案经常用鹿和鸟的形象来进行装饰，而且动物的头都显得较大。及至晚期，图案上开始有了虚拟的动物形象。在斯基泰世界的亚洲部分（哈萨克斯坦、图瓦、南西伯利亚以及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图案上出现了有蹄类动物的形象。M. H. 巴格列波娃在探寻斯基泰式图案原型的过程中分析了大量的出自前亚地区的材料[②]，但她也将很多属于古代东方的物品上的图案归入了斯基泰式图案的范围，例如军旗、权杖和祭祀用品等。这就涉及到了与洛雷斯坦青铜器比较的问题。M. H. 巴格列波娃认为，斯基泰式图案在形成过程中，来自外高

① P. R. Moorey, Catalogue of the Ancient Persian Bronzes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971.（P. R. 莫里：《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的古代波斯青铜器的分类研究》，牛津，1971 年。）

② M. H. Погребова, Закавказье и его связи с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ей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M., 1984.（M. H. 巴格列波娃：《斯基泰时代外高加索地区与前亚地区的联系》，莫斯科，1984 年。）

加索—洛雷斯坦文化圈的材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①]。这个观点表达出来很容易，困难之处在于使用物证材料来进行证实。M. H. 巴格列波娃在论证自己观点过程中没有引用实证材料并不是偶然的，问题在于，洛雷斯坦根本就没有发现这类图案装饰。这里偶尔会发现一些被称为偶像的艺术品，而且多出土于墓葬中。正如 Л. 万杰别勒克在发掘中遇到的情况，他们会发现一些专门用来支撑物件的底座[②]，或者是其他的物品，例如砺石的手柄。

在七河地区、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以及比热河流域出土了马衔和带有山羊头像的管銎，综合各种情况来看，这些物品应该是装饰在车辕杆末端的，K. A. 阿奇舍夫和 A. K. 阿奇舍夫还将这些图案与洛雷斯坦出土的砺石手柄上的图案进行了比较[③]。“A. 盖达尔和P. 格勒石曼则认为这些物品是砺石的手柄”，K. A. 阿奇舍夫和 A. K. 阿奇舍夫对洛雷斯坦发现的这些物品的功用提出了疑问。疑问很容易提出，但却不了解来源。洛雷斯坦出土的这些装饰有山羊头图案的青铜管銎类物品是砺石的手柄，这种观点已众所周知，而且出现的时间也很早。但目前 Л. 万杰别勒克又利用了新发掘所

---

① M.H. Погребова, Закавказье и его связи с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ей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M., 1984.（M. H. 巴格列波娃：《斯基泰时代外高加索地区与前亚地区的联系》，莫斯科，1984 年。）

② L. Vanden Berghe, Excavations in Pusht-i Kuh. Tombs provide Evidence on Dating Typical Luristan Bronzes/Archaeology, 1971. *V*. 24.（Л. 万杰别勒克：《普什特库的发掘——关于墓葬中典型洛雷斯坦青铜器的年代测定》，《考古》1971 年第 5 期，第 24 页。）

③ K. A. Акишев, A. K. Акишев, Проблема хронологии раннего этапа са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Археоло- 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Ата, 1978.（K. A. 阿奇舍夫、A. K. 阿奇舍夫：《塞人文化早期阶段的编年问题》，《哈萨克斯坦考古学遗迹》，阿拉木图，1978 年。）Л. Агапов, M. Кадырбаев, Сокровища древнею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Ата, 1979.（Л. 阿卡波夫、M. 卡德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境内发现的古代宝藏》，阿拉木图，1979 年。）

得的材料进行了证实[①]，这些材料表明砺石的年代很早，为公元前 2 千纪后半叶。

呈卧倒状的山羊：斯基泰的很多艺术题材可以认为其起源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其中就包括被 B. Г. 鲁科尼称之为“呈卧倒状的山羊”的艺术形象。[②]而我则认为，这个结构简单的艺术题材具有多方面的特点，不能武断地认为其在斯基泰艺术中的出现仅仅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具有密切的联系。呈卧倒状且头部向后翻转的山羊形象是非常罕见的，但这种题材在斯基泰人向前亚地区迁徙的时代里就为人所熟知，并曾在乌里克巨冢等遗迹中出土过。同时，其在希腊早期艺术中非常普及，在西阿罗克出土的圆筒形印章上就能看到。这种印章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也发现过。[③]而这种形象也是斯基泰时代生活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们所使用的标志。[④]头部翻转的山羊形象出现在米坦尼风格的印章中的时间为公元前 2 千纪中期。这种形象有可能发源于一个共同的中心，而洛雷斯坦地区是这个中心的可能性却很小。

处在各种动物之间的女神：C. C. 别索诺娃以斯基泰艺术和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中的某些题材具有相似性为例，进而认为二者所体现出的宗教意识形态具有共性。她认为：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推测，在斯基泰和高

① L. Vanden Berghe,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s dans le Luristan//JA. 1973. X.（Л. 万杰别勒克：《洛雷斯坦考古研究》，JA，1973. X。）

② M. A. Дандамаез, B. Г. Луконин, Культур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древнего Ирана, M., 1980.（M. A. 达尼达马耶夫、B. Г. 鲁科尼：《古代伊朗的文化与经济》，莫斯科，1980 年。）

③ P. Amandry, Un motif《skythen》en Iran et on Greece//JNES. 1965.（P. 阿曼德理：《伊朗与希腊斯基泰人母题》，JNES，1965 年。）

④ И. Л. Членов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племен тат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M., 1967.（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的起源及其居民的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 年。）

加索艺术中，处在具有对称造型的动物之间的神的形象从肖像学的角度来看，与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同类形象在起源上具有联系。[①]C. C. 别索诺娃还举例说明了这个结论，其所使用的例证是洛雷斯坦发现的神像的上半部和外高加索地区发现的权杖。[②] 另外，C. C. 别索诺娃还将处在两头狮子之间的一个神像与洛雷斯坦发现的神像进行了对比，前者是雕刻在一件黄金头饰（也可能是耳环）上的。而与时代分别为公元前 1 千纪初的托勒斯塔娅墓葬和公元前 4 世纪的玛斯丘奇巨冢出土的金饰物相比，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神像与它们的差异在于，从制作方法上看，前两者不属于斯基泰式，而是出自博斯波尔国的珠宝匠之手。[③] 但从肖像学和风格上来看，这些金饰物并不能与洛雷斯坦发现的物品相提并论。

带马头的斧钺：在东南欧和高加索地区的基麦里人的遗迹中出土了带有马头装饰的青铜祭祀权杖头[④]（Н. Л. 奇列诺娃称其为斧钺），这种物品的衍生物也在乌克兰和克里木地区发现过，时代为公元前 6 世纪。Н. Л. 奇列诺娃将其与洛雷斯坦出土的带马头的斧钺进行对比后注意到，后者所表现出来的是太阳的特征。П. 阿米耶不久前指出，就洛雷斯坦出土的这件物品而言，他首先援引了 Н. Л. 奇列诺娃的观点，即这件物品的原型可能是欧洲的斧钺，但它实际上却是发源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这件物品的銎部体现出来的不是太阳的特征，而是眼睛（就像萨巴里—杰别出土的那件著名的斧子一样）。而这件物品的年代则应为公元前 2 千纪

---

① С. С. Бессонова,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скифов. Киев, 1983.（С. С. 别索诺娃：《斯基泰人的宗教观念》，基辅，1983 年。）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И. Л. Членов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племен тат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67.（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的起源及其居民的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 年。）

上半叶（图 9）。[①]

洛雷斯坦青铜器与西伯利亚—斯基泰（塔加尔文化）艺术： Н. Л. 奇列诺娃对塔加尔文化艺术的起源提出了这样的猜想：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塔加尔文化中的野兽风格发端于卡拉苏克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前者也对洛雷斯坦和格勒古克的艺术产生了诸多影响。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我们并不熟悉的阿富汗艺术、新疆艺术以及蒙古艺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还有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因素。[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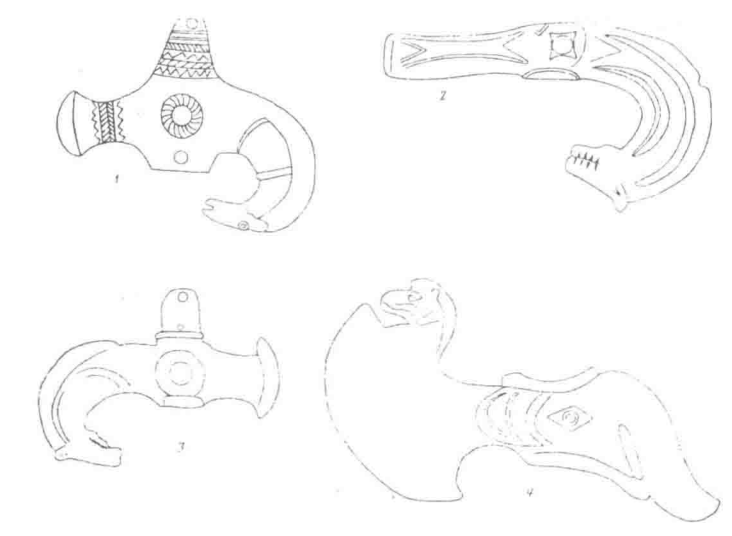


图 9　带有马头形象且用于宗教仪式的工具
1、3. 色雷斯—基麦里式的权杖；2. 基斯洛沃瓷克；
4. 巴克特里亚（公元前 2 千纪前期）

---

① Н. Л. Членова, Татарские лошади (о связях племен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скифскую эпоху)//Кавказ 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М., 1981.（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中的马的形象——兼论斯基泰时代南西伯利亚地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古代及中世纪的高加索与中亚地区》，莫斯科，1981 年。）

② И. Л. Членов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племен тат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67.（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的起源及其居民的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 年。）

在 H. Л. 奇列诺娃的一篇文章中，她将洛雷斯坦青铜艺术与奥格拉赫特（位于南西伯利亚）地区岩画上发现的图案进行了比较。这些岩画上描绘了马、车轮以及站在两只山羊之间的人形图案。其中在人形图案的头部还有角质的头饰，而人和山羊的组合则形成了两个拱形的图案。按照 H. Л. 奇列诺娃的看法，这种形象叫作天蓝色穹隆[①]（图 10：1）。H. Л. 奇列诺娃对这种题材很感兴趣，认为这是用马作为礼物献给神。同时她认为，洛雷斯坦发现的马镳上也有与此类似的场景，马镳上表现的场景是，一个神灵站在两头动物之间。而这两头动物 H. Л. 奇列诺娃认为表现的应该是山羊[②]（图 10：2）（实际上这些动物的腿脚是畸形的，应该是兔子[③]）。H. Л. 奇列诺娃所谈到的奥格拉赫特地区岩画上的形象风格各异，而且制造工艺和时代也是千差万别。可以看出，这里所绘制的马比扁角鹿的体形还要大很多，因而被称之为镂空风格。其他形象制作时则使用了模压工艺。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奥格拉赫特地区发现的这些岩画其时代应为青铜时代早期。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上，例如角、流苏、静止的姿态这些都与奥库涅夫文化中所体现出的风格有共通之处。[④] 不久前萨姆斯文化中所反映的神灵形象被公之于众，该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非常类似。萨姆斯文化中发现的神灵形象位于图案的中心位置，其侧面有凸起，还有角，因此这个神

---

① Н. Л. Членова, Татарские лошади (о связях племен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скифскую эпоху)//Кавказ 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М., 1981.（H.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中的马的形象——兼论斯基泰时代南西伯利亚地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古代及中世纪的高加索与中亚地区》，莫斯科，1981 年。）

② 同上。

③ P. R. Moorey, *Catalogue of the Ancient Persian Bronzes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971.（P. R. 莫里：《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的古代波斯青铜器的分类研究》，牛津，1971 年。）

④ Л. 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ейшая Хакасия, М., 1986.（Л. Р. 科兹拉索夫：《古代哈卡斯》，莫斯科，1986 年。）

灵形象被认为起源于奥格拉赫特地区的岩画。[①]



图 10 洛雷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类似的形象
1. 奥格拉赫特岩画上的各个时代的形象（南西伯利亚）：
青铜时代早期的形象及塔加尔文化时期的扁角鹿和马的形象；
2. 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马镳（站立在两只兔子之间的怪兽）；
3. 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马镳，其表现的马的形象属于典型的伊朗式装饰艺术

① С. В. Студзицкая, Изображ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в искусстве древнего населенияурало-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7.（С. В. 斯杜德基茨卡娅：《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地区古代艺术中的人形形象》，《人神同形研究》，新西伯利亚，1987 年。）И. Г. Глушков, Ик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екотор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человека//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7.（И. Г. 格鲁什科夫：《某些人形艺术形象的肖像学特点》，《人神同形研究》，新西伯利亚，1987 年。）

如果说奥格拉赫特地区的岩画中的马与洛雷斯坦青铜器中所表现的马具有相似之处（图 10：1、3）的话，那么这些相似性还体现在一个方面，即二者所表现的车轮是一样的。如果说奥格拉赫特地区的岩画中的车轮位于马的大腿处，这经常被人解释成太阳的象征[①]，那么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马镳上位于马的臀部、像花结一样的车轮也具有同样的含义（也有人将其解读为伊斯塔尔女神的象征），但如果不说得详细一点的话，就会引起怀疑。这种花结是洛雷斯坦和伊朗北部地区常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时代为公元前 2 千纪末至公元前 1 千纪初。其最主要的功能是装饰。

Н. Л. 奇列诺娃还认为塔加尔文化和洛雷斯坦发现的鍑也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有站立的马状把手。[②] 此外，Н. Л. 奇列诺娃还提到了洛雷斯坦的一件青铜器，这是一件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青铜壶，其主要功能可能是用来祭酒。它的把手为马形，而流部也有马的造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塔加尔文化中发现的鍑，其把手上的马，在各种细节上与真实的马也存在着诸多差别。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些所谓的相似性绝大多数都是臆想的。

有一个独特的观点和洛雷斯坦青铜器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观点的实质是，它片面夸大了洛雷斯坦青铜器对欧亚草原地带早期游牧艺术的影响。这个观点其实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鉴于与日俱增

① Н. Л. Членова, Татарские лошади (о связях племен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 СреднейАзии в скифскую эпоху)//Кавказ 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М., 1981.（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中的马的形象——兼论斯基泰时代南西伯利亚地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古代及中世纪的高加索与中亚地区》，莫斯科，1981 年。）О. С. Черняева, Солнечные кони Оглахтов//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ий мир, Кемерово,1984.（О. С. 切勒尼娅耶娃：《奥格拉赫特发现的太阳马形象》，《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克麦罗沃，1984 年。）Р. В. Николаев, Солнечный конь // 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ий мир,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7.（Р. В. 尼科拉耶夫：《太阳马形象》，《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克麦罗沃，1987 年。）

② И. Л. Членов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племен тат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67.（Н. Л. 奇列诺娃：《塔加尔文化的起源及其居民的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 年。）

的、与斯基泰艺术起源有关的新材料，它也有了特别的现实意义。在将考古材料进行比对分析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洛雷斯坦青铜器对斯基泰艺术的形成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从任何一个早期斯基泰艺术的形象中都分离不出洛雷斯坦艺术的元素来。甚至是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见到的具有斯基泰艺术特点的物品（例如哈勒辛发现的鹿形牌饰以及带有马头的马镳），这类物品并不是发源于当地的，而是具有浓厚的外来因素，总的来看属于古代东方艺术的范畴。由此也证实了北方游牧民族受到的伊朗西部地区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再辅之以一些其他相关材料可以使我们提出关于斯基泰野兽纹起源于前亚地区的观点，但这个观点还不太成熟[①]。笔者确信，以新的理论模式为基础来看斯基泰艺术的起源，其应该不是外来的，而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来看，艺术乃至艺术风格是民族特点的一种鲜明的外在表现。

---

① Г. Н. Курочкин, Ранние этап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киф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Кочевн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и античный мир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1989.（Г. Н. 古洛奇金：《斯基泰艺术形成的早期阶段》，《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人与古代世界》，新切尔卡斯克，1989 年。

考古学与对5—8世纪日耳曼社会史的研究*

海科·施托伊尔（Heiko Steuer）著　周芝雨译

考古学的素材是否也使得我们能够了解过去诸时代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合法的设问。对墨洛温王朝时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讨论尤其广泛，因为除了文字记载之外，更有极其丰富的来自于所谓行列墓（Reihengräber）[①] 文明的墓葬的来源素材可供评估鉴定。这些墓葬的特点是，死者的随葬品包含了他们的饰物、武器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器物，这一特征使得陪葬习俗成了墨洛温王朝自我表达的窗口：昔日的生活方式通过安置死者的仪式得到了展现。假如随葬品始终只能记录过往生活的一个片段，那么考古学家们事实上已然心照不宣地设定了这么一条公理，即呈现出统一规格的陪葬习俗直接反映出了核心的社会现实。

历史科学与考古学——分别受限于它们各自的素材——所探讨的是完全不同的过去的片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活动。人们必须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仅仅在例外情况中可以期待能够沟通二者。墓葬考古学的观察研究和制度史的观察研究分别构建出过去生活总体的独立的段落，这些段落仅在一些片段中相互勾连。或许更加值得期待的是，经过考古学研究的聚居区为社会史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因为村落、农庄和房

---

* 本文译自“Archäologie und die Erforschung der germani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s 5. bis 8. Jahrhunderts”, Dieter Simon (Hrsg.): *Akten des 26. Deutschen Rechtshistorikertages : Frankfurt am Main, 22. bis 26.September 1986.*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87, S. 443-453。——译者注

① 指单个墓葬依时间顺序整齐地排列成行的墓葬区形式。——译者注

屋的分布图就是过去居民的生活空间，它并不像墓葬那样受到过宗教或信仰习俗的改造。至今在德国北部、荷兰和丹麦已完整发掘出大量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聚居区，相比之下，在行列墓文明地区，此类发掘成果的数量尚非常有限。所以墓葬始终是研究墨洛温王朝时期社会结构的首要素材，包括单个墓葬、墓葬区、在教堂里面或周边的墓葬。

下葬习俗完全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并因此包含了对生活的理解、仪式性的需求、传统以及个体的独特性。考古学家很清楚，他无法或只能在例外情况中从墓葬中解读出阶级特征：自由和不自由，贵族出身或随从关系中的大多数类型，比如家庭权威或土地所有制框架下的随从关系。但是考古学家却想要总结关于等级、权力、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的真相。

通过同制度史学家和中世纪史学家的对话应当证明，考古学家选择的诠释能否被接受、文字记载与考古学发现之间是否有交点、考古学最独特的贡献是否真的打开了除历史科学以外的存在领域。在此我想提出以下几点供讨论[①]：

1. 对随葬品——比如贵金属质地的饰品镶饰和武器配饰——的基本评估。

2. 墨洛温王朝时期随葬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方式的类型。

3. 通过墓葬找到支撑“贵族”身份——指的是社会上或经济上具有统治地位的阶层——的证据。

4. 通过诠释所谓的独立墓地（Separatfriedhöfen）描绘被埋葬的人或

---

① 关于我对这些问题的详细的立场见 H. Steuer, *Frühgeschichtliche Sozialstrukturen in Mitteleuropa.* Abh. Akad. Wiss. Göttingen, Phil.-Hist. Kl. Dritte Folge Nr. 128 (Göttingen 1982); ders., Die frühmittelalterliche Gesellschaftsstruktur im Spiegel der Grabfunde, in: H. Roth, E. Wamers (Hrsg.), *Hessen im Frühmittelalter. Archäologie und Kunst* (Sigmaringen 1984), S.78-86, 196-199。

群体的特殊社会地位——此处指的是贵族式的特殊地位。

5. 教堂中的独特墓葬以及将其解释为捐赠人之墓的诠释，这些墓葬似乎能够在考古学的路径上证明私有教堂（Eigenkirchen）的性质和贵族的身份。

6. 间接证明官员乃至贵族的阶级标志。

7. 行列墓墓地的终结、将墓葬迁至教堂或村落的行为以及对旧墓地的洗劫：重大社会转变的标志。

（1）第一阶段的包含随葬品的日耳曼人墓葬，其出现地大多同晚期罗马墓地有关联，且属于 4—5 世纪。这些墓葬中的死者配有包括武器和饰物在内的随葬物，这种配置之后成了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典型配置[①]。因为这些墓葬中的大多数只含有比如作为武器的斧子或作为饰品的铜质扣别针，且只有一些男性墓葬带有包含剑在内的完整武器套装或只有少数女性墓葬带有银质扣别针或发簪，所以这些男性或女性的随葬物配置被解读为是日耳曼统治阶层的丧葬方式。在发掘易北河—威悉河三角区（Elbe-Weser-Dreieck）或威斯特法伦地区（弗勒格尔恩［Flögeln］，威悉明德县［Kr. Wesermünde］；艾林矿山（Zeche Erin），卡斯特罗普—劳克塞尔市［Castrop-Rauxel］）的农民聚居区时找到了银质的女性饰品，在发掘日德兰半岛（欧弗辟高［Overbygard］）的一个聚居区时在一幢房屋的地下室里出土了两柄长剑（Hiebschwerte）和一柄斧头。这些聚居地出土物说明这里的居民都是持有武器和贵金属饰品的农民。如果考古学家找到了日耳曼统治阶层的住房，或是鉴定出了一个广泛的农民阶层的武器和饰品，那么这些阶层的人可能具有怎样的权力地位呢？

所谓的行列墓习俗开始于 5 世纪末，即同克洛维一世建立法兰克王国

---

① H. W. Böhme, *Germanische Grabfunde des 4. bis 5. Jahrhunderts zwischen unterer Elbe und Loire* (München 1974).

的时间相平行，并于7世纪末或8世纪初结束——在西部地区结束的时间早于东部。这种墓葬风格的特征是包含由武器、饰品镶饰、日常用品以及用于正式宴会的较高档的饮食器具所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格的随葬品配置。其中有一个从无陪葬品的墓葬到陪葬品贫乏的墓葬、再到陪葬品丰富的墓葬的等级序列。莱纳·克里斯特莱茵[①]依照所谓的性质群组对整个陪葬品图谱进行了划分，并将这些群组根据社会等级并列起来，比如说带有剑和成对扣别针的墓葬属于B群组——享有地方性权力的富有自由民；包含铜餐具、马具、金质饰品和有贵金属装饰的武器的墓葬属于C群组——高于平均水准的富有自由民，即享有跨地域权力的贵族（*optimates*）；而带有极罕见的、绝大多数来自进口的物品的墓葬则属于D群组，它们达到了亲王（*reguli*）或公爵的等级。这种划分经历了频繁的讨论，也受到过批评，但已通行于考古学界，因为它像菜谱一样易于应用。如果人们想要获得对某个墓葬区的简洁概括，这种划分标准就是有意义的。但是阶级鉴定始终是有问题的，对于极其豪华的墓葬来说或许问题不大，可是对于"普通"陪葬品配置来说是有问题的。沉重的武器装备和银质的成对曲柄扣别针都有可能属于"普通"的陪葬品配置。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一直在讨论，墓葬中有完整的武器套件是自由民、富农还是贵族的标志，而不太完整的武器套件是否是某种半自由民或农奴的标志。墓葬中的武器装备是某种权力地位的标志，是某个自由农民家庭的有意识的表达，还是指向负有军事义务的人？沉重的、带有昂贵装饰的武器和马具轻易地给人以武士的生活方式、独立以及较高社会等级的印象。这种结论是否可能并不充分？当今又多了所谓的公民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描述之间的讨论。

---

① R. Christlein, Besitzabstufungen zur Merowingerzeit im Spiegel reicher Grabfunde aus West- und Süddeutschland. Jahrb. RGZM 20, 1973, 147-180; ders., *Die Alamannen. Archäologie eines lebendigen Volkes* (Stuttgart 1978) 83 ff.

“东边”[1]的学者们[2]致力于通过陪葬品配置“确定自由的、经营私有财产的农民的社会比例”，对于 6—8 世纪这个时段来说，这个目标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封建制度的产生。

（2）毫无疑问，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墓葬反映出了武器装备的核心地位并以此反映出了当时的人生观。[3]生活方式变得完全可以被了解，可以感受到哪些因素在价值观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饰品经常达到极其奢华的程度，坐骑作为宝贵的财产被设置在武士墓葬的周边。[4]就像史前史和古代史的其他时代一样，除了武器装备之外，高级墓葬中还可以看到豪华的宴会器具——铜质餐具、玻璃餐具、烤肉叉、基特拉琴（leier）等，这并不值得惊讶。这些随葬物都很贵重，其中一些需要花费相当的“钱财”，它们反映出经济实力、社会等级以及在此之上的政治意义。奢华墓葬[5]的特

---

① 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译者注

② P. Donat, Zum Problem der sozialökonomischen Differenzierung der bäuerlichen Produzenten im ostfränkischen Reich (nach archäologischen Quellen), in: *Die Rolle der Volksmass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vor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 (Berlin 1975) 175-185; J. Herrmann, Ökonomie und Gesellschaft an der Wende von der Antike zum Mittelalter. Zum Problem der Herausbildung der ökonomischen Grundlagen der Feudalgesellschaft im mittleren und westlichen Europa. 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 Wiss. DD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Jg. 1979, Nr. 13 G (Berlin 1979); *Deutsche Geschichte* Bd. 1 (Berlin / Köln 1982) 219 ff., 228 ff.

③ J. P. Bodmer, *Der Krieger der Merowingerzeit und seine Welt. Eine Studie über Kriegertum als Form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im Frühmittelalter* (Zürich 1957).

④ Judith Oexle, Merowingerzeitliche Pferdebestattungen-Opfer oder Beigaben? *Frühmittelterliche Studien* 18, 1984, 122-172.

⑤ G. Kossack, Prunkgräber, Bemerkungen zu Eigenschaften und Aussagewert. Studien zur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n Archäologie. *FSJ. Werner,* Teil I (München 1974) 3-33; L. Wamers, *Eine thüringisch-fränkische Adels-und Gefolgschaftsgrablege des 6./7. Jahrhunderts bei Zeuzleben. Wegweiser zu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n Stätten Mainfrankens* 5 (Würzburg 1984).

征不仅包括贵重的随葬物，还包括建造坟墓本身的惊人开销——比如措伊茨雷本（Zeuzlebn）[①] 的一个墓葬包含了作为随葬品的马车以及多层附属建筑。它反映出了社会的顶层群体，对考古学家来说，这就是“贵族”。

（3）证明“贵族”身份是考古学家对出土墓葬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对王室墓葬来说这不成问题，而且它也代表着人们可以预期最高社会阶层拥有怎样的陪葬品，比如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②]（Childerich，死于486年）的墓葬、圣丹尼省阿勒贡德王后（死于565/570年）的墓葬、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雷特瓦尔特 117（死于7世纪前半段）位于萨顿胡[③]（Sutton Hoo）的船型墓葬。[④] 约阿西姆·维尔纳认为，在希尔德里克一世以及其他同时期墓葬中发现的粗尾臂环（Kulbenarmring）是王室家族（*stirpsregia*）这一阶层的体现。[⑤] 然后金柄阔剑（Goldgriff-Spathas）、圆环护手剑（Ringschwerter）、环箍头盔（Spangenhelme）或盔甲也是最高等级贵族的标志性随葬品。[⑥]

然而特征不突出但仍旧不同于普通陪葬品的随葬物无法被明确地归给“贵族”，至少不能确定是属于小至所谓当地贵族（*Ortsadel*）的何种贵族阶层。考古学家在一个墓葬区的最富裕的几个墓葬中发现的就是这样的贵族。

---

① 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北部城市维尔内克的一个区。——译者注

② 法兰克的国王，克洛维一世的父亲。——译者注

③ 英格兰萨福克郡伍德布里奇附近的庄园。——译者注

④ K. H. Krüger, Königsgrabkirchen der Franken, *Angelsachsen und Langobarden bis zur Mitte des 8. Jh.* (München 1971); M. Müller-Wille, Royal and aristocratic grav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in the Merovingian period, in: *Vendel Period Studies*, The Museum of National Antiquities, Stockholm, Studies 2 (Stockholm 1938) 109-116.

⑤ J. Werner, Der goldene Armring des Frankenkönigs Childerich und die germanischen Handgelenkringe der jüngeren Kaiserzeit. *Frühmittelalterliche Studien* 14, 1980, 1-41.

⑥ H. Steuer, Helm und Ringschwert-Prunkbewaffnung und Rangabzeichen germanischer Krieger. *Studien zur Sachsenforschung* 6, 1987, 189-236.

（4）为了确保论证的有效性并证明当地贵族的身份——消除自由浮动，考古学找了更多的论据。所谓的独立墓地紧邻大型本地墓地的设置方式，这些小规模墓葬群组完全独立的存在或在教堂内部或周边聚团的分布方式，都被解读为是开始将自己同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的贵族阶层的脱离行为。[①]6 世纪时，位于显眼或独立位置的贵族墓葬仅出现在莱茵河西边的法兰克人群体中，直到 7 世纪，这一习惯才被阿勒曼人和巴伐利亚人接纳。[②]"贵族"阶级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存在，但是经常带有陌生墓葬习俗的单独设立的墓葬区都意味着外来家族的迁入，可能其中大部分都是法兰克人，他们之后渗透到了法兰克帝国这一多民族混居区的各个地方。[③]

同上述情况有关的还有"创始人墓葬"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聚居地的建立者的墓葬。创始人墓葬，即一个墓葬区最老、最初的墓葬，同之后的墓葬比起来大多具有更加华贵的随葬物配置，因为得到看护而免于被盗墓，如果是独立墓葬区的创始人墓葬，则其随葬品配置的豪华程度就更加突出。许芬根（Hüfingen）[④]的墓葬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地普通阿勒曼人的本地墓葬区位于共有耕地"高地"[⑤]（Auf Hohen）[⑥]上，而贵族墓地则

---

① H. Ament, *Fränkische Adelsgräber von Flonheim* (Berlin 1970); R. Christlein, Der soziologische Hintergrund der Goldblattkreuze nördlich der Alpen. In: W. Hübener (Hrsg.), *Die Goldblattkreuze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Bühl/Baden 1975) 73-83 Abb. 6: Gesamtkarte der „Adelsfriedhöfe" in Süddeutschland.

② 由 H.W. Bohme 制作的新版完整分布图见罗马—日尔曼中心博物馆的工作报告：*Jahrb.* RGZM 32, 1985, 709-710, Abb. 22-23。

③ 参见本书第 94 页注释 1，H. Steuer, S.474-477。

④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城市。——译者注

⑤ G. Fingerlin, Hüfingen, ein zentraler Ort der Baar im frühen Mittelalter. In: *Der Keltenfürst von Hochdorf. Methoden und Ergebnisse der Landesarchäologie* (Stuttgart 1985) 411-447.

⑥ 许芬根市地名。——译者注

位于“物欲坡”[1]（an der Gierhalde），依据树轮年代法测定出其创始人墓葬的墓室建于606年，其中的随葬物包括一副带有两块银质基督教主题装饰盘（Phaleren）的马具。发掘者认为，奢华的墓穴建筑和随葬物表明，墓主明显身居超过当地贵族的阶层，就算他不属于上层贵族，也定是较高层的贵族。

（5）如果一个墓葬被设置在教堂内并让人觉得墓主是教堂的捐赠人，那么将其归为贵族墓葬的做法就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这类墓葬能够将所在的教堂定性为私有教堂，借此又可以将墓主判定为属于具有统治性社会和经济地位阶层的贵族。[2] 米歇尔·博格尔特的研究表明，将捐赠人墓葬和私有教堂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仅存在于中世纪考古学中的想象连接，它始自对乌尔里希·施图茨（Ulrich Stutz）私有教堂理论的接纳，彼得·戈斯勒（Peter Goesler）和约阿希姆·维尔纳将该理论同“贵族墓葬”联系了起来，而汉斯·艾里希·费讷（Hans Erich Feine）在进一步构建私有教堂理论时又引证了前面两人的观点。从原则上说，捐赠人墓葬和私有教堂都是制度史的概念；同时作为带有特定使用目的的财产捐赠以及作为服从管理的设施的私有教堂，这两者都是持续的制度事实。这样一来，博格尔特的观点——从意义上来说，捐赠人墓葬和私有教堂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是正确的。考古学家更多地想到的是教堂创建者的墓葬。可是因为一个地主完全能够授命建立多所教堂，但只能被葬在其中一所教堂里，且其他人的下葬仪式也可能获准在这个地主的私有教堂内举行，所以教堂中的墓葬和私有教堂所有者之间的联系几乎不具有强制性。埋在教堂中的、带有贵重随葬品的墓主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这一制度事实无法被认定。因

① 许芬根市地名。——译者注

② M. Borgolte, Stiftergrab und Eigenkirche. Ein Begriffspaar der Mittelalterarchäologie in historischer Kritik. *Zeitschrift für Archäologie des Mittelalters* 13, 1985 (1986), 27-38.

此必须重新考虑该如何鉴定埋葬于教堂中的死者。博格尔特建议通过死者受到的关照来推定其阶级，因为在墨洛温王朝时期，这样的死者同样属于能够安排自己的葬仪的社会群体。如果死者本人不是地主或贵族，那么他至少也属于同统治阶层非常接近的群体，比如能够完全以自己的财产组织教堂中的下葬仪式的农民。[①]

① 近来发表了很多私有教堂中的捐赠人和贵族墓葬以及其他贵族墓葬的发掘报告，这里仅列举一些例子：G. Fingerlin, Merowingerzeitliche Adelsgräber in der Peterskirche von Lahr-Burgheim. *Archäologische Nachrichten aus Baden Heft* 35, 1985, 23-35; R. Christlein, Bajuwarische Adelsgräber des 7. Jh. von Moos-Burgstall Landkreis Deggendorf, Niederbayern. *Das archäologische Jahr in Bayern* 1980 (1981) 166-167; R. Christlein, W. Czysz, Alamannische Adelsgräber von Jengen, Landkreis Ostallgäu, Schwaben. *Das archäologische Jahr in Bayern* 1981 (1982) 164-165; U.v. Freeden, H.J. Köhler, Neue bajuwarische Adelsgräber von Moos-Burgstall, Landkreis Deggendorf, Niederbayern, a.a.O. 166-167; E. Keller, Ein frühmittelalterlicher Adelsfriedhof mit Kirche in Herrsching am Ammersee, Landkreis Starnberg, Oberbayern. *Das archäologische Jahr in Bayern* 1982 (1983) 122-126; W. Charlier, R. Christlein, E. Keller, Bajuwarische Adelsgräber des 7. Jh. von Hausen, Gemeinde Kirchheim bei München, Landkreis München, Oberbayern, a.a.O. 127-128; U. Osterhaus, Eine Adelsbestattung aus der Zeit um 700 n. Chr. aus Regensburg-Harting, Oberpfalz, a.a.O. 131-134; L. Wamser, Eine thüringische Adelsgrablege des 6. Jh. bei Zeuzleben. *Das archäologische Jahr in Bayern* 1983 (1984) 133-138; ders., Neue Untersuchungen im thüringisch-fränkischen Adelsfriedhof von Zeuzleben, Markt Werneck, Landkreis Schweinfurt, Unterfranken. *Das archäologische Jahr in Bayern* 1984 (1985) 131-134; G. Fingerlin, Ein Adelsgrab der jüngeren Merowingerzeit aus Neudingen, Stadt Donaueschingen, Schwarzwald-Baar-Kreis. *Archäologische Ausgrabungen in Baden-Württemberg* 1984 (1985) 172-176; K. Bänteli, B. Ruckstuhl, Die Stiftergräber der Kirche S. Maria zu Schleitheim. *Archäologie der Schweiz* 9, 1986, 68-79; M. Martin, Ein münzdatiertes Kindergrab aus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ecclesia in castroExsientie" (Burg Eschenz, Gem. Stein am Rhein SH), a.a.O. 84-92; M. Hartmann, Die Stiftergräber in der Stadtkirche St. Mauritius von Zofingen. *Archäologie der Schweiz* 4, 1981, 148-163; M. Martin, H.R. Sennhauser, H. Vierck, Reiche Grabfunde i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Kirche von Schöftlach. *Archäologie der Schweiz* 3, 1980, 29-55; etc。

（6）另一条证明“贵族”身份的道路将考古学家们引向了代表阶级、地位或职位的符号，它们标志着拥有职务者来自统治阶层或王室背景，即他是一个承担职务的贵族。例如仅在剑柄的可见部分贴有金箔的金柄阔剑就属于这类标志。有的配置豪华的墓葬并非随机分布于境内，而是出现在特定的地点，比如集中在莱茵黑森地区（Rheinhessen）[1]，借助文字记载已经可以确定它们同王权有所关联。在这样的墓葬中如果出现了金柄阔剑，则表明剑的主人拥有职位，甚至有可能是行政官[2]（Grafen）。人们论证说，这类武器和佩戴者的职位一样是不可继承的。但是它们不像职位那样需被交还宫廷，而是可以随主人入土。金柄阔剑属于四五百年左右这段时间，6 世纪早期出现并替代它的则是所谓的圆环护手剑，这是一种贵重的武器，在其护手上装有后来添加的成对贵金属环：它标志着随从关系框架下武士之间的紧密关系，或国王与官员之间的紧密关系。[3] 目前尚无除了间接证据之外的可靠证据，而且其他墓葬的随葬物配置都非常多变。但是或许仍旧可以借助别的领域来证明高等级的官员的身份。最近在英国发掘出了一个墓葬，其中除了盾牌和腰带扣之外还找到了一个装有金秤的容器。[4] 容器上的鲁内文铭文“……haeriboki……”的意思大约是“主人的账簿”，这暗示了军事领域中的一项大宗买卖。包含金秤的墓葬描绘出一个掌管收支活动——比如支付被杀赔偿金（Wergeld）——的群体。之前人们已经依据墓中其他随葬品——通常是武器——和该秤适用于称量黄金这一事实猜测，这种随葬品配置应被归为贵族阶层[5]，或许墓主并不居于社会的最

---

①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个区域。——译者注

② R. Christlein, *Die Alamannen* (Stuttgart 1978) 86 f.

③ 参见本书第 98 页注释 6。

④ Chr. Scull, A Sixth-Century Grave Containing a Balance and Weightsfrom Watchfield, Oxfordshire, England, *Germania* 64, 1986, 105-138.

⑤ W. Timpel, Fränkische Adelsgräber von Alach, Kr. Erfurt. *Ausgrabungen und Funde* 28, 1983, 237-240 (zwei reich ausgestattete Männergräber mit Feinwaagen).

高层，但肯定也在较高层。发掘出该秤的英国人即持有这种观点。

（7）7 世纪下半叶，行列墓风格及其传播甚远的随葬习俗进入了尾声。古旧墓葬区的排列方式得到了调整：与之同期开始了一轮系统性的盗墓活动，一般波及到 75% 以上的墓葬。[①] 在史前史和古代史中没有哪个时代发生过这样大范围的、针对本族老旧墓地的盗墓活动。人们过去用贵金属的短缺来解释这一现象，其他的解释还包括：经济倒退迫使人们用坟墓中的铁来制作急需的物件；因为基督教的影响，本民族的异教风俗意义减弱。所有这些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居民将本族死者的随葬品移到了何处？有人说，在6世纪末及7世纪，下葬仪式都在教堂里面或周边进行，同时人们也完全保留了旧的、完全脱离基督教观点的随葬习俗。人们猜测这些墓葬群组中埋葬的都是贵族家庭及其从属。[②] 当教堂变成教区教堂后，普通民众就将身边的死者葬在教堂里，贵族家庭及其从属也效仿了他们的做法。但是较新的发掘表明，一直以来，并非所有停止搜寻新的墓地的家族都将死者葬在教堂周边（即正在形成的晚期中世纪村落的中间），而是将死者葬在位于 7 世纪旧村落中心的农庄边上的墓地里。[③] 墓葬和农庄之间的从属关系是已知的，据此亦可完成对随葬品的鉴定。这些随葬品就如 7 世纪下半叶普遍出现的情况那样

---

① H. Roth, Archäologische Beobachtungen zum Grabfrevel im Merowingerreich. In: H. Jankuhn u.a. (Hrsg.), *Zum Grabfrevel i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r Zeit.* Abh. Akad. Wiss. Göttingen Phil.-Hist. Kl. Dritte Folge Nr. 113 (Göttingen 1978)，53-84.

② J. Werner, *Das alamannische Fürstengrab von Wittislingen* (München 1950). 这篇文章开启了对贵族墓葬、宫廷以及后来转变为郊区教堂的私有教堂的讨论。

③ 聚居区中的墓葬区：Burgheim, Ldkr. Neuburg / Donau-R. Christlein, *Die Alamannen* (Stuttgart 1978) 42 Abb. 18; Kirchheim, *Ldkr. München-Das archäologische Jahr in Bayern* 1980 (1981) Abb. 12 mit mehreren Gräbergruppen neben Höfen; *München-Englschalking-Das archäologische Jahr in Bayern* 1983 (1984) 141 Abb. 97-mehrere Gräbergruppen bei ihren Höfen。

变得愈加俭朴；很多坟墓根本没有随葬物。但是一些墓葬含有武器、剑与马刺，另一些墓葬中有贵重的女性饰品。正是这些随葬品组合的群组在数年之前诱使人们将其解释为贵族墓葬。[①] 现在这些墓主被认定是农庄的居民。

针对本族墓地的洗劫活动以及对本族先辈死后安息的公然蔑视也反映出同本族历史之间的断裂。如果说旧社会形态的革命性转变同民族大迁徙时代密切相关，并导致了行列墓习俗的产生——这一习俗同时也在法兰克帝国出现，那么导致行列墓习俗被放弃和盗墓行为蔓延的变革一定更加剧烈。看起来，诸家族似乎已经失去了意愿、权利和机会去维护其先辈坟墓的安宁，去尊敬墓中的死者。亲属关系和家庭纽带一定失去了重要性并遭到破坏。

作为一种解读的建议，我认为，贵族和土地所有制度始终得到了巩固和延续。通过法律和出身保障了自身权力地位的贵族和自由人家族不再需要凭借奢华的随葬品和墓葬习俗标志性地展示其社会地位。只有在必须公开展示每个社会地位的公开的等级社会中，即在一个每个家族都有各不相同的等级、家族内部也有等级次序的社会中，家庭展示其社会地位的行为才是有意义的。依附于主人的家族无法自由地支配财产，他们可能会被贵族主人发派、转赠、转移或拆散，因而不再有条件一代一代地维护家族墓地，为死者配上有价值的随葬物。[②] 地主在教堂埋葬亲人，并让这些教堂成为教区教堂，然后又准许其他人在此下葬并亲自加以安排布置。相对而言，那些放弃了不再需要保护的行列墓墓葬区，直接将死者葬在庭院里的家庭成员，可能是最后的“自由人”，他们不束缚于土地所有制，因此也不需要接受将死者葬在私有教堂和教区教堂周边的新习俗。

---

① F. Stein, *Adelsgräber des achten Jahrhunderts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67).

② H. Steuer, *Die Franken in Köln. Aus der Kölner Stadtgeschichte* (Köln 1980) 158 ff.

这个过程不断持续：近年的考古发掘活动表明，在7世纪晚期到8世纪的这段时间里，农村结构的变化并非偶然。直到这个时期为止，作为“移动的村落”的聚居区每隔小几十年就会在区域边界内被转移到原地址旁边的新位置，此时就会促发一轮迁移。当所有村民一起决定了安置共同墓葬区的措施后，迁移就可能发生。但是在更晚近的时候，一个村落中有了一个乃至多个掌握权力和财产的地主，旧式的搬迁就无法被组织，也不再有人想要这么做了。村落的位置固定了下来，拥有包含墓地的教堂，这种情形从8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如下问题产生：上文所描述的模式能否通过政治和制度史方面的文字记载得到证实？对于晚期墨洛温时代和早期加洛林时代来说，这种验证似乎是可能的，同时考古学的重要性在相反的方向上逐渐增加。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依照7世纪后期的情状做出了对5世纪早期的墓葬区的社会历史解读。

论萨曼王朝的起源问题*

Ш. С. 卡莫利丁（Ш. С. Камолиддин）著　粟瑞雪译

前言

众所周知，中亚的萨曼王朝在中世纪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9—10 世纪，该王朝的众多成员统治着首都布哈拉、其他一些城市以及呼罗珊和马维拉纳赫尔（Мавераннахр）地区（Frye 1993：136-161；博斯沃尔特 1971：145-147；涅戈马托夫 1977）。尽管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讲述萨曼王朝代表人物的统治情况，描述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但时至今日，我们对该王朝的起源仍一无所知（Frye 1993：136）。许多研究者认为，源于波斯的萨曼王朝（Bosworth 1995：1025；别列尼茨基 1999：19—24；Browne 1997：207，352；雷恩-普利 1899：107）还与萨珊王朝有关（阿兹-济里克利 I：290；加富罗夫 1958：51—55；Gafurov1957：2-3；Mercil 1994：253）。因此，为了确定萨曼王朝的真正起源，运用更广泛的文献进行补充研究，仍然是最现实的史学问题之一（特列德维尔 1999：88—89）。

在 8 世纪的前 1/4，该王朝的创始人萨曼-胡达特首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从巴尔赫来到梅尔夫拜见呼罗珊的阿拉伯地方行政长官阿萨德·

---

* 本文译自 Шамсиддин Камолиддин,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аманидов”,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5 (2006/200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pp. 39-63。——译者注

伊本·阿卜杜拉·阿尔-卡斯里（或叫阿尔-库沙伊里）[1]，请他帮助抵抗自己在巴尔赫的敌人。得偿所愿后，萨曼-胡达特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他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为表示尊敬，萨曼-胡达特把自己的儿子也叫阿萨德。稍后，他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呼罗珊的阿布·穆斯林运动（阿兹-济里克利 I：290；Frye 1993：136）。后来，当阿尔·马穆恩[2]在梅尔夫担任呼罗珊的地方行政长官时，萨曼-胡达特的儿子阿萨德曾在前者的官邸里服务。萨曼-胡达特的孙子，也就是阿萨德的儿子们——努赫、艾哈迈德、亚赫亚和伊利阿斯参加镇压了拉菲·伊本·阿尔·拉伊斯（190—195/806—810）在中亚（纳尔沙希：69）领导的起义，并说服后者放下了武器向当局投降。由于他们的这些功绩，阿尔·马穆恩从梅尔夫动身去往巴格达之前，下令任命他们为行政长官。于是，在204/819—820年，他们被任命为马维拉纳赫尔地区一些城市的地方行政长官：努赫在撒马尔罕，艾哈迈德在费尔干纳，亚赫亚在阿什沙什和乌斯特鲁善，伊利阿斯在赫拉特（涅戈马托夫 1977：18）。伊利阿斯·伊本·阿萨德是他们中间一位有经验的将领，曾在塔希尔王朝的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212/827—828年，他被任命为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地方行政长官。

巴赫拉姆·丘宾

关于萨曼-胡达特的出身问题，文献中的说法各异。按照某些资料（Macoudi II：5；al-Moqaddasi：337-338；Jacut III：13），他是萨珊王

---

① 阿布·蒙济尔·阿萨德·伊本·阿卜杜拉·阿尔－卡斯里在98/716—717年曾担任久尔久城（Джурджан）的地方行政长官，在106—109/724—728年担任呼罗珊的地方行政长官，120/737—738年去世。

② 182—198/798—812年曾担任呼罗珊的地方行政长官，官邸设在梅尔夫，198—218/813—833年担任哈里发时，官邸设在巴格达。

朝的沙汉沙赫[①]巴赫拉姆·古拉（420—438 年执政）[②]或者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531—579 年执政）（阿兹-济里克利 I：290）的后裔。但是，大多数文献追溯他的家谱至巴赫拉姆·丘宾（6 世纪）（Hudud al-'Alam：102；al-Istakhri：143，292；Ibn Haukal：468; 纳尔沙希：133; Mirkhond：113；加富洛娃 1992：63），后者是萨珊王朝沙汉沙赫胡尔马日德[③]四世（579—590 年执政）的统帅。巴赫拉姆·丘宾最先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马尔兹潘[④]（ad-Dinawari：81）[⑤]，后来担任列伊和呼罗珊的行政长官（Macoudi I：213）。也有一些资料说巴赫拉姆·丘宾出身突厥，来自在萨珊王朝任职的突厥—奥古兹人（古米廖夫 1967：162；里佐 1955：152）。

萨珊王朝也像安息人那样，在实践中广泛利用邻近“未开化”部落的军事力量。利用游牧部落的军事潜力同时也保障了对他们的长期控制（Wright 2005：15-31）。有资料表明，还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突厥人就站在伊朗人一方参加过军事行动。[⑥]在 4 世纪时，萨珊王朝曾利用希奥

---

① 封号，意指王之王。——译者注

② 巴赫拉姆·朱尔——伊斯兰传统中萨珊王朝沙汉沙赫瓦拉赫兰五世古拉（420—438 年执政）常用的名字。巴列维语的瓦拉赫兰源于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胜利之神的名字。中世纪时，巴赫拉姆的名字在突厥人中非常普及（绍米：54，70）。

③ 这个名字在文献中是胡尔穆日或胡尔穆日德的形式；在学术著作中通常采用霍尔米日德或霍尔穆日德的形式。因为这个名字源于拜火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所以应读成胡尔马日德。

④ 中世纪伊朗的行政长官。——译者注

⑤ 尼扎姆·阿尔-穆尔克称巴赫拉姆·丘宾为萨珊国王胡斯拉夫二世帕尔维扎（590—628 年执政）的“瓦济里人”（西阿谢特-纳梅：75）。

⑥ 兵法传统悠久的突厥人在古代曾作为雇佣军为多国服务。因此，根据亚美尼亚的文献资料，在基尔的儿子——阿契美尼德国王坎比日的军队里就有雇佣的突厥队伍，后者为国王作战并战胜了国王的敌人（捷尔-姆克尔季昌 1985：66）；根据来自耶特城（埃及）的、用希伯来语书写的文件，公元前 5 世纪阿契美尼德帝国进军埃及就是由花剌子模的突厥人、哈尔钦的儿子——达尔戈曼率领的（Meyer 1912：28；Togan 1981：416，n.124）。在中世纪，突厥人曾为阿拉伯人、波斯人、拜占庭人和中国人服务，甚至帮助俄罗斯的大公们保卫基辅大公国的边界（文件 1967：100）。

尼特人在战争中对抗拜占庭。502年，柯巴德[1]与白匈奴结盟，再次进军拜占庭。503年，白匈奴在高加索与匈奴作战。527—532年，萨珊王朝利用萨维尔人与拜占庭作战。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还让英勇善战的部族在边境上广泛屯居，为游牧民族建立永久的屏障（科列斯尼科夫 1981：53；季亚科诺夫 1961：312）。因此，根据阿尔-马苏第的资料，这位国王兴建了巴布·阿拉布瓦布城，以及抵御异教徒的长40法尔萨赫[2]的城墙，并让哈扎尔人、阿兰人[3]、突厥人的各个氏族和萨维尔人的各部落在每座城门附近居住以保卫城墙（Macoudi Ⅱ：2）。

大多数由非伊朗民族代表（希奥尼特人、白匈奴、哈扎尔人、突厥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等）构成的边区行政长官都拥有崇高的封号——马尔兹潘，意思是“保卫国界的人”，并位列萨珊王朝宫廷最高的军事阶层（科列斯尼科夫 1981：49, 54, 55）。一位名叫卡图利夫的白匈奴就曾是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亲信之一（特雷韦尔，雅库鲍夫斯基，沃罗涅茨 1950：141）。在他宫廷服务的有各国皇帝的代表：突厥人，中国人，哈扎尔人（at-Tabari Ⅰ：899）。

众所周知，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与突厥可汗的女儿（at-Tabari Ⅰ：899）——突厥公主凯恩结了婚（捷尔-姆克尔季昌 1979：57）。这桩婚姻是在554年由于波斯使团的到来而缔结的（莫克雷宁 2004：72）。这位汗王的名字在文献中被叫作库克姆·哈康（Ibnu'l-Balkhī：24，94，98），与西突厥汗国第一位可汗的名字一样，后者是568年曾派使团前往拜占庭的伊斯塔米汗·迪扎武尔。剌失德丁提到这位可汗时用的是库克姆·亚弗库伊的名字，而阿布-尔-加济叫他库克姆·巴库伊（科诺诺夫 1958：69）。与自己的前任不同，阿努什尔万不接受占优势地位的正统拜

---

① 波斯萨珊王朝国王。——译者注
② 古代东方国家的长度单位，1法尔萨赫约等于3—7公里。——译者注
③ 操伊朗语的游牧部落，源于萨尔马特人。——译者注

火教的宗教狂热思想，对基督教徒[①]、马兹达克的追随者和其他宗教流派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萨珊王朝阿努什尔万的王位继承人——王子胡尔马日德四世是半个突厥人，因此绰号“突厥扎德”，也就是突厥人的后裔。他继续采用自己父亲的政策，同伊朗贵族和祭司阶层进行残酷斗争，对基督教徒实行和平政策，依靠绝大多数由白匈奴、突厥人和其他非伊朗民族组成的民众（皮古列夫斯卡娅 1946：84—85）。

588 年，巴赫拉姆·丘宾大胜白匈奴和突厥人的军队之后[②]，萨珊王朝的沙汉沙赫胡尔马日德四世就把巴尔赫和整个呼罗珊赏赐于他[③]。乔尔·哈康[④]被杀之后，他的儿子埃尔-捷金[⑤]在派康德[⑥]要塞加固了防御工事。巴

① 阿努什尔万曾经蔑视基督教徒，因为他的儿子阿努沙克-扎德接受了自己父亲信仰基督教的妻子——也就是自己母亲的信仰而发动起义反对他。但尽管这样，他也不敌视基督教徒，并为后者提供一切必要条件（Browne 1997：136，168，181）。

② 突厥汗国因这场战争而国力变弱，分裂为两个汗国——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Harmatta，Litvinsky 1996：368-369）。

③ 根据巴列维的文献资料，斯潘季亚特——维什塔斯普的儿子在巴尔赫兴建了一座漂亮的首都纳瓦扎克，并在城里点燃了能显灵的瓦赫拉姆之火（Markwart 1931：10）。

④ 这位可汗与塔尔杜汗（576—587 年是西突厥人的可汗；587—603 年是东突厥人的可汗）的儿子以及伊斯塔米汗（562—576 年在位）的孙子埃尔·阿尔斯兰同名。纳尔沙希称他为希里·基什瓦尔（Frye 1954：108，n. 28）；汉文献中称他为扬格苏·杰列（捷金），阿拉伯文献中称他为沙巴或什亚巴（Ibn Khordadhbeh：40），波斯文献中称他为萨瓦-沙赫或萨乌赫（古米廖夫 1967：115，132）。汉文献中的阿希兰大汗（阿尔斯兰-塔尔汗）也与他同名（Chavannes 1903：149； 祖耶夫 2002：200）。

⑤ 伊尔-捷金，也就是埃尔-捷金。在汉文献中他被称为尼利，在波斯文献中叫帕尔穆达或纳尔穆德（Togan 1981：72）。克什米尔的佛寺建筑以及佛教渗入布哈拉都与他有关（斯塔维斯基 1960：115）。名字“帕尔穆达”是突厥名字萨瓦·布尤鲁克的伊朗语仿造词（古米廖夫 1967：132）。

⑥ 按照费尔多西的说法，这个要塞叫阿瓦扎（费尔多西 1952：68）。

赫拉姆·丘宾围攻他并迫使其投降，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但他只送了一部分给胡尔马日德，其余全部据为己有。这让沙汉沙赫十分愤怒，就解除了他的职务（Macoudi Ⅱ：213—214；ad-Dinawari：84—85）。巴赫拉姆·丘宾与突厥人订立同盟，亲自指挥突厥志愿军团和联军一起向萨珊王朝首都克特西丰城推进。他宣布萨珊王朝是篡位者，合法政权理应属于帕提亚的阿尔沙克王朝，而他本人是阿尔沙克王朝政权的合法继承人（Shahbazi 1989：521）。胡斯拉夫二世帕尔维日从自己的首都逃到拜占庭皇帝马夫里基那里。巴赫拉姆·丘宾篡夺了萨珊王朝的最高权力后，执政 1 年并发行了铸有自己肖像的硬币。[①]591 年，仍然效忠胡斯拉夫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拜占庭和波斯联军在亚美尼亚的巴利亚拉特河旁打败了巴赫拉姆·丘宾的军队，抓了很多突厥人当俘虏（西莫卡塔：131）。[②] 这之后，巴赫拉姆·丘宾被迫逃往东方的费尔干纳，逃到突厥人那里（古米廖夫 1960：229—230），成为突厥可汗帕尔穆达（埃尔·捷金）的朋友和谋士（Mustawfi-i Qazwini：121）[③]，并与这位汗王的女儿结了婚[④]。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胡斯拉夫二世帕尔维日暗中雇来的杀手所

---

① 铸有其肖像和铭文 Varhran 的德拉克马币和第纳尔币非常有名（Göbl 1971：80；pl. 12，No. 203-204；Nöldeke 1879：282）。

② 在巴赫拉姆·丘宾的军队中，突厥人的数量相当多，因为文献指出，“很多英勇善战的东方民族”和他一起“出发了，胡斯拉夫二世帕尔维日亲自杀死了 3 名为巴赫拉姆·丘宾服役的突厥勇士”（古米廖夫 1960：237—239）。在胡斯拉夫作为战利品送给马夫里基皇帝的战俘中有大量突厥人。这些俘虏的额头上都“被自己的母亲”刻上了基督教的十字（西蒙卡塔：130—131）。

③ 根据阿德-季纳瓦里的资料，突厥可汗对他很尊敬，为他和他的手下建造了城市和宫殿。当巴赫拉姆·丘宾通过正当决斗杀死了可汗那不怀好意的弟弟以后，可汗就把他的地位提得更高了（Dinawari：98—102）。

④ 可汗的女儿外出游玩时遭到猛兽（龙狮）的攻击，巴赫拉姆救了她。之后，可汗便把女儿和王国送给了他（Macoudi Ⅱ：223—224；费尔多西 1952：302；Mustawfi-i Qazwini：120—121）。

杀死（Chavannes 1903：242—245; 古米廖夫 1967：131—132；乌萨诺娃 1995：29）。

萨曼-胡达特

萨曼-胡达特正是出自这桩婚姻的后裔。其家谱中的某些名字，包括坦加奇(坦加斯、坦加斯普、塔格马斯、坦加尔斯、坦加特、萨姆塔甘)，都可能具有突厥起源。在援引其家谱上萨曼-胡达特祖先的其他名字中，绍尔（شاول）、塔甘（طغان）和贾巴（جبا）可以与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人中十分流行的名字或尊号苏尔(萨乌尔)、图甘和贾布古相对比。此外，众所周知，突厥人广泛使用伊朗族系的名字。

萨曼王朝世代相传的名字与萨曼-胡达特祖先的名字和尊号有关。根据文献，其是位于巴尔赫（Hamzae Ispahanensis：237；纳尔沙希：56）、撒马尔罕（al-Moqaddasi：337-338；Jacut Ⅲ：13）或铁尔梅兹（谢苗诺夫 1955：3—11）地区的萨曼村的建立者和统治者。

有关这个名字或名称的词源存在各种观点。在关于萨曼王朝起源的传说中，“萨曼”一词被赋予“完善”的意义（谢苗诺夫 1955：4）。在来自波斯语的译文中，萨曼（سامان）一词意味着“秩序”、“协调”、“福利”和“财富”(ПРС Ⅱ：13)。在巴列维语[①]中，“萨曼”的意思是“边界”、“地 区 ”(Anthologie：424；Dencard：160，164；Dadastan i Denig：244，281)。也提到了专有名词“萨曼 Sam(an)”(Dencard：24，160；Dadastan i Denig：107）或“萨曼人（Thamanaois)”，以及 Harahvatiš 地区的居民（Herzfeld 1947：II：708)。根据某些资料，伊朗白益王朝也源于某个萨曼，后者出自萨珊王朝巴赫拉姆·古尔的后代(比鲁尼 1957：

① 中世纪的波斯语。——译者注

51）。但我们认为，词源上的这一切没有说服力，而且多半不符合事实。

也有人尝试把名字“萨曼”的起源与“沙曼”（šaman）一词相联系（Günaltay 1938：77）。在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乌拉尔—阿尔泰民族中常常能遇见萨曼 / 沙曼 / 萨马伊 / 萨马尔民族，其族源和南部地区有关，在同操阿尔泰语的远古时期，这个民族从南部被带到前者的生活环境中（瓦西列维奇 1965：139—145）。比鲁尼 (Беруни) 把中亚的一个宗教团体叫作阿什-沙马尼亚（الشمنية），该团体的信徒是多神教教徒，但对婆罗门深恶痛绝（比鲁尼 1963：66—67）。呼罗珊的居民把佛教徒称作沙马尼因（شمنيين）或沙曼人（波斯语中“沙曼”一词的复数形式）（شمنان）（al-Biruni：206；比鲁尼 1957：204）。伊本·安纳季姆称佛教徒为阿斯-萨曼尼亚（السمنية）（Flügel 1862：76，105，385）。

在印度神话中，šamana 的意思是“统治者”，是伊玛的名字之一；而在佛教传统中，šramana 的意思是“那个努力的人”，是佛教等级中的第二级。“沙曼”一词可能正是源于这个词（Louis VIII：41，344）。在中世纪的印度提到过萨曼城（سامان）（吉阿萨丁：186）。

在拜火教的宗教文献中，名字“萨曼”是与这样一些魔鬼及人物的名字一起被同时提及的，如阿卡塔什（Akataš），阿科曼（Akoman），阿拉斯泰（Arastay），瓦兰（Waran），纳哈伊斯（Nanhais），萨布克（Sabuk），塔乌列奇（Tavreč），希奥（Hyon）和扎列奇（Zareč）（Anthologie：395，414，430；Dencard：24，160；Dadastan i Denig：107）。在拜火教教徒看来，佛教的神和神职人员可能犹如“魔鬼”一样，而在其中一些人名的构成中可以见到突厥语词和突厥的族名：阿瓦尔、库曼、泰、塔什、图尔和希奥。巴列维语词“萨曼”（Sahman）出自梵语，意指“给予关怀的人”（Dehkhoda VIII：11,769）。

突厥的最高可汗埃尔-捷金（帕尔穆达）是一位佛教徒，巴赫拉姆·丘宾娶了他的女儿。588 年，巴赫拉姆·丘宾被任命为吐火罗和犍陀罗的

统治者，这两个地方都是突厥汗国的组成部分（Chavannes 1903：157）。克什米尔的寺庙建筑与佛教在布哈拉的传播都与他有关（斯塔维斯基 1960：115）。759—764 年间，中国旅行者悟空在克什米尔和犍陀罗的佛教圣地看见过几座 6—7 世纪由突厥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兴建的寺庙，这些建筑已经上百年了。克什米尔有一座突厥人时期建造的“哈通神庙”和以突厥最高统治者的儿子埃尔-捷金命名的寺庙（Ve-li-te-le 或 Ve-li-tegin 神庙）。在犍陀罗有一座捷金-沙神庙（храм Tegin-cha），是“突厥皇帝的妻子”哈通修建的（Chavannes 1903：198，242—245；利特温斯基，赛马利 1971：120）。通·亚布古汗也是一位佛教徒，约 630 年，他亲切接见了玄奘并听过后者宣讲佛法（Beal 1990：42—44）。

300—351/912—962 年，萨曼王朝在喀布尔和加兹尼地区发行的迪尔汗银币上有牛和骑士的图案（Av），以及用古印度音节文字表述的印度铭文（Rv），读作“纪念 Sri Khudavayaka 神”。这些银币的另一种样式上是牛、Sri Khudavayaka 神（Av）和骑士（Rv）的图案（Mitchiner 1977：132）。

在撒马尔罕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所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枚费尔斯铜币，是 359/969—970 年在费尔干纳以萨曼国王阿尔-曼苏尔·伊本·努赫和他儿子阿赫马德·伊本·阿尔-曼苏尔的名义由萨曼王朝的地方行政长官克雷奇·阿尔-哈吉布·阿赫马德·伊本·阿里铸造的（КИ II：102）。在这种铜币的 Av 上是经典的佛教图案（围成圆圈的八瓣花结，里面套一个围成正方形的花结，再里面是又一个圆形花结），这是北派佛教（如大乘佛教和密宗）公认的太阳和宇宙的象征，中世纪时该佛教在中国（尤其是西藏）、中亚和中国新疆非常流行（托波罗夫 1991：101；Mandala：767）。中间有 8 瓣花结的经典曼达拉图案也是佛陀的象征，这个图案恰好出现在 8—9 世纪，也就是佛教密宗形成的时期（阿拉波夫 2002：12—16）。在塔什干艺术画廊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银行古钱藏品中，珍藏着哈拉汗王朝的某些铜币，其上面也可以见到这种曼达拉的图

案（#41，#42，#43）。

在布哈拉的萨曼王朝陵墓外墙上，描绘着中间是正方形和圆圈交错组合的复杂几何图案，这一标志是萨曼王朝与佛教有关的又一明证（普加琴科娃，列姆佩尔 1960：67；普加琴科娃 1968：121；布拉托夫 1976：85）。中世纪初期，在中亚和东亚最大的佛教祭祀中心之一——敦煌石窟中描述佛教故事情节的壁画上，绘刻的正是这种标志（阿拉波夫 2002：120—125）。

我们认为，这些资料对于确定萨曼王朝的起源有很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萨曼-胡达特可能不是拜火教教徒，而是如文献中所讲述的那样（加尔迪济：62）[①]，是一位佛教徒，这与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佛教在他出生地——巴尔赫占主导地位是相符的（Barthold 1945：48）。也不排除，萨曼-胡达特可能是摩尼教信徒。强大的摩尼教村社在巴尔赫及其附近地区也存在了几百年（3—8 世纪）。6 世纪时，一种体现摩尼教徒与佛教徒密切联系的、神奇的安息摩尼教文字被记载在这里（斯塔维斯基 1977：178；李特文斯基，赛马利 1971：115）。我们从文献中得知，在 7—8 世纪的吐火罗，包括恰加尼昂，摩尼教信徒的作用相当大。佛教和摩尼教在中亚并存了很长时间，佛教对摩尼教东支的影响十分巨大，在摩尼教文字中，“摩尼”就被叫作“佛陀”（西域 1992：526）。根据伊本·安纳季姆的资料，除了萨曼尼伊（阿斯-萨曼尼亚），也就是佛教徒，最早从吐火罗迁移到马维拉纳赫尔的人就是摩尼教信徒（Flügel 1862：76, 105, 385）。

---

① 这个报道和有关萨曼-胡达特出身萨珊王朝的统帅——巴赫拉姆·丘宾家族的资料是一致的，后者在拜火教为国教时的萨珊帝国当臣民时，多半也应信仰该宗教。

贾巴汗

按照马哈茂德·伊本·瓦利的说法，萨曼王朝和巴尔马克家族[①]具有共同的起源，都是某个叫贾巴汗的后裔（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15a）。萨珊王朝沙汉沙赫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531—579年在位）的军队占据巴尔赫城时，吐火罗贾布古王朝的贾巴汗是该城的统治者，也是中国玄奘大师的同时代人（630）（Togan 1969：282）。6世纪80年代，巴尔赫的行政长官贾布古汗是萨珊王国的藩臣，他和胡尔马日德四世派来的巴赫拉姆·丘宾的军队一起反击过由巴米扬的统治者和其盟友卡布尔沙赫组成的、进攻巴尔赫的联军（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12б—313a）[②]。根据法扎伊利·巴尔赫（Фаза'ил-и Балх）的资料，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巴尔马克家族作为创建纳乌巴哈神庙（храм Наубахар）的人，在位于巴尔赫西部边界的贾巴汗地区拥有住地，该世系也由此而来（阿尔-巴尔希：19，37）。

巴尔赫的白匈奴统治者和突厥统治者使用的钱币很有名，它是按照萨珊王朝钱币的样式铸造的，上面铸刻着王朝的尊号“亚布古”——*yabgu Bahlikano*，也就是“巴尔赫的亚布古”或“亚布古·巴克特里斯基”（Göbl 1967：141，182；尼基京 1986：82，87）。6世纪下半叶，该地曾以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名义在巴尔赫铸造过钱币（尼基京 1986：50），而从7世纪前1/4起，又以巴尔赫的突厥亚布古的名义重新恢复铸造（Walker 1941：14）。中国的玄奘大师7世纪时曾到访巴尔赫，他把巴

---

① B. B. 巴托尔德也指出巴尔马克家族与萨曼王朝同源（巴托尔德 1963a：119）。

② 关于该手稿，详见 Ethe 1903：col. 229—230。

尔赫称作“小皇城”(Julien 1857 I：29)。

12 世纪，阿斯–萨马尼提到位于巴尔赫城门附近的贾巴汗村，并指出其存在于 9—10 世纪（阿斯–萨马尼Ⅲ：171；Jacut Ⅱ：14）。根据马哈茂德·伊本·瓦利的资料（17 世纪），从老“艾德加赫”(或叫“穆萨拉伊·卡季姆”)，也就是举行全民祷告和宗教节日的地方，一直延伸到新“艾德加赫”(穆萨拉伊·贾季德）的地方，被叫作贾巴汗纳巴德（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17б)。在巴尔赫城外商业区的城墙边，坐落着高墙围绕的卡莱·贾巴汗要塞和贾巴汗本人的宫殿（Togan 1969：281—282）。位于西墙（沙赫里·别伦）的大门（达尔沃扎），也就是新老“穆萨拉”之间外城的城门（哈菲日·塔内什：317a—317б)，也叫贾巴汗大门（或叫“Дарб-и Ваки‘а”）。在这座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并不存在、而于 17 世纪修建的大门旁边（Togan 1969：282，283），有一个街区叫古扎里·贾巴汗，一直延伸到中心沙赫里斯坦（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07б)。也不排除，伊斯兰教之前的巴尔赫大门巴布·阿特–图尔克（达尔瓦扎–伊·图尔克）就坐落在这里，在贾巴汗大门所在的地方（卡马利丁诺夫 1996：317）。

根据马哈茂德·伊本·瓦利的资料，贾巴汗有一个弟弟名叫法伊兹（或叫卡因），掌管位于巴尔赫城外商业区南部的希斯尼·库法芝要塞。他们之间关系不好，于是贾巴汗被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的村镇，叫作卡里亚伊·贾巴汗（贾巴汗村）。他为自己的儿子萨曼（萨曼王朝的祖先）建造了另一个村镇，叫作卡里亚伊·萨曼（萨曼村）。这两个村被单独的城墙围起来，该城墙后来被乌兹别克的汗王阿卜杜勒·穆明汗修缮并加固（17 世纪）。在这城墙内的村子里居住着贾巴汗和萨曼的后裔（Togan 1969：283）。巴尔马克家族也起源于此。瓦济尔·哈龙·阿尔–拉希德·阿尔–法德尔·伊本·亚赫亚·阿尔–巴尔马吉任呼罗珊的行政长官时，途

经该村，为巴尔赫的乌里玛[1]和贵族发表演说，指出贾巴汗街区是其先祖贾巴汗的遗产，其先祖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还兴建了一座寺庙和纳乌巴哈神庙。乌里玛们回答他说，如果他开凿一条新的水渠通到其先祖贾巴汗建造的街区就更好了（Togan 1969：283）。

17世纪，在沙赫里斯坦西部还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公园——巴吉·哈尼公园，属纳德尔·穆罕默德汗所有。它从东边的占克尔季比亚清真寺延伸到西边的达尔瓦扎伊·贾巴汗，从南边的吉赫·沙伊赫大门到北边的贾巴汗城门塔楼。公园里有几座高大的建筑，一些美丽的城堡和花坛（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3066）。这座花园在11世纪也被称作巴吉·布祖尔克花园。按照阿布-法兹尔·拜哈基的说法，当阿米尔[2]马苏德·加日纳维逗留巴尔赫时，曾三次带着自己的随员和长椅在这座位于沙赫里斯坦的花园里歇息[3]。因此可以说，这座花园是在伊斯兰教之前由巴尔赫的突厥统治者贾巴汗建造的，此处还有他的府邸。

按照阿尔-霍列兹米的说法，古兹人和葛逻禄人（8—10世纪居住在中亚七河流域的突厥部落）的统治者叫贾布亚（al-Khowarezmi：120；阿尔-霍列兹米：219）。7世纪的巴列维语文献中说，萨珊王朝在巴尔赫有一个反对者叫亚布-哈康（Markwart 1931：10）。根据亚美尼亚文献，西突厥汗国的行政长官叫杰布-哈康，也就是可汗贾布古（古卡相1971：247）。西突厥汗国最高的可汗图恩·贾布古汗（618—630年执政）也带有贾布古汗的尊号（古米廖夫1967：159）。为纪念自己的父亲，图恩·贾布古的儿子塔尔杜-沙德（625年被任命为吐火罗和犍陀罗的统治者）发行了一种饰物，在这个饰物上，图恩·贾布古被称为*jeb MLK'n MLK*、也

---

① 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与法学家阶层。——译者注

② 统治者、亲王或大公。——译者注

③ 曾有一条大的溪流流经这座被称为“宽阔与最惬意之地”的花园，依托该溪流建造有一个瀑布（拜哈基：378，385，605，606，608，610，611）。

就是“杰布（贾布古）· 沙汉沙赫”或“杰布（贾布古）王之王”（Harmatta 1982：167-180; Harmatta, Litvinsky 1996：370）。中世纪时，在与克什米尔交界的地方提及过贾巴汗地区（绍米：271）。

因此，从上述各种文献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贾布亚、杰布、亚布和耶布都是描述突厥尊号“亚布古”或“贾布古”的不同形式（Bosworth, Clauson 1965：9—10）。前面提到的巴尔赫统治者贾巴汗的名字也属此列（Togan 1969：282）。这个具有不同读音的名字（贾巴、朱巴、朱塔、贾姆昌、贾西曼、吉斯曼、朱斯曼、哈米塔恩、胡达特、胡塔、哈曼、萨珊等）[1]在中世纪的文献中被当作萨曼-胡达特父亲的名字[2]。毫无疑义，贾巴汗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在几种互无关联的文献中都记载着他的名字：阿斯-萨马尼（12 世纪），亚库特（13 世纪），伊本 · 塔格里巴尔季（15 世纪），哈菲济 · 塔尼什（16 世纪）和马哈茂德 · 伊本 · 瓦利（17 世纪）。可以设定，贾巴汗的名字实际上是统治者托戈鲁尔的尊号，这是萨曼-亚布古的父亲，在伊斯兰教最初流行时统治过巴尔赫（阿尔-拉里：234a）。

在牛津大学的古钱币藏品中，珍藏着一枚萨曼国王曼苏尔一世伊本 · 努赫（350—365/961—976 年在位）于 358/968—969 年发行的银饰。其正面右首铸有该统治者肖像，两句巴列维语铭文分别排列肖像两旁。右边的铭文读作 *MLK"n MLK'*，意思是“王之王”，也就是“沙汉沙赫”，左边的铭文读作 *ŠHN*。饰物背面除了通常的穆斯林用语（لا الاه الا الله وحده و لا شــريك لـه محمد رسـول الله）外，还刻着他带有沙皇尊号的名字阿尔-马利克。这位统治者的肖像令人很感兴趣。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的脸型混

① 在某些文献中也会见到“哈亚”的形式（伊本 · 塔格里巴尔季Ⅲ：279；伊本 · 阿拉希尔 1937 Ⅰ：523；阿兹-济里克利 Ⅰ：290）。

② 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用阿拉伯字体书写的这些名字都能读成“贾巴”或“贾巴汗”。

合了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特征，且后者的特征居多。凸显的鼻子是西突厥人、包括呼罗珊的突厥—奥古兹人所特有的。脸的上半部骨头突出是蒙古钦察人的典型特征。巴旦杏核状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皮十分肿胀。头上那顶独特的帽子，有点像构成复杂的王冠。右耳上戴一只球状的耳环，王冠下有一条浓密的卷发辫，垂在背后。[①]

从肖像研究的角度看，它与7—8世纪吐火罗、喀布尔和犍陀罗的突厥统治者肖像有相似的血统，后几位统治者模仿萨珊国王胡尔马日德四世发行的德拉克马币，在他们自己发行的钱币上铸刻本人的肖像（www.zeno.ru）[②]。但625年左右，塔尔杜-沙德在昆都士发行的纪念币就与它完全相似了。塔尔杜-沙德是最高突厥汗图恩-亚布古的儿子，以及吐火罗和犍陀罗的突厥"亚布古"王朝创始人，因彻底战胜白匈奴而发行了这枚纪念币。对饰物的肖像研究，就像研究吐火罗突厥"亚布古"的某些钱币一样，一方面能发现它对沙汉沙赫胡尔马日德四世的德拉克马币有模仿，另一方面还发现它对印度宗教传统的仿效（Harmatta 1982：168）。这枚饰物上铸有图恩·亚布古汗的肖像，他被称为*jeb MLK''n MLK'*，也就是"耶布（亚布古）沙汉沙赫，意思是王之王"（Harmatta, Litvinsky 1996：370）。

我们认为，这枚饰物的正面是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正面的原型。两幅肖像的相似几乎表现在所有的细节上——同样是巴旦杏核状的大眼睛和垂在背后的辫子，同样的服装和以牛角为翼的王冠。区别只是，萨

---

① 英国研究者特列德维尔热情地给我们提供了这枚饰物的造型，我们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

② 欣杜·沙希-捷金的钱币（#20999, #21384），瓦苏杰维的钱币（#12962），吐火罗的亚布古钱币（#15170, #21382）和阿拉霍希亚的统治者钱币（#20783, #26690, #22922）都十分相似。

曼王朝饰物上的肖像更明显地表现出蒙古人种特征，耳朵上戴的耳环由一块石头构成，而不是像图恩·亚布古汗肖像上的耳环那样由三块石头组成。肖像的左右两边也同样有波斯中部的铭文。图恩·亚布古汗饰物的背面铸有一个祭坛和两位祭司，以及头发呈火焰状的湿婆神像。而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背面没有这些标志，只有阿拉伯铭文。

毫无疑义，饰物上的这两位统治者都是突厥人，他们的人类学特征，一只耳朵上戴的耳环，最主要是束辫的发式都能证明这一点。两位统治者肖像的特点是没有胡子，这与对萨珊王朝沙汉沙赫和白匈奴统治者所发行钱币上的肖像研究有矛盾。萨珊王朝的沙汉沙赫长着独特的大胡子和小胡子，头发在头顶上卷成一团。白匈奴的统治者长着小胡子，头发从后面剪得很短。两位统治者头上的王冠也和萨珊国王的王冠不同，而是与突厥喀布尔沙赫及片吉肯特的突厥统治者的王冠十分相似（Harmatta 1982：169—170）。众所周知，在采用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字之前，前两位可汗使用的是粟特文字，更早些时候使用巴列维文字。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假定，伊斯兰教之前的萨曼王朝先祖，包括萨曼-胡达特，正好都属于吐火罗的亚布古王朝，其创始人就是最高突厥汗图恩-亚布古的儿子塔尔杜-沙德。A. 3. 瓦利季·托甘同样提出一个假设，认为萨曼-胡达特的先祖不仅属于吐火罗的葛逻禄贾布古王朝，还是最高突厥汗之一——库克姆汗的后裔[①]，并以库克姆汗的名义统治突厥—奥古兹人（Togan 1981：112）。统治吐火罗150多年的突厥亚布古王朝，其创始人出身于领导过第一个突厥汗国的突厥—阿申人（博博约

---

① 拉希德·阿德丁把这位可汗叫作库克姆·亚弗库伊，阿布-加济叫他库克姆·巴库伊，伊本·阿尔-巴尔希称他卡克姆·哈康，阿特—塔巴里叫他希尔-亚布古，都与伊斯塔米-亚布古·季扎武尔是同一个人。他的女儿是萨珊国王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妻子和胡尔马日德四世的母亲（at-Tabari Ⅰ：899；Ibnu'I-Balkhi：24，94，98；拉希德·阿德丁 1987：94；科诺诺夫 1958：69）。

罗夫 2003： 3—12）。

还需要弄清楚的是，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上铸刻的到底是哪位统治者？可能是图恩·贾布古汗或另一位最高突厥汗，因为他拥有“王之王”或沙汉沙赫的尊号。曼苏尔·伊本·努赫饰物上的肖像图案表明，萨曼王朝把他尊为本世系的最高先祖。他与巴赫拉姆·丘宾可能有亲属关系，因为根据文献，后者与图恩·贾布古汗年长的同辈、扬格-索乌赫-捷金（萨维沙赫）的儿子——埃尔-捷金汗（帕尔穆达）的女儿结了婚。也不排除，萨曼王朝的饰物上铸刻的正是这位可汗——萨曼王朝最高先祖的肖像。

但是，“王之王”的尊号也以古印度音节文字的形式 *shaonanoshao* 被铸刻在贵霜王国统治者的钱币上。因此，拥有这个尊号的可能不仅是最高突厥汗，还包括认为自己是贵霜国王后裔的、吐火罗的突厥亚布古。这说明，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上铸刻的统治者可能是萨曼王朝血统较近的先祖之一——贾巴汗或萨曼-胡达特。

汉文献中引用的是 588—750 年在吐火罗执政的突厥亚布古们的名字。他们的府邸一开始在昆都士，后来在巴尔赫。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他们的王朝迁移到巴达赫仍继续存在（比丘林Ⅱ：321—322；Chavannes 1903： 156—158）。应当说，萨曼—胡达特的父亲贾巴汗与这个王朝最后一批代表中某一位相符。吐火罗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埃尔-捷金（帕尔穆达）（588—590），然后是图恩·贾布古汗之子塔尔杜-沙德（618—630），再往后是伊什巴拉·亚布古（660—700），纳杜尼利（700—720），库特鲁格·图恩·塔尔杜（720—730），希利曼·加罗（约 750）（博博约罗夫 2003： 6）。贾巴汗与萨曼-胡达特的执政时间与这个王朝最后三位代表的执政时间是一致的。

萨曼—亚布古

因此，某些中世纪的传说，提及了萨曼-胡达特是古代突厥—奥古兹人的传奇君主，令人很感兴趣。于是，按照拉希德·阿德丁的说法，继一位名叫托库兹·亚弗库伊（或杜库尔·亚弗库伊[①]）的传奇可汗在马维拉纳赫尔的统治之后，是一位名叫萨曼·亚弗库伊（也叫萨曼-胡达特）的贵族（阿斯尔扎杰）汗王执政，后者是整个萨曼王朝的先祖（拉希德·拉德丁 1987：94；Togan 1972：112）[②]。在阿布-加济的著作中，这位汗王（也就是萨曼·亚弗库伊）叫"阿斯尔扎杰"（"贵族的"），并指出他执政了 20 年。根据这份资料，他是在阿尔斯兰汗执政 10 年之后，又是在塞尔柱王朝的先祖阿尔斯兰汗和名叫库克姆·亚弗库伊的汗王之前执政（科诺诺夫 1958：69）。根据在伊本·阿尔-巴尔希的著作中也提到的这位库克姆·亚弗库伊的情况，他的女儿就是萨珊王朝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妻子和胡尔马日德四世的母亲。[③] 根据这个故事稍后的版本，[④]"亚弗库伊"一词的意思是"部落首领"，也是朝代的名称（穆罕默多娃 1978：169—171）。

---

① 见拉希德·阿德丁的土耳其版《大事汇编》（Джами'ат-таварих）（安卡拉，1957）（Mercil 1994：253）。

② 《奥古兹-纳梅》是拉希德·阿德丁的历史著作《大事汇编》的残卷，其手稿珍藏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图书馆（Фонд Bagdad köškü），马吉穆阿伊·哈菲济·阿布鲁名下 282 号（页码从 590a—601б，以及 641a）。

③ 伊本·阿尔-巴尔希引用他的名字不是以 Kukem Yavquy（Baquy）的形式，而是 Qoqim Khaqan 的形式（Ibnu' I-Balkhi：24，94，98）。根据阿特-塔巴里的说法，胡斯拉夫一世阿努什尔万的妻子是西突厥汗国哈康希尔-亚布古的女儿（at-Tabari Ⅰ：1966），指的就是伊斯塔米-亚布古·季扎武尔（博博约罗夫 2003：28；古米廖夫 1967：34—37，39—40）。

④ 有资料显示，还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民间叙事文学《奥古兹-纳梅》就已有了最早的记录，且有两种不同的版本；8 世纪时，其中一个版本被译成波斯文，9 世纪时又被译成阿拉伯文。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它不断地被充实表现奥古兹部落历史的新内容（Köprülü 1976：25—26.n.31；249—251，n.106）。

穆斯利赫·阿德丁·穆罕默德·阿尔-拉里（15 世纪）在自己的著作《时代的镜子和变动的车轮》(Мир'ат ал-адвар ва мирхат ал-агйар) 中也引用了拉希德·阿德丁关于萨曼王朝奥古兹起源的报道，他援引的是拉希德·阿德丁的文章《大事汇编》(Джами' ат-таварих)(阿尔-拉里：234a)。根据穆罕默德·阿尔-拉里的资料，萨曼王朝的先祖萨曼-亚布古[1]（也叫阿希尔扎杰）出身于奥古兹人的突厥世系。在伊斯兰教流行初期，该世系有一位统治者叫托格鲁尔，萨曼-亚布古在他之后开始执政（阿尔-拉里：234a)。我们认为，这位名叫托格鲁尔的统治者，在拉希德·阿德丁的著作中被叫作托库兹（杜库尔）·亚弗库伊。穆罕默德·阿尔-拉里补充道，当萨曼-亚布古来到梅尔夫时，塔希尔·祖尔-亚米纳因[2]正担任阿尔-马蒙的阿米尔，就负责教育他（阿尔-拉里：234a)。

根据哈姆德·阿拉·卡兹维尼（14 世纪）的资料，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曾是马维拉纳赫尔的统治者，而萨曼-胡达特的父亲是一位将领。阿拉伯人入侵之后，萨曼父亲的处境变得不好，成了一位贵族的骆驼向导。但因其出身高贵且志向高远，他不满足于现状，就去了突厥斯坦当强盗。一段时间之后，他变得相当强大，于是占领并控制了阿什纳斯城[3]，当了城主（Mustawfi-i Qazwini：379)。洪达米尔（15 世

---

① 见文本：萨曼-巴弗吉。

② 指呼罗珊的塔希尔王朝创始人——将领塔希尔·伊本·阿尔-胡赛因（159—207/775—822)。

③ 阿什纳斯是锡尔河下游的突厥人的城市，位于占德和瑟格纳克之间（Mustawfi of qazwin：261；拉希德-阿德丁 1946 I［2］：200)。后来，又是这些作者指出，阿萨德 4 个儿子中名叫亚赫亚的儿子曾被任命为阿什纳斯城的统治者。但是，我们根据其他文献得知，第一，9 世纪初时，锡尔河下游的阿什纳斯尚未并入阿拉伯哈里发的组成；第二，亚赫亚曾被任命为阿什—沙什和乌斯特鲁善的统治者。因此，这里的阿什纳斯城多半指的是沙什（阿什—沙什——阿什纳斯)。B. B. 巴托尔德也指出过这一点（巴托尔德 1963a：267)。

纪）也引用这些资料，指出萨曼父亲攻占了沙什城（汉达米尔Ⅱ：352）。

阿尔库克

《萨季亚》（17世纪）中引用了铁尔梅兹萨伊德家族的家谱，根据该作品，当阿拔斯王朝夺取呼罗珊的政权后，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一个叫阿尔库克或阿尔卡克的人从费尔干纳来到铁尔梅兹。他从铁尔梅兹又来到巴尔赫，在这里从萨伊德的哈桑·阿尔-阿米尔处接受了伊斯兰教，后者是伊玛目[①]阿尔-胡赛因·伊本·阿里[②]的后裔和阿拔斯王朝的亲属。然后他到巴格达找哈里发，后者因哈桑·阿尔-阿米尔的推荐而任命他为巴尔赫的执政者。当哈桑·阿尔-阿米尔决定搬迁到铁尔梅兹发展公用事业和开疆拓土时，阿尔库克（阿尔卡克）和他一起动身前往，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献给他，还亲自参与修复城市。阿尔库克本人在铁尔梅兹周边创办了一座村镇，把它兴建起来，开辟出几个大花园，并移居此地，称之为萨曼。他的儿子阿萨德在这里出生，阿萨德在父亲死后负责管理很多地区。阿萨德有三个儿子——努赫、纳斯尔和伊斯马伊尔。他们长大后，阿萨德任命纳斯尔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自己则去了费尔干纳，直至去世（谢苗诺夫 1914：3—20；1955：3—4）。19世纪，铁尔梅兹的郊区就叫沙赫里·萨曼，而在位于古铁尔梅兹以东3公里处的克尔克兹遗址，还能看到萨曼王朝祖遗的城堡残壁（哈基莫夫 1983：149—153）。

萨曼-胡达特的费尔干纳家系令人毫不怀疑，因为他的先祖巴赫拉姆·丘宾（娶了最高突厥汗埃尔-捷金［帕尔穆达］的女儿）正是在这里繁

① 伊斯兰国家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② 铁尔梅兹的萨伊德追溯自己的家谱到乌巴伊德·阿拉赫·阿尔-阿拉朱（赫罗莫姆），后者是伊玛姆扎因·阿尔-阿比丁·阿里·伊本·阿尔-胡赛因的孙子（米尔佐耶夫 2004：14）。

衍后代并走完生命的历程（ad-Dinawari：98-102； Macoudi II：223–224；古米廖夫 1960：229—230）。[①] 如果考虑到埃尔-捷金是佛教徒，那就可以设定，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在库巴城拥有居住地，7—8 世纪时，那里有一座突厥人兴建的大型佛寺（布拉托娃-列维娜 1961：241—250）。

至于阿尔库克（Arquq）或阿尔卡克（Arqaq）的名字，这是我们得知萨曼-胡达特这一真名的唯一来源。应当指出，Arquq（Arqaq）是纯突厥的名字，具有突厥名字的典型词尾 *-aq*（*-qaq*, *-γaq*）或 *-uq*（*-quq*, *-γuq*）（ДТС： 653，654），排列在这样一些名字之中，如 Qunaq，Tuqaq，Tutaq，Seljuq 等[②]，从古突厥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顽强的”。在马哈茂德·阿尔-卡什加里的词典中，引用了名字 Arquq 和词组 *arquqkiši*“顽强的人”（科什加里 I：109；ДТС：54）。

卡库达尔

根据这个故事较新的版本（用乌兹别克语记载在 18 世纪的一份手稿中［阿尔-乌斯图尔拉比］[③]），萨曼-胡达特也有一个外号叫“卡库达尔”，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有辫子的人”（卡库），中世纪时这样称呼那种男子头上的头发向后梳，编成一条辫子，再用一条小带子在后脑勺

---

① 也有资料显示，萨曼王朝源于乌斯特鲁善（穆赫托罗夫 1998：163）。

② 比如，Alijaq，Alp-Tughaq，Artuq，Asaq，Bajnaq，Barcuq，Barquq，Barkiyaruq，Bursuq，Buzuq，Damqaq，Imlaq，Kerinjuq，Oyunaq，Qabajiq，Qarajiq，Qarluq，Qaylaq，Oghurjiq，Qultaq，Qunaq，Qurjuq，Qušluq，Duqaq，Saltuq，Tuqaq，Tutaq，Satuq，Seljuq，Tughluq，Učuq，Ulaq，Yuluq，Yarmaq，Yasaq，Yumaq，等等（拉希德·拉德丁 1987：123—126；科诺诺夫 1958：71—94；Hennequin1985：68-82，92，98，109，462—547，835—836）。

③ 这份手稿现在铁尔梅兹一位居民的手中，有关消息是从我们的同事——史学副博士贾拉利丁·米尔佐那里得到的，为此向他表示感谢。

旁边扎起来并垂在背后的发式。这种发式在古代是匈奴人的典型特征，[①]而在中世纪早期，则主要是突厥人的典型特征（魏因施泰因，克留科夫 1966：179）[②]，汉语文献的资料（比丘林Ⅰ：167；Ⅱ：254）[③]和大量造型的（阿尔巴乌姆 1960：137，第二幅图；1975：30，31；Esin 1970：fig.9a，9b，10；Rahmonov 2001：38，45；fig. 2，6，9）[④]、碑文的（库巴列夫 2001：103；Tashbayeva 2001：194—195；波马斯基娜 1970：435）[⑤]和雕塑艺术的文物证实了这一点[⑥]。

---

① 公元前后，在位于蒙古的匈奴墓穴中发现了一些剪下来表示哀悼的辫子（阿尔巴乌姆 1975：30）。

② 从巴尔赫地区的吉加捷普古城中发现的萨珊王朝时代早期（3—4 世纪）带印章压痕的文件上，可以见到突厥人最早的图像之一，其发式是一根编得很紧的辫子（科鲁格利科娃 1984：141）。

③ 根据中国玄奘大师的资料（7 世纪），当他来到苏耶城（苏亚布）时，遇见了前来打猎的突厥哈康。有 200 多名达干，也就是达尔罕跟随他，都身穿锦缎长袍，头发编成一条辫子（Julien1853：55-58；祖耶夫 2002：263）。6 世纪时，高昌（吐鲁番）的居民也编辫子并搭在背后（摘要 2003：20）。根据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资料（1221 年），撒马尔罕的突厥统治者遵循突厥传统，与自己的臣民不同，留着一条辫子（苏哈列娃 1954：333）。

达尔罕，古代蒙古社会的一种称号。——译者注

④ 另请参见：古代喷赤肯特的绘画。表 10，第 1 项；表 12；表 20，第 2 项；表 36，第 6 项；表 37，第 6 项；表 39；季亚科诺夫 1954：83—158，表 6，17，22，26，29，33，34，35，36—39，以及插图：《突厥的达官贵族》——西侧，表 8，细目 2；表 9，细目 3；表 10，细目 1；表 12。

⑤ 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奇科尔峡谷的西季—布拉克地区发现的骨片上（7—8 世纪）（塔巴尔季耶夫 2005：305—310），在 6—8 世纪的阿尔泰悬崖壁画上（切列米辛 2005：251—258）和苏列克的岩画上（阿尔塔莫诺夫 1962：210；Esin 1965：214）所表现的战斗场面中也绘刻了留辫子的突厥士兵。

⑥ 古代突厥人——“巴尔巴”的石像中很多都有辫子。在费尔干纳东部的卡拉—布拉克古城发现了一个小铜人，后脑勺上留有发髻（半身塑像 1983：35，69 号）；在贾尔库尔干附近的阿克捷普古城（6—7 世纪）发现一颗大的圆脸神像头，头上粘着一根小辫子（勒特韦拉泽 1989：69）。

离苏丹—绍达特建筑群不远，在位于铁尔梅兹地区的纳穆恩村，保存着卡库达尔的陵墓（хонако）（16世纪）。这座陵墓中间的厅堂完全为坟场所占据，它的来历就如同这座追悼亡灵的纪念性建筑是为谁而建一样不得而知（阿尔沙夫斯卡娅 1982：86—88）。也许这里曾埋放着萨曼-胡达特家族最早的后代的坟茔。于是，就像他本人一样，根据传说，在生命的尽头回到了家乡费尔干纳并埋葬在那里。

关于卡库达尔的民间故事材料有文献证实。上面提到，在萨曼国王曼苏尔一世伊本·努赫（350—365/961—976年在位）于358/968—969年制作的银饰上，正面铸刻的统治者肖像的王冠下就压着一条浓密的卷发辫，垂在背后。也许，这枚饰物上铸刻的就是萨曼-胡达特或他的父亲贾巴汗。

结语

综上所述，足以假定，巴赫拉姆·丘宾出身于古老的突厥贵胄——贵霜王国或马萨格泰的阿萨息斯王朝的分支。它并入了中亚的西徐亚游牧部落联盟，于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结束了希腊—马其顿征服者在安息的统治，和邻近的其他非伊朗民族的多数代表一样，曾为萨珊王朝服过兵役。

巴赫拉姆·丘宾的家族领地位于巴尔赫地区，在他担任呼罗珊驻巴尔赫的马尔兹潘（中世纪伊朗的行政长官）时被兴建起来。它一直存在到被阿拉伯人占领的那一天，中世纪时以丘宾村或丘宾纳巴德村而闻名。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巴赫拉姆·丘宾在巴尔赫起义反对萨珊王朝，与突厥人订立同盟，占领了萨珊王朝首都克特西丰。590年，巴赫拉姆·丘宾篡夺了萨珊王朝的最高政权后执政一年便被拜占庭军队打败，被迫投奔突厥人。在那里他成为吐火罗第一位突厥亚布古（后来的最高突厥汗埃尔-捷金［帕尔穆达］）的朋友和谋士，随后又与之结亲，娶了后者的女儿。巴赫拉姆·丘宾最后住在费尔干纳的库巴城，那里有他的居住地和与突厥公

主成婚的后代——萨曼王朝的先祖。618年，突厥人占领吐火罗之后，其中一些人迁回巴尔赫，并把自己的（早先属于巴赫拉姆·丘宾）家族领地收归己有。贾巴汗和萨曼-胡达特是巴赫拉姆·丘宾的曾孙或玄孙辈。

文献中的某些报道指出了萨曼-胡达特的突厥出身，但其中只有一部分被评定可信。比如，阿尔-穆卡达西（10世纪）报道的来自萨曼村的突厥人情况，阿斯-萨马尼（12世纪）在关于巴尔赫地区贾巴汗村的报道以及几乎所有文献中都把贾巴汗作为萨曼王朝的先祖（10—12世纪），还有《Фаза’ил-и Балх》（12世纪）中关于贾巴汗村的萨曼王朝与巴尔马克家族起源的报道以及对之进行补充的、马哈茂德·伊本·瓦利的资料《Бахрал-асрар》（17世纪）。在较新的文献中（拉希德·阿德丁，阿尔-拉里，穆斯塔菲-卡兹维尼，米尔洪德，阿尔-乌斯图尔拉比，《萨季亚》和伊斯马伊尔·萨马尼捐赠的文献）记载的有关萨曼-胡达特的父亲、萨曼-亚布古、阿尔库克和卡库达尔的报道十分传奇，但其中某些内容可以表现出真实事件的余波，且有文献证明——曼苏尔·伊本·努赫的饰物上刻有图恩·亚布古汗或贾巴汗的肖像。

因此，根据已有资料完全可以证明，萨曼-胡达特是源于萨珊王朝的非伊朗姓氏的代表（加富罗夫 1958：51—55；涅格马托夫 1977：18；Mercil 1994：253），就像他光荣的先祖巴赫拉姆·丘宾拥有奥古兹—突厥出身一样。如果巴赫拉姆·丘宾出身于呼罗珊已伊朗化的古奥古兹人的后代，那萨曼-胡达特就是他与最高突厥汗家族女性婚生的后代，他们在费尔干纳有亲属关系。正因如此，巴赫拉姆·丘宾的后裔在文献中被称为马维拉纳赫尔的统治者，而只有拥有最高突厥汗姓氏的成员才能担任这一角色。他的父亲贾巴汗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时代做过巴尔赫的统治者，拥有突厥的尊号亚布古（贾布古）和突厥名字托格鲁尔。贾巴汗的府邸位于巴尔赫城外商业区西北的贾巴汗要塞，他还在要塞中为自己的儿子萨曼修建了单独的村庄。贾巴汗还修建了一座佛寺和纳乌巴哈神庙，这座

神庙的最高祭司——巴尔马克家族也自认是他的后裔。90/709 年，阿拉伯人占领巴尔赫并损毁纳乌巴哈神庙之后，贾巴汗动身前往突厥斯坦，夺取了阿什—沙什城的政权。该城原属突厥人，134/751—752 年，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战役中打败中国人后，此城归属于阿拉伯人。

萨曼–胡达特从费尔干纳来到梅尔夫，在塔希尔王朝创始人塔希尔·伊本·阿尔–胡赛因的协助下接受了伊斯兰教。萨曼–胡达特信仰伊斯兰教之前，也像自己的先祖贾巴汗与巴尔马克家族一样信仰佛教。他拥有突厥名字阿尔库克和佛教名字萨曼。他按突厥的习俗把自己的头发编成一个长辫，因此外号叫卡库达尔。和他父亲贾巴汗一样，他也拥有尊号亚布古（贾布古），这是吐火罗突厥统治者的朝代封号。萨曼–胡达特（萨曼–亚布古）在吐火罗的不同地区修建了几个村庄（铁尔梅兹、胡塔兰、萨曼冈），后来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可以假定，他不仅是村庄的创建人，还像他的先祖埃尔–捷金（帕尔穆达）和父亲贾巴汗一样，也是佛教寺庙的创建人。

萨曼–胡达特和其先祖一样，出身于中亚定居的突厥人，具有悠久的农业文化和城市文化传统。中亚古代和中世纪定居的农业居民与城市中讲突厥语居民的后裔在 20 世纪初以“萨尔特人”的叫法而出名，无论与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还是与中亚操伊朗语的定居民族都有区别（Kamoliddin 2004：63-64）。1924 年布尔什维克划分行政区划之后，他们构成了现代乌兹别克人的基础（卡莫利丁 2004：34—41）。因此，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萨曼王朝在中亚的统治应当被看作乌兹别克人民与国家机构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史料

拜哈基——阿布-尔-法日尔·拜哈基：《马苏第史（1030—1041）》，A.K. 阿伦茨译自波斯语并加序、注释和附录，增订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

阿尔-巴尔希——阿布·巴克尔·阿卜杜拉·伊本·乌马尔·伊本·穆哈马德·伊本·达武德·瓦伊日·阿尔-巴尔希：Фаза'ил-и Балх，阿卜杜勒-哈伊·哈比比版，1350/1971。

比鲁尼 1963——阿布·赖汉·比鲁尼：《印度》，A. Б. 哈立多夫和 Ю.Н. 扎瓦多夫斯基译自阿拉伯语，В.Г. 埃曼和 A.Б. 哈立多夫加注释，《选集》第 2 卷，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3。

比鲁尼 1957——阿布·赖汉·比鲁尼：《过去几代的文献》，M.A. 萨利耶译自阿拉伯语并加注，《选集》第 1 卷，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57。

比丘林 Ⅰ—Ⅲ——Н. Я. 比丘林（亚金夫）：《古时居住在中亚的民族资料汇编》，3 卷本，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1953。

加尔迪济——阿布·萨伊德·加尔迪济、扎因·阿尔-阿赫巴尔：《资料精编：呼罗珊历史篇》，A.K. 阿伦茨译自波斯语，Л. M. 叶皮凡诺娃加序、注释和目录，塔什干，苏联科学院分院出版社，1991。

吉阿萨丁——吉阿萨丁·阿里：《捷穆尔远征印度日志》，A. A. 谢苗诺夫译自波斯语并加序和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58。

伊本·阿尔-巴尔希——阿布-哈桑·阿里·伊本·穆哈马德·阿什-沙伊巴尼·阿尔·贾扎里·伊本·阿尔-巴尔希：Ал-Камил фи-т-та'рих，12 卷本，Миср，Булак，1883—1885。

伊本·塔格里巴尔季——伊本·塔格里巴尔季：Ан-Нуджум аз-захира фи мулук Миср ва-л-Кахира，12 卷本，Ал-Кахира，Дар ал-кутуб ал-мисрийа，1348—1375/1930—1956。

伊本·哈尔达德别赫——伊本·哈尔达德别赫：《道路与国家之书》，H. 韦利哈诺娃译自波斯语并加注、考证、加目录和配图，巴库，Элм 出版社，1986。

摘要 2003——《汉语文献摘要》，A. 霍贾耶夫翻译，《中亚突厥民族的民族史资料》，塔什干，苏联科学院分院出版社，2003，第 5—35 页。

科诺诺夫 1958——A.H. 科诺诺夫：《土库曼人的家谱》，《阿布-加济·哈纳·希

温斯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

科什加里——马哈茂德·科什加里：Девону луғоти-т-турк, Туркий сўзлар девони. Таржимон ва нашрга тайёрловчи С.М.Муталлибов, 3 жилдлик, 塔什干，苏联科学院分院出版社，1963。

阿尔-拉里——穆斯利赫·阿德丁·穆罕默德·阿尔-拉里：Мир'ат ал-адвар ва мирхат ал-агйар，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俄罗斯书库，目录编号 725F。

阿尔-拉里——穆斯利赫·阿德丁·穆罕默德·阿尔-拉里：Мир'ат ал-адвар ва мирхат ал-агйар，伊斯坦布尔图书馆俄罗斯书库，目录编号 3156。

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马哈茂德·伊本·米尔·瓦利：Бахр ал-асрар фи манакиб ал-ахйар，伦敦大英图书馆俄罗斯书库：印度厅，目录编号 575。

马哈茂德·伊本·瓦利——马哈茂德·伊本·瓦利：《贵族美德之秘密大全（地理）》，Б. А. 艾哈迈托夫作序、翻译、加注和目录，塔什干，苏联科学院分院出版社，1977。

纳尔沙希——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伊本·扎法尔·纳尔沙希：Бухоро тарихи / Форс тилидан А.Расулев таржимаси，塔什干，苏联科学院分院出版社，1966。

拉希德·阿德丁 1987——法兹尔阿拉赫·拉希德·阿德丁，奥古兹-纳梅 / Р.М. 舒丘罗娃译自波斯语并加序、注释、注和目录，巴库，Элм 出版社，1987。

拉希德·阿德丁——拉希德·阿德丁：《大事汇编》，3 卷本，Л. А. 赫塔古罗夫，О. И. 斯米尔诺娃，Ю. П. 韦尔霍夫斯基和 А. К. 阿伦茨译自波斯语，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6—1952。

阿斯-萨马尼——阿布·萨德·阿卜杜勒-卡里姆·伊本·穆罕默德·阿斯-萨马尼，Ал-Ансаб /'Абд ар-Рахман ибн Йахйа ал-Му'аллими ал-Йама- ни 出版，10 卷本，Байрут, Мухаммад Амин Дамадж, 1400-1401/1980-1981。

西阿谢特-纳梅——西阿谢特-纳梅：《尼扎姆·阿尔-穆尔克关于 11 世纪的瓦济里人执政的书》，Б. Н. 萨霍德翻译、为文献研究作序并加注，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9。

西莫卡塔——费奥菲拉科特·西莫卡塔：《历史》，С. П. 孔德拉季耶夫译自希腊语，莫斯科，1957。

捷尔-姆克尔季昌 1979——捷尔-姆克尔季昌，Л. Х.：《亚美尼亚关于 5—7 世纪的中亚文献》，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

阿尔-乌斯图尔拉比——艾哈迈德·阿斯-萨戈尼·阿特-捷尔米济·阿尔-乌斯图尔拉比：《星体科学》，铁尔梅兹私人收藏的 18 世纪俄罗斯书库（乌兹别

克语）。

菲尔多西 1952——菲尔多西，阿布-卡西姆，沙赫-纳梅：《关于巴赫拉姆·丘宾的传说》，斯大林纳巴德，1952。

汉达米尔——吉亚斯·阿德丁·伊本·胡马姆·阿德丁·阿尔-胡赛因·汉达米尔：Та'рих хабиб ас-сийар фи ахбар афрад ал-башар。3 卷本。Техран, Интишарат-и китабхана-йи Хаййам, 1333/1915。

哈菲日·塔内什——哈菲日·塔内什·伊本·米尔·穆罕默德·布哈里：Шараф-нама-йи шахи (Книга шахской славы). Факсимиле рук. Д 88, М. А. 萨拉赫丁诺娃译自波斯语并加序、注和目录，2 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

阿尔-霍列兹米——阿布·阿卜杜拉·阿尔-霍列兹米：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Мафа- тих ал-'улум», С. 沃林翻译, МИТТ. 第 1 卷，7—15 世纪，《阿拉伯与波斯文献》，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9。第 217—219 页。

舍费尔 1981——Э. 舍费尔：《撒马尔罕的金桃》，《大唐帝国的异域怪现象之书》，译自英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

绍米——尼佐米丁·绍米：Зафарнома / Форс тилидан Ю. Ҳа-кимжонов таржимаси, таржимани қайта ишлаб нашрга тайёрловчи ва масъул муҳаррир А.Ўринбоев，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社，1996。

Anthologie—*Anthologie de Zadspram*, Edition critique du text Pehlevi, traduit et commente par Ph. Gignoux et A. Tafazzoli, Paris, 1993.

al-Baladsori—Ahmad ibn Yahya ibn Djabir al-Baladsori: *Liber expagnationis regionum*, Ed. M. J. de Goeje, Lugduni-Batavorum, 1863.

al-Biruni—Abu Rayhan al-Biruni: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trans. C. E. Sachau, London, 1879.

Chavannes 1903—Chavannes, E. :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ks) occidentaux,* Сборник трудов Орхо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ып. 6. СПб., 1903.

Dadastan i Denig—*Dadastan i Denig,* Part 1,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M. Jaafari-Dehaghi, Paris, 1998 (SI, Cahier 20).

Dencard—Dencard: *Le Cinqueme Livre,* Transcription, traduction et commentaire par Jaleh Amouzgar et Ahmad Tafazzoli, Paris, 2000 (SI, Cahier 23).

ad-Dinawari—ad-Dinawari, Abu Hanifa ad-Dinawari: *Kitab al-Ahbar at-tiwal,* Publie par V. Guirgass, Leide: E. J. Brill, 1888.

Frye 1954—Frye, R. N. : *The History of Bukhara,* translated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 Narshakhi, Cambridge, 1954.

Hamzae Ispahanensis—Hamzae Ispahanensis: *Annalum,* libri X, Ed. M. E.Gottwaldt. T. 1. Textus arabicus, Petropoli, Lipsiae, 1814.

Hudud al-'Alam—Hudud al-'A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 London, 1970.

Ibn Haukal—Ibn Haukal, Abu-l-Kasim an-Nasibi: *Opus geographicum*, Ed. M. J. De Goeje, BGA, pars 2, Lugduni-Batavorum: E. J. Brill, 1967.

Ibn Khordadhbeh—Abu-l-Kasim'Obaidallah ibn'Abdallah Ibn Khor dadhbeh: *Kitab al-masalik wa-l-mamalik (Liber viarum et regnorum),* Ed. M. J. de Goeje, BGA, pars 3, Lugduni-Batavorum: E. J. Brill, 1967.

Ibnu'l-Balkhi—Ibnu'l-Balkhi: *The Farsnama,* Ed. by G. le Strange and R. A. Nicholson (GMS), London, 1921.

al-Istakhri—Abu Ishak al-Farisi al-Istakhri: *Viae regnorum*, Ed. M. J. de Goeje. BGA, pars 1. Lugduni-Batavorum, 1967.

Jacut—*Jacut's geographisches Wörterbuch aus den Handschriften zu Berlin,* St. Petersburg, Paris, London und Oxford, hrsg. von F. Wustenfeld, Bd. I-VI, Leipzig, 1866-1873.

al-Ja'kubi—Ibn Wadhih al-Ja'kubi qui dicitur: *Historiae,* pars I-II, Ed. M. Th. Houtsma, Lugduni-Batavorum, E. J. Brill, 1883.

Julien 1857—Julien, S. : *Memoires sur les contrees accidentaux,* I-II volumes, traduite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l'an 668 par Hiouen Tsang, Paris, 1857-1858.

al-Khowarezmi—Abu'Abdallah Mohammed ibn Ahmed ibn Jusof al-Katib al-Khowarezmi: *Liber Mafatih al-'Olum*, Ed. G. van Vloten, Lugduni-Batavorum: E. J. Brill, 1968.

K odama ibn Djafar—Kodama ibn Djafar: *Accedunt excerptae Kitab al-Kharadj*, Ed. M. J. de Goeje. BGA, pars 6. Lugduni-Batavorum: E. J. Brill, 1967 (1st edition: 1889).

Macoudi—Macoudi: *Les prairies d'or*, Text et traduction C. Barbier de Meynard, t. I-IX, Paris: Société Asiatique, 1861-1877.

Markwart 1931—Markwart:J. A. : *A Catalogue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of Eranshahr,* Pahlavi text, version and commentary, Roma, 1931.

Mirkhond—Mirkhond: *Histoire des Samanides,* Texte Persan, traduit et accompagne des notes critiques, historiques et geographiques par M. Def remery, Paris: Imprimerie Royal, 1845.

al-Moqaddasi—Abu'Abdallah Mohammad ibn Ahmad Shamsaddin al-Moqaddasi: *Descriptio Imperii moslemici*, Ed. M. J. de Goeje. BGA, pars 3. Lugduni-Batavorum,

1967 (1st edition: 1877).

Mustawfi-i Qazwini—Hamdallah Mustawfi-i Qazwini: *The Tarikh-i-Guzida or Select History, compiled in A. H. 730 (A.D. 1453)*, Ed. by E. G. Browne with indices of the facsimile text by R. A. Nicholson, vol. 1, Text (GMS, vol. XIV), Leiden / London, 1910.

Mustawfi of Qazwin—Hamdallah Mustawfi of Qazwin, *The geogra 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 al-Qulub (composed in 740/1340)*, Ed. by G. Le Strange (GMS), Leiden / London, 1915.

at-Tabari—Abu Djafar Mohammed ibn Djarir at-Tabari: *Annales*. Ed. M. J. de Goeje, I-III series, Lugduni-Batavorum: E. J. Brill, 1964.

学术著作

阿尔巴乌姆 1960——Л. И. 阿尔巴乌姆，巴拉雷克-捷佩：《吐火罗物质文化和艺术的历史》，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0。

阿尔巴乌姆 1975——Л. И. 阿尔巴乌姆：《阿夫拉西亚布的绘画》，塔什干，苏联科学院分院出版社，1975。

阿拉波夫 2002——A. 阿拉波夫：《佛教曼达拉和萨曼王朝的象征》，《艺术》2002 第 4 期，第 12—16 页。

阿拉波夫 2002——A. 阿拉波夫：《中亚早期伊斯兰陵墓发往宇宙空间的信息》，《世界建筑学院莫斯科分院年鉴》，莫斯科，2002，第 120—125 页。

阿尔塔莫诺夫 1962——M. И. 阿尔塔莫诺夫：《哈扎尔人的历史》，列宁格勒：国立埃尔米塔日出版社，1962。

阿尔沙夫斯卡娅 1982——З. A. 阿尔沙夫斯卡娅，Э. B. 勒特韦拉泽，З. A. 哈基莫夫，《苏尔汉河的中世纪文物》，塔什干，1982。

巴托尔德 1964——B. B. 巴托尔德：《阿布海尔》，《9 卷本文集》第 2 卷第 2 部分，莫斯科，1964，第 489 页。

巴托尔德 1963a——B. B.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的文化生活史》，《9 卷本文集》第 2 卷第 1 部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3，第 169—433 页。

巴托尔德 1963——B. B.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9 卷本文集》第 1 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3。

别列尼茨基 1999——Б. A. 别列尼茨基：《萨曼文明的起源》，《萨曼国成立 1100 年》，国际会议材料，圣彼得堡，1999，第 19—24 页。

博博约罗夫 2003——Г. 博博约罗夫：Тохаристон ябғулари тарихига доир (VII–VIII асрлар), O’zbekiston tarixi, 2003，第 3 期，第 3—12 页。

博斯沃尔特 1971——К. Э. 博斯沃尔特：《穆斯林世家：按时间先后和家族历史顺序》，П. А. 格里亚兹列维奇译自英语并加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

布拉托娃-列维娜 1961——В. А. 布拉托娃-列维娜：《库瓦的佛寺》，《苏联考古》1961 第 3 期，第 241—250 页。

魏因施泰因，克留科夫 1966——С.И. 魏因施泰因，М. В. 克留科夫：《关于古代突厥人的肖像》，《突厥学汇编》，《献给 А. Н. 科诺诺夫 60 寿辰》，莫斯科，1966，第 177—187 页。

瓦西列维奇 1965——Г. М. 瓦西列维奇：《西伯利亚民族中萨曼/萨马的民族名称》，《苏联民族学》1965 第 3 期，第 139—145 页。

西域 1992——《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西域：民族，语言，宗教》，Б. А. 李特文斯基主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2。

加富罗夫 1958——Б.Г. 加富罗夫 ：《萨曼王朝兴衰缘起》，《苏联东方学》1958 第 1 期，第 51—55 页。

古卡相 1971——В. 古卡相：《莫伊谢伊 · 乌季斯基的〈阿尔巴尼亚人史〉中来自突厥语的词语或成语》，《突厥语言的构成和历史》，莫斯科，1971，第 238—250 页。

古米廖夫 1960——Л.Н. 古米廖夫 ：《巴赫拉姆 · 丘宾（史料试评）》，《东方学问题》1960 第 3 期，第 228—241 页。

古米廖夫 1967——Л.Н. 古米廖夫：《古代突厥人》，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部，1967。

ДТС——《古突厥词典》，责任编辑：В. М. 纳杰利亚耶夫，Д. М. 纳西洛夫，Э. Р. 捷尼舍夫和 А. М. 谢尔巴克，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部，1969。

季亚科诺夫 1954——М. М. 季亚科诺夫：《卡菲尔尼甘河下游的考古学著作》，ТАЭ 的著作，第 2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4，第 253—293 页。

季亚科诺夫 1961——М. М. 季亚科诺夫：《古代伊朗历史概要》，莫斯科，1961。

古代喷赤肯特的绘画——《古代喷赤肯特的绘画》，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

阿兹-济里克利——哈伊尔 · 阿德丁 · 阿兹-济里克利：Ал-А’лам. Камус тараджим ли-ашхар ар-риджал ва-н-ниса’ мин ал-‘араб ва-л-мусташрикин ва-л-муста’рибин，10 卷本，阿尔-卡西拉，1954—1959。

祖耶夫 2002——Ю. А. 祖耶夫：《早期的突厥人：历史与思想概要》，阿拉木图，Дайк-Пресс，2002。

卡马利丁诺夫 1996——Ш.С. 卡马利丁诺夫：《9—13 世纪初阿拉伯语文献中南粟特和吐火罗的历史地理》，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社，1996。

科列斯尼科夫 1981——А.И. 科列斯尼科夫 ：《萨珊国伊朗的术语“马尔兹潘”》，《巴勒斯坦集》，第 27（90）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81，第 49—56 页。

科鲁格利科娃 1984——И.Т. 科鲁格利科娃：《吉加-捷佩的印章》，《古代巴克特里亚》，第 3 册，САAЭ 的材料，莫斯科，1984，第 141—151 页。

库巴列夫 2001——В.Д. 库巴列夫：《阿尔泰古突厥岩画中狩猎与战争的场面》，《欧亚大陆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2001 第 4（8）期，第 95—107 页。

КИ——《古代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与艺术》，展览目录，2 卷本，莫斯科，1991。

李特文斯基，赛马利 1971——Б.А. 李特文斯基，Т.И. 赛马利：《阿吉娜-捷帕：考古学，绘画，雕塑，》，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1。

米尔佐耶夫 2004——Дж. 米尔佐耶夫：《铁尔梅兹萨伊德王朝在中亚历史上的作用》，O’zbekiston tari x i，2004 第 3 期，第 13—23 页。

穆罕默多娃 1978——З.Б. 穆罕默多娃：《撒拉尔-巴巴文集中〈奥古兹-纳梅〉的人名简论》，《中亚专名词汇》，莫斯科，1978，第 169—171 页。

涅戈马托夫 1977——Н.Н. 涅戈马托夫：《萨曼王国（9—10 世纪的马维拉纳赫尔和呼罗珊）》，杜尚别，多尼什出版社，1977。

尼基京 1986——А.Б. 尼基京：《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品中“伊朗匈奴人的”钱币：新古钱研究》，《历史博物馆的古钱文物》，《古钱汇编》，第 9 卷（国家历史博物馆著作集，第 61 号），莫斯科，1986，第 82—88 页。

文物 1983——《吉尔吉斯的文化艺术古迹（古代和中世纪）》，《展览目录》，列宁格勒，艺术出版社，1983。

皮古列夫斯卡娅 1946——Н.В. 皮古列夫斯卡娅：《六七世纪之交的拜占庭与伊朗》，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

波马斯基娜 1970——Г. 波马斯基娜：《塞马雷—塔什景区的岩画》，《1969 年的考古发现》，莫斯科，1970，第 434—435 页。

ПРС——《波斯语—俄语词典》，2 卷本（60000 多个单词），Ю.А. 鲁宾奇克编辑并以波斯语为语法加注，莫斯科，1970（再版本：莫斯科，1985）。

里佐 1955——伊诺亚特·阿拉赫·里佐：Ирон ва Туркон дар рузгор-и Сосонийон. Техран, 1374/1955.

勒特韦拉泽 1989——Э. В. 勒特韦拉泽：《北吐火罗的陵墓建筑和安葬仪式》，《南乌兹别克斯坦在远古和中世纪早期时的古迹：从乌兹别克斯坦艺术理论考察新发现的角度》，塔什干，苏联科学院分院出版社，1989，第 53—72 页。

谢苗诺夫 1955——A. A. 谢苗诺夫：《关于萨曼王朝起源的问题》，塔吉克斯坦共

和国 ИИАЭ 著作集，第 27 卷，《关于塔吉克民族及其国家形成时期历史与文化的论文集（公元 9—10 世纪）》，斯大林纳巴德，1955，第 3—11 页。

谢苗诺夫 1914——А. А. 谢苗诺夫：《铁尔梅兹塞伊迪家族的起源及其古老的坟茔"苏丹—绍达特"》，考古爱好者突厥斯坦小组的报道和会议记录（1913 年 12 月 11 日—1914 年 4 月 1 日），第 18（19）年，塔什干，1914，第 3—20 页。

斯塔维斯基 1977——Б. Я. 斯塔维斯基：《贵霜王国的巴克特里亚历史与文化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

斯塔维斯基 1960——Б. Я. 斯塔维斯基：《5—8 世纪中叶中亚的国际交往（从苏联考古学的资料出发）》，《东方学问题》1960 第 5 期，第 108—118 页。

苏哈列娃 1954——О. А. 苏哈列娃：《戴各种头饰的古代中亚民族的面容》，《中亚民族学文集》第 1 册，莫斯科，1954，第 299—353 页。

塔巴尔季耶夫 2005——К.Ш. 塔巴尔季耶夫：《天山早期游牧民族的村落》，《突厥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什凯克，2005，第 305—310 页。

特雷韦尔，雅库鲍夫斯基，沃罗涅茨 1950——К. В. 特雷韦尔，А. Ю. 雅库鲍夫斯基，М. Э. 沃罗涅茨：《乌兹别克斯坦民族的历史》，2 卷本，第 1 卷《从远古时期到 16 世纪初》，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50。

特列德维尔 1999——Л. 特列德维尔：《萨曼王朝使用的尊号"马利克"（统治者）》，《萨曼王朝时代对中亚文化遗产所做的贡献（国际讨论材料）》，杜尚别，阿季布出版社，1999，第 88—93 页。

乌萨诺娃 1995——М. 乌萨诺娃：Исмоил Сомоний вакфномаси, Шарк- шунослик, 第 6 期，塔什干，1995，第 24—31 页。

哈基莫夫 1983——З. А. 哈基莫夫：《南乌兹别克斯坦的建筑遗迹》，《9—13 世纪中亚的艺术文化》，塔什干，1983。

切列米辛 2005——Д. В. 切列米辛：《阿尔泰山区古代突厥人岩画艺术的新材料》，《突厥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什凯克，2005，第 251—258 页。

奇列诺娃 1971——Н. Л. 奇列诺娃：《基梅里亚-卡拉苏克同一性问题中公元前 1000 年伊朗北部和西部的文物》，《伊朗的艺术与考古（关于伊朗建国 2500 年的全苏会议报告）》，莫斯科，1971，第 323—339 页。

Barthold 1945—W.Barthold :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 Adap tation francaise par M. Donskis, Paris, 1945.

Bosworth 1995—C. E. Bosworth : *Samanids,* EI, vol. 8 (Ned-Sam), Leyden, 1995, pp. 1025-1029.

Bosworth, Clauson 1965—C. E.Bosworth, Clauson, G. : *Al-Xwārazmi on the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JRAS, London, 1965, pp. 2-12.

Browne 1997—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I-IV volu mes, vol. 1,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Firdawsi (to 1000 AD), Bethes da, Maryland: Iranbooks, 1997.

Dehkhoda I-XIV—A.Dehkhoda: *Loghatnāme (Encyc lopedic Dictionary)*, Ed. Mohammad Mo'in and Ja 'far Shahidi, I-XIV volumes, Tehran: Tehra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93-1994.

Esin 1970—E. Esin: "Ay-bitigi" , *The Court attendants in Turkish icono graphy*, CAJ, vol. 14, 1970, pp. 78-117.

Esin 1965—E. Esin: The Horse in Tutkic Art, CAJ, vol. 10,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5, pp. 167-227.

Flügel 1862—G. Flügel: *Mani, seine Lehre und seine Schriften: Ein Beitzag zur Geschichte der Manichaismus,* Leipzig, 1862.

Frye 1993—R. N. Frye: *The Samanids*, CHI, I-VII volumes, vol. 4. The period from the Arab invasion to the Saljuqs, Cambridge, 1993, pp. 136-161.

Gafurov 1957—B. G. Gafurov: *The Rise and Fall of Samanids,* Paper for the XXI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1957, pp. 1-6.

Göbl 1967—R. Göbl: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Band 1.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

Göbl 1971—R. Göbl: *Sasanian Numismatics, with 16 Minting Tables and 16 Plates /* Translated by P. Severin, Vienna, Braunschweig, 1971.

Günaltay 1938—M. S. Günaltay: *Islam dunyasinin inhitati sebebi Selcuk istilasi midir?*, Türk tarih kurumi, Belleten, cilt II, Ankara, 1938, pp. 73-88.

Harmatta 1982—J. Harmatta: *La Medaille de Jeb Šāhānšāh*, SI, t. 11, 1982, pp. 167-180.

Harmatta, Litvinsky 1996—J. Harmatta, B. A. Litvinsky: *Tokharistan and Gandhara under Western Turk Rule (650-750),* part 1, History of the regions, HCCA, vol. 3, Paris, 1996, pp. 367–401.

Hennequin 1985—G. Hennequin: *Catalogue des Monnaies Musulmane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Asie pre-Mongole, les Selguqs et leur Successeurs,* Paris, 1985.

Herzfeld 1947—E. Herzfeld: *Zoroaster and his world,* I-II volumes, Princetone University Press, 1947.

Köprülü 1976—F. Köprülü: *Turk edebiyatinda ilk mutasavviflar,* Istan bul, 1976, 3-baski.

Louis 1977—1987-F. Louis: *Encyclopaedia of Asian Civilizations,* 10 volumes, Paris:

Jean-Michel Place, 1977–1987.

Mercil—E. Mercil: *Samani devleti'nde Turkler'in rolu*, Istanbul Uni versitesi Edebiyat Fakultesi Tarih Dergisi, Prof. Hakki Dursun Yildiz Hati ra Sayisi, Istanbul: Edebiyat Fakültesi Basimevi, 1994, pp. 253-266.

Mitchiner 1977—M. Mitchiner: *The World of Islam: Oriental Coins and their values,* London: Hawkins Publications, 1977.

Nikitin 1984—A. B. Nikitin: *Monnaies d'Árachosie du haut Moyenage,* SI, t. 13, fascicule 2, 1984, pp. 233-239.

Nöldeke 1879—Th. Nöldeke: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eit der Sasaniden,* Leyden, 1879.

Rahmonov 2001— S. A.Rahmonov : *Tavka (O'zbekistonning qadimgi bojxona inshootlari tarixiga doir), Civilizations of Turan–Mavarannahr,* V, Toshkent, 2001.

Shahbazi 1989—A. Sh. Shahbazi: *Bahram VI Chobin,* Bahram: VII, Encyclopaedia Iranica, Ed. by Ehsan Yarshater, vol. 3 (Ataš-Bayhaqi), London, New York, 1989, pp. 514-522.

Tashbayeva 2001—K.Tashbayeva, M.Khujanazarov, V. Ranov, Z.Samashev: *Petrogliphs of Central Asia,* Bishkek, 2001.

Togan 1969—Z. V.Togan: *The Topography of Balkh Down to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J, vol. 13, 1969, pp. 277-288.

Togan 1981— A. Z. Togan: *Validi Umumi Turk tarihina giris,* 1-cilt. , En eski devirlerden 16 asra kadar, 3-baski, Istanbul, 1981.

Treadwell 2003—L.Treadwell: "Shāhānshāh and al-Malik al-Mu'ay- ya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Samānid and Būyid Iran*" , F. Daftary and J. W. Meri eds., Culture and Memory in Medieval Islam: Essays in Honour of Wilferd Madelung. Londres, Tauri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stitute of Ismaili Studies, 2003, pp. 318-337.

Walker 1941— J. Walker: *A Catalogue of the Arab–Sassanian Coins (Umaiyad Governors in the East, Arab—Ephtalites, Abbasid Governors in Tabaristan and Bukhara) with 40 Plates,*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941.

缩略语

АР—Автореферат 作者文摘
АН—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科学院
А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考古发现
БЧ—Бартольд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纪念巴托尔德的系列报告会
ВДИ—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古代史通报
Г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国家历史博物馆
ДТС—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古突厥词典
ЗВОРАО—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俄罗斯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
ИВ—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东方学研究所
ИИАЭ—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
ИМКУ—Истор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乌兹别克斯坦物质文化的历史
КИ—Куль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文化与艺术
ЛО—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列宁格勒分社
МИА—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历史与考古文件汇编
МИКХ—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ких ханств 哈萨克汗国历史文件汇编
МИСЦА—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历史文件汇编
МИТТ—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туркменов и Туркмении 土库曼人和土库曼历史文件汇编
МКТ—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塔吉克斯坦的物质文化
НС—Нумизма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古钱研究汇编
НУУз—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Узбекистана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
ОНУ—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
ООН—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社会科学分部
ОСА—Ономасти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中亚专有词汇
ПВ—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东方学问题
ППВ—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стока 东方文字文物
ПС—Палест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巴勒斯坦集
ПТКЛА—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и сообщени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 кружка любителей археологии 考古爱好者突厥斯坦小组的报道和会议记录

CA—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苏联考古学
CB—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苏联东方学
CHB—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东方国家与民族
CT—Советская тюркология 苏联突厥学
CЭ—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苏联民族学
CЭC—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中亚民族学汇编
TД—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报告提纲
TC—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突厥学汇编
ЎзМУ—Ўзбекистон Милл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и
ЭB—Эпиграфика Востока 东方铭文学
ЮTAKЭ—Южно-Туркменистан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плекс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南土库曼斯坦考古综合考察队
AEMA—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AOASH—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BE—(die) Brochaus Enzyklopadie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
BGA—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BSOA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亚非学院院刊（伦敦大学）
CAJ—Central Asiatic Journal 中亚学报
CHI—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剑桥伊朗史
EB—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
EI—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伊斯兰百科全书
ER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民族种族研究
GLE—Grand Larusse encyclopedique
GMS— "E. J. W. Gibb Memorial" Series "E. J. W. Gibb 纪念"系列
HCCA—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中亚文明史
IA—Islam Ansiklopedisi 伊斯兰百科全书
IACAS—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国际中亚研究协会
IJM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国际中东研究学刊
JA—Journal Asiatique 亚细亚学报
JAO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
JRA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学报
MS—Manuscript 手稿
NC—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钱币编年史

NE—The National Encyclopedia 国家百科全书
NUUz—National University of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
OH—Orientwissenschaftliche Hefte 东方科学书籍
RIIAS—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内亚研究所
SI—Studia Iranica 民俗学
SOP—Studies Oriental Pedersen

薛延陀考*

夏德（F. Hirth）著　陈浩译

拉德洛夫（W. Radloff）在《暾欲谷碑》前言中[①]，根据我的建议，提出 Tarduš 可与“薛延陀”勘同，下面我将详细论证这一假设。

《新唐书》卷 217 下《回鹘传附薛延陀传》，有比丘林的译文。我首先讨论汉文中史料中薛延陀的相关名号，并根据其古音寻找其突厥语原形。

（1）“薛”，粤音 sīt，与碑铭 *sir bodun* 之 *sir* 对勘，在语音上完全匹配。剩下的部分“延陀”则与 *tarduš* 勘同，前提是“延”读 *t'an*，不过我对此尚无十分的把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假设在早期的文献中写作“㗖”、“诞”、“鞭”、“駷”这类“延”声字，后来因音似而产生了讹误。[②] 譬如《诸蕃志》作者赵汝适之“适”读如“括”，就是类似的情况。[③] 我曾以为，历朝避“圣讳”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延”可能是避讳的结

---

* 夏德此文原刊于拉德罗夫《暾欲谷碑》（1899 年，圣彼得堡）书末。文中引用的汉文史料，译者统一用今日通行点校本复核。原文中古突厥语字符 *š*、*č* 分别写成德语的 *sch*、*tsch*，今统一改回。——译者注

①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Die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etersburg, 1899.

② “延陁”早在仪凤二年（677）立的《李勣碑》中出现过，录文见《金石萃编》卷 58。据碑文，李勣贞观十五年（641）“破延陁于乌德鞬山”。所以，讹误发生的时间一定在此碑之前。译案：延，喻母四等字，古属定母。

③ 例如赵汝适因音似而把“缎”讹为“段”，宋代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把“狮”讹作“师”。参见拙作《中国与罗马东部》（*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第 8 页，我是用《后汉书》的古本校勘的。

果。在我看来，这并不可笑，因为在《避讳录》里可以找到证据。为了最终找到 Tarduš 的汉文音译，我暂且把“延陀”之“延”视为某个形声字（音 *t'an*）的讹误。

（2）夷男（粤音 *i-nam*）。唐宪宗元和中（813），回纥遣使伊难珠（《旧唐书·回纥传》页 5211、《新唐书·回鹘传上》页 6126），尽管“男”（*nam*）、“难”（*nan*）读音不完全一样，但“夷男”、“伊难”还是很相似的。[①] 也不能排除 *inam* 是 Tarduš 部落对 *inan* 的方言化结果，*inan* 的意思是“相信”、“信任”，因为在察合台语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形式。[②] 尽管施古德（G. Schlegel）对 Devéria 的混淆提出异议，但我并不反对这样的观点：把薛延陀夷男还原成 Ynandugratsch, Ynantschmur。[③]

（3）大度设（粤音 *tai-tok-tschīt*）。我们把此名号与碑铭中出现的 Tarduš-Šad 勘同，前提是罕见的 *tar* 之 *-r* 被忽略了，这样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例如“波斯”< Pars, Perser，“波”的古音也不是以 *t* 或 *k* 收尾的入声字，却用来音译有 *-r* 尾音的 *par/per*。）“设”是碑铭 *šad* 之音译早已为人熟知（见拙作《跋暾欲谷碑》），故我们认为 *ta-tuk šad* 是 *tarduš šad* 的一种近似的音译。这类名号音译的情况，在汉文突厥石料里较为常见，但绝对需要道出其中原委。Tarduš-Šad 似乎在颉利可汗（作为始毕可汗的后任，他统辖东方薛延陀部落[*]）时期就有过。据《新唐书·突厥传上》，颉利在武德三年（620）即位不久，以次弟为：

延陀设，主延陀部。

---

① G. Schlegel, *Die 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m uigurischen Denkmal in Kara Balgassun*, p. 9; Alp Inanču, cf. Inschrift MM. III, 6,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335

② Cf. Vambéry,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Turko-Tatarischen Sprachen*, p. 40.

③ Cf.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438.

* 始毕之后非颉利，而是处罗可汗。——译者注

步利设，主霫部（粤音 *tsāp*, 可能 < *bolčar*）。

统特勒，主胡部（可能是蒙古部落）。

斛特勒，主斛薛部。

似乎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后来薛延陀政权下的“大度设”（Tarduš-Šad）是颉利可汗治下的“延陀设”的延续。在突厥汗国时期，这类职务都是可汗家族成员担任，如可汗弟或可汗子。《册府元龟》中还记载了一个没有忽略尾音 -r 的异译，即“达度设”（粤音 *tāt-tok-tschīt*）。永徽六年（655）唐遣使册拜西突厥咄陆可汗子颉苾达度设为可汗，最终礼臣不册而归。“苾”粤音 *pit* 或 *pat*，故“颉苾达度设”的突厥形式当是 Äl-bär Tarduš-Šad，Äl-bär 意思是“人民的捐助者”。可见，Tarduš-Šad 这一名号也用于西突厥，属于一位主管薛延陀的首领。“达度”似乎就是拜占庭使节在西突厥见到的 ταρδου（见 Menander Protector 的记载）的汉译。将来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个名号流行于东、西突厥治下的地区，还是仅适用于薛延陀。

（4）突利失，粤音 *tat-li-schat*。前文已经讨论过，“失”是 *šad* 的音译。“设”和“失”是同一突厥名号的不同译法。“突利失”可能是一个人名的音译，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5）曳莽，粤音 *yai-mong*, *sit-mong*。他不是嫡子，而是庶子，为妾所生。

（6）拔灼，粤音 *pat-tsch'ök*，突厥语 **bäl-čök*。

（7）肆叶护可汗。

在《跋》的第二部分中涉及碑文铁勒部落时，我已经讨论过了 Tarduš 的问题。同时，我想指出，比丘林的译文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薛延陀”与 Tarduš 勘同的全部史料。比丘林未译的《新唐书》章节有关薛延陀的结局是，被高宗置嵠弹州，在河套附近。《旧唐书 · 北狄传》页 5349 记载更详：“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

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由此可知，薛延陀也属于铁勒部落。薛延陀的政权垮台后，其部落一定与漠北其他铁勒部落为伍了。《新唐书·突厥传上》页 6043（儒莲译文 IV, p. 408）：“至黑沙，乃不见虏，得薛延陀余部，降之；引还至长城。”结合突厥碑铭，这段史料说明了，薛延陀与突厥早已结成联盟。据《旧唐书·北狄传》页 5349，薛延陀本非铁勒近属，而是别部。“铁勒，本匈奴别种。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分散，众渐寡弱。武德初……散在碛北。”省略的部分是一串铁勒属部名称，薛延陀当其首。与《隋书·铁勒传》所谓“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如果我关于“北褥”的假设没有错的话，这里应包括保加尔人，即 8 世纪史料中的诸侯国 Τελέτζης[1]）的记载有所不同，这时的铁勒仅“散在碛北”。武德初（618）的铁勒属部有：

（1）薛延陀（Sir-Tarduš）。需要说明的是，从此处记载来看，在汉文史家眼里，薛延陀并非铁勒，只是其属部。然而，在《旧唐书·北狄传》页 5346，夷男又谓“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

（2）契苾，古音 *k'ai-pit sit-pit* < *kaibal säbir*?

（3）回纥。

（4）都播，即图瓦。

（5）骨利干，碑铭之 Qurïqan。

（6）多览葛，粤音 *tō-lam-kot*，据施古德，< *telenget*。如今之 Tölös 仍然是将许多家族划分成这两个主要的阵营。[2]

（7）仆骨，据施古德，< Bugu，他在 Dölös 中也找到相应的家族。[3]

（8）拔野古，碑铭之 Bayïrqu，可能古代与薛部有联系，故称 Sir-

---

① J.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iksichen Inschriften*, p. 73.

② Cf. H. Vambéry, *Das Türkenvolk*, p. 92.

③ Cf. Vambéry, p. 263.

Bayïrqu。

（9）同罗，碑铭之 Toŋra。

（10）浑部。

（11）思结，粤音 *si-kit*，可能是《阙特勤碑》上出现的 Isgil。[①] 据《新唐书・突厥传上》页 6036，贞观四年，颉利可汗被执后，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唐（儒莲译文，IV, p. 230）。《隋书・北狄传》之“斯结”，见前文《跋》“独洛河组”铁勒。此部落在开皇二十年分布于独洛河北，据伊本・鲁斯塔，在伏尔加河流域有一支保加尔人之别部。[②]

（12）斛薛，粤音 *huk-sīt*。

（13）奚结，粤音 *hai-kit*。

（14）阿跌，粤音 *a-tit*，即碑铭之 Aedüd。

（15）白霫，粤音 *pāk-tsāp*，闽音 *peik-sik*，可能 < *bolšar*，属于碑铭 Altïn-köl 之一。（Inschri., p. 335）据《新唐书・回鹘传下》6145 页，白霫在契丹北。如果以语言学勘同为准的话，那么在 Altïn-köl 安葬的白霫首领已经远离了故土。

关于薛延陀的起源和早期史，我们所知甚少。薛延陀的起源问题与铁勒的谱系问题息息相关。《通典》与《隋书》一致，把铁勒的祖先叙述成匈奴之苗裔。如果我们把匈奴当作突厥的祖先的话，那么铁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突厥人了。《通典》谓突厥“匈奴之别种”，不同于铁勒“匈奴之苗裔”。《通典》“薛延陀”注曰“前燕慕容儁时，匈奴单于贺剌头率部三万五千来降，延陀盖其后”。据《晋书・慕容儁载记》页 2838，单于贺赖头降儁后，“拜宁西将军、云中郡公，处之于代郡平舒城”。故，薛延陀是跟随单于从北方草原来到中国塞内的。然而，从此刻起，直到柔然汗国

---

① Cf. Radloff, *Altt. Inschri.*, p. 25.

② Cf. Marquart, *Chronologie*, etc., p. 90 f.

的灭亡（北齐天保六年，555），薛延陀一直未见于史料记载。《通典·薛延陀》页5465，“初，蠕蠕之灭也，并属于突厥”。

关于薛延陀，《旧唐书·北狄传》页5343：“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 *sīt, sir*）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叶护。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乙失钵之孙曰夷男，率其部落七万余家附于突厥。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太宗方图颉利，遣使册夷男真珠毗伽可汗[①]，赐以鼓纛。夷男“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在京师西北六千里。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参拙《跋》）。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贞观四年，平突厥颉利之后，夷男建牙帐于独洛河南。“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会朝廷立李思摩为可汗，处其部众于漠南之地，夷男心恶思摩，甚不悦”。“十五年，太宗幸洛阳，将有事于泰山”，“夷男因命其子大度设勒兵二十万”南下，因为突厥军队前去参加太宗的泰山祭祀了，边境空虚。达度设屯白道川（阴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带），李思摩遣使请救。唐军与达度设相及，达度设遁回漠北。尽管国力强盛，薛延陀还是向唐朝请婚，太宗遂许以新兴公主妻之。贞观十九年（645），夷男卒。夷男少子拔灼袭杀其兄而自立，是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或许可以还原为 *Äl-kül-sir-šatomi。“是时

① 谢偃《可汗山铭》载，武德十三年（639）册“大单于真珠毗伽可汗”，《古今图书集成》8，卷113，第9页。

复以太宗尚在辽东，遂发兵寇夏州，将军执失思力击败之。”“拔灼轻骑遁去，寻为回纥所杀。”“其后延陀西遁之众，共推夷男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率部落七万余口，西归故地。乃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北。诏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加绥抚。而诸部铁勒素服薛延陀之众，及咄摩支至，九姓渠帅莫不危惧。朝议恐为碛北之患，复令英国公李勣进加讨击。勣率九姓铁勒二万骑至于天山。咄摩支见官军奄至，惶骇不知所为，且闻诏使萧嗣业在回纥中，因而请降。嗣业与之俱至京师，诏授右武卫将军，赐以田宅。咄摩支入国后，铁勒酋帅潜知其部落，仍持两端。李勣因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计。”

随着咄摩支入唐，薛延陀的政治机构也灰飞烟灭了。《新唐书·回鹘传下》（比丘林未译）：“初，延陀将灭，有丐食于其部者，延客帐中，妻视客人而狼首，主不觉，客已食，妻语部人共追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灭。’追者惧，却走，遂失之。至是果败此山下。”

太宗以薛延陀灭，复遣道宗穷讨余部。狼头人身的乞丐，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隐喻，他代表的是突厥人，《酉阳杂俎》所谓的“狼种”。（见拙《跋》，页 41）突厥人在颉利可汗被执后，生活在薛延陀的统治下。正如上文所述，“于是诸姓多叛颉利，归之者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贞观八年（634），“颉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来降者尚十余万”。唐朝在颉利故地置突厥羁縻州，三十年后种落滋繁。

要想通过突厥碑铭来充分了解突厥汗国的结构，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较罕见的记载。对于汉族史家来说并不重要的内容，在突厥碑铭里往往频繁出现。汉族史家把对北方民族的胜利称为“灭”。然而有一半的情况，甚至在一大半的情况下，被击败的民族还留在原来的地盘，或后来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求汉文史家记载这些细节，那我们就低估了汉人

的文化优越感了。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在贞观四年到永隆元年的五十年中（630—680）突厥余部一直在薛延陀统治下继续生活着。同样，随着薛延陀的灭亡，突厥余部在骨咄禄领导下由云中起事，与定居于郁督军山的突厥部落，以及金山的西突厥合流。他们在强势的骨咄禄领导下，重新夺回郁督军山林。

根据汉文里的薛延陀史料，特别是上文引用的内容，不禁让我们联系到《暾欲谷碑》第2—4行提到在唐人治下的五十年（贞观七年至永淳元年，633—682）一部分突厥人留在郁督军山林这片故土上，受薛延陀人的统治，曰："上天这样说：'我给了你们汗，你们舍弃了你们的汗，臣属了唐廷。上天发怒了，突厥人民死亡，衰微和消灭了。在突厥和薛的土地上没有留下人民。'"（cf. Radloff, Nachträge, p.116）这些内容指的当然是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在阴山灾难性的失败，导致突厥人民失去了自由。(《新唐书·突厥传上》，页6035）

据《新唐书·回鹘传下》的记载，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古音 *it-li-t'it*，咥，徒结切，我认为其突厥语原形是 *ilter*。Ilter，"首领"（即阿布尔哈齐《突厥世系》里所谓的 Il-Ilter 或 Äl-Älti。[1] Il-Ilter 字面意思是"人民的首领"，是王公的称号）。我们须警觉，汉文史料和突厥碑铭一样，常把人名、部落名、官称和官号互相弄混。故，所谓的"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可能是指"薛延陀是首领"，就像苏格兰人在报告中把坎布尔（Campbell）部落称为"坎布尔家族的首领"一样。既然 Ilter 是指"首领"，那么这个名号一定是在某个家族内世系的，《古今图书集成》之《薛延陀传》的编纂者不仅将此名号用于薛延陀的姓，还称"一利咥乙失

---

① Cf. Radloff, *Kudatku Bilik, Theil I*, p. XXXIX; Vambéry, *Das Türkenvolk*, p. 317, Anm. 2.

钵”（< Ilter Yschbara? ）[1]、“一利咥夷男”（< Ilter Ynan? ）。这不是晚近学者随意杜撰的，而是依据了古代的史料，即前文所引，贞观三年太宗册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九》（点校本，页 11167）称“薛延陀可汗一利咥夷男”。至于，薛延陀固有的名号与后来的 Ilteres 或 Ältäräs 有何关系，如骨咄禄、默啜以及天宝初拔悉密之长都曾拥有此号（见拙《跋》，页 50），我尚不敢遽下论断。当我们把 Il 或 Äl（国家、人民）从人名中剥离出来之后，《旧唐书·突厥传下》页 5183，西突厥首领“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的名号里的“咥利失”可能是 Täräs，整个名号就可以还原成 Yschbara Täräs Kakhan。而 Il 或 Äl 则无疑“乙利可汗”（《旧唐书·突厥传下》，页 5183）、“伊利可汗”（《周书·突厥传》，页 909）的突厥语原形。《周书》里的“伊利可汗”意思是“人民的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参见前文 109 页，对 53 页的注疏，关于 Il 或 Äl 的音译问题。

薛延陀在两《唐书》骨咄禄时代之后的史料中未再出现，说明薛延陀部落不再具有独立性了。史文最后一次提到薛延陀，是《册府元龟》卷 974《外臣部十九》11277 页，开元七年“二月丁未，投降突厥延陀磨览死，赠中郎将，依法葬”，延陀磨览的突厥语可能是 **tarduš bolän*。

---

① 我认为“乙失钵”（粤音 *yüt-schat-pūt*）可能是“沙钵罗”（见《旧唐书·突厥传下》，页 5183）、“沙钵略”（《隋书·突厥传》，页 1865）和“始波罗”（见《隋书·突厥传》）的异译，是基于《通典》的一段突厥语汇释文：“其勇健者谓之始钵罗。”此外还有“谓老为哥利”，“谓酒为匐你热汗”（“匐你”，古音 *p'o-ïr*，这是对古代汉语读音的很有价值的一条材料，如果我们的对勘是正确的话，因为“匐你”仅是音译的部分，对应突厥语“酒” *bor*，那么“热汗”的突厥语形式应该是 *jitkhan* 或 *jerkhan*）。“突厥呼屋为遗”，遗，粤音 *wai*，突厥语 *üj*。

“大中央辽契丹国”考*

康丹（Daniel Kane）著　康鹏译

一国两号

辽朝的国号问题，一直显得扑朔迷离。据《辽史·太祖纪》，太祖建国时，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建元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并未提及国号之事。这应当是《辽史》疏漏所致。众所周知，《契丹国志》是《辽史》史源之一，该书卷1《太祖大圣皇帝纪》称“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建元神册，国号契丹”。此外，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亦谓“太祖大圣皇帝，梁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与上文不同的是，此处所记国号为“大契丹”，而不是“契丹”。[①]

---

* 本文译自 Daniel Kane, “The Name of the Kitan State in Kitan”, *paper of Perspectives on the Liao: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Yale University, 2010。——译者注

① 这一部分的叙述主要得益于刘浦江先生搜集的资料。参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第 30—44 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7—51 页。下文所注《辽朝国号考释》的页码均指《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一书。

燕云十六州（938）、后晋入辽（946）与“大辽”国号的行用（947）

《辽史》仅有一处提及官方颁布国号之事，《太宗纪下》谓大同元年（947）“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然而，据其他文献及石刻资料所载，早在938年就已出现“大辽”这一名号。[①]

一般而言，辽朝改国号为“大辽”的主要原因当与燕云十六州入辽有关。唐亡以后，政权割据。923年，沙陀突厥推翻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政权（907—923），建立后唐。此时中原的版图仍然包括燕云十六州。937年，石敬瑭在契丹的支持下，攻灭后唐，得以建立后晋政权。次年，契丹要求其割让燕云十六州。与此同时，太宗宣布改用一个新的年号“会同”，其含义当为契丹与燕云汉人均为一家（蕃汉一家），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燕云十六州最终被分成两个区域，一为南京道（治所在今北京市），一为西京道（治所在今大同市）。946年，契丹出兵灭亡后晋，随即“这一王朝的汉文国号被定为‘辽’。这说明由半野蛮人建立的辽王朝，在获取中原地区汉人谋士的支持之后，顺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文化，对

---

① 据《辽史》所记，会同十年（947）正月契丹攻灭后晋，二月建号大辽，并改年号为大同。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原载《燕京学报》1932年第13期；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一文认为《辽史》所载大同元年改号“大辽”之事应当较为可靠。佟家江《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及刘凤翥《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台北《历史月刊》1991年1月第36期）两文均认为《新五代史》及《东都事略》所载较为准确，早在会同元年（938）即已改国号为大辽。《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则将此事系年于937年。自947—983年，辽朝的正式国号当为“大辽”。但是，刘浦江先生在石刻资料中发现了6条在983年以前使用“大契丹”的例证（936、942、952、955、970、979）。

国家的礼仪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①]。

我们始终没有弄清辽朝为何以"辽"为国号。[②]学界普遍认为辽朝系因辽水得名，犹如金朝以按出虎水为其国名，按出虎（alčun）的女真语意思即是"金"。然而，正如陈学霖先生所言，金朝的国号问题要远远比辽朝复杂得多。刘浦江先生也曾指出辽水是潢河、土河合流后的名称，潢、土二河对于契丹族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很难说潢、土二河合

---

① 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冯家昇：《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美国哲学学会汇刊》（*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新36卷，费城（Philadelphia），美国哲学学会，1949年，第152页注释50。

② 陈学霖：《"大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Ta Chin" (Great Golden): The Origin and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Jurchen State Name），《通报》（*T'oungpao*）第77卷4—5号，1991年。关于金朝国号有一条极为重要的材料，即大金开国皇帝阿骨打的著名圣谕，"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参见陈氏《"大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第261页。陈氏在文中说道："诸多资料表明，辽人源于辽东半岛的辽水，契丹人在那里建立了早期的殖民统治，此外，根据已故学者冯家昇先生的研究，圣谕中关于'宾铁'的描述极易使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圣谕表达的是'契丹'一名的起源及含义，而不是'辽'。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获知后者的确切含义。"在此假说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对契丹文国号"辽"的研究，认为《辽史》中的潢河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乌力吉河，该河最终汇入西辽河（当然今天的老哈河也同样汇入西辽河水）。而汉文国号"辽"即来自于西辽河，在古汉语中"辽"具有"遥远"的意思。

马颂仁（P. Marsone）《草原与帝国：4—10世纪契丹·辽王朝的形成》（巴黎：美文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2011年）第179页注释28云："最近的材料表明，'辽'这个名字以一种词语的变形形式进入到蒙古语词汇中，遂衍变为loqa，其义为'铁'（参见《大宁城与老哈河》，《内蒙古地名》1985年4期，转引自《赤峰市地名志》第821页）。此处，用以表示'铁'的是'辽'而不是'契丹'。关于它的解释或许来自于阿骨打的那条圣谕。"又，马氏对老哈河河名的注释云："蒙古语中的Louqa-yin γoul也就是满语的Loxamüren，其义很可能就是'铁水'。"（参见《草原与帝国》第184页注释46）有人也会因此提及《辽史·国语解》中的*xoǰu（曷朮）一词，其义为"铁"，人们经常将其与达斡尔语的kašō（铁）相比较，并以此证明达斡尔族与契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流与燕云汉地入辽有什么瓜葛。

圣宗复改号“大契丹”（983）

《辽史》丝毫没有提及圣宗改国号之事，但是宋代文献则载有此事，这也已被众多的石刻资料所证实。刘浦江先生认为改国号之事当出于当时摄政的承天太后的旨意。至于为什么要改号“大契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刘氏引述岛田正郎的观点说，此次改号“大契丹”可能是为了纠正自太宗以来过分汉化的倾向，亦即现今我们所说的契丹民族意识的再次觉醒。不过，刘氏认为这种解释缺乏史实依据。[①]

刘浦江先生的最终结论是：916 年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时，契丹仅仅控有塞北地区，故其国号为“大契丹”；938 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于是太宗为这块新纳入的版图创立新国号“大辽”；947 年，辽灭后晋，太宗将“晋”改称为“大辽”，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②]

道宗复改号“大辽”（1066）

《辽史》同样没有记载道宗改国号之事，但石刻资料及宋、高丽文献中明确记有此事。不过，依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此次改国号的缘由。刘浦江先生估计这与道宗皇帝的汉化倾向有关。至于此次改国号的确切原因，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①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第 37 页。

② 同上书，第 30—44 页。

定立国号之重要性

《辽史》丝毫没有记载历次改国号之事，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在中国史书中绝无仅有。清朝学者屡屡指责《辽史》太过疏漏，如钱大昕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①] 一个国家选定国号是极为庄重的事情，陈学霖先生评论道：“在政治史中，统治政权定立国号是一个非常庄重、神圣的事件，乃是本身的政治文化标识，宣示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这与统治阶层的社会、政治、宗教、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诸多王朝起起落落，却都保持着绵延不断的政治传统……一个政权或王朝名称的定立是新兴统治者需要面对的一个极为重要、神圣的任务。这一传统……不仅仅为中原汉人所继承，也被非汉族的游牧民族征服者吸收采纳，无论他们据有中华帝国的部分还是全部疆域。这一政治传统在思想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②]

有些学者试图回避这一问题。例如，魏特夫与冯家昇写道：“一个王朝中途变更自己的国号总会引发一些令人深入探讨的问题。契丹统治者何时采用‘辽’这一国号，一直是众说纷纭。史料中已出现936、937、938年多种说法，不过，《辽史》中首次出现定国号‘辽’的时间不早于947年。983年，圣宗改号‘契丹’，复又回归到帝国早期的价值取向。1066年，道宗再次改国号为‘辽’，这一国号一直行用至辽朝灭亡。《辽史》的编纂者没有记载历次国号的变更情况，也许是他们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若是根据他们的记述，自907年建国直至1125年亡国，辽朝的国号

---

① 转引自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第28页。

② 陈学霖：《“大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第253—299页。

始终是‘辽’。我们相信，如果史臣一一记述历次国号的变动，更易造成史籍的混乱。”[①]

汉文国号中“大契丹”与“大辽”之关系

那么，“大契丹”与“大辽”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呢？许多学者认为这两个国号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冯家昇认为“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元’指蒙古治下之中国本部，‘蒙兀’则兼含东亚一大国”[②]。依此思路，则“大辽”最初当指燕云地区而言。冯氏复云：“太宗灭晋建号辽，盖指治下之晋土也，后弃晋北去，中道而殂，嗣主遂以‘辽’施于南京路。而‘契丹’为漠北诸族所称，自若也。”提出“大辽”为契丹专用于汉地的国号，冯家昇先生是第一人。

姚从吾先生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说，辽朝“是契丹族在汉地建立的新国家”，是太宗灭晋后“正式宣布的”，“因此‘大辽’应当是汉地新朝的通称，而不通行于契丹本部。”[③]此外，姚从吾先生认为“大契丹”与“大辽”有时在汉地可以并用。

1962年，岛田正郎推断说：“显然，在使用‘大辽’这样一个汉化的国号时，同时仍在正式使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国号，因此国号的改变即便是确有其事，也不必过分重视。我甚至以为，当时的契丹人对于用汉字写出的‘大辽’国号，也是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去读的。所以

---

① 魏特夫、冯家昇：《辽代社会史》，第38页。

② 参见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转引自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第36页。

③ 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原刊《大陆杂志》1952年2月第4卷第2期；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第5集，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35页，转引自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37页。

我只看重辽朝国号的始创，而并不在意其国号的改变。"[1]

《道宗哀册》中的契丹国号

道宗及宣懿皇后的哀册发掘于1930年。[2]汉文《道宗哀册》册盖刻有"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数字，实为道宗皇帝之谥号。汉文哀册册石第一行与此相同，唯在谥号之前刻有道宗皇帝的庙号。

契丹文哀册册盖为方形，共6行，每行刻有6个篆字：

现将以上篆字恢复为楷体原字，并将其还原组合成契丹小字，[3]册盖文字为：

---

① 转引自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第37页。

② 详情请参见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2002年版，第107页。关于契丹小字《宣懿皇后哀册》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拙著《契丹语言与文字》（*The Kitan Language and Script*），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2009年版，第214—225页。

③ 篆盖的具体还原过程请参考刘凤翥：《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第76—81页。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可以将其转写为：masaqú dau.úr.ún xu.ulǰi qïta.ún.i ɣur.ú.úr.bun mu.u.ǰi m.o č.i.is.d.b.únw.unc w.un ɣoŋ di g.en.ún č.ah ~č.ai w.un，意思为“大中央（？）辽（？）契丹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1]

《耶律宗教墓志》及其他墓志中的契丹国号

《耶律宗教墓志》出土于1991年，志石的前四字为：[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这与《道宗哀册》册盖表示国号的四个契丹小字非常相似。然而，《道宗哀册》中的[契丹小字] dau.úr.ún、[契丹小字] qïta.ún.i 两词在《耶律宗教墓志》中被分别刻作[契丹小字] t.iau.dû 和[契丹小字] qïta.i。此后，一些载有国号信息的契丹文墓志相继出土。如《耶律迪烈墓志》志文的开篇即为[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masaqú t.iau.dû xu.ulǰi qïta.i g.úr.en，除[契丹小字]、[契丹小字]两字的前后顺序与《耶律宗教墓志》不同之外，其他均完全相同。又如《耶律奴墓志》的开首为[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masaqú xu.ulǰi qïta.i g.úr.en，除去[契丹小字] t.iau.dû 一字被省略外，其他部分与《耶律迪烈墓志》完全相同。

契丹·辽与辽·契丹

在比对这些契丹文墓志时，刘凤翥先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

① 拙著《契丹语言与文字》的转写体系尚不成熟，随着解读的不断深入，有些地方也会随之修正。吴英喆、杨虎嫩（Juha Janhunen）《契丹小字新资料》（*New Materials on the Khitan Small Script*，英国，环球东方出版社［Global Oriental］2010年版）一书已采纳了这一转写体系并做了适当的调整。在这篇文章中，笔者用通行的 š、č、ǰ、ɣ 代替原先的 ś、c、j、h，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淆乱。笔者认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契丹小字]应当被转写为 qïta，而不是 qid；[契丹小字]（大）应为 masaqú（或是 masqú），而不是 GREAT（译者按：原文如此）；[契丹小字]可以转写作 ulǰi，而不再是 rà 或 lij。修订的具体原因请见下文。当然，这远非最终的定稿。文中笔者将用小写字母转写契丹小字、大写字母转写契丹大字。

即契丹文中的 *qïta.i（契丹）与 *xu.ulǰi（辽？）与汉文国号"大辽"、"大契丹"的行用时段存在着清晰的对应关系。[①] 当行用"大契丹"国号时，契丹大、小字的资料均写作 *qïta.i xu.ulǰi；当行用"大辽"国号时，契丹文资料则刻作 *xu.ulǰi qïta.i。据此，刘凤翥推测 *xu.ulǰi 的意思当为"辽"。

目前已有十余方契丹文墓志载有国号信息，石刻中大多数国号的首字为 [契丹字] masaqú（大），最后一个字为 [契丹字] g.úr（国）或 [契丹字] g.úr.en（国之）。介于"大"、"国"之间的三个契丹字应当就是契丹的国号。为便于观察辽朝国号的变化，我们将石刻中的国号标记为：A (B) C D E 或 A (B) D C E。在一些石刻中 A [契丹字]（大）之后的 B（[契丹字]）t.iau.dû 有时会被省略。有些石刻资料中 C（[契丹字]）xu.ulǰi（辽？）在 D（[契丹字]）qïta.i（契丹）之前，有些则是 D（[契丹字]）qïta.i（契丹）在 C（[契丹字]）xu.ulǰi（辽？）之前。契丹大字资料中也载有国号的相关信息，一些石刻记载的顺序为 CD，另一些则为 DC。例如，在行用"大契丹"国号时，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将国号记作[契丹大字]。第一个字[契丹大字]，可译为 MASAQÚ（契丹小字作 [契丹字]）；最后一个字[契丹大字]，可译为 GUR（国）。[契丹大字]两字义为"中央的"（[契丹字] t.iau.dû），[契丹大字]为"契丹"（[契丹字]），[契丹大字]为"辽"（[契丹字]），亦即"契丹辽国"。当行用"大辽"国号时，撰于 1066 年之后的《萧孝忠墓志》则将国号记作[契丹大字]，即"辽契丹国"。此外，《耶律习涅墓志》将国号简化为[契丹大字]，即"中央契丹国"。

---

① 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辽代契丹语中的双国号——兼论"哈喇契丹"》，《东北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1—4 页。刘凤翥的这一发现获得了陈智超先生的认可，参见陈氏《辽契丹双国号制的发现——评刘凤翥关于契丹语双国号制的新发现》，《燕京学报》新 24 期，2008 年，第 2—16 页。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参见氏著《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辽契丹）考"——兼拟契丹大字 [契丹大字] 及契丹小字 [契丹字] 的音值》，《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日本松香堂 2009 年版，第 195 页。

从这些契丹文石刻资料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当汉文国号为“大契丹国”时，契丹文国号为“大契丹辽国”；当汉文国号为“大辽”时，契丹文国号为“大辽契丹国”（表 1）。

介于“大”与“契丹辽”或“辽契丹”之间的那个契丹字，学界一致认为其含义为“中央的”。这是因为《道宗哀册》与《郎君行记》中均出现了这一词汇[①]，该词在《郎君行记》中的意思即为“中间的”。然而，该词在其他石刻中的意思却有着显著的差别。汉文文献中从未有“大中央辽契丹国”这样的记载，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将该词释读为“中央的”并不一定正确。

表 1　汉文国号与契丹文国号对应表

汉文国号	契丹文国号	
道宗哀册（大辽）	[illegible]	ABCD
	masaqú dau.úr.ún xu.ulǰi qïta.ún.i	
耶律迪烈墓志（大辽）	[illegible]	ABCDE
	masaqú t.iau.dû xu.ulǰi qïta.i gúr.en	
耶律奴墓志（大辽）	[illegible]	ACDE
	masaqú xu.ulǰi qïta.i gúr.en	
耶律智先墓志（大辽）	[illegible]	ABCDE
	masaqú t.iau.dû xu.ulǰi qïta.i gúr.en	
耶律宗教墓志（大契丹）	[illegible]	ABDCE
	masaqú t.iau.dû qïta.i xu.ulǰi gúr.en	

① 《郎君行记》是唯一一个契汉双语对译的石刻，是破译契丹文最为基础的资料。《郎君行记》现存于西安武则天皇帝的乾陵之前。相关注释请见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第 8 页；拙著《契丹语言与文字》，第 185—189 页。

续表

汉文国号	契丹文国号	
永宁郡公主墓志（大辽）	夹早弓尗央尗刂国 MASAQÚ TIAU-DU XU-ULJI QÏTA-I GUR[1]	ABCDE
耶律习涅墓志（大契丹）	夹早弓尗刂国 MASAQÚ TIAU-DU QÏTA-I GUR[2]	ABDE
萧孝忠墓志（大辽）	尗央尗刂国 XU-ULJI QÏTA-I GUR	CDE
耶律祺墓志（大辽）	夹尗央国 MASAQÚ XU-ULJI GUR	ACE
耶律昌允墓志（大契丹）	夹尗刂尗央国 MASAQÚ QÏTA-I XU-ULJI GUR	ADCE

（A）大 又（夹）

《郎君行记》的第一个字即为 又，志石开篇云：又 山 [Khitan] GREAT GOLD g.úr.en，义为“大金国之”，与《郎君行记》汉文部分的“大金国”对译。毫无疑问，又 的意思就是“大”，但是对于该词的读音仍有争议。清格尔泰先生依据蒙古语的读音，将其构拟为 *jix。刘凤翥先生根据《道宗哀册》中的 [Khitan] m.o č.i.is.d.b.ún 一词（义为“大孝”），认为 又

① 第一个契丹大字，可译为“大”（契丹小字作 又）；最后一个字，可译为“国”，该字源于汉字“國”（亦作“国”），契丹小字则作 [Khitan] g.úr。依据契丹小字的解读成果，可以推知早弓应为“中间的、中央的”之义（契丹小字作 [Khitan] t.iau.dû），尗刂当为“契丹”之义（[Khitan] qïta.i），尗央则为“辽”之义（xu.ulǰi）。

② 契丹大字国（国）之后通常缀有属格附加成分 [Khitan] en（契丹小字作 [Khitan]）。早弓 / [Khitan] t.iau.dû 一般译作“中央的”，详见下文。尗刂、尗刂显然是同一词汇的不同书写形式。

的读音应当与 m.o 相似（刘氏将其构拟为 *mai）。[①] 许多契丹文墓志都会提及墓主婚姻及子女的详细情况，其中契丹文基数词均为表意文字，序数词则大多为表音文字。这使得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契丹文序数词与女真文的第一个音素非常相似。这更近似于蒙古语的表达方式，而不像通古斯语那样在词干之后中附加 xon/xun。[②] 契丹文序数词通过词尾的变化来表示该词的阴（女性）、阳（男性）性，这与契丹文基数词通过带点、不带点原字区分其阴、阳性相一致。[③] 契丹文过去时态的动词以及一些形容词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词性变化。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契丹文“第一”的构词形式，其中 m.asa.qó 用于男性， m.asa.qú 则用于女性。[④] 此外，乌拉熙春还从墓志中找到三处用 修饰长女的例证。[⑤] 我们同样发现 m.obo.qo 用以指称“长子”的例子。这表明契丹文中修饰男性的“大”或“长（子女）”实际上就是阳性词 m.o 或

---

① 相关文章可参阅刘凤翥：《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民族研究》1984 年第 5 期，第 76—81 页；即实：《 不等于 ——反驳刘凤翥同志》，《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7—583 页。

② 这些数词业已得到充分的研究，相关讨论请参见杨虎嫩等：《蒙古语》（*The Mongolic Languages*），伦敦 / 纽约，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9 页。

③ 参见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4 年版，第 179—187 页；吴英喆：《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25—38 页；吴英喆：《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6—175 页。

④ 与都是圆唇后元音，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二者在语音上的确切区别。为便于区分，笔者将、分别拟音为 qó 和 qú，当然它们也可以被拟音为 [u] 和 [o] 或是其他相似的元音。

⑤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日本松香堂 2009 年版，第 159 页。

m.asa.qó，其阴性形式则为 [契丹字] 或 [契丹字] m.asa.qú。据此可知，在语法上，契丹语“国家”一词当为阴性，这与拉丁语、俄语中的“国家”一词的词性相同。笔者推测 [契丹字] m.o 有可能是 [契丹字] m.asa.qó 的缩写。此外，乌拉熙春将 [契丹字] 的读音构拟为 *mos。

（B）中央 [契丹字]（[契丹字]）*t.iau.dû 和 [契丹字] *dau.úr.ún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加辩驳地将 [契丹字] t.iau.dû 翻译为“中央”，仿佛这已成为定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源于学界对《道宗哀册》册盖中 [契丹字] 一词的释读，《道宗哀册》所记国号为 [契丹字] [契丹字] [契丹字] [契丹字] [契丹字] m.asa.qú dau.úr.ún xu.ulǰi qïta.ún.i g.úr.en。在其他相关碑刻中，[契丹字] 被另一个契丹字 [契丹字] 所替代。人们依据《郎君行记》中的 [契丹字] [契丹字] dau.úr.ún u.ul 这一词组，推定 [契丹字] dau.úr.ún 的意思为“中间的”。这是因为 [契丹字] u.ul 显然与中古蒙古语 u'ul（冬天）相近，其义亦当为“冬天”，而与 [契丹字] [契丹字] 对译的汉语即为“仲冬”，故 [契丹字] dau.úr.ún 的意思当“仲”，即“中间的、中央的”。即实推测 [契丹字] [契丹字] 的语音应当为 *k'ei duanin，其义为“大中”，“契丹”一词即源于此。事实上，即实关于“契丹”语源的观点并未被学界承认，不过，学界对于他关于国号中第二个词词义为“中央”的论述并无异议。问题在于，目前出土的所有契丹文墓志中，只有《道宗哀册》在相应的位置刻上 dau.úr.ún“中央”，而其余的墓志则均作 t.iau.dû。后者被学界想当然地译为“中心、中央”。那么，所谓的“中央”一词为什么在《道宗哀册》与其他墓志之间有着如此显著的差异？

2002 年，清格尔泰先生总结了诸家观点。[1] 他承认《道宗哀册》中的

①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第 100 页。

dau.úr.ún 一词确为“中央”之意，但同时怀疑《耶律迪烈墓志》、《耶律奴墓志》及其他墓志中紧随 又 之后的契丹字 令考分 未必是“中央”之义。令考分 的拟音当为 t.iau.dû，而不是 dau.úr.ún。他从蒙古语中找到了一个与之近似的词 *ʧ'u:t'*，意为“盛名的，有名气的”。最终，清格尔泰先生将《道宗哀册》中的 又 尺交叐 兆刈 吴叐关 释读为“伟大、中央、强大契丹的”，并将其拟音为 jix tunən xus qïtǎni；《耶律智先墓志》中的 又 令考分 兆刈 吴关 九交冇 可以拟音为 jix ʧ' u:t' xus qitǎi ku ɑ n ɑ ən，义为“伟大、盛名的、强大的契丹国的”。乌拉熙春教授通常将 令考分 拟音为 *diau-d。

问题在于，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丝毫没有提及辽朝国号含有“中央”一词，甚至是辽代汉文石刻资料也仅仅将其国号记为“大契丹”或“大辽”，同样没有提及“中央”一词。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旁证探寻事实的真相。

女真之大中央金国

1992 年，蒙古国新发现一处女真文石刻。乌拉熙春对其进行了研究[①]，她将石刻开头的几个文字释读为：**各 米** *amban* **为 久 爻** *dulingi* **斥 土** *alčun* **囡 土** *gurun*，意为“大中央金国”。其中 **爻** 的读音尚不清楚，**为** 的读

①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蒙古九峰石壁女真字石刻〉译释》，收入氏著《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京都，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4 年版，第 140—154 页；同氏著《〈蒙古九峰石壁石刻〉与“札兀惕·忽里”》，《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日本松香堂 2009 年版，第 41—62 页，该文第 62 页附有石刻照片，但第一行的女真字显得模糊不清。

音为*duli*，这已被《女真进士题名碑》[①]及《女真译语》[②]中的相关资料所证实，且《女真译语》在女真文 *dulila gurunni* 旁的汉语注释即为“中国”，清濑义三郎则府亦对此进行了阐释。[③]*dulila* 显然与满语 *dulimba*（“中间、中央”）相关。乌拉熙春指出这是首次在女真文资料中发现金朝国号的全称，与金朝国号类似，契丹文墓志中也频现“大中央契丹国”这一国号。

但是，令人生疑的是，在《大金得胜陀颂碑》[④]、《女真进士题名碑》等为数不多的女真文资料中，金朝国号一般都写作**夅 芈 斥 圡 囪 圡 夅 芈** *Amban alčun gurun*。是故，我们暂时无法考证蒙古国女真文石刻中 *Amban dulingi alčun gurun* 的可靠性。陈学霖先生的专著曾详细论述金朝国号起源及释义[⑤]，文中丝毫没有提及“大中央金国”这一国号。与此相应，刘浦江先生在论述辽朝国号时[⑥]，也没有提及“大中央辽国”这一国号，他仅仅是在述及契丹文资料时提到了“中央”一词。

---

① 此碑系 1124 年为纪念女真进士科登科进士而建。参见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81—320 页。相关的基础研究请参见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 1977 年版，第 23 页；拙著《明会同馆女真译语研究》（*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语论丛（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第 153 卷，布卢明顿（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内亚学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1989 年版，第 46—47 页。

② 此书系明朝政府官修的女真语—汉语对译词典，最先由葛鲁贝（Wilhelm Grube）整理刊行，参见葛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čen*），莱比锡（Leipzig），1896 年。较近的成果可参见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③ 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 139 页。

④ 此碑刻于 1185 年，系金世宗为了纪念太祖起兵灭辽而建。参见刘凤翥、于宝林：《女真文字〈大金得胜陀颂〉校勘记》，《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92—344 页。相关的原始资料可参见拙著《明会同馆女真译语研究》，第 43—45 页；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 23 页。

⑤ 陈学霖：《“大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第 253—299 页。

⑥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详见本书第 148 页注释 1。

中央蒙古帝国

松井太先生最近撰文讨论一份蒙文残本中的“中央蒙古帝国”（*[dum] dadu mongɣo[l] u[l]us*）。早在1971年，李盖提（Ligeti）教授曾专门研究过这一残本。[①] 在文本的第9行，*mongɣo[l]* 和 *u[l]us* 两词非常清楚，但是位于这两个词之前的文字却残缺不清，李盖提将其假定为 **[dum]dadu*。松井太指出西方文献曾将察合台汗国称作“中央帝国”，这与上述残本关于 **Dumdadu Mongɣol Ulus* 的记载相一致。例如吉约姆·亚当（Guillaume Adam）曾提及1314—1328年有一“中央帝国”（*Medium Imperium*，指察合台汗国都哇及其后裔在中亚地区所统治的国家）；1388年教皇本笃十二世（Pope Benedict XII）的信中亦曾言及“中央帝国”（*Imperium Medium*）；1436年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的世界地图中描绘有“中央帝国”（*Imp. de Medio*）。其他一些文献中所载的 *Imperium Medie* 或 *Imperium Medorum* 显然属于对“中央帝国”的误记。松井太还引述了伊本·拔图塔（Ibn Baṭṭūṭa）关于察合台汗国的描述，该汗国“位于世界四大强国的中间，四大强国分别为中国、印度、伊拉克（伊利汗国）、月即别（金帐汗国）”。亨利·玉尔（Henry Yule）解释察合台汗国被称作“中央帝国”是由于它地处中国与波斯两大帝国之间。松井太进而指出，

---

① 松井太：《Dumdadu Mongol Ulus-“中央蒙古国”研究》（*Dumdadu Mongol Ulus- the Middle Mongolian Empire*），芮跋辞（Volker Rybatzki）、亚历山大·波兹（Alessandra Pozzi）、昌彼得（Peter W. Geier）、约翰·克鲁格（John R. Krueger）编：《早期蒙古人：语言、文化与历史——罗依果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The Early Mongols: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Igor de Rachewiltz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0th Birthday*），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2009年版，第111—119页。

“尽管在中国及波斯文献中没有发现‘中央蒙古帝国’的直接证据，都哇及其后裔有可能将其新建的国家称作‘中央蒙古帝国’*Dumdadu Mongɣol Ulus*，以示其政权得以重建。……正如伊本·拔图塔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选用‘中央’*dumdadu* 一词，可能是由于察合台汗国地处元朝、印度、伊卡哈尼德王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的中间。”

以上两条论据依据的都是残缺不清的资料。乌拉熙春书中提供的女真文石刻照片模糊不清，无法清晰地辨识、阅读。至于学界对于蒙文残本中那个缺失词的释读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并无实据。或许日后会有更多的证据能够证实这种假设，最终将这一谜团彻底解决。

（C）契丹 ‹qïta.i›~ ‹qïta.ún›~ ‹qïta.ún.i›（ ）

“契丹”一词在契丹小字中通常写作 qïta.ún、 qïta.ún.i 或 qïta.i。原字 qïta 显然是由 与 这两个原字拆解拼合而成。契丹文中的辽朝年号均含有原字 或 。清格尔泰先生详细介绍了学界对“契丹”一词的释读情况及其自己的观点。[①] 目前，我们仍不清楚 qïta.i、qïta.ún、qïta.ún.i 三者之间的区别，以及一些文献中出现的不同音译的原因，如马可·波罗将“契丹”（实指中国）记作 *Catai*，第一个音节的元音为 [a]。[②] 那么，为什么一些域外文献在音译“契丹”一词时，将第一个音节中的元

---

①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第 97—102 页。

② 关于 Kitan（契丹）一词的详细研究，可参见伯希和（P. Pelliot）：《马可·波罗行记注》（*Notes on Marco Polo*），第 1 卷，巴黎，梅森内夫出版社（Adrien Maisonneuve）1959 年版，第 216—219 页。关于中世纪西方文献中“契丹”一词的不同写法（如 Cathay, Kitan, Kitay, Katay, Katan），可参见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的《西方的契丹史料及相关问题》（Western Information on the Kitans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s），收入氏著《中世纪内亚史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阿什盖特出版公司（Ashgate）1997 年版，第 262—269 页。

音标记为 [a]，而另一些文献则标记为 [i]？伯希和认为这可能是阿拉伯文抄本在传播过程中造成的，因为阿拉伯文抄本有时会忽略词首的短元音。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蒙古语方言不一所致，例如“肉”在蒙古书面语中作 *miqa*，但在喀尔喀蒙古语中则作 *max*。关于这一问题，突厥语将“契丹”的读音记作 *qïtañ* 显得极为重要。据此，笔者认为**关**的准确发音很有可能是 qïta，而不是 kita 或 kida。元音 ï 在舌后软腭音 q 之后，与当今土耳其语不加点的 *ı* 的发音较为近似。由于突厥语中含有与**关**近似的发音，而汉语、阿拉伯语均无类似的语音，故突厥语可以较为容易地音译出契丹语**关**。央后元音 ï 在口语中有时会被发成 [ɐ]（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准确而言，应当是威尼斯人）。对于操其他语言者而言，与 ï 最为接近的元音就是 [i]。一旦一些译法被普遍接受，“契丹”一词亦将以不同的音读方式传播于中亚及欧洲。我们越了解“契丹”一词的准确发音，就越接近真相（这与上文“中央”一词的释读有类似之处）。如果最终确定“契丹”一词含有 /ï/ 这一音素，那么之前关于 ún 或许是 en 之类的拟音在实际上可能是 /ïn/。

（D）辽**兆刈**（**示英**）xu.ulǰi

兆刈是辽朝国号中最难释读的一个词汇。第一个原字**兆**，通常被用来音译汉语语音中的 [xu]，如**小凡 兆 炏 叉气 仐 犮 九亦** l.iúŋ xu ui š.aŋ siaŋ g.ün，对译的汉语为“龙虎卫上将军”。第二个原字**刈**的读音直至最近才得以确定。即实将**兆刈** xu.ulǰi 拟音为 **hulus*，并谓这是蒙古语“国家（*ulus*）”一词的早期形态。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假设的漏洞在于中古蒙古语 *ulus* 从未以 **hulus* 形式出现。事实上，阿尔泰学界已经找到了 *ulus* 的语源。中古蒙古语 *ulus* 借自突厥语 *uluš*（13 世纪以前），

此词曾出现于突厥鄂尔浑碑铭及回鹘文中。[①] 乌拉熙春大体赞同即实的说法，"即实先生曾将'[契丹字]'一词释作'国'，认为与蒙古语的 *ulus* 为同源词，确为真知灼见。但其参照蒙古语的形式所构拟的 *hulus*，如今根据上述拟音结果当修正为 *hulʤi*。*Hulʤi* 具有'国'的含义，当是王朝建立以后才被赋予的概念。其本义可以循蒙古语 *ulus* 的词义变迁线索予以探讨"[②]。她认为 *hulʤi* 的意思应当与中古蒙古语中的 *irgen*（亦儿坚）相近，义为"百姓"、"国家"[③]。

清格尔泰认为[契丹字] xu.ulǰi 有可能就是虎斯～虎思 **xus*，《辽史·国语解》将该词释义为"有力"。此词当与蒙古语 *kücün*、女真语 *husun* 及满语 *husun* 相关，这些词汇具有"有力"、"强大"之义。[④]

萧仲恭的名字为[契丹字]的读音最终得以确定，要归功于萧仲恭的契丹语名字——朮里者 **ǰulije*[⑤]，契丹小字将其写作[契丹字] ǰu.#.e.，据此可知，[契丹字]的读音有可能是 *ris, lis, liǰ, riǰ, rǰ* 等。最近乌拉熙春指出与[契丹字]相对应的契丹大

---

① 克拉克（Clark, L. V.）《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 I：论非词首音节 s, z, š, č》（Turkic loanwords in Mongol, I: The Treatment of non-initial s, z, š, č"），《中亚杂志》（*Central Asian Journal*），1980 年，第 24 卷 1—2 号。

②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辽契丹）考"》，《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第 195 页。

③ 马颂仁基本接受了乌拉熙春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假说，但又做了如下注释："Hulji 很可能有'民族'、'种族'之类的含义。乌拉熙春的假说在音韵上及其他方面并不是非常完美，例如一个意思为'民族'的词语被重复地用在像'Hulji 国'这样的场合下，以表示'民族的国家'。目前，Hulji 的确切意思还不能稳妥地加以勘同。"参见马氏《草原与帝国》，第 135 页。

④ 即实：《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67 页。

⑤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从满文〈辽史〉的误译谈起——以"都菴山"和"陶猥思氏族部"为中心》，《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第 219—220 页。

字𘬁的音值应当为 *ulǰi。[1] 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辽史》谓耶律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兀里"一词见于《多罗里不郎君墓志》，与之对应的契丹大字正是𘬁。耶律羽之的兄长觌烈字"兀里轸"，契丹大字为𘬁𘭀。𘭀的读音为 in，故𘬁𘭀的拟音当为 ulǰi.n，𘬁的拟音则当为 ulǰi。契丹大字𘬁 ulǰi 与女真字𘬁 xudu（福）的字形非常相似。[2] 据金启孮先生研究，《女真字文书》中即有此字，该书当是金朝遗物，是现存最早的女真文文献。很多女真字在字形上与契丹大字完全相同或相似，词义也完全一致，二者仅在发音上有所差别。如"龙"，契丹大字作[illegible] luu，女真字作[illegible](-[illegible]) mudu-r；"年"，契丹大字作[illegible] ai，女真字作[illegible] aña；"孩子"，契丹大字作[illegible] bo.qo，女真字作[illegible] ǰui。契丹大字𘬁 ulǰi 与女真字𘬁 xudu（福）仿佛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蒙古人名 Öljeitü"有福的、吉祥的"

就笔者管见，乌拉熙春并未注意到蒙古语 *üljei*、《元朝秘史》中的 *olǰe*（福），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蒙古人名 Üljeitü（亦作 Öljeitü 或其他书写形式）。Öljeitü（完泽笃）是忽必烈之孙元成宗的蒙古语名字。词尾 -tü 系形容词后缀。这一名字的含义是"有福的、吉祥的"。ülje ~ ölje 的意思则为"福、吉祥"。如果契丹文与此确有关系，那么契丹人名"兀里轸" ulǰi.in 应相当于蒙古语的 Üljeitü ~ Öljeitü。[3]

---

① 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将该词记作[illegible] *hutur（第 116 页）。《金史》中有一些相关记载，如《金史·地理志上》会宁县下注云："有得胜陀，国言忽土皑葛蛮，太祖誓师之地也。"《金史·国语解》谓"与人同受福曰'忽都'"。"忽土皑葛蛮"在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中作[illegible] *hutuŋai gaman。

② 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92 页。

③ 承蒙罗依果先生赐教蒙古人名 Üljeitü 及其相关条目，谨致谢忱。

乌力吉木伦 /Ülji mören 河

1922 年，闵宣化（Jos. Mullie）发表了他关于巴林左旗地区的详细调查报告，闵氏尽量探查《辽史》所载地名的具体地址，希望找到辽上京、辽帝陵墓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遗迹、遗址。[①]他曾提及乌力吉木伦河，蒙古语作 Uldži-murën。闵氏认为辽之曲江即指此河，金代则称之为“金粟河”。他指出 Uldži-murën 不见于中国的舆地之书，可以见到的唯有乌尔图绰农河，意为长狼河。根据当地蒙古人的介绍，Uldži murën 之名是较晚时期才出现的名字，*uldži* 为佛教的一种符号，其形弯曲，盖表示水道之曲也。闵宣化接着引用了柯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编订的蒙古语词典，书中将 *uldži* 翻译为：“一，‘幸运，运气，福气，恩惠，恩赐’；二，‘恩宠，祝圣’与相应的两个动词；谋求幸运，提供运气；降福，祝圣。”该词还以 *üljitüutason* 的词组形式出现在蒙古方言中，在柯瓦列夫斯基词典中的释义是“一个希腊式的有着交错线条的形象”，这显然是指其形状而言。乌力吉河河名的起源，很可能是流俗词源衍变的一个例证。河流之名 Uldži ~ Ülǰi 的实际含义当为“吉祥、有福”。如果这确实与契丹文 ulǰi 和 ulǰii-in 存在渊源关系，那也是合情合理的。上文已指出契丹大字𠅤 ulǰi 与女真字𠅤 xudu（福）的字形非常相似，这与此处的论述也完全吻合。较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早在契丹建国之前这条河就以 Ülji 为名。

① 闵宣化（Jos. Mullie）:《蒙古巴林左旗的辽帝国古城》（Les anciennes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大遼 au royaumemongol de Bārin，即《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通报》（*T’oung Pao*）21 卷，1922 年，第 105—231 页。

11 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辽朝都城名号

11 世纪，马卫集描述了前往契丹国的路线，“在沙洲（Sajū）分作两途，前往契丹国需继续向东，经由 Khātūn San（当为 Sinī）……东行约两个月即可抵达契丹的都城 Ūjam”。[①] 关于 Ūjam 的具体含义，一直没有定论。穆斯林文献通常将契丹写作 Khatā，Khatā 与带有元音 [i] 的 Kitai 相通，这同样体现在穆斯林文献用 San 表示 Sinī 中。这说明在域外文献中，[a]、[i] 可以相互替换。因此，Ūjam 有可能就是 Ulǰin。最早将 Ūjam 与 Ulǰin 河联系在一起的是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②]

木叶山的位置

据《辽史》记载，木叶山为契丹之“神山”，位于土、潢二河交汇之处，这两条河就是今天的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二者合流后，称为西辽河。[③] 令人疑惑的是，现今两河交汇的地方并没有任何山峦，而且人们一般认为辽朝的辽河与现今辽河的水道相同。然而，1963 年，罗玉堂和章

---

① 参看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注的阿拉伯文史料《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该书由伦敦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于 1942 年出版，译文见第 18 页，注释见第 70—73 页；转引自彭晓燕（Michal Biran）提交的会议论文《辽朝与穆斯林世界关系考：移民、外交、贸易与相互认知》（Unearthing the Liao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Migrations, Diplomacy, Commerce, and Mutual Perceptions）。

② 米诺尔斯基曾提及闵宣化的调查，“古老的城市”（Anciennesvilles），参见第 145 页注释①。衷心感谢彭晓燕先生告知米诺尔斯基及闵宣化的著作。

③ 关于木叶山的具体位置的讨论，张柏忠、乌拉熙春的观点值得参考，详见马颂仁：《草原与帝国》，第 28—30 页。

文溶撰文指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辽河至少改道15次，改道以前的故道尚可辨认。[①]1988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者依据文献记载详细考察了辽河的变迁，他们认为数个世纪以来，西辽河及其他相关河流确实改变了自身的流向及其名称。1955年，张柏忠发文称，在过去的10个世纪中，原先地处辽朝腹心地区诸多河流的上游，同样存在改道、改名的现象。[②]根据他的研究，一千年前的西拉木伦河根本没有汇入辽河，而是汇了今天称之为乌力吉木伦的河流（Öljei mören）。他认为该河就是辽朝上京地区的潢水。乌拉熙春依据文献及石刻史料，同样认为现今的乌力吉木伦河就是契丹的潢水，木叶山地处乌力吉木伦河与哈黑尔河的交汇处，而不是与老哈河的交汇点。[③]张柏忠及乌拉熙春均认为辽朝的潢水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西拉木伦河，而是并不怎么出名的乌力吉木伦河。[④]

《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卷》有一幅关于辽上京道及临潢府的地图。[⑤]图中显示，上京附近有一条名为狼河的河流，在其北面另有一条名

---

① 罗玉堂、章文溶：《辽河三角洲平原地貌的特征和发育过程及其对农业的意义》，《中国地理学会一九六三年年会论文选集》，第51—54页，转引自《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

② 张柏忠：《辽代的西辽河水道与木叶山、永、龙化、降圣州考》，《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从满文〈辽史〉的误译谈起》，《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第219页。笔者最初通过马颂仁《草原与帝国》（第30页及187页注释60）一书方才获知张柏忠及乌拉熙春的学术观点。

④ 相关讨论参见马颂仁：《草原与帝国》，第28—30页，第184—187页注释41—63。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潢水具有"黄色的河"这一含义，西拉木伦河在蒙古语中亦有此义。此外，《契丹国志》将潢水记作"女古没里"（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译法），契丹语"女古"的意思就是"金、黄"。大部分河流及其支流，在不同时期似乎会有不同的名字，这与河道的屡次变动可能存在或有或无的关系。我们期望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界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⑤ 谭其骧等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卷》，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重印，图6—7。

为大福河的河流。在这两条河流之间还有一条河水，但是地图编者并未注明该河的名称。根据这幅地图的标识，潢河位于上京之南，大福河位于上京之北，二者距离上京的里程相当，都不是非常靠近上京。显而易见，经过历次地貌变迁，我们已经很难弄清各个河流在特定时期准确的位置及其名称。

为什么辽朝要称作“辽”

归根结底，我们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辽朝为什么取国号为“辽”。我们并不知道契丹人自身如何称呼“辽河”。契丹人的圣河是潢水，我们也不知道其契丹语究竟该如何称呼。张柏忠、乌拉熙春等学者认为潢水就是今天的乌力吉（Üljei）木伦河。蒙古语 Üljei 的意思就是“吉祥、有福”。国号“辽”在契丹大字中作尗英 xu.ulǰi，该词中的第二个字英 ulǰi 几乎与女真字英 xudu（福）完全一致。在过去的千余年中，各个河流屡屡改道，难以周知。如果契丹人将自己的圣河称作 Ulǰi，而且此河在辽朝亦汇入辽河的话，这将揭开长久以来萦绕在我们心中的谜团：辽朝的契丹文国号实际上源自上京（以及木叶山）附近的 Ulǰi 河。正如陈学霖先生所说，以水名为国号蕴含着很强的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因素。在汉文中，Ulǰi 河的下游被称作“辽”，故而汉文国号被命名为“辽”。

那么如何解释第一个原字**玭** xu 的发音被略去这一事实呢？**玭**用于音译与 [xu] 发音相近的汉语词，但是在具体拟音时，**玭**的词首辅音有可能是 [x]~[h]~[ɣ]~[ʔ]~[k]~[g]~[kh]，其后的元音可能为 [u]~[ʊ]~[ü]~[ö]，且词尾有可能还有一个辅音，与**玭**相应的汉文“虎”*hu* 并未将其读音准确地反映出来。一般来说，**玭** xu 应当表示“契丹”这一合成词的第一个音节（或是开首辅音）。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玭**不是一个语标文字（logograph），契丹语读音近似 [xu]（或许有可能截然不同），它也有可能

是一个读音近似于 [xu] 的单音节词（monosyllable）。这使得我们想到一个源于突厥语的常用词 qut，该词亦被蒙古语所吸收，其词义与 ulǰi 非常接近。[①]

（E）国**九夾**（囯）g.úr = **gur~ *gür*

九夾 g.úr 是契丹文与汉文"大辽国"、"大契丹国"国号相对应的最后一个词。该词通常会以**九夾杓** g.úr.en 这一属格形式出现，此处的**杓** en 为属格后缀。中国学者普遍将**杓**转写作 *ə n*。但**杓**经常用以翻译汉字"门"中的元音，也会音译发音与"门"近似的汉字中的元音，辽代汉语"门"的发音更有可能是 [mun] 或 [mʊn]，而不是像现代官话那样发作 [mən]。**九**的读音已被证实为 g。[②]

如果契丹语的语音体系与蒙古语相似，我们可以假定 úr 的读音实为 [ür]，若此，我们尚需要找到与 *ɣur* 和 *gür* 相似的音节。

契丹文中共有两个词可以表示"国家"，一个是源自汉语的借词 **gui*，另一个是契丹语词**九夾**，通常被拟音为 g.úr。我们很自然会联想到满语的 *gurun*（国），该词当源于女真语**囷土** gur.un。[③] 意为"国"的 g.úr 一词，令我们注意到西辽建立者耶律大石的汗号——菊尔汗（亦作"古尔汗"，*gurkhan*），人们通常将其解释为"众汗之汗"。魏特夫与冯家昇认为该词"尚未从语源学上加以解释"，他们指出 **gur* 有可能与《元朝秘

① 承蒙罗依果先生告知 xu 与突厥语 / 蒙古语 qut 之间的关系，谨致谢忱。

② 关于 **gur* 或是 **gür* 一词，参见拙文《契丹与女真》（Khitan and Jurchen），收入亚历山大·波兹、杨虎嫩和魏弥贤（Michael Weiers）主编：《满洲研究：史达礼教授纪念文集》（*Manchu Studies in Honour of Giovanni Stary*），威斯巴登（Wiesbaden），哈拉索维茨（Harrassowitz）2006 年版，第 121—132 页。

③ 参见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 112 页第 274 号词。

史》中所载的蒙古语 *gür*（“巨大、宽广、全体的、普遍的”）的意思相一致，这在文献中是较为普遍的用法。魏特夫、冯家昇推测“*gōr-xān*（古尔汗）盖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之汗，是最高统治者”。[1] 伯希和推测 *gür* 可能源自契丹—蒙古语，意为“整体的、全部的（le tout entier）”，而《元朝秘史》即将 *gür* 释义为“普”。[2] 但是伯希和并不知道契丹语 g.úr 的意思为“国”，更准确地说，该词通常用来代指汉语的“国”字。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作为游牧部落的契丹人在建国之前并没有“国”的概念，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契丹语词，但是他们有可能会用类似“整体的、全部的（le tout entier)”这样的词汇来表示汉语的“国”、“王朝”。耶律大石使用“王”和“*gürkhan*”的头衔，同时也接受了中国皇帝的名号。很难相信他没有将 *gürkhan* 中的 *gür* 一词与自己母语（契丹语）中的 *gür*（国）一词联系起来。至于 *gürkhan* 是否借自汉语的“国王”一词，或是“国”应被理解为“帝国、王朝”，而不仅仅是“国家、王国”，这些都是另外需要探讨的问题。

结语

辽朝最初的汉文国号为“大契丹”，当是源于契丹之名。937 年，燕云十六州开始行用“大辽”国号，947 年，契丹灭亡后晋之后，将“大辽”国号推广至新的统治区。这与是年辽朝吸纳汉人谋士参与行政管理及礼仪建设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此后，南方汉地行用“大辽”国号，北方契丹旧地仍行用“大契丹”国号。983 年，出于一种未知的原因，圣宗皇帝诏令南方汉地也必须使用“大契丹”国号，但是“大辽”国号并未被完全废

---

① 魏特夫、冯家昇：《辽代社会史》，第 431 页。

②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第 1 卷，第 225—226 页。

用，只是其使用的频率要远低于“大契丹”。1066年，仰慕中国的道宗皇帝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将国号改为“大辽”，这一状况直至辽末没有改变。

契丹文国号与上述汉文国号的变化相一致。当汉文国号为“大契丹”时，契丹文国号作“大中央契丹辽国”；当汉文国号为“大辽”时，契丹文国号作“大中央辽契丹国”。尽管契丹文中的“辽”字仍有争议，但我相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契丹语的“辽”就是xu.ulǰi，其中ulǰi与蒙古语üljei（吉祥、有福）有关。我们尚不知晓Ülǰi河在辽朝的称呼。如果辽代也是这一名称，而且最终汇入西辽河的话，那么Ülǰi和“辽”将是同一水系在不同流段的契丹语名和汉语名。

附记：拙译英文原稿系康丹（Daniel Kane）先生于2010年在耶鲁大学主办的辽史会议上宣读的讲稿。2012年，康丹先生将原文及标题略做修改，委托我翻译此文，并于同年8月在赤峰“首届契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今蒙康丹先生授权发表，谨致谢意！

“知己知彼”：中世纪俄罗斯对金帐汗国之熟知*

查尔斯·J. 哈波林（Charles J. Halperin）著　沙慧心译

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始终备受争议。无论在帝俄时代还是苏维埃时代，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历史编纂者始终拒绝承认中亚游牧民族的侵略曾为俄罗斯带来任何积极意义。帝俄时代所编纂的大部分历史确实彻底忽略了蒙古人可能造成的影响。S. M. 索罗威夫（S. M. Solovev）与V. O. 克柳切夫斯基（V. O. Ključevskij）在其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中只字未提“蒙古时期”，也是出于此意。其他一些史学家则多强调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的负面影响：军事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征税引发的经济剥削，对罗斯公国的政治干预、文化孤立乃至道德沦丧。[①] 有关这些负面影响的解释呈现为两种形式：要么是因为撇开了罗斯的政治基础结构、社会结构与教会不谈，而争论说蒙古人对俄罗斯历史未产生任何作用；要么争论说，对那些被鞑靼触碰过的罗斯人的生活区，蒙古人的左右是灾难

---

* 本文译自查尔斯·J. 哈波林《俄罗斯与蒙古人：中世纪与近代早期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与亚欧草原》。

① 参见 B. D. Grekov, A. Ju. Jakubovskji, *Zolitaja orda i ee padenie*. Moskva, Leningrad 1950, pp. 247-251; 迈克尔·车尔尼亚夫斯基（Michael Cherniavsky）《汗与巴塞勒斯：管窥中世纪俄罗斯政治理论》，《思想史杂志》卷 20，1959 年，第 459—476 页（最为精简透彻的分析，见第 459 页）；博里斯·伊师波丁（Boris Ischboldin）《鞑靼史论文集》，新德里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7—23 页；V.V.Kargalov, *Vnešnepolitičeskie factory razvitija feodal'noj Rusi. Feodal'naja Rus' i kočevniki*. Moskva 1967, pp. 219-255（最为广泛的探讨）；N. S. Borisov, Otečestvennaja istoriografija o vlijanii tataro-mongol’skogo našestvija na russkuju kul’turu, in: Problemy istorii SSSR5 (1976) pp. 129-148（最前沿的调查）。

性的。苏联学界[①]与许多西方历史编纂[②]都附会上述观点。甚至近来一些专论蒙古帝国的佳作也做出推测，认为被征服国家所遭遇的军事威胁、经济破坏与政治危机彻底揭露了蒙古影响的本质。[③]

关于对 13—15 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政治表述，差异在于，在东北罗斯公国的演进以及最为重要的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中，它们分配了多少影响给蒙古人。然而，无论是否认同蒙古曾对罗斯事务进行干预，所有学者都认为，金帐汗国是施压于罗斯公国的外因。在研究金帐汗国针对罗斯的政策模式时，汗国的内部历史几乎不会被纳入学者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现有的

---

① A. Sakharov, Les Mongoles et la civilization russe. 有关俄罗斯的历史及对苏维埃史学观点之总结的可靠参考，参见 Cahiers d' historie mondiale (Neuchatel 1958) pp. 77-87; 另有 L. V. Čerepnin, Mongolo-Tatary na Rusi (XIII v.), in: S. L. Tichvinshij (ed.), *Tataro-mongoly v Azii i Evrope*. Moskva 1970, pp. 179-203 可供比对。

② 有关蒙古“摧毁”罗斯历史的理论，以卡尔·A. 威特弗格（Karl A. Wittfogel）的论述最为详尽，他认为蒙古人将“东方专制主义”施加于罗斯。见卡尔·A. 威特弗格：《东方专制主义：对鞑靼权力的比较性研究》，纽黑文出版社 1957 年版，详第 201—203 页，第 219—225 页。探讨参见威特弗格发表于《斯拉夫评论》22 卷第 4 辑（1963 年 12 月）的《罗斯与东方：一种比较与对比研究》，第 627—643 页；尼古拉斯·V. 罗亚莎诺夫斯基（Nicolas V. Riasanovsky）：《罗斯与“东方专制主义”》，第 644—649 页；博司霍德·斯普勒（Berthold Spuler）：《俄罗斯与伊斯兰》第 650—655 页，及威特弗格之回复，第 656—662 页。笔者认为威特弗格对蒙古人在罗斯历史中地位的解释仍有欠缺，应于别处进行详细论述。

尽管威特弗格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未得到普遍认同，但其建构的蒙古人对罗斯所造成影响的图景仍是学者竞相模仿的对象。如 B. 兹真尼亚克（B. Szczesniak）：《对鞑靼对罗斯教堂与国家之影响的注释》，《东欧与斯拉夫研究（卷 17）》1972 年，第 92—98 页。

有关蒙古人未曾给罗斯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论述，参见瓦伦汀·A. 罗亚莎诺夫斯基（Valentin A. Riasanovsky）：《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罗斯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评论（卷 20）》1937 年 1 月，第 499—530 页。

③ 如 Tichvinskij 主编，*Tataro-Mongoly v Azii i Europe*，或有 Kargalov, *Vnešnepolitičeskie factory razvitija feodal'noj Rusi*，后者有多部著作对罗斯进行专门论述。

假设是，金帐汗国曾欲掠夺罗斯，并为达成这一目的不遗余力。这种观点的产生虽无可厚非，但如此一来却把罗斯与蒙古的关系简化为由愤世嫉俗的鞑靼“外来者”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诡计与军事阴谋。[①]中世纪俄罗斯文献对鞑靼扮演的角色有如下描述：出于天生的恶意和魔鬼的驱使，蒙昧、残暴、无信仰的鞑靼恶魔摧毁了罗斯的东正教基督徒。[②]正如 A. E. 普里森贾可夫（A. E. Presnjakov）所言，蒙古人的统治权威对罗斯而言是“陌生且畸形的”。[③]以上，中世纪俄罗斯人对于鞑靼的看法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俄罗斯史学编纂的基础，即将蒙古人视作中世纪俄罗斯历史上陌生而消极的外因。

近来，一些学者针对上述有关罗斯与蒙古关系的主流范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他们试图以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来呈现蒙古人对俄罗斯历史的冲击。1917 年俄国革命后，在移民中爆发的欧亚运动（Eurasian Movement）为学术观点的进步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虽然他们早期的论著并不符合学术标准，欧亚理论（Eurasian Theory）也因过多受到形而上

---

① 在克柳切夫斯基提出消极论点之后，普里森贾可夫恢复了对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的积极看法，但仍将蒙古人视作外因，随后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均沿用该方法。见 A. E. Presnjakov, *Obrazovanie velikorusskago gosudarstva. Ocerki po istorii XIII-XV* stoletija. Petrograd 1918; A. N. Nasonov. *Mongoly i Rus'. Istorija tatarskoj politiki na Rusi.* Moskva, Leningrad 1940; L. V. Čerepnin, *Obrazovanie russkogo centralizovannogo gosudarstva v XIV-XV vv. Očerki social'no-ekonomičeskoj i političeskoj istorii Rusi.* Moskva 1960; 及约翰 · L.I. 芬奈尔 :《莫斯科的崛起》，洛杉矶，伯克利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1304—1359 页。

② 如 M. V. Šachmatov, Otnošenie drevne-russkich knižnikov k tataram, in : Trudy IV S-ezda russkich akademičeskich organizacij za granicej v Belgrade 16-23 Sentjabrja 1928. Čast' I, Belgrade 1929, pp. 165-173; 或尼古拉斯 · V. 罗亚莎诺夫斯基（Nicolas V. Riasanovsky）:《罗斯人眼中之亚洲》，韦恩斯 · S. 乌克尼克（Waynes S. Vucinich）编 :《俄罗斯与亚洲》，斯坦福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9 页。

③ Presnjakov, *Obrazovanie velikorusskago gosudarstva*, pp. 48-50. 笔者未能对普里森贾可夫“*čužaja i čuždaja vlast*”一句的头韵进行英文转译。

的地缘政治决定论的影响，导致其实用性有待商榷。[①] 乔治·范伦斯基（George Vernadsky）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则可另当别论，他试图从客观视角探讨蒙古人在俄罗斯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指出莫斯科公国借鉴了蒙古的政治、财政、军事、管理与外交制度，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②] 莫斯科公国曾改进蒙古的邮政系统，这是无可否定的。[③] 蒙古人也摆脱了一些诸如"毁灭俄罗斯历史"的指控。基于俄罗斯曾与文艺复兴"擦肩而过"这一史实，托马斯·S. 努南（Thomas S. Noonan）指出，蒙古人对此无需担负责任。[④] 劳伦斯·N. 兰格（Lawrence N. Langer）认为，1237—1238 年间与 1382 年的蒙古西征都没有为罗斯带来饥荒与瘟疫，引发贫瘠（遭废弃的村庄成为不毛之地）的主要原因是黑死病，而不是蒙古人。[⑤] 苏珊娜·麦克奈丽（Suzanne Mc Nally）论证了蒙古人并未将

---

① 有关欧亚主义，见 Otto Böss, *Die Lehre der Eurasier. Ein Beitrag zur russischen Ideen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Wiesbaden 1961 =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Osteuropa-Institus Müchen, Band 15; 尼古拉斯·V. 罗亚莎诺夫斯基（Nicolas V. Riasanovsky）：《欧亚主义的兴起》，《加利福尼亚斯拉夫研究（第 4 辑）》，1967 年，第 39—72 页。G. 爱德华·奥查德（G. Edward Orchard）《俄罗斯史学中的欧亚学派》，《劳伦森大学评论（第 10 辑）》，1977 年 11 月，第 97—106 页。

② 乔治·范伦斯基（George Vernadsky）：《欧亚主义、蒙古与罗斯》，纽黑文出版社 1953 年版。查尔斯·J. 哈波林：《乔治·范伦斯基与欧亚主义》，《蒙古人与罗斯》（原载《斯拉夫评论》1982 年，第 477—493 页）；同文见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36 (1985), pp.55-194。

③ 古斯塔夫·阿勒夫（Gustav Alef）：《莫斯科大公国邮政系统的起源与初期发展》，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N. S. 15 (1967), pp. 1-15。

④ 托马斯·S. 努南（Thomas S. Noonan）：《中世纪俄罗斯，蒙古人与西方国家：诺夫哥罗德与波罗的海之关系（1100—1350）》，《中世纪研究（卷 37）》，1975 年，第 316—339 页。

⑤ 劳伦斯·N. 兰格（Lawrence N. Langer）：《罗斯乡村与瘟疫：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的修道院财产》，《加美斯拉夫研究（卷 10）》，1976 年秋，第 351—368 页。

terem[①]与女性隔离引入中世纪俄罗斯。[②]珍妮特·马丁（Janet Martin）则更为详实地阐述了蒙古人在罗斯皮毛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蒙古人的介入的确曾使罗斯的皮毛贸易路线改道，但这种改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却使一些罗斯人获利。[③]

有关中世纪俄罗斯人对鞑靼看法的理解也得到了发展。迈克尔·车尔尼亚夫斯基（Michael Cherniavskij）认为，罗斯人吸收了蒙古政治理论的精华，承认了成吉思汗氏族的合法性，并将拜占庭巴塞勒斯（*basileus*）[④]的合法王权及特权一同授予可汗。[⑤]罗斯人对成吉思汗氏族意识形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出了车尔尼亚夫斯基的评价，笔者曾试图对此进行论证，相比鞑靼，成吉思汗氏族的法则在莫斯科政体中得到了更为灵活且广泛[⑥]深远的应用。[⑦]

众所周知，古代俄罗斯文学是美学、文学与道德规范的集合，其功能

---

① 莫斯科公国时期将贵族女性与外部社会隔绝的居所。——译者注

② 苏珊娜·真诺斯克·麦克奈丽（Suzanne Janosik Mcnally）:《从公民到私囚：中世纪俄罗斯妇女地位的变迁》，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博士论文，1976年，第142—148页，第253—256页。

③ 珍妮特·马丁（Janet Martin）:《金帐汗国与黑暗之地：13—14世纪蒙古人控制下的毛皮贸易》,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 (1978), pp. 401-422。

④ 王政执行官。——译者注

⑤ 车尔尼亚夫斯基（Cherniavsky）:《汗或巴塞勒斯》，第459—476页。约翰·L. I. 芬奈尔（John L. I. Fennell）:《14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教会的意识形态作用》，载于*Gorski Vijenac*纪念伊丽莎白·希尔（Elizabeth Hill）教授专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05—111页。芬奈尔因未参考前述车尔尼亚夫斯基之文而惊异于汗王的谨慎，他没有混淆中世纪俄罗斯人对鞑靼的描述与他们对汗王的尊敬之间的界限。

⑥ 查尔斯·J. 哈波林：《俄罗斯东正教的成吉思汗系圣徒：彼得王子传》，《加美斯拉夫研究（卷9）》，1975年，第324—335页。

⑦ Charles J. Halperin, The Russian Land and the Russian Tsar: The Emergence of Muscovite Ideology, 1380-1408, in: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äischen Genschichte 23 (1976), pp. 7-103.

在于界定"文学礼仪"，这使得文学家针对既定主题进行的创作受到了限制。[①] 在论及罗斯与蒙古关系的"文学礼仪"中，无信仰的鞑靼人被描述为彻头彻尾的负面形象。实际上，陈腐单一的长篇大论和传统的文学主题涵盖了一切有关鞑靼的叙事散文，即一种"上帝之鞭"的意象。在鞑靼人发动的每一次袭击中，这些无信仰的蛮族毫无怜悯之心，即使是老幼妇孺和僧人修女也要赶尽杀绝。但在这种曲解事实的片面之词背后，罗斯与蒙古的历史经验却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军事冲突是民族宗教边境的常态，那里的社会群体排斥甚至仇视对方的宗教信仰，即使如此针锋相对，共存仍是他们仅有的选择。这种情况在宗教边境随处可见。因此，除了战争和相互鄙弃，穆斯林摩尔人与西班牙天主教徒、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与拜占庭基督徒、穆斯林与攻占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土耳其和蒙古侵略者与东斯拉夫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连中国人与长城之外的"野蛮人"都不得不维持一种和缓的外交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互习语言、往来贸易、联谊结盟、体制借鉴是最为常见的手段。但因这种实用主义垄断了正义和救赎，其伸张必定会损害一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和政治制度。因此，所有关于和平共存的合作模式的理论都不能够被用来证明非军事互动的合理性。对宗教偏见的期望与对实用主义的渴求是矛盾的，而沉默的意识形态为这种矛盾的存在提供了可能。[②] 罗斯与蒙古并不是单纯的军事管制关系，可以证实这一论点的材料被中世

---

① D. S. Lichačev, *Čelovek v literature drevnej Rusi*. Moskva 1958, 2nd ed. 1970; Lichačev, *Poétika drevnerusskoj literatury*. Leningrad 1967; Lichačev, *Razvitie russkoj literatury X-XVII vekov. Epoch ii stili*. Leningrad 1973.

② 见查尔斯·J. 哈波林：《沉默的意识形态：对中世纪俄罗斯宗教边境的偏见与宽容》，《社会历史比较研究》，1984 年，第 442—446 页；同上，《罗斯与金帐汗国：蒙古人对中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影响》，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5 年；同上，《鞑靼枷锁》，俄亥俄州哥伦布，斯拉夫出版社 1986 年。

纪俄罗斯的种种文献所湮没。只有探寻史料背后的意义，我们才能够进行深入挖掘，因为，要使中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书写、复制、保存写卷的读书人——成为鞑靼的专家，会是个令人困窘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异端的蒙古人是战场上的敌人，而不是学习客观认知的对象。

基于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苏维埃学者 M. D. 波鲁博佳里诺娃（M. D. Polubojarinova）推断罗斯人曾出没于金帐汗国。罗斯的王公贵族、士兵、商人、传教士和奴隶常以访客的身份踏入鞑靼的领地，周期或长或短。罗斯人频繁而持久的逗留是否影响了中世纪俄罗斯人对鞑靼的看法？波鲁博佳里诺娃并未对此进行探讨。[①] 罗斯人对鞑靼人有着如此深入的了解，却仍然认为他们是——如皮斯雅科夫所言——“陌生且畸形的”，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鞑靼人视为熟知的敌人，由此可知，中世纪俄罗斯文献对鞑靼人的描述是一种主观意象，其目的在于激发宗教仇视，为战争奠定基础。既悲哀又无法否认的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把敌人想象成低级蒙昧的野蛮人，却不愿承认他们只是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另一种人。

鞑靼人是罗斯人的敌人，鞑靼人征服了罗斯，他们发动的袭击和战争给罗斯造成了持久的毁灭，罗斯的政治也受到蒙古汗的影响。因此，对中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了解他们的敌人已如箭在弦，出于自卫目的的深谋远虑促使他们制定了这一政策。他们因宗教偏见和盲目自负对此绝口不提，同时也一概拒绝针对以往经验的分析与总结。罗斯人对金帐汗国的地理、人事和语言有着深入的了解，笔者将在下文通过一系列资料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

---

① M. D. Polubojarinova, *Russkie ljudi v Zolotoj Orde*. Moskva 1978; 可参考笔者在 Russian Review 39, 2 (April 1980) pp. 237-238 一文的回顾。文中“波鲁博佳里诺娃阐释考古学材料的篇幅是文献资料的二倍，足见其作为考古学家的专业功底”一句难以理解，是由于笔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遗漏页码索引所致。

* * *

鞑靼人并未侵入俄罗斯的森林地带，他们在从黑海北部延伸至里海中部的草原一带停了下来。在是否对草原进行了解的问题上，罗斯人几乎没有选择。为使政治事务顺利开展，他们不得不出访金帐汗国。卓越的俄罗斯东方学家 V. V. 巴托尔德（V. V. Bartol'd）在其研究欧洲与俄罗斯的东方诸国的著作中，对罗斯人没能充分利用当时的条件表示惋惜。13 世纪的方济会神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游记，其中蕴含的信息之丰富，整个俄罗斯无出其右，他们在前往哈拉和林（Karakorum）途中留下的游记，涉及了大量有关蒙古帝国的地理知识和社会常识。旅居哈拉和林的罗斯人却没能留下此类文字遗产，故而未能为传统的欧洲东方学界注入新的资源。[①]

与柏朗嘉宾（Carpini）[②]和鲁布鲁克（Rubruck）[③]相比，罗斯人的游记在较为具体的领域也是匮乏的。目前未见有文字记载罗斯人对哈拉和林的回应，他们对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作何见解也不得而知。驻守在大都之外作为帝国卫队的罗斯戍卒，也未在中世纪俄罗斯史乘里留下只言片语就销声匿迹了。虽然没有一本游记能够涵盖罗斯人对金帐汗国自然地理的所有认识，但我们可以根据中世纪俄罗斯的多种文献重新整合。

---

① V. V. Bartol' d, *Raboty po istorii vostokovedenija*. Moskva 1977, pp. 363-364 (= *Sočinenija*, vol. 9).

②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于 1246 年奉教宗依诺增爵四世派遣，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觐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著有《鞑靼蒙古史》（*Ystoria Mongalorum*），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为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译者注

③ 威廉·鲁布鲁克，方济会传教士，1253 年奉路易九世之命前往蒙古汗廷传教，先后谒见拔都汗与蒙哥汗，1255 年回国后将旅行见闻写成出使报告，即《东方行记》（*Itinerarium fratris Willielmi de Rubruquis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 Galli, Anno gratia 1253 ad partes Orientales*），记述 13 世纪蒙古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详细描述了蒙古的山川河流和周边各族情况，是研究中世纪中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译者注

由于听信莫斯科大公伊凡·卡里达（Ivan Kalida）一系列言过其实的控诉，汗国于1318—1319年间令卡里达的竞争对手，特维尔（Tver）的亚历山大洛维奇（Aleksanrovic）王公米哈伊尔（Michail）前来朝觐。此后米哈伊尔开始了在汗国的游牧生活，并遭受了长达数月的折磨，直到最终被处决。米哈伊尔的殉难成为圣徒传记的主题[①]，传记作者对汗国的游牧路线描述得十分具体：米哈伊尔渡过塞万切河（Sevenč），到达高加索地区（Caucasus）的捷列克河（Terek River），该河位于德雅科夫城（Dedjakov）[②]的加卡斯基山（Jasskij[③]）和契尔卡斯基山（Čerkasskij[④]）附近。之后米哈伊尔在亚速海（Surož Sea）附近的顿涅克河[⑤]（Donec）一带与游牧部落相遇，并与他们一同横渡亚迪支河（Adyž），“Adyž”在鞑靼语中有“悲伤”之意，因此亚迪支河可谓“河如其名”。在被处决之后，米哈伊尔的遗体最初葬在位于东高加索杰尔宾特（Derbent）铁门（Iron Gate）附近的možd'žčara，随后又迁至伏尔加河与顿河交汇处[⑥]的Bezdež[⑦]，最终安葬于

---

① V. A. Kučkin, *Povesti o Michaile Tverskom. Istoriko-tekstologičeskoe issledovanie*. Moskva 1974 是针对此段传记的综合性研究。

② 对该城位置的探讨，见 M. G. Safargaliev, Gde nachodilsja zolotoordynskij gorod Dejakovo in: Učenye zapiski Mordovskogo pedagogičeskogo instituda imene A. I. Poležaeva. Serija obščestvennych nauk. Vyp 4. Saransk 1956, pp. 128-137; V. A. Kučkin Gde iskat’ jasskij gorod Tjutjakov, in: Izvestija Severo-Osetinskogo naučnogo issledovatel’nogo institute. Vol. 25. Ordžonikidze 1966, pp. 169-183; 及 E. I. Krupnov, Ešče raz o mestonachoždenii goroda Dedjakova, in: *Slaviane i Ruś*. Moskva 1968, pp. 291-297 (= Rybakov *Festschrift*)。

③ 阿兰人称 Jasy。

④ 切尔克斯人称 Čerkesy。

⑤ Seversky Donec River，位于乌克兰境内。——译者注

⑥ V. L. Egorov, Razvide centrobežnych ustremlenij v Zolotoj Orde, in: Voprosy istorii (1974) No. 8, pp. 36-50.

⑦ 捷克西北部村庄。——译者注

罗斯。[1]

以上显然是某位见证者留下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且此人对金帐汗国的腹地有着极为全面的了解。在现存有关金帐汗国游牧期的文献中，米哈伊尔的传记涵盖了最为广泛精准的内容，它并未囿于记录游牧部落的行进，而是重在描述米哈伊尔在殉难之路上饱受的艰辛与磨难。罗斯编年史中的一些短篇也证实了罗斯人对欧亚草原地理情况的熟悉。1346年爆发的一场瘟疫不仅摧毁了金帐汗国斡耳朵（*orda*，可汗的游牧首都），还袭击了萨莱（Saraj，固定首都），奥尔纳奇（Ornač，即乌尔根奇 [Urgenč]，中亚的花剌子模）和 Bezdež。下述群体也在此次瘟疫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穆斯林（*Besermeni*，即中亚的穆斯林）、鞑靼、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意大利人（*Frjazy*, 主要是克里米亚热那亚人）和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2] 罗斯人十分熟悉流经萨莱的伏尔加河，并记录了河流沿岸的城市：保加尔（Bolgar）、萨莱、Bezdež 和 Naučad。[3] 还有一则史料叙述了一队诺夫哥罗德海盗（uškujniki）的跋涉之路：他们从 Zasuře 出发，经过 Markaš 和 Vetlus 到达保加尔，随后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最终到达阿斯特拉罕（Astrachań）。[4] 罗斯编年史学家想必已经意识到阿塞拜疆（Azerbajdžan）

---

① *Polnoe sobranie russkich letopisej* (即后文所提到的 PSRL) . Vol. 1. 2nd ed. Leningrad 1926; vol. 2nd ed. S-Peterburg 1908; vol. 5. S-Peterburg 1851; vol. 10. S-Peterburg 1885; vol. 11. S-Peterburg 1897; vol. 15. S-Peterburg 1863; vol. 18. S-Peterburg 1913; vol. 20. S-Peterburg 1910; vol. 23. S-Peterburg 1863; vol. 25. Moskva, Leningrad 1949; vol. 27. Moskva, Leningrad 1962; vol. 32. Moskva, Leningrad 1975; here vol. 5, pp. 207-215. Cf. the comments on the Horde and its movements in H. A. R. Gibb (tr.), *Ibn Ba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irica 1325-1354*. New York 1929, pp. 142-152。

② *Troickaja letopiś. Rekonstrukcija teksta*. Ed. M. D. Priselkov. Moskva, Leningrad 1950, p.368 (即后文提到的 TL)。

③ TL, p. 38.

④ TL, p. 396. 见 Janet Martin, Les uškujniki de Novgorod: marchands ou pirates, 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6 (1975) pp. 5-18。

的大不里士（Tebriz）对于金帐汗国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将波斯伊利汗国（Ilkhanids of Persia）于1357年对金帐汗国的发动的战争载入了史册，这一征伐是金帐汗国所经历的世纪之战的巅峰。[①] 罗斯人不仅熟知其东方，他们对南方的情况也了如指掌。1406年，脱脱迷失（Tochtamyš），金帐汗国的一位君主，与立陶宛（Lithuania）大公维托夫特（Vitovt）的前任侍从战败于沃尔斯克拉河（Vorskla），死于西伯利亚王国（汗国领土）。[②]

1389年，皮蒙（Pimen）受大主教的委派，与斯摩棱斯克（Smolensk）的伊格纳修斯（Ignatij）一同渡过伏尔加河到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教会的随从们来到撒里・火者（Sary Hoza）、别克・布拉特（Bek Bulat）和阿克・布迦（Ak Buga），伊格纳修斯将绵亘起伏的紫山（Červlenyj Jar）与蜿蜒流淌的河流绘制成一幅活色生香的粉笔画。[③] 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吉丁（Afanasij Nikitin）终于在15世纪成功抵达印度，然而他沿着伏尔加河顺流而下时却经过了喀山（Kazań）、金帐汗国、勿斯兰（Uslan）、萨莱伊和Berekezany。尼吉丁的商队在Buzan河附近遇到了充满敌意的鞑靼人，又在阿斯特拉罕遭受喀西姆（Kaisym）苏丹[④] 和鞑靼人的攻击，当地游牧部落的追击迫使他们一路逃至Bogun。在前往杰尔宾特（即铁门）的途中，他们在里海北岸的Tarchi附近再次被Kaitaks人拦截。通过布拉特・伯克（Bulat Beg）的斡旋，来自阿塞拜疆席尔旺沙（Shirvanshah）的使节在杰尔宾特的阿山伯克（Asanbeg）将尼吉丁及其商队从Kaitaks人手中解救出来，并掩护他们一路前行。杰尔宾特的统治者布拉特・伯克是Kaitaks君主阿里儿伯克

① PSRL, vol. 4, p. 63.

② TL, p. 465.

③ PSRL, vol. 11, p. 96.

④ 一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Alil’beg）的姐夫。[1]

有时单凭一则史料难以判断罗斯人对草原地理的了解程度。蒙古汗王颁布 *jarlyki* 以保障罗斯正统基督教大主教及教众的财政与审判豁免权，据蒙古大臣的说法，曾有文献对汗王颁行政策的地点有所记载。有一批 *jarlyki* 被译为罗斯语并得以存留，其中一则或可证明罗斯人已找到汗王起草 *jarlyki* 的地点，包括 Velikoluko、Želtoi、Trosti、萨莱、Kaogna 和 Gulistan，阿斯特拉罕省（Gubernija）是主要地点。汗王在黑海游牧时撰写了其中一项，而另一项则撰写“在草原”（*na Taly*）。[2]

1480—1481 年，诺盖鞑靼人（Nogai Tatars）协助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杀害了大帐汗国（the Great Horde）的阿黑麻汗（Achmat Khan）。罗斯编年史记述了这一事件发生的确切地点：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 Bela Veža 与亚速海附近的 Malyj Donee 河（*na Doncu na Malom*）。上述信息或许出自诺盖人向伊凡三世提交的报告，至于阿黑麻汗被杀害的地点，罗斯人并不是很清楚。[3]

中世纪俄罗斯史料所体现的地理学认知，绝非只有金帐汗国的地形地势。罗斯人对帖木儿（Timur）[4] 扩张征伐的范围了如指掌。罗斯人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帖木儿帝国向金帐汗国发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罗斯编年史列举了帖木儿所征服的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其中还包括

---

① PSRL, vol. 20, pp. 303-304, 及 *Choženie za tri morja Afanasija Nikkina 1466-1472 gg.* Moskva 1948; 2nd ed. 1958, pp. 10-11。

② M. D. Priselkov, *Chanskie jarlyki russkim mitropolitam*. Petrograd 1916. p. 57, 59, 61. 有关对不确切位置的考证，见 Pamjatniki russkogo prava. Vol. 3, Moskva 1955, pp. 476, 477, 479, 480。

③ *Ustjužskij letopisnyj svod (Archangelogorodskij leropisec)*. Ed. N. K. Serbina. Moskva, Leningrad 1950, pp. 93-94.

④ 俄罗斯文献称其为 Temir-Aksak，西方则称 Tamerlane。

一些天主教[①]国家。[②]这一名单亦可作为对16世纪的中亚、里海、高加索、外高加索、黑海北部和伏尔加河北部等“鞑靼领土”进行汇总的基础。[③]近期发现的文献对15世纪东高加索杰尔宾特附近的城市、首领、气候、地理和经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该地区是通往波斯的必经之路，早在金帐汗国的游牧时期，罗斯人对此地的了解就已经十分深入。[④]

相比当代学者，罗斯人对于金帐汗国的地理情况所知更多，前者通常无法对中世纪俄罗斯文献所提及的地点一一进行考证。尽管学界存在这方面的空白，范伦斯基仍坚持认为欧亚草原的地理情况是为罗斯人所熟知的：“这一时期的罗斯编年史体现了罗斯人对金帐汗国地理情况极为广泛的认识，除萨莱外，史料还提及乌尔根齐和阿斯特拉罕等商业中心。同时，他们对亚速海和克里米亚也十分熟悉。”[⑤]

罗斯人对萨莱远比对君士坦丁堡熟悉得多，然而却有大量以朝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探讨君士坦丁堡的地理情况与社会文化[⑥]，其信息量之丰富，是萨莱无法匹敌的，涉及哈拉和林的文字资料更是寥寥无几。这种地理认知的不对等并非出于对这两个地区的忽视，而是由于一种文化上，或者说文学上的禁锢制约了中世纪罗斯学者的发声。对中世纪的俄罗斯人来

---

① 此处指以《圣经》为经典的广义基督教。——译者注

② PSRL, vol. 15, col. 448, 449.

③ N. A. Kazakova, “Tatarskim zemljam imena”, in: Trudy Otdela drevnerusskoj literatury [即后文所提到的 TODRL] 34 (1979) pp. 253-256。

④ V. A. Kučkin, “Skazaine o železnych vratach”, in: Archeografičeskij ežegodnik za 1964 g. (1965) pp. 274-277, 及 Russkij putešestvennik v Azerbajdžane v pervoj polovine XV veka, in: Voprosy istorii (1965) No.3, pp. 204-205; Ju. K. Begunov, Drevnerusskoe opisanie Derbenta i Širvana, in: TODRL 21 (1965) pp. 126-131.

⑤ 范伦斯基（Vernadsky）:《蒙古人与罗斯》，第343页。

⑥ 有关朝圣的效用，见乔治·P. 马杰斯卡（George P. Majeska）:《14—15世纪的圣索菲亚：俄罗斯旅行者与遗迹》，《丹巴顿橡树园报》，1973年，第69—87页。同上，《14—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旅行者》，华盛顿，丹巴顿橡树园图书馆馆藏，1984年。

说，只有宗教朝圣才可以作为游记而永世流传，毕竟方济会教徒的宗教任务有着人心所向的目的，即劝导蒙古人皈依天主教。在阿法纳西·尼吉丁之前，中世纪的俄罗斯没有能够与马可·波罗的游记相提并论的世俗游记。尼吉丁是个例外，显然他认为金帐汗国有着比异域印度更为人所熟知的一面，并将其悉数载入游记。罗斯大公和传教士前往萨莱的原因有些尴尬：罗斯曾被蒙古人征服。虽然在陈述时事的方式上已出现少数例外，但如果以公开发表的形式保存罗斯人在旅途中掌握的地理学知识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另外，采用西方大学所惯用的方式进行"新社会科学"的写作，从来都不是中世纪俄罗斯的传统。罗斯陷入被异教徒统治的窘境，在汗国地理认知领域的失语是其知识分子对此做出的普遍回应，即沉默。但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中足以窥见中世纪俄罗斯人对草原地理的卓越认知。

* * *

鞑靼人在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中被称作"鞑靼（*Tatary*）"，之前通常附有贬义形容词。但对于中世纪俄罗斯人来说，鞑靼人不是"畸形的陌生人"。鉴于中世纪俄罗斯人对汗国人事的熟悉程度，鞑靼人被冠以一概而论的名号是有悖事实的，罗斯人理所当然要了解他们的统治者，即汗。这并非易事，因为金帐汗国素来以内乱频仍和君王更迭而著称，但罗斯文献所涵盖的内容却远比这丰富。当时编纂的编年史所涉及的鞑靼人物已有二百位之多[①]，将名单汇编为表格可以一目了然。[②]

① 同年发生的不同史实、不同年发生的同一史实或与同一史实相关的不同鞑靼贵族，在不同编年史中均有记载。考虑到将东方姓名转译为罗斯语时的意译因素，有时同一人物会有两种译名，这种情况是难以辨别的。笔者未对名单所涉及的人物一一考证，一位人物只能对应一个名字。笔者的名单很可能是不完整的，但其数量足以为此文的论点提供支撑。

② 见附录，pp. 173-175. NPL = *Novgorodskaja pervaja letopiś staršego i mladšego izvodov*. Ed. A. N. Nasonov. Moskva, Leningrad 1950。

罗斯人不仅记录汗王（*cari*）的姓名，有时也记录汗王子嗣（*careviči*）与嫔妃或遗孀（*caricy*）[①]的姓名。非成吉思汗系的贵族称“王子”（*knjaź*），通常译为“埃米尔”（emir）或“伯克”（beg）。蒙古官员有适切的称谓：兼管征兵与贡赋，并负责公共治安的官员称“八思哈”（*baskaki*）；汗国内部的行政官员称“达鲁花赤”（*darugi*）；使节（*envoys*）[②]负责金帐汗国与罗斯森林地带间各种信息指令的传达。有时罗斯文献在提及鞑靼贵族时使用罗斯语，如“指挥官”（*voevoda*）和“朝臣”（*stol'nik*）等。因此，学者有时会混淆某位鞑靼贵族的身份。[③]在动荡不安的14世纪60至70年代，萨莱的政权更迭是罗斯编年史都无法厘清的问题。[④]然而关于14世纪下半叶金帐汗国的王权更迭，罗斯文献比阿拉伯—波斯文献涵盖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内容，罗斯基督徒对汗国政治的关注也比对马木留克（Mamelukes）和伊朗的蒙古穆斯林的关注更为密切。[⑤]事实上，金帐汗国在14世纪末与15世纪初的罗斯编年史中所占的比重远超罗斯其他邻国[⑥]，因为它给罗斯造成的重大紧迫的威胁是别国不曾有的。即使夹杂了主观因素，罗斯编年史对鞑靼王子姓名的转录仍旧十

---

① 也称 khanshas 或 khatuns。

② *posoly*，直译自蒙古语 *il'či*。

③ Nasonov, *Mongoly i Ruś*, p. 30, n. thought Kutlubuga, s. a. 1262，提到了中国的忽必烈汗（Kubilai Khan），虽然他被称作穆斯林。Berthold Spuler, *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en in Rubland*. 2nd ed. Wiesbaden 1965, p. 36，反驳了 Nasonov 的观点，却认为 Qutlug-Boga 是一位 baskak，这是编年史中未曾提及的。

④ Grekov, Jakubovskij, *Zolotaja Orda i ee padenie*, pp. 269-270，纠正了一些有关内战期间汗王的错误信息。

⑤ Grekov, Jakubovskij, *Zolotaja Orda i ee padenie*, p. 272，认为罗斯编年史对汗国政治卓越的认知是“相当典型的”。

⑥ L. V. Čerepnin Ostraženie meždduunarodnoj žizni XIV-načalo XV vv. moskovskom letopisanii, in: *Meždunarodnye svjazi Rossii do XVII v.*, Moskva 1961, pp. 225-256，详见 pp. 227-231, 244-247。

分精准，例如于 1409 年随 Edigej 王子围攻莫斯科公国的汗王子嗣们。[1] 罗斯人深谙汗国人事与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在列举名单方面存有缺陷，如某教堂的大主教或某市的主教，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大公或某公国的王公等，难以置信的是，史料中居然有汗国君主（*cari ordynskie*）的名单。[2] 鞑靼人向罗斯发起的一些战役过于著名，以至于大部分都以其指挥者来命名，如 1251 年的 Nevrjui 之战，1293 年的 Djudeń 之战和 1322 年的 Achmyl' 之战。[3] 这些战役也相应地被用作具有年代意义的参照系，例如，笔者的祖先在此地耕作的年代是 Edigeeva rat（Edigej 之战）的四十年后（1408 年＋ 40 年 =1448 年）。[4]

鞑靼君主、王储、王子、汗王嫔妃与遗孀、八思哈、达鲁花赤、使节和指挥官及其他无头衔的称谓均出现于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中，这些称谓证明了罗斯人对金帐汗国人员构成的熟知。罗斯人能够准确辨认成吉思汗氏族的成员，对汗国贵族联姻、姻亲、同胞甚至表亲等家族关系都一清二楚，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积累了质、量俱佳的社会资料，这一点着实令人钦佩。探究汗国事务是罗斯人迫于政治局面做出的无奈之举，他们别无选择。对罗斯王公而言，有关汗国政局的可靠消息可能在危急时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假消息则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即使是普通政治机构的运作，

---

① A. Jakubovskij, Iz istorii padenija Zolotoj Ordy, in: Voprosy istorii (1947) No. 2, pp. 30-45，是诸如 Jakubovskij 等声名显赫的东方学家的高度赞扬。

② M. E. Byčkova, *Rodoslovnye knigi XVI-XVII w. kak istoričeskij istočnik*. Moskva 1975, pp. 147-150.

③ M. N. Tichomirov, Kulikovskoj bitva 1380 g., in: Tichomirov, V. F. Ržiga, L. A. Dmitriev (eds.), *Povesti o Kulikovskoj bitve*. Moskva 1959, pp. 335-376.

④ A. D. Gorskij, Oraženie tataro-monglo' skogo iga v russkich aktach XIV-XV vv., in: *Feodal'naja Rossija vo vseirno-istoričeskom processe*. Moskva 1972, pp. 48-58 (=*Čerepnin Festschrift*).

也需要行贿以备求助之需。罗斯人与汗国政治精英的熟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迫于无奈，而非自愿。

罗斯史料体现出的对汗国社会层面的探讨比政治层面更为深入，因为编年史并不仅仅关乎政治，史料中出现的鞑靼贵族想必也为其预期受众所津津乐道，否则将不会载入史册。金帐汗国权力精英——统治者和官员——的姓名为中世纪俄罗斯的权力精英——王公、*bojare*、主教、商人等——所熟知。罗斯人一定是通过这些人寻求认同，否则，他们在历史编纂过程中有所选择的行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对罗斯权力精英而言，"鞑靼人"或许同"罗斯人"（*Ruś*）和"下层阶级"（*čerń*）一样，只是对一个群体不含任何特征概括的称呼。但蒙古的上流社会绝非庸庸碌碌之辈，他们有名有姓，在中世纪等级社会中也有与身份相符的称谓。他们在中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的眼中绝不可能是陌生的外来者，相反，罗斯人对他们再熟悉不过。与鞑靼人相处隐藏的危机，只要综合已有的认知并加以权衡，便可预见危机的到来。

罗斯人熟知与其相识的蒙古精英的姓名、身份和地位，中世纪俄罗斯史料对此鲜有提及，这种表述可能会引发过多疑问，即什么是导致罗斯正统基督徒与萨满教徒或穆斯林鞑靼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原因。在分析罗斯人对汗国社会的熟识程度时，只有通过对编年史中若隐若现的社会资料进行梳理，才能够概括二者关系的显著特征。这种结果对于我们理解罗斯—鞑靼关系的本质来说是深奥的，它消除了对中世纪俄罗斯史料所体现的自我意识的怀疑，推翻了大多数现代历史编纂的预设，即蒙古人是 13 至 15 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外部因素。

* * *

从表面来看，罗斯人如果和蒙古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则无法通过交流获得对金帐汗国地理和社会的认知。令人吃惊的是，有关罗斯—鞑靼关系

中这一基本要素的探讨，学界并不多见。[①] 当涉及到罗斯人是如何打破沉默开始与鞑靼对话时，中世纪的俄罗斯史料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空白作为回应。

1223 年的编年史家声称他们对鞑靼为何人、从何处来、居于何地、使用何种语言等问题一无所知，不过，东斯拉夫王公却曾与鞑靼人进行谈判。文献未记述谈判的语言与翻译者，有学者认为当时的通用语可能是某种"突厥语"，这只是一种预设。蒙古人不使用罗斯语，罗斯人不使用蒙语，两国也从未进行过接触。然而，蒙古的人口结构包括大量讲突厥语的游牧民，东斯拉夫人也乐于同这些来自东欧草原的游牧民族保持密切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突厥语使用者在蒙古军队和东斯拉夫政治集团中非常普遍，因此突厥语当是 1223 年谈判的媒介语言。

征服罗斯后，蒙古人在草原地带安置下来，并与讲突厥语的民族，即钦察人（Kipchaks，罗斯语称 polovcy）融合。金帐汗国蒙古人的突厥化适应了他们与罗斯的交流，至 15 世纪，"鞑靼语"演变为察合台突厥语（Chagatai Turkic）。蒙古人终归是主宰草原的征服者，他们很少费心学习罗斯语。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罗斯贵族与教会代表团中有讲突厥语的翻译，而编年史却几乎从未提及这种双语使用者。

例外的存在证明了规律的普遍性。文献记载一名讲罗斯语的翻译（*tolamač*）曾参与围攻海乌姆（Cholm）的战争，他显然是鞑靼人。[②] 绝大多数有关翻译人员的记载直到晚期才出现，它们通常使用文学性语言，可信度不高。"Skazanie o Mamaevom poboišče"（对莫斯科公国与马麦[③]作战的记载）讲述了 1380 年罗斯在库利科沃（Kulikovo）之战中的胜利。

---

① *Spuler, Die Goldene Horde,* pp. 285-293，探讨似乎并无结论。

② PSRL, vol. 2, col. 851.

③ Mamai.

文章在叙述罗斯使者 Tjut'čov 与两名讲钦察语的翻译一同被派往金帐汗国时运用了大量修辞手法（将鞑靼描述为钦察人，是 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历史主义”陈词滥调，由此可知，当时的罗斯语翻译是鞑靼人）。①

最初的双语翻译有时由通晓罗斯语的钦察人担任。柏朗嘉宾曾提到大公 Jaroslav、Coman Temer 和基督徒 Coman Sangor（本应有教名）的两位“骑士”。② 一些前往金帐汗国的罗斯贵族使节（*kiličei*）或许并不是纯种罗斯人。1360 年，Kašin 的王公瓦西里（Vasilij）将 Grigořčjuk Koreev 派遣至金帐汗国，③1380 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ij Donskoj）派 Tolbuga 与 Mokšej 向脱脱迷失传达信息。④ 姓名并非民族认同的绝对标准，这些非罗斯非基督人物证实了下述情况，即罗斯境内通晓两种语言的游牧民是出使金帐汗国的最佳人选。

显然，一些鞑靼人学习罗斯语是出于喜好或是迫于压力。长年驻扎罗斯的 *baskaki* 能够轻而易举地学习当地语言。与罗斯公主通婚的鞑靼王子，如 Končaka，最终皈依了罗斯正统基督教，为践行宗教信仰，他们必须学习罗斯语或斯拉夫语。那些鞑靼皈依者的随从和仆人或许同样不得不学习罗斯语，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定居。迁居罗斯并皈依东正教的鞑靼贵族，如 1393 年的编年史提到的三位人物，被罗斯人同化是毫无疑问的。鞑靼人迁居罗斯的高峰始于 15 世纪下半叶，在此之前，学习“鞑靼语”的罗斯

---

① Tichomirov, Ržiga, Dmitriev (eds.), *Povesti o Kulikovskoj bitve*, p. 49. 原文详见 Halperin, The Russian Land and the Russian Tsar, pp. 23-37。

②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编：《亚洲行记：14 世纪方济各会传教士中蒙书信集》，纽约，1955 年，第 66、70 页。

③ PSRL, vol. 15, col. 67.

④ TL, P. 421. 有关 kiličei，见 Polubojarinova, *Russkie ljudi v Zolotoj Orde*, pp. 18-19。

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学习罗斯语的鞑靼人。旅居汗国并接见来自森林地带的鞑靼使臣与官员的罗斯王公、贵族、商人和牧师学习鞑靼语的动机最为强烈。

虽然 *jarlyki* 的受众使用罗斯语，但其初始语言是突厥语，想必教区有能够将其译为罗斯语的官员。最合乎学术意义的假设是，一位主教区的文官于 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初将 *jarlyki* 译成了罗斯语。[①]

俄罗斯的历史编纂者在论及（蒙语与罗斯语的）翻译者时极为罕见地语焉不详，双语现象在罗斯编年史中也留有大幅空白，上述情况证明一些领域仍有问题存在。不难想象，除非被明确提及，否则双语现象和翻译者不过是不值得探究的一般性存在。当然，"鞑靼"的学问在文化意义上是不堪的，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在一个需要救赎的国家，精通异教徒的语言无异于自毁声望。瓦西里二世（Vasilij Ⅱ）因热爱鞑靼语甚于其母语而在莫斯科公国的内战中饱受控诉，对鞑靼文化的支持致使他双目失明，政权最终也遭到推翻。[②] 学习东方语言的 Afanasij Nikitin 也是一则反例。Nikitin 与穆斯林一同生活了七年，甚至可能已经放弃自己的信仰，出于商业、宗教和求生的目的，他不得不熟练掌握东方语言。Nikitin 精通波斯语、

① A. A. Zimin, Kratkoe i jprostrannoe sobranija chanskich jarlykov, vydannych russkim mitropolitam, in: Archeografičeskij ežegodnik za 1961g. (1962), pp. 28-40. 苏维埃学者已经开始考据金帐汗国颁行 *jarlyki* 的初始语言，可参考 A. P. Grigorev 的三篇文章：Evoljucija formy adresanta v zolotoordynskich jarlykach XII-XIV w., in: Učenye zapiski LGU, No. 389, Seriia vostokovedčeskich nauk (1977) vyp. 19. Vostokovedenie 3, pp. 132-156; Obraščenie v zolotooedynskich jarlykach XIII-XIV w., in: Učenye zapiski LGU, No. 403. Serija vostok. Nauk (1980), vyp. 23. Vostokovedenie 7, pp. 155-180. 及 K rekonstrukcii tekstov zolotoordynskich jarlykov XIII-XIV vv., in: Istoriografija i i stočnikovedenija istorii stran Azii i Afriki 5 (1980) pp. 13-38; M. A. Usmanov, *Žalovannye akty Džučieva ulusa XIV-XVI vekov*. Kazań 1979, 详见 pp. 94-115, pp. 192-193。

② PSRL, vol. 4, s.a. 1446, p. 125.

阿拉伯语以及察合台突厥语，常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东方方言甚至在他的游记中随处可见。[①]Nikitin因与原生文化的“隔绝”和“变节”饱受焦虑。对异教徒语言的精通尚且为罗斯正统基督教招致厄运，异教徒的宗教或将使其遭受灭顶之灾。

* * *

若想全面完整地理解蒙古人对俄罗斯历史造成的冲击，仅探讨罗斯的遭遇是不够的，罗斯人对蒙古人的看法及其在战场之外做出的回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世纪俄罗斯人对金帐汗国地理、社会和语言的了解证明他们与汗国不仅是相互残杀，然而这种了解却没能形成文化理解与文化包容。在蒙古人的征服下，罗斯人知识的习得只能是出于军事目的和政治憎恨。此外，中世纪俄罗斯学者不愿承认其精通于金帐汗国的方方面面，对异教徒敌国的熟悉将使他们身陷险境。因此，他们对金帐汗国的认知几乎彻底湮没于史料之中，但他们的认知又是如此广泛而卓越，若能放宽中世纪文献对宗教和文学的限制，学者便可对其进行复原与分析，从而对罗斯—鞑靼关系做出进一步阐释。

---

① *Choženie za tri morja Afanasija Nikitina 1466-1472, passim* 与 Gail Diane Lenhoff 近来的修正主义研究：《三海之外：东正教徒 Afanasij Nikitin 的变节》，《东欧季刊》1979年，第431—447页。以及她的博士论文《中世纪俄罗斯之行的确立》，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第198—248页（Nikitin 所使用的东方方言见第228—239页）的第六章。非常感谢 Lenhoff 教授同意笔者复印她论文的这一章。此外还应关注 JA. S. Lure, Podvig Afanasija Nikitina (k 500 – letiju načala ego putešestvija), in: Izvestija Vsesojuznogo Geografičeskogo obščestva 99 (1967) pp. 435-442。

附录：

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所涉及的鞑靼贵族名单

年代	人物	来源
1223	Gemjabeg, C’gyrkan, Tešjukan	NPL, pp. 61-63, 264-266
1237—1238	Batyj	PSRL, vol. 1, col. 470
1240	Tovrul, Urdju, Baidar, Birjui, Kaidan, Bečak, Meńgu, Kjujuk’, *voevoda* Sebejai, *voevoda* Burundai	SRL, vol. 2, cols. 784-785
1243	Manmana, Balaa	PSRL, vol. 2, col. 794
1245	*Stol’nik*（朝臣）Eldega	NPL, pp. 298-303
1247	Berdebek	PSRL, vol. 10, pp. 134-135
1249	Sartak, Batyi 之子	PSRL, vol. 1, col. 472
1251	Nevrjui	NPL, p. 304
1256	Ulavcij 汗	TL, p. 325
1259—1260	Kuremsa, Burundai	PSRL, vol. 2, cols. 841-848
1261	Baimu, Kuičija, Asika, Boljuja	PSRL, vol. 2, cols. 849-855
1262	*posol* Kutlubuga Berkaj 汗	TL, p. 327 NPL, p. 312
1269	*velikijbaskak* Amragan	NPL, pp. 319, 88
1274	Igurčina	PSRL, vol. 2, cols. 871-874
1277	Nogai 汗，*posoly:* Tegičag, Kutlubuga, Ešimut, Mam-šeja	PSRL, vol. 2, cols. 876-878
1280	Končak, Kozej, Kubatan	PSRL, vol. 2, cols. 881-882
1282	Tura, Temer Alyn	TL, p. 339
1283—1284	Kursk *baskaki* Achmat	PSRL, vol. 1, cols. 481-482 TL, pp. 340-342
1288	汗国王子 Elortaj	PSRL, vol. 10, p. 167
1291	Telebuga 汗，Alguj 汗	NPL, p. 327

续表

年代	人物	来源
1293	Toktomer 汗，Djudeń	PSRL, vol. 1, col. 483 TL, pp. 345-346
1294	Tochta 汗	TL, p. 347
1297	Nevrjui	TL, pp. 347-348
1305	八思哈 Kutlubuga	PSRL, vol. 1, col. 528
1306	Tair	PSRL, vol. 25, p. 393; vol. 18, p. 86
1314	*posol* Aračij	TL, pp. 354-355
1315	Tjaitemer	TL, p. 355
1316	Kazanči, Sabanči	PSRL, vol. 1, col. 529
1317—1318	Končaka, 基督教名 Agafuja, Uzbek 汗的妹妹，莫斯科公国 Jurij Danilovič 之妻，*posol* Kavgadyj, Astrabal	TL, pp. 355-356; PSRL, vol. 4, pp. 48-49
1318	Telebuga, *posol* Konchia	NPL, pp. 95-96; TL, p. 356
1322	*posol* Achmyl, *posol* Sevenč'buga	TL, p. 357
1323	遗孀 Bojalyń, Uzbek 之妻	TL, p. 357
1327	*posol* Ševkal, Fedorčjuk, Turalyk, Sjuga	TL, pp. 355-359
1329	Gajančar	PSRL, vol. 15, col. 41
1330	非成吉思汗系王子（*velikijknjażordynskij*）Asan 汗王（*cariki*）: Kotlubaj, Katibej, Beker	PSRL, vol. 10, p. 203 PSRL, vol. 32, p. 43
1332	Dmitri Soltan	PSRL, vol. 32, p. 43
1333	Toidyj, Kal-ntaj, Čiriča	PSRL, vol. 15, p. 47
1338	Istorčej, Kindyk, Avdulja	PSRL, vol. 15, cols. 48-49; TL, p. 362
1340	Tovlubij	TL, p. 363
1341	Uzbek 汗，Čanibek 汗，Čanibek 汗之兄：Chydyrbek, Tinibek	TL, p. 365; PSRL, vol. 15, col. 54
1342	Kindjak	TL, p. 365
1347	*posol* Koga	TL, p. 368

续表

年代	人物	来源
1349	*posol* Totuj	TL, p. 369
1352	Ourdak	PSRL, vol. 15, col. 61
1357	Košak, Itkara Taidula 汗，Berdibek 汗 *posol* Iryńčej	PSRL, vol. 25, p. 180, vol. 18, p.100 PSRL, vol. 18, p. 100; TL, pp. 375-376 PSRL, vol. 15, col. 65
1358	*Carevsyn* Mamat Choža	TL, p. 376
1359	Kul' pa 汗，Naurus 汗，Naurus 之子：Michail 与 Ivan	TL, pp. 376-377
1360	Chidyr 汗，Mualbuzin 王子 *posol* Žukotnica	PSRL, vol. 15, col. 69 TL, p. 377
1361	Murat, Chidyr之兄；Mamai 王子；Avdulja 汗，Mamai 之傀儡；Temirchoža 汗；Kil' debek 与 Bolaktenur, Čanibek 之子；Naručad 王子；Ardemelik, Uruzbuga, Aratechozja, Sekiz, Achmat	TL, pp. 377-378; PSRL, vol. 15, cols. 71-72
1362	*posoly:* Urus, Kairbek, Altynčbej	PSRL, vol. 27, p. 242
1363	Amurat 汗，*posol* Iljak	PSRL, vol. 11, p. 2
1364	Aziz 汗，*posol* Urusmandy	PSRL, vol. 15, col. 77
1365	Tagaj 王子 *posol* Baram Choza 与 Osan	TL, p. 381 PSRL, vol. 4, p. 65
1368	*posol* Karač, Oajdar, Tjutekaš	TL, p. 386; PSRL, vol. 11, p. 10
1370	Mamant-Saltan, Mamai 汗之傀儡；*posol* Ačichoža, 保加尔（Bolgar）Osan 王子，SaltanBakovsyn; *posoly:* Kap' tagai, Tjuzjak, Sarychoža	TL, pp. 389-390 PSRL, vol. 15, cob. 92, 95
1374	*posol* Sarajko	TL, p. 396
1375	Astrachańknjaź Salčej; *posol* Ažichožej	TL, p. 398; PSRL, vol. 15, col. 110
1377	汗王子嗣（*carevič*）Arapša	TL, pp. 402-403

续表

年代	人物	来源
1378	Chazibej, Koverga, Karagaluk, Kostrok, Begička	TL, pp. 415-417
1381	Tochtamyš 汗 , *posol*carevičAk-choža	TL, p. 421
1382	*posol,* šurin (Tochtamyš 之姐夫), Šichmat	TL, pp. 422-424
1383	*posol* Adaš	TL, p. 427
1386	遗孀 Tovlunbeka,Tochtamyš 汗之妻	TL, p. 430
1389	*posoly:* Šichmat, Ulan	TL, p. 435; PSRL, vol. 4, p. 97
1391	Bektut	TL, pp. 437-438
1393	Bachtychozja (受洗后称 Onanija), Chidyrchozja (受洗后称 Ozarja), Mamat' chozja (受洗后称 Misail)	TL, p. 443
1398	Temir-Kutluj 汗 , Temir-Aksak (Tamerlane) 之委托人	TL, pp. 448-449
1399	*posoly:* Bekšik, Satkin; Edigej 王子（非成吉思汗系）; Entjak 王子	TL, pp. 450-453
1400	Šadibek 汗 , *posol* Sofrja	TL, p. 454
1405	*posol* kaznačej (财务主管) Mirza	TL, p. 459
1407	Bulat Saltan 汗	TL, p. 465
1408	汗王子嗣 : Bučak, Tegri-Berdij, Altemir, Bulat; knjazi: Machmet, Isup Sjulimen 之子 , Teginja, Šich 之子 , Saraj, Urusach 之子 , Obrjagim, Temirja 之子 , Jakšibij, Edigej 之子 ; Seitjalibij, Burnak, Erikliberdij *posol* Mamait Derbyš	TL, pp. 468-471 PSRL, vol. 15, col. 480
1412	Zeledi Saltan 汗 , Tochtamyš 之子	PSRL, vol. 4, p. 113
1419	Barak	PSRL, vol. 5, p. 262
1424	Kudaidat 汗 , Kogčja *bogatyr*	PSRL, vol. 5, p. 262
1429	Alibaba	PSRL, vol. 18, p. 170

续表

年代	人物	来源
1431	Aidar 王子 , Ulumachmat 汗	PSRL, vol. 18, pp. 170-171
1432	*Ulusdoroga* Min Bulat, Širin 王子 , Tjaginja, *stol'nik* Usein, Teginja 之表兄	PSRL, vol. 18, pp. 171-172
1438	*posoly:* El' berdej, Ulumachmet 汗之女婿 , *daraga* 王子 Usein Saraev, Usen' chozja, Ulumachmat Mamutek Mustafa 之子 , *murza* Achmut, Aziberdej, Mišerovanov	PSRL, vol. 18, p. 192
1445	Ačisan; Bigič, Machmet 之 *posol* *posoly:* Seit Asan, Uteš Kuraiš, Dylchozja, Aidar; 汗王子嗣 :Kaisym, Jagub, Tregob, Berdodat	PSRL, vol. 18, pp. 193-195 PSRL, vol. 18, p. 195 PSRL, vol. 20, p. 260; vol. 23, p. 153
1450	Malyberdejulan	PSRL, vol. 18, p. 206
1451	Mazavša, Kičiachmat 之子 ; Gediger	PSRL, vol. 5, p. 270
1460	Achmat 汗 ; Teisufuj, Temir	PSRL, vol. 5, p. 272
1471	Rjazań *doroga* Temir	PSRL, vol. 18, p. 224
1476	Bočjuka, *Bol'sajaorda* Achmat 汗之 *posol*	PSRL, vol. 18, p. 224

一座已消失的恺加时期埃里温城堡内的清真寺
——19世纪早期的建筑与认同，及伊朗与地方的建筑传统*[①]

马库斯·里特尔（Markus Ritter）著　俞雨森译

写作本文的意图有二。首先，本文重新“发掘”了一座位于埃里温（Yerevan）的清真寺。此寺建立之时，其所处的亚美尼亚（Armenia）乃至南高加索（South Caucasus）的这部分土地尚未归于俄国，仍属伊朗统治范围。这座位于该城古城堡内的清真寺应是伊朗统治时期埃里温最精美的建筑之一，具有高度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不过，20世纪早期，其不幸被毁，随后逐渐被人淡忘。因此，从艺术史的角度，本文将通过史料对其进行重构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提供建造的时间及赞助者的信息。本文试图阐释，从伊朗本地传入的建筑范式（models）和形式（forms）是如何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其他可能的范式（包括位于城堡内的第二座奥斯曼

---

* 本文译自“The Lost Mosque(s) in the Citadel of Qajar Yerevan: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Iranian and Local Tradition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ran and the Caucasus* 13 (2009), pp. 239-280。作者发表本文时任职于奥地利科学院（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Vienna），目前任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伊斯兰艺术史教授。——译者注

① 本文修改自向《伊朗与高加索》（*Iran and the Caucasus*）期刊组织的会议“突厥世界、高加索以及伊朗：互动的文明十字路口”（The Turkic World, the Caucasus, and Iran: Civilisational Crossroads of Interactions）提交的论文，2009年7月10—13日。更早的版本则发表在由欧洲伊朗学会（the Societas Iranologica Europaea）组织的会议“历史进程中的伊朗认同”（Iranian Identitie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上，2005年9月21—24日。

时期的清真寺，如今同样消失）却没能产生影响。

其次，对这座清真寺的研究也回应了另一个问题，即伊斯兰建筑是如何在转向现代时期（modern period）的过程中建构不同的认同——在这个例子中，则是在一个和伊朗文化相关的南高加索地区。由此，我将不会再从艺术中寻找一个延续的“伊朗认同”——不管如何定义这个词。在艺术史写作中，这种强调伊朗文化延续性的视角和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①] 相反，我将只关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一种特定的建筑类型：18 世纪晚期到 19 世纪早期，在恺加早期尚属于伊朗版图的宗教建筑。在一个变革的时期，这个在新王朝统治下的阶段和上述问题有特殊的相关性。[②]

关于对该理论的讨论，埃及学家阿斯曼（J. Assmann）曾提出“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模式。虽然这个模式是基于对前基督教诸文明的考察，但却有意识地涵盖了整个文化史（见阿斯曼 1992[130—140 页］及 1995 年著作；另参见哈布瓦赫［Halbwachs］1967）。他认为，“认同的产生……是基于其他诸种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认知和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而后者则是通过一套共同的象征系统才得以发生的”，他强调这套系统不可避免地提取自并建立于过去（阿斯曼 1992:130 及 132—133）。这些象征则包括建筑和装饰，作为“构建共同记忆的标志物”（阿斯曼 1992:139）。将他的理论运用到建筑（或其他不同类别的视

① 例如，戈达德（Godard）等人将前伊斯兰时期的艺术母题在伊斯兰时期的留存视为一种伊朗民族的延续，一个突出的例子即是伊旺（agvān）这一建筑形式的运用。

② 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尽管“认同”（identity）一词已经被广为使用，但仍很难将它定为一个学术用语（见阿斯曼 / 费里斯 1998b:11—13）。这个术语从其在最初心理学领域扩展应用于人类学和诸社会科学领域的历史性研究，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

觉艺术）领域，作为艺术来源的“过去”包括了先前曾使用过的建筑模式或传统，而采用或拒绝某种特定的模式或传统，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表达，换言之，即认同的塑造。

1. 介绍

1.1 恺加王朝早期的建筑和认同

从历史来看，恺加王朝统治早期，伊历 1200—1264/ 公元 1785—1848，政治上大致趋于新的稳定，同时，一场开始自 18 世纪的分崩离析的社会巨变也已发生。尤其重要的是，此前盘踞伊朗北部的恺加部落再次建立了王朝统治，城市和宗教精英的权力不断扩大，和欧洲的关系空前密切，但此时伊朗已经逐渐沦为弱势一方。[①]

在宗教建筑方面，恺加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法塔赫·阿里·沙（Fath Alī Shāh，伊历 1212—1250/ 公元 1797—1834）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新一轮的建筑营造热潮。[②] 希伦布兰德（R. Hillenbrand）将这一时期的建筑定性为一种“传统和创新的结合体”，并

① 关于早期恺加历史，见汉布里（Hambly）于 1991 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关于恺加统治前的 18 世纪伊朗史，见佩里（Perry）1979 年和艾弗里（Avery）1991 年的研究。

② 很长一段时间来，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没有足够的重视。例如，蒲伯（Pope）和阿克曼（Ackerman）的著作，从 1938—1939 年的出版到 1977 年的第三次增订版都没有涉及萨法维时期之后的艺术和建筑。而近年来兴起的一阵“恺加热”（Qajar-mania），则反其道而行之。有关对此的讨论，见里特尔 2006 年（1—2，4—7 页）及 2008 年（44 页）的著作。2006 年，贝伦斯-阿布塞伊夫（Behrens-Abouseif）和弗诺伊特（Vernoit）合编的论文集讨论了 19 世纪不同地区的伊斯兰艺术和建筑。1995 年，布莱尔 / 布鲁姆（Blair/Bloom）则对土耳其和埃及的情况做了总结（309—314 页）。

带有有意识的“保守态度”。[①]近来的研究则强调其主动和创造性的特征，将这些建筑阐释为对传统的再造（re-adaptation），并根据其不同的赞助传统将两种主要的建筑类别区分开来。[②]

因此，在恺加朝统治阶层赞助的建筑中，特定的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的建筑形式被重新定义出来，并且作为固定的典范在整个伊朗范围内推广。这种庭院式的清真寺，如由法塔赫·阿里·沙在德黑兰和加兹温（Qazvīn）所建的[③]，带有四座纪念碑性的伊旺（ayvān）和一个圆顶，其形制可以追溯至17世纪早期的伊朗皇家清真寺。在受到近两百年的冷落之后，19世纪早期，这种建筑传统重新被采用，且被赋予了新的形式。[④]这些新的建筑独具一格，拥有标准化的建筑元素和形式，可以被视为恺加王朝的皇家和官方建筑风格。[⑤]不过，由城市

① 希伦布兰德 1983：352, 362。斯卡尔斯（Scarce）（1991：911-914）也对这一时期做了概论，并对宫殿建筑及相关题目做了研究（见其 1983、1992 和 2001 年作品）。近来，伊朗国内则出版了相关图录，其中有各建筑物的平面图和照片，其中最重要的是 1996 年至 2004 年间出版的《艺术宝库》（Ganjnāma）。

② 里特尔 2006 和 2008 年的研究，都强调了早期恺加建筑自身的独特性，将它和 19 世纪后半叶的晚期恺加建筑及 17 世纪的萨法维建筑做了区别。

③ 关于这些建筑的情况，见《艺术宝库》1996：181—191；2004：144—151；以及清真寺（Masājid）1999：105 f.；古里兹（Gulrīz）1958：539—548。详细分析，见里特尔 2006：101—118, 731—746, 844—859 和该书图录。

④ 这一类型的建筑最后的例子包括伊斯法罕的沙赫清真寺（Masjid-i Shāh），始建于伊历 1020/ 公元 1611，以及位于法拉赫巴德（Farāhābād）宫殿区的清真寺，建于 1611 年左右。前者的平面图可见《艺术宝库》1996b：161；苏尔德勒—托米勒 / 斯普勒（Sourdel-Thomine/Spuler）1973：348—350，图 79；蒲伯 / 阿克曼 1977：1185—1189。后者可见克莱斯（Kleiss）1982 年做的平面图和描述。稍晚建于伊斯法罕的医师清真寺（Masjid-i Hakīm）建于伊历 1067—1073/ 公元 1656—1662，不过它的四伊旺式的布局规模有所缩小，而且并非皇室赞助建立。

⑤ 关于恺加时期四伊旺式清真寺的发展，见里特尔 2006：90—93, 207—214；关于经学院，见同书 215—216 页；关于皇室传统，见同书 472—486 页。

商业精英和什叶派教法学家（ulamā）赞助的建筑则明显出现了不同的形式上的调整和变革。这些建筑，如伊斯法罕（Isfahan）的圣裔清真寺（Masjid-i Sayyid），采用了某座特定的城市或地区的建筑形制，因此地方的传统清晰可见。这些地方元素和皇室传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足以媲美皇室建筑的不同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风格，有时甚至对后者构成了挑战。

从之前提出的观点看，这些不同的模式或许可以被视为皇室和地方的不同认同（identity）。此种发生于18到19世纪伊朗的建筑形式上的变革，在伊朗的建筑"传统中独具重要性"（希伦布兰德 1983），来自不同传统的元素在此融合。如果我们延伸上述假设，用阿斯曼（1992: 125—126, 163—164, 278）的话说，或者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伊朗建筑在一个变革时期发生的建筑元素的汇集（codification）和标准化（canonisation）。

1.2 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埃里温的建筑传统

在波斯语中，埃里温（Yerevan）这个地名即 īravān，另一个更广义的名称则是 Chukhūr-i Sa'd，后者同时包括了这座城市以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处于伊朗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省。该省包括了亚拉腊平原（Ararat Plain）及周边的南高加索山脉，今天此地已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①] 这个地区自古即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且和周边地区的交往和互动不断。它是中世纪基督教亚美尼亚王国及其后多个公国的一部分，和更偏西南方的地区相比，此地受阿拉伯统治的影响较浅。14 世

---

① 在亚美尼亚编史传统中，此地被认为是"东亚美尼亚"，而"西亚美尼亚"则指位于今天土耳其东部的亚美尼亚人聚地（见布尔努强 [Bournoutian] 1992：10）。我用"南高加索"指临近伊朗至高加索山脉前的地域。常用的"外高加索"（Transcausus 或 Transcaucasia）一词是 19 世纪俄国的产物，不过沿用至今（见布尔努强 1992：70，注 1）。对应的 Transaraxia 一词则是佩里（Perry）于 1979 年提出的，旨在强调以伊朗为中心的视角，不过并未在学术界广泛使用。而济基杨（Zekiyan）教授则使用 Subcaucasia 一词来指这一地区（见济基杨 2008）。

纪末帖木儿（Timur）入侵对此基督教传统的破裂作用甚深。其后，多个土库曼（Turkcoman）部落驻扎于此，直到19世纪，此地一直处于伊朗各伊斯兰政权统治之下。[①]

但凡谈及埃里温地区的建筑传统，最为人熟知和研究的是其中世纪及之后的基督教石结构建筑，其中的典范则是13世纪的圣母教堂（Church of the Mother of God）。[②]不过，埃里温真正成为一座重要城市则是在15世纪之后，因此，几座最著名的教堂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兴建，尽管此时基督徒已经是少数。[③]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建筑同样曾被奉命建造，但留存至今者极少，研究者对此也所知甚少。这一点或许可以佐证一个现象，即当时建立的大规模的伊斯兰建筑较少，不过，相当一部分建筑是在1917年后由于苏联的现代化和反宗教政策才被毁。

在西方文献中，埃里温的伊斯兰统治期被惯称为“波斯汗国”（Persian Khanate），但这一称呼并未出现在波斯语史料中。[④]15世纪时，这座城市成为黑羊王朝（Qārā Quyūnlū）治下亚拉腊地区的中心。16世纪开始，它陷入萨法维（Safavid）和奥斯曼（Ottoman）两大帝国的争斗之中。经过一段短期的奥斯曼统治，阿拔斯一世（Shāh Abbās）以降的伊朗

---

① 见布尔努强1992：1—5以及卡滕霍夫（Kettenhofen）：1998的简述；布尔努强/休森（Hewson）1998；卡纳尔（Canard）1960；卡亨（Cahen）1960；法拉吉（Faroqhi）1995；米尔赞·巴拉（Mirza Bala）1977。

② 蒂埃里（Thierry）1988及库尼奥/布雷恰·法拉塔多契（Cuneo/Breccia Fratadocchi）1988。关于埃里温的基督教建筑，见蒂埃里1988：537—538。

③ 亚美尼亚基督徒的人数，见布尔努强1992: 58。

④ 阿科皮扬（Akopyan）1971年专著的讨论范围涵盖了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Arutyunyan/Asratyan/梅利基扬（Melikyan）1968：14—45，提供了亚美尼亚简史，包括其伊斯兰时期及其建筑物。阿科皮扬1971：491—506，将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伊朗和土耳其统治视为对这一地区的破坏。将它及其他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统治地域称为“汗国”，反映的是俄国乃至其后的亚美尼亚史著的观点，即刻意割裂其与伊朗的关联。在现代土耳其史著中，这个名词也用于指代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的势力范围。

君主将南高加索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①]18 世纪初，埃里温再次被奥斯曼占领，[②] 不过纳迪尔沙（Nādir Shāh）及恺加王朝的第一位君主阿加·穆罕默德·汗（Aghā Muhammad Khān）再次将它及周边地区纳入伊朗统治范围内。之后，沙俄进入高加索，分别在 1804—1813 和 1826—1828 年与伊朗发生了两次战争。在 1813 年签订的《古丽斯坦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Gulīstan）中，伊朗将南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退让给了俄国。埃里温仍然属于恺加王朝的一部分，它的繁荣甚至让挑剔的欧洲旅行者印象深刻，然而，在 1828 年的《土库曼查和约》(the treaty of Turkmānchāy）中，埃里温同样被割让给了沙俄。[③]

已知的 17 至 19 世纪由穆斯林赞助人建造的埃里温建筑绝大多数是砖砌而成，这和伊朗的建筑传统相关，却并未延续亚美尼亚的石砌建筑传统。不过，迄今为止，无论是这些建筑的风格特征，或其与邻近地区的联系，或是建筑自身的语境（context）都尚未被研究。由于埃里温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建筑都已经被毁，现今能用的主要史料只有欧洲旅行者游记中留下的描述和摄影。[④]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恺加时期埃里温的地

---

① 阿科皮扬 1971：496 将埃里温描述为萨法维伊朗的一个管理和政治单位。

② 在 1579—1604 和 1723—1735 年间。

③ 布尔努强 1992(即其 1982 年著作的修订版）提供了关于 19 世纪早期恺加伊朗统治时期最详细的著录。他挑战了早期亚美尼亚作者的观点，正面评价了这一时期，强调俄国征服前埃里温是伊朗内部重要的一部分（另外参见同作者 1976 年对埃里温最后一位恺加总督的讨论）。当时欧洲人也持正面评价，包括杜普雷（Dupre）1819：II，261—263 和哈豪森（Haxthausen）1854：265—266。关于伊朗和俄国的关系，见卡扎姆扎德 1991：317，322—334, 337—338。

④ 此处省略赘述。关于埃里温，见本书第 219 页注释 1 以及蒙特派勒（Dubois de Montpéreux）1839—1843：iII. Vol., pl. 24；迪厄拉富瓦 1887: 19；皮埃蒙特 1972：pl.7；库尼奥 1995：pl. II；关于东亚美尼亚的总体情况，见布尔努强 1992：58。

方志。[1] 有些关于埃里温历史的著作根据 19 世纪欧洲人的游记，对其伊斯兰建筑做了列表和简介。[2] 意大利艺术史家库尼奥（P. Cuneo）（以对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建筑的研究著名）根据这些著作以及一些欧洲旅行者的记录，在近期一篇论文中提供了埃里温 17—19 世纪伊斯兰建筑的描述列表，并对仅存的两座做了较细致的分析：一座名叫蓝色清真寺（Gök Jāmī）的 18 世纪中叶的清真寺，以及 19 世纪晚期的努尔·扎尔清真寺（Masjid-i Nūr Zāl）（库里奥 1995）。

2. 埃里温城堡内消失的清真寺

在此，我将添加三座位于埃里温旧城堡内的清真寺（图 1、2），目前均已消失。他们仅仅在二手文献中被一笔带过，但其中两座可以根据材料进行详细描述。我将重点分析一座带有经学院的清真寺，它建于 18 至 19 世纪的恺加时期，可与伊朗本地的砖砌建筑对比（图 4 至 11）。第二座清真寺是一座 18 世纪的奥斯曼石砌建筑，将在下文中和第一座做对比研究（图 12）。第三座清真寺上雕刻的铭文显示其来自 1796 年，是一座带着宣礼塔的建筑。它可能就是穆罕默德·汗清真寺（the mosque of Muhammad Khān）。这座清真寺曾在一份俄国 19 世纪的清点单中出现（布

---

① 参见布尔努强 1992：290-293 的波斯文件书目，他并未利用恺加晚期的史学家穆罕默德·哈桑·汗（Muhammad Hasan Khān）的地理学辞典中关于埃里温和当地清真寺的两个条目（前一个条目使用了欧洲旅行者的记录，例如 17 世纪的法国旅行家夏尔丹）。2005 年 1 月，我造访了位于德黑兰的外交部档案馆，得知该处藏有关于埃里温清真寺的档案。我没能核对信息，但这些档案很可能和俄国征服之后的情况相关。

② Arutyunyan/Asratyan/ 梅里基扬 1968：31—36，布尔努强 1992：205，其中包括了 19 世纪中期俄国征服亚美尼亚时记录的埃里温各清真寺的名字。

尔努强 1992:205），而且它的名称也和 1784/5—1804/5 埃里温地方长官的名字相符（表 1）。显然，城堡内没有更早的大规模清真寺建筑。[①] 今天，城堡的所有城墙和建筑都已经消失在现代的埃里温城中，甚至在地图上已经难觅曾经的轮廓。[②]

尽管在波斯史料中没有第一座恺加时期清真寺的详细记录，但欧洲旅行者的记录和曾经的摄影图像，包括尚未发表的那些，提供了对这座清真寺进行辨认和重构的机会。一位曾经的亲历者将它断代为 17 世纪晚期的萨法维王朝（迪厄拉富瓦 1887：21）。不过，根据史料的先后分析，结合一批将它和法塔赫·阿里·沙时期联系的材料以及对历史的考虑，最有可能的建造时期应该是在 1814—1826 年之间，即恺加的地方长官侯赛因·汗（Husayn Khān）统治该地的时期（里特尔 2006: 602-605）。他是 19 世纪早期埃里温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我也将在下文中提出，他是这座清真寺最有可能的赞助人。

2.1 重建

史料 就我所知，对这座建筑最早也是最生动的描述来自法国旅行者蒙特派勒（Dubois de Montpéreux），他在 1827 年俄国征服该地区之后不久即造访了这座清真寺。1848 年，俄国民族学家哈尼科夫（N. V. Khanikoff）记录了这座清真寺上的一条铭文。简短的描述也出现在以下几位欧洲人的笔下：菲利皮（De Filippi），他曾于 1862 年陪同一位意大利外交官经过埃里温；1887 年，法国考古学家迪厄拉富瓦（J.

---

① 在萨法维时期，夏尔丹（Chardin 1811, II： 162—170）曾在 1666 年或之后数次应邀造访城堡内的宫殿，但没有在他的游记中提到一座清真寺，塔韦尼耶（Tavernier）1632 年绘制的城堡概图中也没有出现。

② 通过不同时期的地图（从 1837 年至 19 世纪末），消失的过程被清晰地记录下来，见 Arutyunyan/Asratyan/ 梅里基扬 1968:45—48 等处）。

Dieulafoy）；以及 1893/4 年，英国旅行家林奇（H. F. B. Lynch）。最详尽的描述则来自德国艺术史家萨尔（F. Sarre）（参见蒙特派勒 1839—1943, vol. 3：334—336；哈尼科夫 1862：73；皮埃蒙特（Piemonese ）1972：273 [菲利皮]；迪厄拉富瓦 1887：21；林奇 1901, I：217；萨尔 1901—1910：52-53）。他赠与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for Islamic Art in Berlin) 的六块瓷砖是这座建筑目前唯一的物质遗存（萨尔 1901 : fig. 52）。[①]

最早的图像史料来自蒙特派勒和迪厄拉富瓦两人书中的版画（图 4），描绘了正对大殿的庭院一景。其场景是大致正确的，但个别细节处存在偏差，需要和其他证据对照使用。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两幅质量最佳的照片中，一幅尚未被公开发表，来自一位只知其名为 Mr. Shervinski 的先生，收藏在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图 5），另一幅已经由库里奥发表却被错误地推断归属，目前收藏于亚美尼亚顿斯科伊修道院（the Armenian Donskoy Monastery)。[②] 萨尔也留下了数量最大的照片资料，本文将公布其中一些之前尚未为人所知的照片（图 7 至 11）。1862 年由蒙塔博内（Luigi Montabone）所拍的照片时间最早，从远处拍摄了高于城堡城墙的穹顶。

地点和鉴定　关于这座清真寺的具体位置，可以从两张俄国绘制的城堡地图上得知，它们分别制作于征服该城的 1827 年及其 10 年之后（图 1、2）。19 世纪早期，这座城堡被认为是南高加索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它的

---

① 第七块瓷砖（同书图 56）同样属于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现外借给柏林达雷姆的民俗博物馆（the Museum für Volkskunde at Berlin-Dahlem）。其上有一条铭文装饰，不过现在仍不确定它是否的确曾属于这座建筑。

② 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slamische Kunst in Berlin），archive no. 10687a；顿斯科伊（Donskoy Monastyr），archive；库尼奥 1995: pl. II，错误地断为 "Moschea Zal Khane"。

建造则可追溯至16世纪，由萨法维或奥斯曼人修建。[①]17世纪时，它被描述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城，但不得而知其具体的结构布局。[②]在两张19世纪的地图上，这座城堡占据了城南相当大的地盘，并由两道城墙护卫。西面，位于陡峭山巅，对着埃里温河（Iravān Chāyī）的则是恺加地方长官们的府邸，坐拥美妙的乡村景色，正如一幅1891年根据一张照片刻制的版画上显示的那样（图3）。[③]

如前所说，城堡内有几座不同时期的清真寺。二手文献中时有混淆，但仔细阅读旅行者的记录，可以得知本文讨论的这座恺加早期的清真寺临近府邸的西面（图2，标号1）。[④]在1837年的地图上，城堡内的各建筑轮廓可辨，可以看出这座清真寺的庭院式平面图（图2，标号2）。主轴朝向南面，正是埃里温吉布拉的方向。从这个方向可以看到平面图中的一个房间，正是1891年的插图（图3）中出现的圆顶建筑。这一点也和19世纪晚期照片中的建筑吻合，只是后者使用了不同的名称。

建造廊柱、墙壁以及拱顶的主要材料是砖。

建筑和装饰　欧洲旅行者注意到这座清真寺的瓷砖装饰十分华丽，但没有提及这座建筑本身及其布局。雕版插图和照片可以提供这些方面及其

---

① 据说是萨法维王朝的沙·伊斯马仪（Shāh Ismāīl，1501—1524）的一位将军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堡垒（库尼奥1995：75，87，注释6，但没有提供出处）。Arutyunyan/Asratyan/梅利基扬，1968：18，23提出这座城堡是奥斯曼人建于1582—1583年，即苏丹穆拉德三世（Sultan Murad III）征服后由将军法尔哈德帕夏（Ferhad Paşa）下令建造。

② 夏尔丹，1811，II：162—163，他曾在1672—1673年间到过此地。其他17世纪的史料包括1655年塔维尼耶和1647年爱维亚·瑟勒比的记录。对这座城市的两份全景式图景，包括其城堡，参见Arutyunyan/Asratyan/梅利基扬，1968：图17、18。

③ 尚特雷（Chantre）1891：285；Arutyunyan/Asratyan/梅利基扬1968：图29。

④ 例如，布尔努强1992：41提供的城堡概图并未标示出这座伊朗清真寺的位置；当地所谓的遗迹有误。

装饰的资料。图像资料显示，在一个长方形的庭院三面，各围绕着一座由柱子组成的单层拱廊（图4、5）。[①]在庭院的第四面，即正对吉布拉的位置，一座带有圆顶的礼拜大殿拔地而起，它的双层形式的正面墙装饰华丽。庭院的平面结构是十字式的。两侧的拱廊形成了壁龛，而中间的那座则以檐口加以突出。在一张东侧的照片上（库里奥 1995:pl. II），中间的拱廊形成了一条通道，可能是引向一个侧门。根据迪厄拉富瓦的描述，其他的壁龛是和一个附属的经学院的宿舍相连的。在照片上，圆顶礼拜大殿对面的北侧建筑情况不得而知，但 1837 年的沙俄地图（图 2）显示它深于东西两侧，说明它的布局另有不同。中间被强调的区域应该是类似伊旺或者入口之类的建筑。如照片所示（Dienlafoy, ibid.; 另见 Dubois de Montprereux 1839-1843: ill. Vol., pl. 24），庭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

廊柱、墙壁以及拱顶所用的主要材料是砖。不过，围绕庭院的房间的基座则使用石料，侧檐和圆顶的枕梁可能也使用了这一材料。以照片中一位立者的高度（图 5）（见萨尔 1901—1910：图 53）作为大致的基准，可以推测得知庭院的宽度约为 29 米。根据当时清真寺建筑的长宽比为 3 : 2，[②]可知庭院长度为 43.50 米。

这座建筑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其圆顶大殿的规划。其双层高的建筑正面，中间是一座由半圆的拱壁合成的巨大的入口拱廊。拱廊后即高耸的圆顶大殿，毗连两个高度稍小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向其侧边的房间开口，形成了五个房间并排一行的结构（图 8、9）。内部的高度和装饰突出了中间三个房间。在圆顶大殿内，拱廊和帆拱上是一圈瓷砖铭文，铭文位于圆顶之

① 相关的两张照片上可见庭院的景色，见本书第 201 页注释 2. 另参见蒙特派勒 1839—1843： ill. Vol., pl. 24.

② 例如，埃里温的蓝色清真寺以及下文将讨论的加兹温的显贵经学院。

下，其分隔处是一圈彩砖组成的图案。圆顶大殿的外部，圆顶位于鼓形墙壁之上，壁上共有八扇窗，圆顶外部通体由琉璃瓷砖装饰而成（图 6、7）。

面向庭院的大殿正面和不同的房间相连，各房间则位于一组相连的拱形墙面之后。正面墙皆由多彩的植物纹样的瓷砖装饰（图 6、7）。

铭文　在建筑物正面，铭文装饰占据了醒目的位置。在上下拱廊的上方各有一行带状铭文，以两列旋涡装饰组成，其上是用纳斯塔里克字体（nasta'līq）书写的献给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的七行式波斯文挽歌（marthīya），作者是 17 世纪的诗人穆赫塔沙姆 · 卡沙尼（Muhtasham-i Kāshānī）。[①] 上文提到的六块藏于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瓷砖肯定来自于最初铭文下方的装饰板，最有可能属于入口拱廊左侧的围栏，萨尔拍摄的几张照片上的装饰板就是空白的。

另一条苏鲁斯体（thulth）的铭文则围绕着入口门框，根据照片（图 6），可辨认出其内容为《古兰经》第 62 章，第 1—11 节。[②] 这条以及前一条铭文的最末应该包括年代信息，但照片拍摄时已经消失不见。

第三条铭文位于圆顶内部的底部，其内容是《古兰经》第 76 章（图 8）。[③] 经句末有书法家的签名，但不甚清晰，难以辨认："katabahu, Abbās (或 , Azīz)。"

在米哈拉布上方有一块长方形的壁板，由瓷砖装饰围绕，但在 1897 年的照片（图 11）上已经消失不见，原来可能是一块石碑，其上应存在第四条铭文。

---

① 哈尼科夫 1862：73 注意到了这首诗歌的铭文，但没有提供具体位置。在旧照片上（图 7），这首诗歌恰好是大殿正面的铭文内容。

② 第 62 章即"聚礼（主麻）"章，共计 11 节。——译者注

③ 第 76 章即"人（印萨尼）"章，共计 31 节。——译者注

2.2 比较研究：当地的和伊朗的来源

和伊朗建筑相比，这座建筑的类型显得颇为怪异。它的确属于轴线对称的庭院式清真寺类别，但其规划布局，以及其圆顶大殿和横向的房间附属于大厅的方式都迥异于（标准的）带圆顶大殿的四伊旺式清真寺（例如在德黑兰和加兹温的两座皇家清真寺）和伊朗别的清真寺样式。[①]我们将在埃里温本地寻找其原型。另一方面，建筑的风格特征和装饰明显更加伊朗式，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埃里温本地的先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座清真寺和另一座位于城堡内的更早期的清真寺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系。后者位于目力所及的邻近位置。英国人莫里尔（J. J. Morier）（1818:319）在1814年提到了这座清真寺："一座极佳的清真寺，由突厥人建造。它以砖、石筑成，拥有一座严饰的拱顶，醒目地位于（城堡的）中心。"根据传说，这必然就是那座在奥斯曼占领时期由总督雷杰普帕夏（Recep Paşa）建造的清真寺。[②]这座清真寺现在已彻底被毁，不过依靠莫里尔的描述，我们可以在一张18世纪的城堡版画（从西北方向）和一张19世纪的记录沙俄围城的图片（从东南方向）上辨认出这座清真寺（图12）。[③]位于中心的建筑[④]是一个带有巨大圆顶的立方体构造，四个较小的圆顶和一座铅笔状的宣礼塔则位

---

① 例如，德黑兰的哈只·拉吉布·阿里清真寺及经学院（the Masjid and Madrasa-i Hājj Rajab'Ali）（《艺术宝库》1998a：127；其平面图，见里特尔2005：图195a）

② Arutyunyan/Asratyan/梅利基扬 1968：32。另见法拉吉 1995：489a 将 Morier 描述的那座建筑和本文讨论的蒙特派勒曾提及的清真寺混为一谈（1839—1843；vol. 3: 334—336）。

③ G. Sergeyevich 于1796年所做的版画，复见于布尔努强/休森 1998：547。沙俄围城的照片则仅见 Nafīsī 1965，II：142-143 的复制版，不知其拍摄者及去向。

④ 1827年的俄国地图（Arutyunyan/Asratyan/梅利基扬 1968：25）标示出了一座清真寺，大致位于城堡中心。

于角落位置（图 13）。这符合 18 世纪奥斯曼清真寺式样，这种式样被广泛地用于安纳托利亚诸省，例如内夫谢希尔（Nevşehir）的易卜拉欣帕夏清真寺（Ibrahim Paşa Camii）。规模较小的类似清真寺离埃里温仅仅 70 公里，就在今天土耳其东部的多乌巴亚泽特（Doğubeyazit）的一座石砌清真寺（图 14）。这座建筑是奥斯曼总督伊斯哈克帕夏（Ishak Paşa）建造的府邸的一部分。[①] 据莫里尔所说，埃里温的这座奥斯曼时期的清真寺（在当时）尽管仍然可以使用，但却被恺加王朝的总督们彻底遗忘："现在它仅仅被当作一个储藏室"。[②]

本文讨论的这座恺加早期的清真寺在形制上和埃里温当地的聚礼清真寺（图 15 至 19）较为一致。后者在当地的突厥语中被称为 Gök Jāmi（蓝色清真寺），在波斯语中则被称为礼拜五清真寺（Masjid-i Jum'a）或城市清真寺（Jāmi'-i Shahr）。根据清真寺内主米哈拉布（mihrāb）上的铭文（图 18），这座清真寺是在当地总督侯赛因・阿里・汗（Husayn Alī Khān，1762—1783）的赞助下于伊历 1182/ 公元 1767—1768 年建成。伊历 1305/ 公元 1887—1888 年，清真寺重新装饰了一次瓷砖，说明直到 19 世纪晚期，沙俄征服 60 年后，埃里温仍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穆斯林

---

① 伊斯哈克帕夏是彻尔德尔奥卢（Çıldırglu）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曾以奥斯曼之名统治了部分格鲁吉亚。一般认为，这座府邸由他的父亲始建，而大部分则由他本人在 1784 年竣工，后由他的儿子加以扩建。私人房间入口处的一条铭文显示年份为 1780 年（古德温 [Goodwin]1971：405、491、注释 73—74；另见宾格尔 [Bingöl] 1982 年的专著）。贝林格里（Bellingeri）/ 库拉托拉（Curatola）1998 将它和当地的亚美尼亚建筑做了比较。和伊斯哈克帕夏相关的亚美尼亚史料，见罗塔（Rota）1993。这个家族的另一支则统治了奥斯曼帝国的彻尔德尔省（*eyalet*）（见乌尔西努 Ursinus 2000）。

② 根据蒙特派勒 1839—1843，III:334 以及哈豪森（Haxthausen）1856，I：237，第二座清真寺随后被改造为一座俄国东正教教堂，而本文所讨论的清真寺则被挪用作为一个兵器库。根据 Arutyunyan/Asratyan/ 梅利基扬 1968：32，在清真寺原址上曾建了一座教堂。

群体。[①] 今天，这座清真寺是埃里温唯一幸存的建于伊朗统治时期的建筑。[②] 其平面规划（图 17）和正对大殿的庭院（图 16），和位于城堡的恺加清真寺内相似。其礼拜大殿的设计，同样是三个相连的房间连成一排，外加两侧的耳室。穿过入口拱廊，到达礼拜大殿，毗连两个高度稍低的圆顶或穹窿式的拱顶。此处的耳室是分隔开的，不过在城堡的清真寺，耳室相通，扩充了大殿的室内空间。庭院长 70 米，宽 47 米，同样是十字式的结构。其他的拱廊则开向附属的经学院的宿舍。北翼则又不同，由方形房间组成，中有一座伊旺建筑。我们可以通过它重新构建城堡清真寺的北翼。

旅行家蒙塔派瑞（1839—1843, III:346）已经注意到了城堡的恺加早期的清真寺和更老的蓝色清真寺之间的相似之处。在埃里温，其他的清真寺和经学院都已被毁，其中一些建于 17 世纪，根据 19 世纪的观察者的记

---

① 穆罕默德·哈桑·汗 1989(1879)：2002；Arutyunyan/Asratyan/ 梅利基扬 1968：31，图 22—24, 56；皮埃蒙特 1972: 272，图 6；库尼奥 1995: 80—83；见里特尔 2006：364-365，注释 4—6，对相关图像和文字史料的记录及描述。关于年代有不同说法。根据 Arutyunyan/Asratyan/ 梅利基扬 1968：31，这座建筑始建于 1760 年，竣工于 1764—1768 年，而布尔努强 / 休森 1998：547b 则将其建造年代断为 1776 年。关于这座建筑的铭文，仍缺乏可靠资料。近来，设拉齐（Shīrāzī）2000 重新对这座建筑及其铭文做了记录，但在我写作时没能读到他的研究。至于对这座建筑最新的描述，参见胡维扬（Huvīyān）2007。2009 年 7 月，我参观了这座清真寺，并且在米哈拉布石刻铭文的底部发现了精确的断代年份——伊历 1187，因此得到了这座建筑完成的最晚年代（terminus ante quem）（图 18）。礼拜大殿入口墙上的一条较长的三层叠加的瓷砖铭文如今已轶，但仍可见于这座清真寺的一张旧照片上（图 17）。这条铭文随后被另外的瓷砖装饰所取代，其上的年代为伊历 1305 年（关于这部分，见库尼奥 1995：82，图 IVc）。在苏联时期，这座建筑被改用为这座城市的博物馆。1996—1999 年，它被大规模翻新。

② 另外唯一一座被认为幸存至今的建筑是 1889 年沙俄统治时期的努尔·扎尔清真寺（Masjid-i Nūr Zāl）。

录，这些建筑的格局颇类似蓝色清真寺。[1]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蓝色清真寺的格局代表了一种埃里温当地的独特类型，而城堡内的19世纪的清真寺则采用了这种类型。[2]

与伊朗传统相关的风格特征 不过，这座新的建筑在风格上明显对伊朗的建筑传统有所继承，也和同时期伊朗的建筑形式有所呼应。在蓝色清真寺，圆顶大殿如同一堆冗重的建筑块堆砌在造型怪异的正面墙结构上，恰好反映出室内房间的构造。相反，城堡清真寺的大殿正面则优雅地连贯，双层拱廊结构连成一体。尽管建筑本身规模更小，但在视觉效果上则颇具纪念碑性，更令人印象深刻。

带双层拱廊的正面墙这一建筑形式，可以追溯到帖木儿时期建筑，在萨法维时期尤其常见。在这两个时期，以伊旺形式构成的大门入口比两边的建筑更高。[3]而入口彻底和两边相平，形成一条延续的屋顶轮廓线，仅仅是恺加早期建筑的特征，例如萨南达季的善行清真寺及经学院（Dār al-Ihsān mosque and madrasa at Sanandaj）的礼拜大殿，库姆的翻修的主麻清真寺，或下文将讨论的加兹温的显贵经学院。[4]和蓝色清真寺相比，城堡清真寺的建筑正面更接近同时期的伊朗建筑。类似的现象也可以从瓷砖装饰上看到，尽管从目前存世的样本看，其质量显得亚于伊朗中部的瓷砖。

---

① 根据林奇 1901 I：214-215，萨法维晚期的城市清真寺（Shahr Jāmi）和哈只·纳斯鲁拉·巴尔格（Hājjī Nasrullāh Bayg）清真寺即和蓝色清真寺有类似之处。Arutyunyan/Asratyan/梅利基扬 1968：32 将上述建筑列为同一类型。

② 这个格局在南高加索的起源及传布仍未有定论（里特尔 2006：384—387）。

③ 例如马什哈德的高哈尔·沙德清真寺，伊斯法罕的国王清真寺及苏丹侯赛因经学院（Pope/Ackerman 1997: 图 428—430；464, 468；497, 501A）。

④ 关于在萨南达季的这座建筑，见《艺术宝库》2004b: 图 179 以及里特尔 2006: 图 88a；关于库姆的建筑，见同书图 84a。

同时，有些建筑特征则显得过时，或者说复古。正面的圆柱形扶壁无疑是受到帖木儿时期建筑的影响，例如马什哈德的高哈尔·沙德清真寺（the Gawhar Shad mosque）主要的伊旺两侧的宣礼塔（蒲伯 / 阿克曼 1977 : pl. 430）。晚期萨法维和早期恺加建筑则摒弃了这种类似雕塑一般的元素，其宣礼塔往往从檐口开始建立。[①] 入口门框上的倒 U 形铭文装饰在 19 世纪建筑中十分罕见，但在萨法维和帖木儿时期的宗教建筑中则是一个常见的特征，而角落处每个尾字母相互交叉的细节处理也让人联想起帖木儿时期的先例。[②]

一座位于加兹温的相关的建筑　令人吃惊的是，一座位于伊朗中北部城市加兹温的同时期的建筑（图 20 至 22），尽管和埃里温相距甚远，却在可以和这座埃里温的恺加早期的清真寺及其建筑类型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加兹温的这座建筑的两位赞助人也和埃里温有着关联，下文将对此予以讨论。这座建筑坐落于迪马杰（Dīmaj）区，被称为显贵经学院（Madrasa-i Sardār），曾经可能具有清真寺功能。[③] 根据一条铭文，它被断代为伊历 1231/ 公元 1815 年建立，而另一部分装饰内容则提供了另一个日期伊历 1233/ 公元 1817 年（里特尔 2006：756；古里兹 1958：568—569）。

经学院围绕着一个长宽为 33 × 22 米的庭院而建，它的规划（图 20）

---

① 例如，在萨法维时期的伊斯法罕，国王清真寺和苏丹侯赛因经学院的入口及其圆顶大殿（见蒲伯 / 阿克曼 1997: 图 428—430；464, 465, 503）。

② 此类框形铭文可见于伊斯法罕的萨法维建筑的入口和马什哈德高哈尔·沙德清真寺的吉布拉伊旺（qibla-ayvān）的入口。恺加早期建筑中的一个特例是伊斯法罕的圣裔清真寺（Masjid-i Sayyid）；见《艺术宝库》1996b : fig. 86, 89。这种尾字母的位置处理在帖木儿时期建筑中屡见不鲜，例如，在马什哈德、齐亚拉特加（Ziyāratgāh）和阿尔达比尔（Ardabīl）（见戈隆贝克 [Golombek]/ 威尔伯 [Wilber] 1988 : pls. 245, 307, 328）。

③ 更细致的研究，见里特尔 2006：371—382，746—758，pls.75—81，152a，156a，185。

异于当时恺加早期经学院的标准类型。三处庞大的凸起建筑组成了大殿，在类型上奇异地近似于13世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经学院，[①] 但在18至19世纪的建筑中，它更像是埃里温类型的一个较小的变体。位于中间的凸起建筑相当于一个圆顶大殿，朝向一个巨大的正门拱廊。圆顶外部高度较小，且缺少支持圆顶的鼓形墙壁，不过其上方的一个大而高耸的天窗十分醒目（图22）。[②] 两个毗连的房间由圆顶式拱顶构成。此外，不再有别的房间，而在埃里温的蓝色清真寺的大殿内这部分建筑仍占据了一定地位，到了其后的城堡清真寺则已经不再重要。剩余的三个房间由拱廊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空旷的一分为三的空间结构（图22）。北翼则由一列方形的房间（图20）组成，其布局接近埃里温的蓝色清真寺。它颇为特别地使用了一个带有门廊的面向中轴线的入口，而非常见的伊旺，这一点接近埃里温恺加城堡内的清真寺原貌。

和埃里温的两处建筑不同的是，加兹温经学院除大殿以外的三侧均是双层建筑。从功能上看，这可能是为了提供较多的住宿房间，这对一个经学院来说是很必要的；从建筑美学看，这样的安排使得建筑表面具有了统一的高度和外观。如此安排也符合一贯的建筑传统，包括双层的庭院两翼，正对横轴线的楼梯，入口则沿纵轴线直接引入内部庭院，伊斯法罕的萨法维经学院和其他位于伊朗中部的建筑都遵循了这一传统。[③]

---

① 例证见埃廷豪森（Ettinghausen）/（Grabar）/ 詹金斯—麦地那（Jenkins-Madina）2001: figs. 363，365，367，368。

② 在这一时期的恺加聚礼清真寺中，不同类型的天窗用来突出圆顶殿堂的外部，例如位于布鲁吉尔德（Burūjird）和塞姆南（Simnān）两地的国王清真寺。同样的圆窗圆顶的类型也可见于德黑兰的国王清真寺；圆顶本身已经不复最初的外观（见里特尔 2006：pls. 6c，7a，99b，117b）。

③ 例如伊斯法罕的曾祖经学院（madrasa-i Jadda-i Buzurg），（Kāsagarān），（Nīmāvard）（见高贝 [Gaube]/ 沃斯 [Wirth] 1978：fig. 50 [平面图]，pls. 31B, 32A；后两座建筑的平面图，里特尔 2006：pls. 201 e-f）。

通过建筑和装饰特征的对比，可以发现它和同时期埃里温城堡的清真寺有着直接的关联。例如，萨尔道尔经学院的建筑表面同样采用了五轴双层的效果，尽管这和其后的房间数量或布局并无关系。和埃里温的例子一样，此处同样采用七行体诗歌作为主要的瓷砖铭文，遍布于庭院建筑表面。对比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注意到一种旧式的建筑风格，因为当时恺加早期经学院的标准类型已经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后者基本特征如下：庭院宽广，其表面为单层结构，基于四伊旺原则而确立的十字形总体规划，以及一个带左右两道弯曲入口的大门——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在此出现。

2.3 埃里温和加兹温的赞助人

两座恺加早期的清真寺赞助人的背景解释了两者在建筑形式上的关联（表 1）。加兹温萨尔道尔清真寺入口处的铭文显示，这座建筑的赞助人是侯赛因・汗（Husayn Khān）和哈桑・汗（Hasan Khān）兄弟，两人被称为"将军（sardār）"——即清真寺名的由来——"统领（amīr）"以及"主帅（sipahsālār）"。

根据巴姆达德（Bāmdād）的人物传略辞典，这对兄弟属于恺加部落的一支，且是皇室的高层人员。两人的首名均是穆罕默德。在欧洲人的记录中，第一位被称为侯赛因・古力・汗（Husayn Qulī Khān）。他在军队和政府中资历极深。自伊历 1221/ 公元 1806—1807 年至沙俄征服，他一直是埃里温的地方长官。他的兄弟哈桑・汗，也被叫作汗・巴巴・汗（Khān Bābā Khān），则是军队的副指挥官；他的名字也明确地出现在伊朗和俄国签订的《土库曼查和约》中。侯赛因・汗的一位姐妹嫁给了法塔赫・阿里・沙，而他的一个女儿也嫁给了继承者阿拔斯・米尔咱（'Abbās Mīrzā）（见巴姆达德 1968, I:401—404，329—333；布尔努强 1976；1992；1998，2005；巴扬尼 [Bayānī] 2009；皮埃蒙特 1972: 281—282）。

根据记录，侯赛因"在加兹温、埃里温和卡尔巴拉（Karbalā）建了

慈善工程，如清真寺和大型蓄水库”（巴姆达德同书，404）。在加兹温，总督经学院，当地的两个蓄水库（āb-anbār）——其中一个就位于经学院前，另一个在别处——以及一个浴室（hammām）上的铭文都使用了他们的称号——萨尔道尔。[①] 根据一份伊历1233年主马达·敖外鲁月（5月）/公元1818年3月的档案，兄弟俩甚至于早先的伊历1180/公元1766年资助建造了伊拉克卡尔巴拉什叶派圣墓的一座经学院，同时也提及埃里温省（“Chukhūr-i Sa’d-i Iravān”）二十四个以他们的波斯和突厥名字命名的村庄产业。在德黑兰，他们修筑了一条水道（qanāt），且在今天的巴哈里斯坦（Bahāristān）一带拥有一座花园（bāgh）（参见卡泽鲁尼 [Kāzirūnī] 2000:62—63, 64—71; 关于德黑兰的花园，见 Sa`īdī Sīrjānī 1989: 480）。至此，仍未有关于史料可以提供在埃里温的宗教建筑方面的投入的信息。

埃里温城堡清真寺的铭文对其赞助人只字未提。不能彻底排除它就是俄国人统计中提到的那座由穆罕默德·汗——即1784/5至1804/5年的地方长官——赞助的清真寺，如果是这样，则它的年代应在恺加王朝的最早期。但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莫瑞尔（Morier）在1814年只提到了那座奥斯曼清真寺；很难想象他会没有注意到这座恺加清真寺的耀眼的穹顶和琉璃砖。19世纪的旅行家林奇（1901, I:217）记录了一个传闻，即“它是在法特赫·阿里·沙时期被建的，被称为阿拔斯·米尔咱主麻清真寺（Abbas Mirza Jami）”。这就将这座清真寺和阿拔斯·米尔咱（Abbās Mīrzā）——法特赫·阿里·沙的儿子及王储——联系了起来。阿拔斯·米尔咱驻在大不里士（Tabrīz），但他几乎没有可能是这座埃里温清真寺的赞助人。即使在他自己的驻地，他也没有兴建任何值得注意

① 古里兹1958：278—279，288。第二座蓄水库现在仍然位于雷伊路（Rāh-i Rayy），穆希里（Mushīrī）巷，靠近火车站街。两座蓄水库都建于伊历1229/公元1813。

的建筑。[①]一个更有可能的赞助人应该是自 1807—1827 年任职埃里温的侯赛因·汗，正是他 1814—1826 年和俄国的第二次战争之前的某段时间建了这座清真寺。侯赛因·汗和哈桑汗在加兹温的经学院与埃里温清真寺之间的相似之处可以证明这一推断。伊历 1235/ 公元 1819 年，侯赛因·汗也负责修缮或改建了紧挨清真寺的总督府邸，在河对岸，一座府邸花园同样是由他赞助建造（里特尔 2006: 391—392）。府邸的铭文赞扬了法特赫·阿里·沙和他自己的功德，而府内的一幅壁画则描述了侯赛因、他的兄弟以及皇帝的形象。[②]

另一项有力的证据是侯赛因·汗本人的背景。在布尔努强（Bournoutian）对埃里温的研究中，侯赛因是一位出身于精英阶层的典型"恺加长官"。他大约出生于伊历 1155/ 公元 1742 年，在法特赫·阿里·沙还是法尔斯省（Fārs）的总督时，他就已经是后者的随从。伊历 1217/ 公元 1802 年，他成了尼沙普尔（Nīshāpur）和呼罗珊（Khurāsān）的总督。1807 年，即第一次对俄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埃里温的总督，直到埃里温和亚美尼亚落入沙俄之手。即便如此，他仍备受荣宠，继续任呼罗珊和巴赫提亚尔（Bakhtiyār）两省总督，直到他于伊历 1245/ 公元 1829 年去世。

关于侯赛因·汗的确切世袭，史料之间互相矛盾。根据巴姆达德编辑

---

① 唯一知道的由阿拔斯·米尔咱下令修建的是位于大不里士的（Masjid-i Shāhzāda）。这座建筑最晚开始建于 1926—1928 年，但从未完成。另有说法则认为它是在随后毁坏。他的儿子马赫迪·古力·米尔咱（Mahdī Qūlī Mīrzā）继续或重建了这座建筑（见卡兰格 [Kārang] 1973: 352—356，穆罕默德·哈桑·汗 [1879] 1989: 558）。

② 哈尼科夫 1862: 73 报告了这条铭文，并且提到这座府邸建于伊历 1235/ 公元 1819。如果我们相信 Arutyunyan/Asratyan/ 梅利基扬 1968: 32 以及布尔努强 1992: 44（他提出府邸是 1798 年完成）给出的未被史料证实的论断，则他所见的铭文应该是经过修改的。关于其壁画，见 Dubois de Montpreureux 1839-43: ill. Vol., pl. 25-26；另见 Adle 1996: 347-365。

的一份不知名的史料，侯赛因・汗和他的兄弟名字的后缀（nisba）既是埃里温尼（Iravānī），也是加兹温尼（Qazvīnī），但他们的父亲是一位曾统治过埃里温的名叫穆罕默德・汗・恺加・埃里温尼（Muhammad Khān Qājār-i Iravānī）的人。[①] 布尔努强将他和那位统治埃里温至 1804/5 年的人区别开来，但没有对后者加以考证。[②] 然而，根据恺加晚期阿提玛德・苏丹那（I'timādas-Saltana）（1897）的地理志对埃里温清真寺的记载，这位父亲的名字稍有不同，而两兄弟的世系也更清楚了："这座清真寺属于侯赛因・阿里・汗（Husayn Alī Khān）赞助的建筑的一部分，他是埃里温的总督，是穆罕默德・哈桑・汗・萨尔道尔（Muhammad Hasan Khān Sardār）的父亲，穆罕默德・哈桑・汗的祖父。"（Muhammad Hasan Khān 1989:2002）这后一个名字，如我们所见，指的是侯赛因・汗的兄弟。因此，根据这则史料，这对兄弟可能正是总督穆罕默德・哈桑・汗的儿子，后者即 1784/5—1804/5 年的那位穆罕默德・汗，同时也是侯赛因・阿里・汗——即 1762—1783 年埃里温的统治者——的孙子。因此，他们和当代的萨尔道

① 巴姆达德 1968, III:271 在他的条目"埃里温的穆罕默德・汗・古瓦卢・恺加・埃里温尼（Muhammad Khān Quvanlū Qājār-i Iravānī）中提到，他曾在从伊历 1212/ 公元 1797—1798 年开始（再一次）担任埃里温的总督，不过并没有将这个人和两兄弟的父亲联系起来，也没有对他的世系提供信息。

② 布尔努强 1982:14 认为这位父亲应该是"某位在 18 世纪任埃里温统领的穆罕默德・汗"，同书 10—12 页则将任期始于 18 世纪，终于 1804 年的埃里温总督穆罕默德・汗・恺加当成另一个人。1992 年的研究（第 14—15, 17 页）做了类似的判断，但给出的总督名字是穆罕默德・侯赛因・汗，而他的任期终于 1805 年。但他 1998 年（530 页）和 2005 年的研究却又将总督的名字改回了穆罕默德・汗。这位父亲不可能是"埃里温的穆罕默德・汗・恺加"，后者曾是纳迪尔沙（Nadir Shah）的刺客，1747 在被马什哈德被处决（佩里 1979：第 3—4 页），否则，他的儿子哈桑・汗在 1855 年去世的时候将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年纪。

尔–埃里温尼（Sardārī-Iravānī）家族应属于同一世系，[①] 不过这仍有待进一步历史研究。

不过，上述1818年的捐献档案却让事情变得复杂。关于这对兄弟的父亲，它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将其家族和加兹温联系了起来："……两位总督（sardārān）……穆罕默德·侯赛因·哈纳和穆罕默德·哈桑·哈纳……都是加兹温的巴赫拉姆·古利·巴伊格·恺加（Bahrām Qulī Bayg Qājār-i Qazvīn）之子。"[②] 这份文书具有档案的性质，而且写于这对兄弟在世的时候，因此准确性较高。因此，上述埃里温的穆罕默德·哈桑·汗即是其父亲的说法，显得颇令人怀疑。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侯赛因·汗并非一个空降至埃里温的"管理者"，相反，他出身于一个当地的恺加世袭家族。如果苏勒塔那是正确的，那么侯赛因·汗延续了至晚自1762年开始的一项政治传统，即由一支恺加部落或家族来统治埃里温。因此，总督一职几乎是世袭的，尽管偶有例外。[③] 正因如此，在沙俄南下的关键时期，在埃里温

---

① 埃米尔–阿里·萨尔道尔–埃里温尼（Amir-Ali Sardari-Iravani）先生（如今居于德国科隆）好心地向我讲述了他对家族传统的所知，其中一部分来源于尚未公布的档案（2009年9月18—21日的电邮）。埃里温总督的任职顺序如下：1762—1783埃里温的侯赛因·阿里·汗·恺加，1783—1784古拉姆·阿里·汗（前任之子），1785—1805和1806—1807穆罕默德·汗·恺加（前任之弟，侯赛因·阿里·汗之子），1805—1806马赫迪·古力·汗（此人不属于这个家族）取而代之，1807—1827侯赛因·汗（穆罕默德·汗之子）。一份1864年的瓦克夫档案（德黑兰 Sāzmān-i Qwaqāf no.148）提到哈桑·汗·萨尔道尔–埃里温尼（这个名字和侯赛因·汗的兄弟吻合）向他的（他们的）父亲穆罕默德·汗·恺加–埃里温尼的陵墓捐献了一份在马什哈德巴扎的财产。

② Kāzirūnī 2000:66. 关于这对兄弟的世袭，不同史料间有所冲突，作者并未做评。

③ 布尔努强（1998:508-509, 521, 528, 530, 535）提供的总督人名列表是基于俄文和亚美尼亚文史料，列出如下：1762—1783侯赛因·阿里·汗，1784—1805穆罕默德·汗·恺加（中有间断），1796—1797阿里·古力·汗（阿加·穆罕默德·汗之兄

当地有势可依的侯赛因・汗被选为总督，并在这个位子上坐了超乎寻常的时间（见表 1）。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埃里温城堡的清真寺建筑形式，以及其赞助人背景的研究，我们可以就“建筑传统如何塑造认同”这一议题得出一些结论。

从艺术史的角度，根据已知的关于埃里温城堡内的这座清真寺的信息及将其和其他同时期建筑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埃里温当地的建筑传统和建筑类型通过和恺加伊朗传统的融合和妥协而继续得以保存。在布局规划方面，这座建筑是以埃里温的一座更早期的重要清真寺——蓝色清真寺——为原型，后者则代表了埃里温当地使用的一种更广泛的建筑传统。就总体规划而言，以圆顶礼拜大殿为重点的庭院式清真寺的确来源于伊朗的建筑传统，但本文讨论的建筑并没有仿效同时期恺加皇室赞助的标准类型，即四伊旺式的庭院清真寺和经学院。然而，建筑类型及其装饰风格则

［接上页］弟），1797 马库（MāKū）的哈桑・汗，1805 皮尔・古力・汗，1805—1806 马赫迪・古力・汗，1806—1807 阿合马・汗・马拉盖伊，1807—1827 侯赛因・古力・汗・恺加。17 世纪，至少可证实有两位出身恺加家族的总督：著名的埃米尔・古那・汗・恺加任至 1625 年，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塔赫玛斯普・古力・汗・恺加，后者在 1635 年将埃里温投降给奥斯曼苏丹穆拉德四世（见 Muhammad Ma`sūm b. Khavājagī Isfahānī (1643)1978:491 以及罗塔 2008）。根据 Reid 1978:130, 136，恺加部落在南高加索的势力始于沙赫维尔迪・速檀（Shāhvirdī Sultan, d.1570），他的后人直到 19 世纪仍统治埃里温、甘贾（Ganja）和卡拉巴赫（Qarābāgh）。关于南高加索的齐亚杜格卢恺加部（Ziyādughlu Qājārs），见 Ebrahim-nejad 1999:159-160；关于在甘贾的一系，见 Muhammad Ma`sūm b. Khavājagī Isfahānī (1643)1978:312-320。在甘贾，贾瓦德・汗・齐亚杜格卢・恺加在伊历 1209/ 公元 1794 年重修了萨法维时期建的主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内坐落着卡尔卜・阿里・汗・恺加之子哈桑・阿里（Hasan`Alī Khān b. Kalb`Alī Khān Qājār，死于伊历 1056/ 公元 1646）的陵墓（见穆罕默德・哈桑・汗［1897］1989:2036-2037）。

表 1　18—19 世纪埃里温几位总督以及他们赞助修建的建筑：建筑铭文与史料的对应

<table>
<tr><td colspan="2">侯赛因 · 阿里 · 汗
埃里温总督 1762—1783

穆罕默德 ·（哈桑）· 汗 · 恺加
埃里温总督 1784/5—1804/5，中有间断</td><td>埃里温
—蓝色清真寺

—城堡内的总督府邸
—城堡内的一座清真寺？</td></tr>
<tr><td>（穆罕默德）· 侯赛因 · 古力 · 汗 · 恺加 1742—1829；1807—1827 任埃里温总督，随后任呼罗珊和巴赫提亚尔总督</td><td>（穆罕默德）· 哈桑 · 汗 · 恺加 1855，被称为“汗 · 巴巴 · 汗”；埃里温将军；后任起儿漫、俾路支斯坦、亚兹德和巴赫提亚尔总督</td><td>埃里温
—重建或重修城堡内的总督府邸
—河对岸的总督府花园
—城堡，恺加早期清真寺（阿拔斯-米尔咱清真寺）
加兹温
—显贵经学院
—经学院前的蓄水库
—显贵浴池
—显贵蓄水库
德黑兰
—显贵水道
—显贵花园
卡尔巴拉
—拱北内的一座带清真寺和图书馆的经学院</td></tr>
</table>

明显脱胎于伊朗的传统，和同时期恺加皇室建筑的关系较深。彩色瓷砖的使用以及阿拉伯古兰经句和波斯诗歌为主题的铭文，使它和伊朗中部建筑传统的联系更深于当地的式样，即蓝色清真寺，后者显得极为地方性。另一方面，城堡内更早出现的奥斯曼清真寺——如今也已消失，但本文对其简要重构了一番——却没有对这座建筑有任何影响，尽管两者相距很近。

如此的综合性有别于我们在 18—19 世纪伊朗中心地区观察到的现象。在这些地区，由恺加的统治精英们赞助的清真寺和经学院建筑通常只具备单一的建筑特征，当地的建筑传统发挥了主导影响。这一现象说明这座建筑落成的时间较早，可能是在总督穆罕默德 · 汗（1784/5—1804/5）时期完成。但是，这座建筑对当地建筑先例及传统的继承关系，也使人联想到

侯赛因·汗（1807—1827）才是真正的赞助人。对他而言，在建筑上对蓝色清真寺的借鉴即代表了对地方政治权力传统的认同。如果侯赛因·汗是蓝色清真寺赞助人的孙子，如一条史料所示，那么，借鉴蓝色清真寺的建筑传统也表达了他对个人和家族的认同。不过，如何将这种假设和同时期一条将他的世袭追溯到加兹温的史料结合起来，则见仁见智了。

另一方面，这座建筑对伊朗传统的展示则反映了他已经融入了恺加统治精英阶层，有别于早先的埃里温总督们，毕竟此时恺加部落已经统治了整个伊朗，且被调任于伊朗的其他省份。这座建筑的建筑和装饰风格比蓝色清真寺显得更"伊朗"。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视觉宣言"视作埃里温这一族群的认同。建筑及其铭文都强化了和伊朗相关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上的传统。

19 世纪早期的建筑所具有伊朗风格，比 18 世纪的清真寺远为明显，这一点和当时的政治变局相关，因此而催生出了新的视觉定义的需要。当这座恺加清真寺建造时，伊朗首次败于沙俄，南高加索的大部均被割让，一位新的总督被任命至埃里温，此时此地已经成为对抗沙俄不断扩张的军事前沿。通过同时强调对当地和伊朗的建筑传统的继承，这座建筑不仅仅是在一个孤立的变革时期的"记忆聚合体"（Assmann 1992:278），而是18—19 世纪伊朗建筑这一普遍现象的例证。

参考文献

Adle, Chahryar (1996), "Archéologie et arts du Monde Iranien, de l'Inde musulmane et du Caucase d'après quelques recherches récentes de terrain, 1984-1995",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1996,* Paris: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lettres: 315-376.

Akopyan, T. Kh. (1971), *Istoriya Yerevana (1500-1800 gg)*, Yerevan (Russian and Armenian, Engl. summary).

Arutyunyan, Varazdat M.; Asratyan, Murad M.; Melikyan, A. A. (1968), *Yerevan* [posvyashchaezya 2750-letiyu Yerevana], Moskow.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1983),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eminar in the Series Exploring Architecture in Islamic cultures,* Singapore (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Assmann, Aleida; Friese, Heidrun (eds.) (1998a), *Identitäten,* Frankfurt am Main (Erinnerung, Geschichte, Identität; 3).

——— (1998b), "Einleitung", Assman/Friese (eds.) 1998a: 11-23.

Assmann, Jan (1992),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2nd ed. 1997).

——— (199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125-133.

Avery, Peter (1991), "Nadir Shah and the Afsharid Legacy", Avery/Hambly/Melville (eds.) 1991: 3-62.

———; Hambly, Gavin; Melville, Charles (eds.) (199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7, *From Nadir Shah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Cambridge.

Bāmdād, Muḥammad (1968), *Sharh-iḥāl-irijāl-iĪrān: darqarn 12 va 13 va 14 hijrī,* 6 vols., Teheran 1347sh.

Barnard, Alan; Spencer, Jonathan (eds.) (2004),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1996), Reprint.

Barnes, Susan J.; Melion, Walter S. (eds.) (1989),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Visual Art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 Washington.

Bayānī, Bahman (2009), "Nigāhībihyikqabāla-iizdivāj-inafīsdawra-iFatḥʿalīshāh-iQājār", *Payām-iBahāristān* 4: 768-778.

Behrens-Abouseif, Doris; Vernoit, Stephen (eds.) (2006), *Islamic Art in the 19th Century: Tradition, Innovation and Eclecticism,* Leide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60).

Bellingeri, G.; Curatola, Giovanni (1988), "Sul Ṭarḥ-ı jedīd, «art nouveau», dei Jaq'eli a Bayazid", L. Magarotto and G. Scarcia (eds.), *Georgica II,* Bologna: 141-218.

Bingöl, Yüksel (1982), *Der Ishak-Pascha-Palast in Dogubayazit am Berg Ararat: Ein Beitrag zur Baugeschichte eines türkischen Palastes im 18. Jh.,* Berlin.

Blair, Sheila S.; Bloom, Jonathan M. (1995),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1250-1800.* New Haven.

Bosworth, Edmund; Hillenbrand, Carole (eds.) (1983), *Qajar Ir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1800-1925* (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L. P. Elwell-Sutton), Edinburgh.

Bournoutian, George (1976), "Ḥusayn Qulī Khān Qazvīnī, Sardar of Yerevan: A Portrait of a Qajar Administrator", *Iranian Studies* 9: 163-179.

——— (1982), *Eastern Armeni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Persian Rule 1807-1828:* A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Study of the Khanate of Yerevan on the Eve of the Russian Conquest,* Malibu/CA.

——— (1992), *The Khanate of Yerevan Under Qajar Rule 1795-1828,* Costa Mesa/CA.

——— (1998), *Russia and the Armenians of Transcaucasia 1797-1889: A Documentary Record,* Costa Mesa.

——— (2005), "Hosaynqoli Khan Sardār-e Iravānī", *Encyclopaedia Iranica:* XII, 519-520.

———; Hewson, Robert H. (1998), "Yerevan ii: The Persian Khanate of Yerevan", *Encyclopaedia Iranica:* VIII, 545-548.

Cahen, Claude (1960), "Armīniya IIb",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I, 638-640.

Canard, Maurice (1960), "Armīniya I, II",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I, 634-638.

Chantre, B. (1891), "A travers l'Arménie Russe", *Le Tour du Monde* 61: 369-416; 62: 225-288.

Chardin, Jean (1686); L. Langlès (ed.) (1811), *Voyages du Chevalier Chardin au Perse et autres lieux de l'Orient.* (Based on the editions: London 1686, Amsterdam 1711 and 1735). 10 vols., Paris.

Clarke, Georgia; Crossley, Paul (eds.) (2000),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 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European Architecture, c. 1000-1650,* Cambridge.

Cuneo, Paolo (1995), "La città di Yerevan e le sue moschee del periodo persiano", Michele Bernardiniet alia (eds.), *L'arco di fangocherubò la luceallestelle: Studi in onore di Eugenio Galdieri per il suo settantesimo compleanno*. Lugano: Edizioni Arte e Moneta: 73-88, pls. I-IV.

———; Breccia Fratadocchi, Tommaso (1988), *Architettura armena: dal quarto al diciannovesimo secolo*. 2 vols. Rome: De Luca.

Dieulafoy, Jane (1887), *La Perse, la Chaldée et la Susiane*, Paris.

Dubois de Montpéreux, Frédéric (1839-1843), *Voyage autour du Caucase: chez les Tcherkesseset les Abkhases, en Colchide, en Géorgie, en Armenie et en Crimée: avec un atlas geographique pittoresque, archéologique, geologique etc*. 5 vols. & 1 ill. vol., Paris.

Dupré, Adrien (1819), *Voyage en Perse fait dans les années 1807, 1808 et 1809*, 2 vols., Paris.

Ebrahimnejad, Hormoz (1999), *Pouvoiret succession en Iran: Les premiers Qajar; 1726-1834*, Paris (Moyen Orient & Océan Indien XVIe-XIXe s.; 12).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1965-2002), 11 vols., Leiden.

Encyclopaedia Iranica (1985-), 14 vols. to date, London, Costa Mesa/CA, New York.

Ettinghausen, Richard; Grabar, Oleg; Jenkins-Madina, Marilyn (2001),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650-1250, New Haven.

Faroqhi, Suraiya (1995), "Rewā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III, 487-489.

Finster, Barbara (2008), "Zur Tradition iranischer Architektur", Ritter/ Kauz/Hoffmann (eds.) 2008: 347-356, pls. 1-3a.

Frampton, Kenneth (1985), "Critical Regionalism,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 idem (ed.),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314-326.

Ganjnāma: Farhang-iāthār-imi'mārī-iislāmī-iĪrān, KāmbīzḤājjī-Qāsimī (ed.), Tehran.

——— (1996a) 1. *Khānahā-i Kāshān = Houses of Kashan*, 1375sh.

——— (1996b) 2. *Masājid-i Iṣfahān = Mosques of Esfahan*, 1375sh.

——— (1998a) 3. *Banāhā-i madhhabī-i Tihrān = Spiritual Buildings of Tehran*. 1377sh.

——— (1998b) 4. *Khānahā-i Iṣfahān = Houses of Esfahan*, 1377sh.

——— (2004a) 6. *Masājid = Mosques*, 1383sh.

——— (2004b) 7. *Masājid-i jāmi' = Congregational Mosques*, 1383sh.

Gaube, Heinz; Wirth, Eugen (1978), *Der Bazar von Isfahan*, Wiesbaden (Beihefte zum Tübinger Atlas des Vorderen Orients; B, 22).

Godard, André (1962), *L'art de l'Iran,* Paris.

Golombek, Lisa; Wilber, Donald [N.](1988), *The Timurid Architecture of Iran and Turan,* 2 vols., Princeton.

Goodwin, Godfrey (1971), *A History of Ottoman Architecture,* London, repr. 1992 from the paperb.ed. 1987.

Grabar, Oleg (1989), "Ayvān", *Encyclopaedia Iranica:* III, 153-155.

Gulrīz, Muḥammad ʿAlī (1958), *Mīnūdāryābāb al-jannat Qazvīn,* Tehran 1337sh.

Halbwachs, Maurice (1967), *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 Stuttgart (French original 1950).

Hambly, Gavin R. G. (1991a), "Āghā Muḥammad Khā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ājār Dynasty", Avery/Hambly/Melville (eds.) 1991: 104-143.

——— (1991b), "Iran during the Reigns of Fatḥ ʿAlī Shāh and Muḥammad Shāh", Avery/Hambly/Melville (eds.) 1991: 144-173.

Haxthausen, August von (1854), *Transkaukasia,* 2 vols., London (German ed.: *Transkaukasia: Andeutungen über das Familien- und Gemeindeleben und die socialen Verhältnisse einiger Völker zwischen dem Schwarzen und Kaspischen Meere; Reiseerinnerungen und gesammelte Notizen,* 2 vols., Leipzig 1856. Reprint in one vol. as *Transkaukasia: Reiserinnerungen und gesammelte Notizen.*Hildesheim 1985).

Helmreich, Anne (2002), *The English Garde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ompeting Styles of Garden Design; 1870-1914,* Cambridge.

Hillenbrand, Robert (1983), "The Role of Tradition in Qajar Religious Architecture", Bosworth/C. Hillenbrand (eds.) 1983: 352-382.

——— (2005),"The One that Got Away: Ernst Herzfeld and the Islamic Architecture of Iran", Ann C. Gunter, Stefan R. Hauser (eds.), *Ernst Herzf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900-1950,* Leiden: 405-426.

Huviyān, Āndrānīk (2007), "Masjid-i Kabūd-i Īravān", *Gulistān-ihunar* 9, Pāʾīz 1386sh: 117-122.

Kārang, ʿAbd al-ʿAlā (1973), *Āthār-ibāstānī-iĀdharbāyjān.* 1. *Āthārwaabnīya-itārīkhī-ishahristān-i Tabrīz,* Teheran 1351sh (Silsila-i intishārāt Anjuman-i Āthār-i Millī; 91).

Kazemzadeh, F. (1991), "Iranian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o 1921", Avery/Hambly/Melville (eds.) 1991: 314-349.

Kāzirūnī [Shaykhulḥukamāʾī], ʿImāduddīn (2000-2001), "Vaqfnāma-imawqūfāt-isardārān-i QazvinīdarĪravān", *Vaqf: Mīrāth-i Jāvidān* 25 (8/1) 1379sh: 61-72.

Kettenhofen, Erich (1998), "Yerevan i: Ancient and Medieval", *Encyclopaedia Iranica:* VIII, 542-545.

Khanikoff, Nikolai Vladimirovitch de (1862), "Mémoiresur les inscriptions musulmanes du Caucase", *Journal* Asiatique, 5ème série, 20: 57-155.

Kleiss, Wolfram (1982), "Die Safavidische Sommerresidenz Farahabad am Kaspischen Meer", *Archä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15: 347-360, pl. 72-79.

Lynch, Henry F. B. (1901), *Armenia: Travels and Studies,* 2 vols. (London), 2nd reprint, Beirut 1967.

Masājid (1999), *Masājid-itārīkhī: Dā'iratu'l-ma'ārif-ibanāhā-itārīkhī-iĪrāndardawra-iislāmī,* Pāzhuhishgāh-i Farhangwa Hunar-i Islāmī, Dā'iratu-'l-Ma'ārif (ed.), Tehran 1378sh.

Morier, James Justinian (1818), *Second Journey Through Perisa, Armenia, and Asia Minor to Constantiople Between the Years 1810 and 1816,* London.

Mirza Bala (1977), "Erivan", *İslam Ansiklopedisi: İslâmâlemi, tarih, coğrafya, etnografyavebiyografyalugati,* 12 in 14 vols., Istanbul 1940-86: IV, 311-315.

Muḥammad Ḥasan Khān (I'timād as-Salṭana, Ṣanī' ad-Daula) (1879), 'Abdulḥusayn Navā'ī and Mīr-Hāshim Muḥaddith (eds.) (1989), *Mir'āt al-Buldān,* Finished 1297h, 4 vols., Teheran 1368sh.

Muḥammad Ma'ṣūm ibn KhvājagīIṣfahānī (1643), Gerhard Rettelbach (ed. and transl.) (1978), *Khulāsat as-Siyar: Der Iran unter Schah Ṣafī (1629-1642) nach der Chronik des ...,* München.

Nafīsī, Sa'īd (1965), *Tarīkh-i ijtima'ī va siyāsī-i Īrān dar dawra-i mu'āṣir,* vol. 2, Teheran 1344sh.

Perry, John (1979), *Karim Khan Zand: A History of Iran, 1747-1779,* Chicago.

Piemontese, Angelo M. (1972), "The Photograph Album of the Diplomatic Mission to Persia (Summer 1862)", *East and West* 22/3-4: 249-311.

Pope, Arthur Upham; Ackerman, Phyllis (eds.) (1977),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1938-39), 3rd edition with addenda, 16 vols., Ashiya/Japan, New York, Tehran 1977.

Reid, James (1978), "The Qajar Uymaq in the Safavid Period, 1500-1722", *Iranian Studies* 11: 117-144.

Ritter, Markus (2006), *Moscheen und Madrasabauten in Iran 1785-1848: Architektur zwischen Rückgriff und Neuerung,* Leiden (2005)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tudies and Texts; 62).

——— (2008), "Re-evaluating the Architecture of 18th-19th-Century Early Qâjâr Iran: The Case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e / Arzyābī-imujaddid-imi'mārī-iqurūn-i 18 tā

19 milādī, ibtidā-idawrān-iQājārīya-iIrān (qarn-i 12 tā 13 hijrī): barrasi-imawradī-imi'mārī-imadhhabī", *Memar: Iranian Bimonthly o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48/March, Teheran: 44-49.

———; Kauz, Ralph; Hoffmann, Birgitt (eds.) (2008), *Iran und iranisch geprägte Kulturen,* Wiesbaden (Beiträge zur Iranistik; 27).

Rota, Giorgio (1993), "Ancora sul palazzo di İshak Paşa a Doğubeyazit", *Annali di Ca' Foscari: Rivista della Facoltà di lingue e letterature straniere dell'Università di Venezia* 32/3: 335-342.

——— (2008), "The Death of Ṭahmāspqoli Xān Qājār According to a Contemporary Ragusan Source (How to Become a Renegade, 2)", Ritter/ Kauz/Hoffmann (eds.) 2008: 54-63.

Sa'īdī Sīrjānī, 'A.-A. (1989), "Bahārestān", *Encyclopaedia Iranica:* III, 480-481.

Sarre, Friedrich (1901-10), *Denkmäler persischer Baukunst,* 2 vols., Berlin.

Sawyer, Sean Edward (1999), *Soane at Westminster: Civic Architec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1780-1834,* New York.

Scarce, Jennifer (1983), "The Royal Palaces of the Qajar Dynasty: a Survey", Bosworth/ C. Hillenbrand (eds.) 1983: 329-351.

——— (1991), "The Arts of the Eigh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Architecture, Ceramics, Metalwork, Textiles", Avery/Hambly/ Melville (eds.) 1991: 890-958.

——— (1992), "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in the Creation of Teheran", Chahryar Adle, Bernard Hourcade (eds.), *Teheran: capitale bicentennaire,* Paris and Teheran (BibliothequeIranienne; 37): 73-94.

———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Gulistan Palace: The Aims and Achievements of Fath Ali Shah (1797-1834) and Nasir al-Din Shah (1848-1896)", *Iranian Studies* 34/1-4: 103-116.

Shīrāzī, Bāqir Āyatullāhzāda (2000), "Muṭāli'avamarammat-i Masjid-i Jāmi'-i Īravān", *Athar* 31-32/1379sh: 1-84.

Sourdel-Thomine, Janine; Spuler, Bertold (eds.) (1973), *Die Kunst des Islam, Berlin* (West) (Propyläen Kunstgeschichte; 4).

Straub, Jürgen (1998), "Personale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 Zur Analyse eines theoretischen Begriffs", A. Assmann/ Friese (eds.) 1998: 73-104.

Thierry, Jean-Michel (1988), *Armenische Kunst,* Documentation Patrick Donabédian, Freiburg im Breisgau (French original edition: Paris 1987).

Tzonis, Alexander; Lefaivre, Liane (2003), *Critical Regionalism: 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Munich.

Ursinus, Michael (2000), “The Role of the Vali of Çıldır in Ottoman-Caucas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Late 18th Century”, Raoul Motika, Michael Ursinus (eds.), *Caucasia Betwee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ran, 1555-1914*. Wiesbaden: 41-48.

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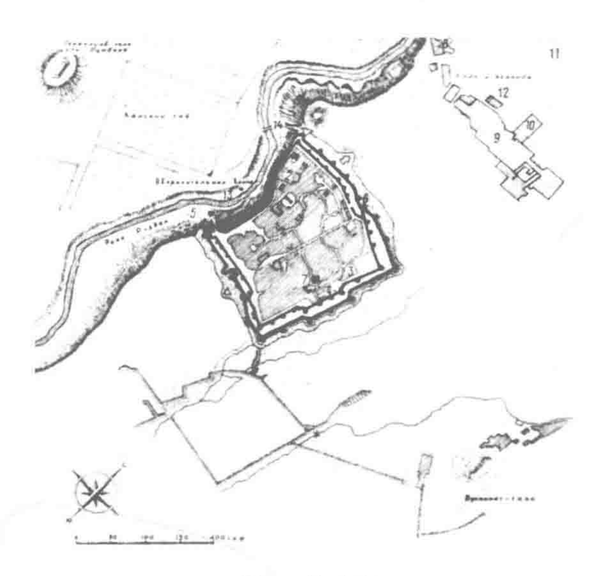


图 1 埃里温

城堡，城市的中心（右上方），埃里温河和数座公园 1827 的俄国制图。引自哈鲁琼尼扬 / 哈斯拉强 / 梅利基扬 1968 :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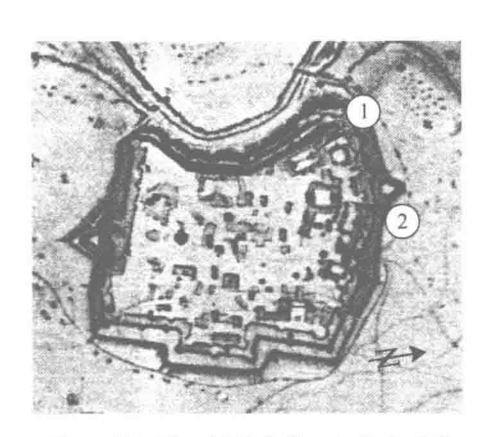


图 2　埃里温，城堡及其建筑的平面图

1837 年沙俄地图中的细节图，引自哈鲁琼尼扬 / 哈斯拉强 / 梅利基扬 1968:45。数字和箭头为本文作者所加；（1）恺加总督府邸，（2）庭院式建筑，此处被断为本文讨论的这座早期恺加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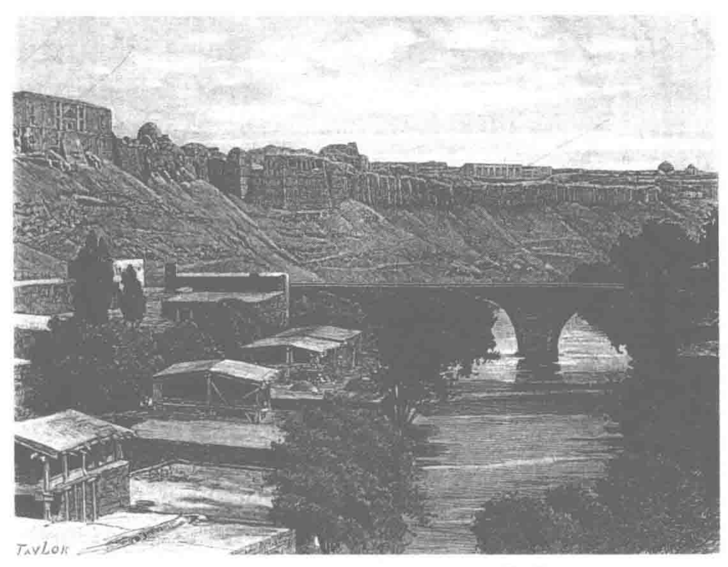


图 3　埃里温，河岸上的城堡，面南

左边的城堡建筑应是总督府的一部分。注意其右的规模较大的圆顶。这幅版画图像来源于一张照片。引自尚特雷 1891: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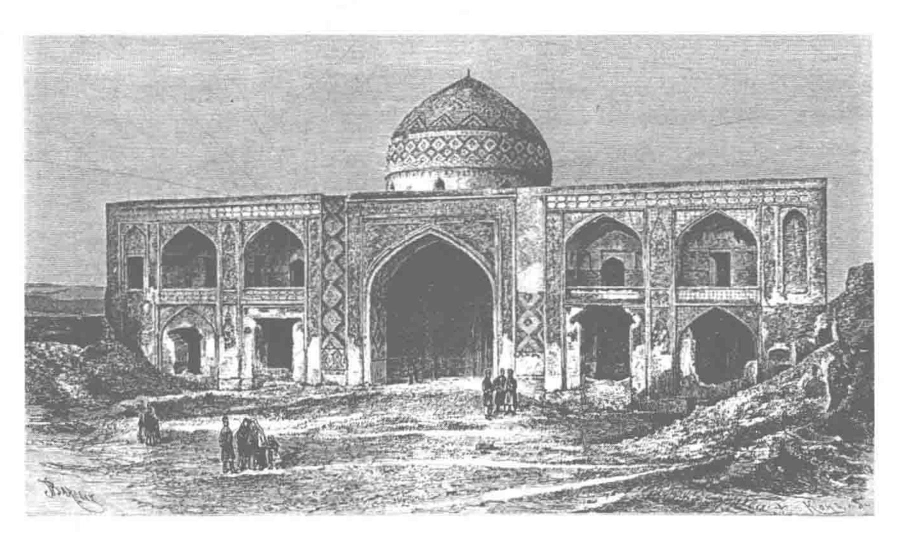


图 4　埃里温，城堡清真寺
此处断为恺加早期版画，可能来源于一张照片。引自迪厄拉富瓦 188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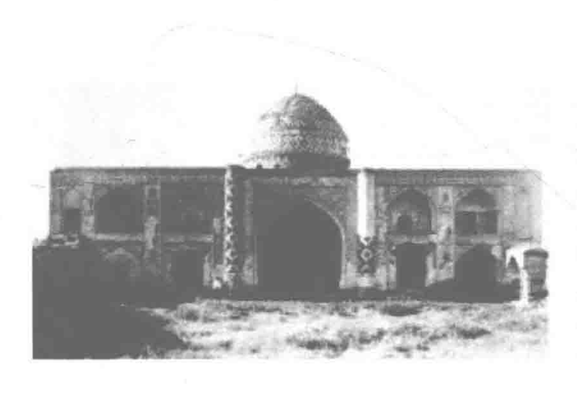


图 5　埃里温，城堡清真寺
此处断为恺加早期庭院，礼拜大殿及侧翼的前几排拱廊。Shervinski 摄，19 世纪末；柏林国立美术馆—普鲁士文化基金会 (Staatliche Museen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档案号 no. 1068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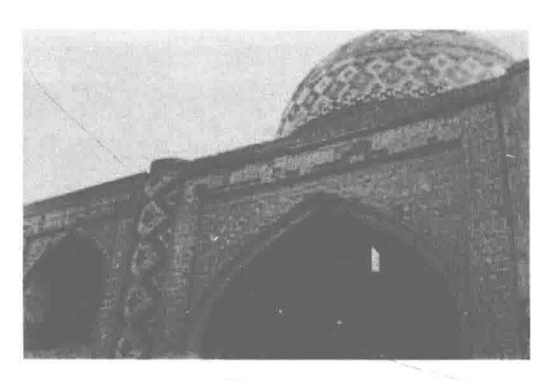


图 6　入口

未公布的 Shervinski 摄的照片，19 世纪末；柏林国立美术馆—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档案号 no.1068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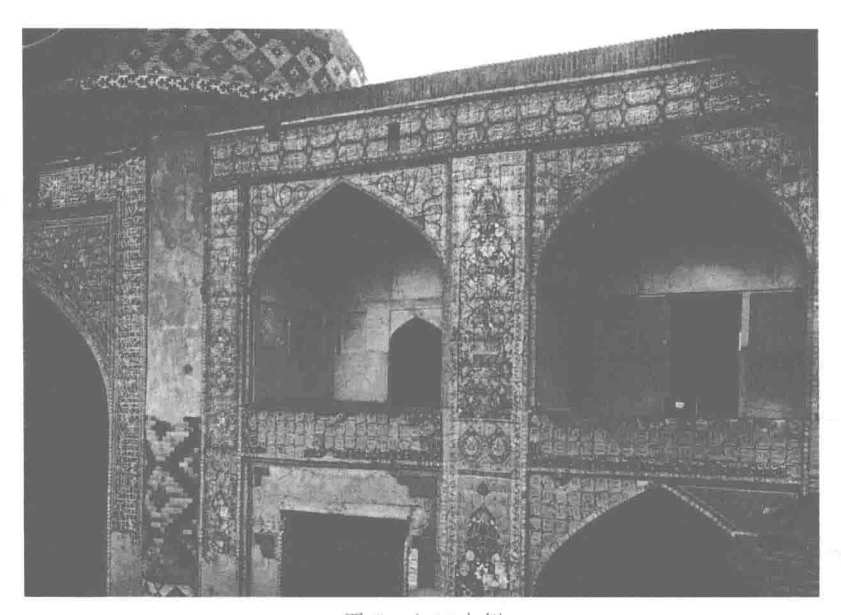


图 7　入口右侧

F. Sarre 1897 年所摄照片；档案号 pl. 9095。埃里温，城堡清真寺，此处断为恺加早期。礼拜大殿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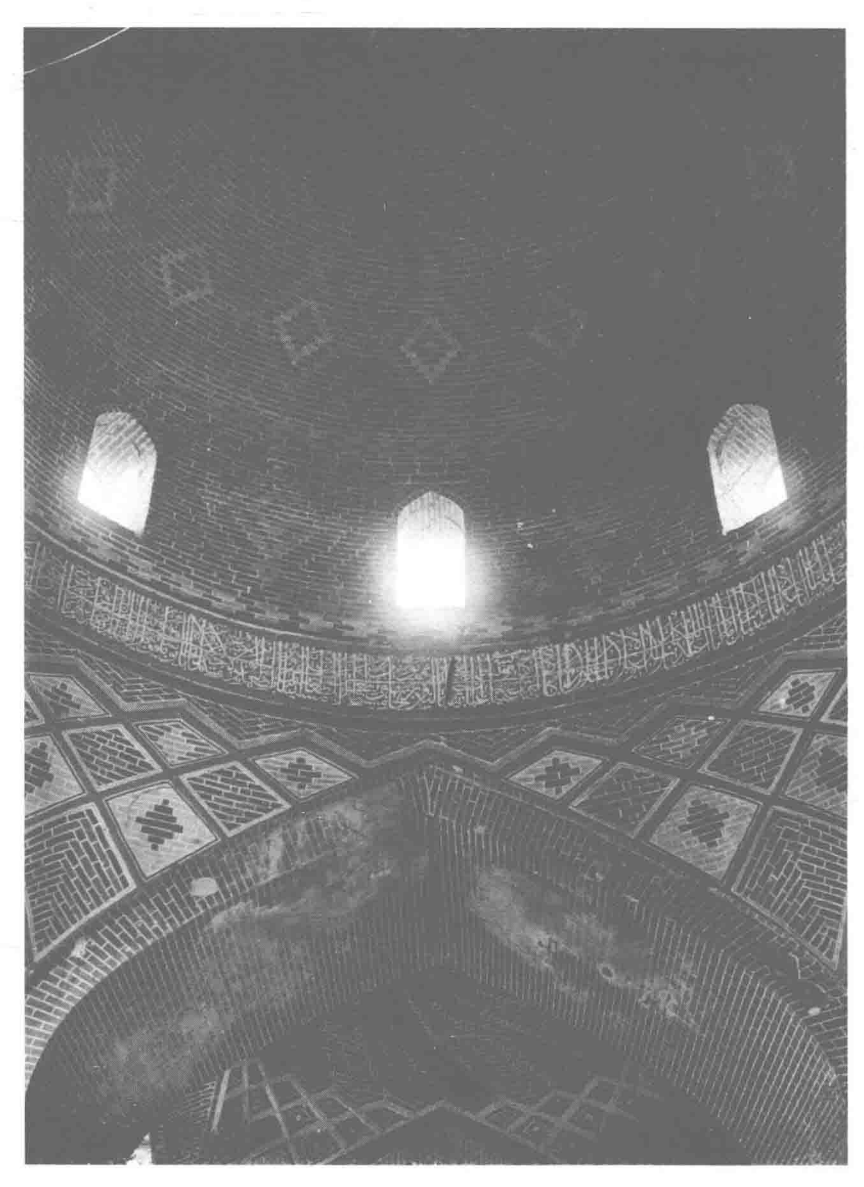


图 8 圆顶内室

此为与东面房间相连部分。F. Sarre 1897 年摄；柏林国立美术馆—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档案号 pl. 9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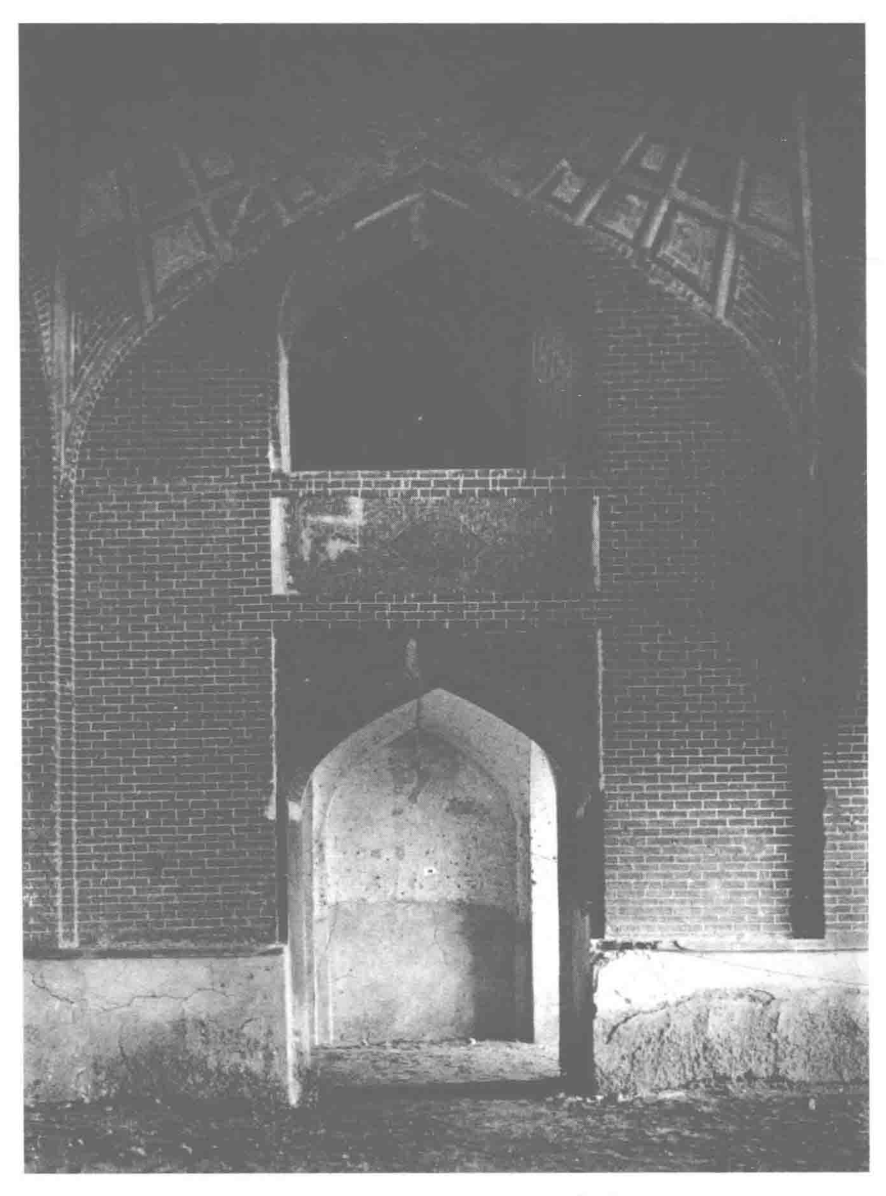


图 9　西侧横室，与最后一个房间相连

F. Sarre 1897 年摄；档案号 pl. 90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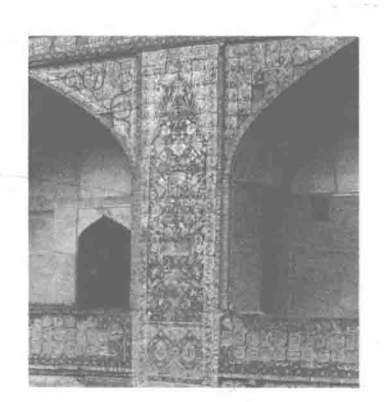


图 10　瓷砖装饰
大殿正面图 7 细部。



图 11　瓷砖装饰，圆顶内室，米哈拉布的镶板
F. Sarre 1897 年所摄照片的细部。柏林国立美术馆—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档案号 pl. 9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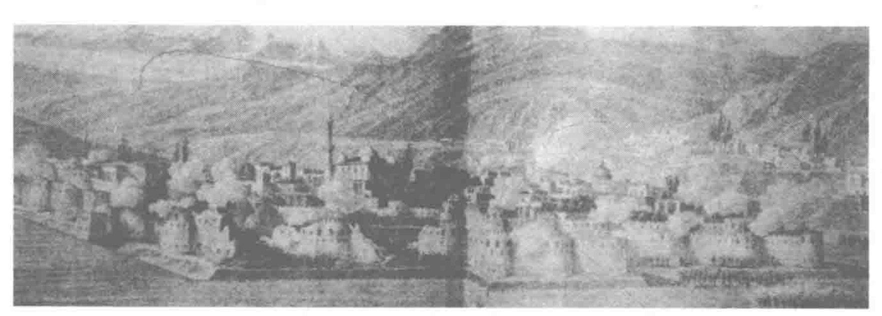


图 12　沙俄占领埃里温城堡，19 世纪
引自纳弗斯，1965：II，142-143，出处和收藏地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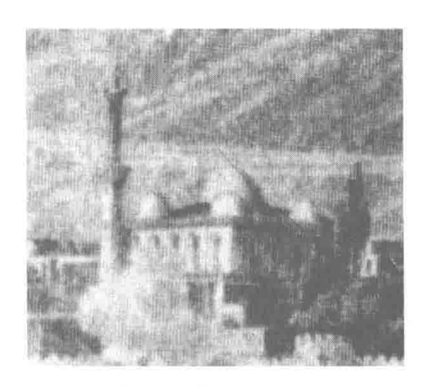


图 13 图 12 的细部

一座清真寺，本文将其断为 1725 年奥斯曼总督雷杰普帕夏赞助所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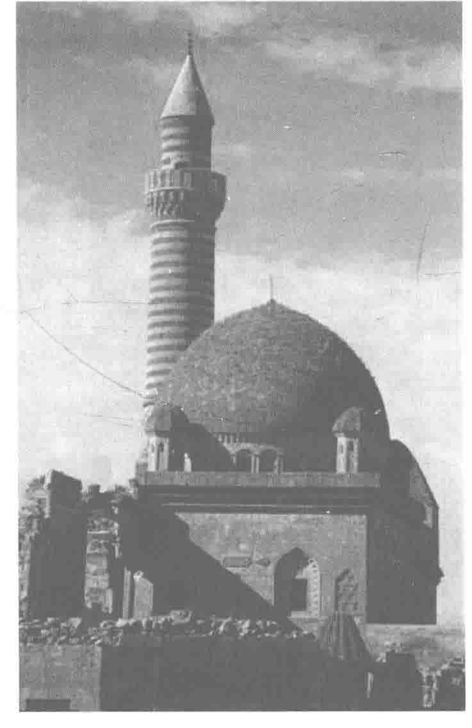


图 14 杜古拜亚斯（土耳其），伊斯哈克帕夏府邸清真寺，1784 年建成（M. Ritter 摄于 198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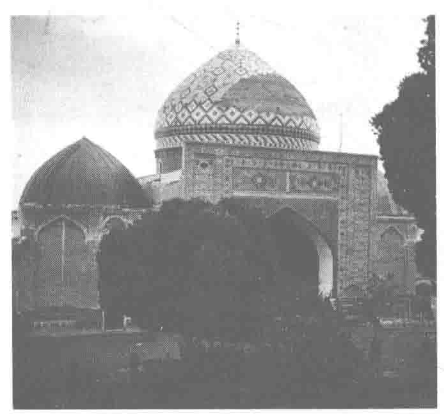


图 15 蓝色清真寺庭院与礼拜大殿

1887 年的瓷砖正面墙瓷砖装饰，F. Sarre 摄，1897；柏林国立美术馆—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档案号 pl. 9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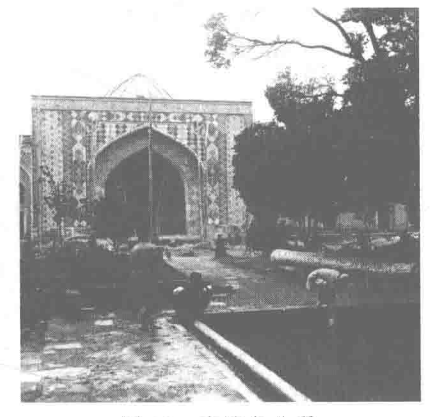


图 16 庭院与北翼

F. Sarre 摄，1897；柏林国立美术馆—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档案号 pl. 9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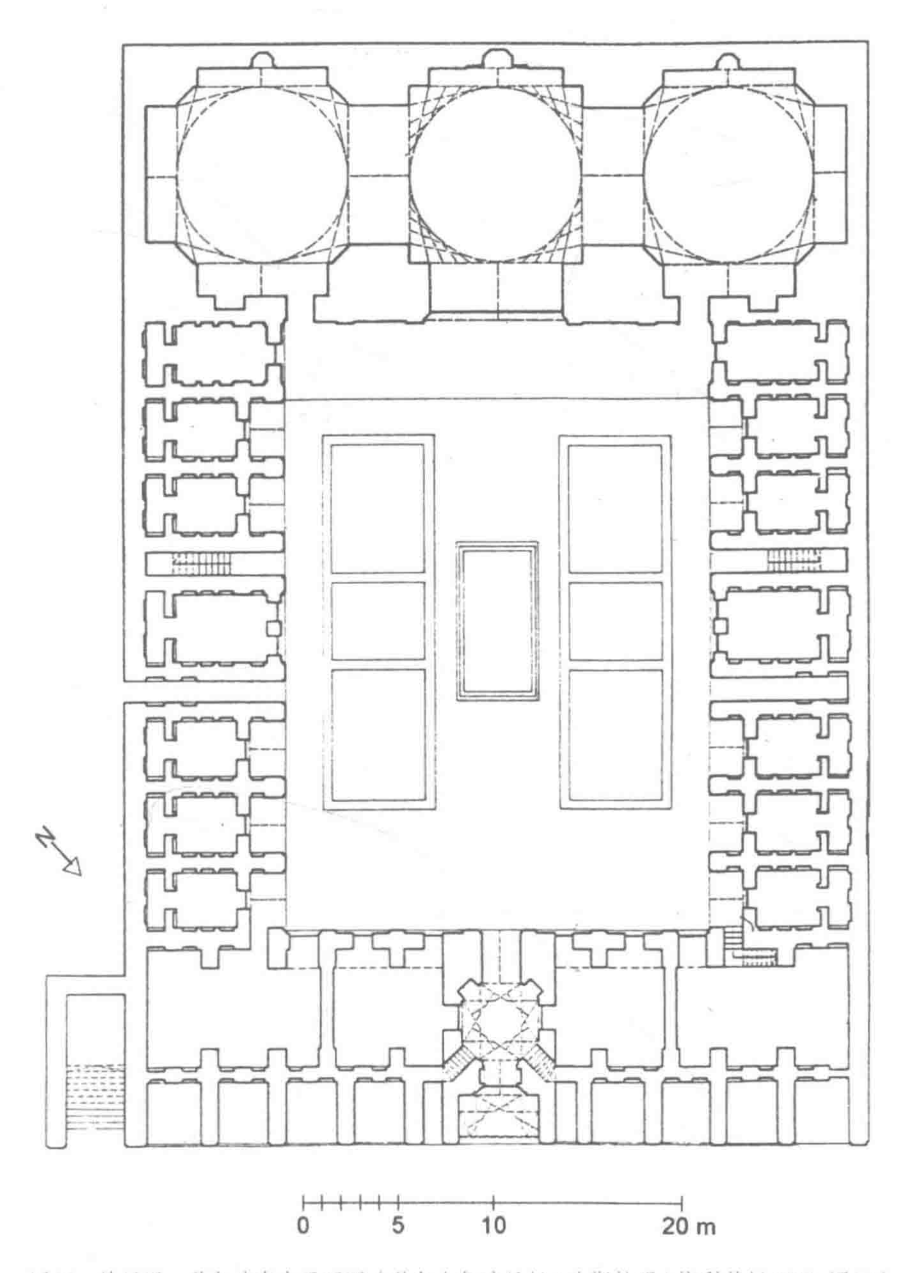


图 17　埃里温，蓝色清真寺平面图（引自哈鲁琼尼扬 / 哈斯拉强 / 梅利基扬 1968:图 22）



图 18 礼拜大殿

正中的米哈拉布旁的石刻铭文，以年份 1181/1767—1768 结束。M. Ritter 摄于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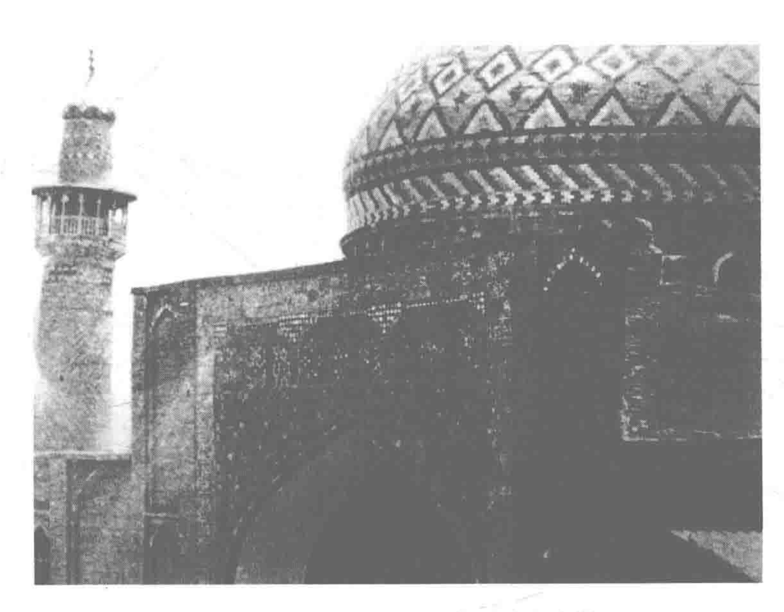


图 19 礼拜大殿入口，圆顶及宣礼塔

正面最初的瓷砖装饰不同于图 15 所示的更晚近的装饰，后者使用了带有铭文的门墙；一张早于 1887 年的照片的细部；清真寺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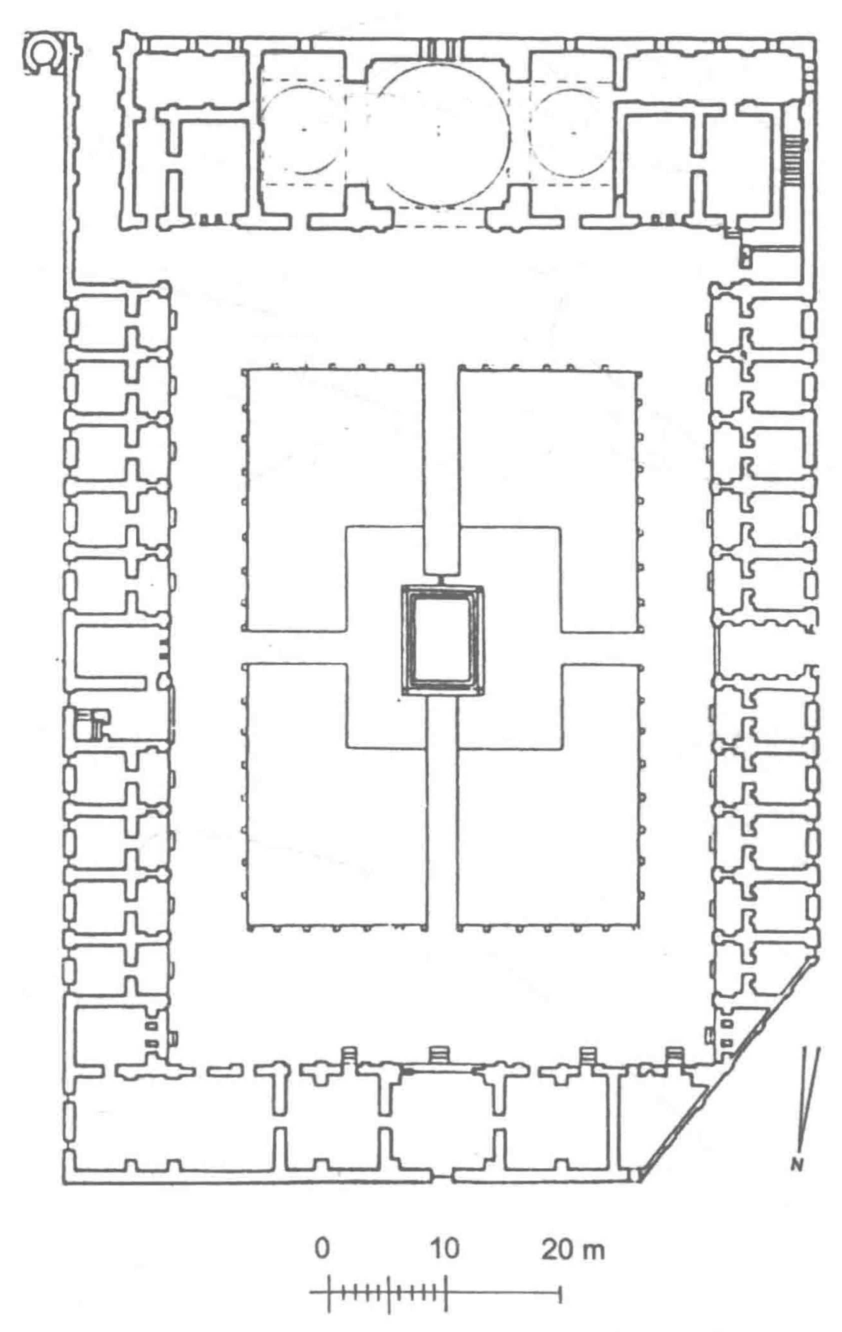


图 20　显贵经学院庭院与礼拜大殿（M. Ritter 绘于 1997 年）



图 21　加兹温，显贵经学院

德黑兰沙希德贝赫什迪大学建筑系档案，Archive Dānishkada-iMi`mārī, Danishgāh-i Shahīd Bihisht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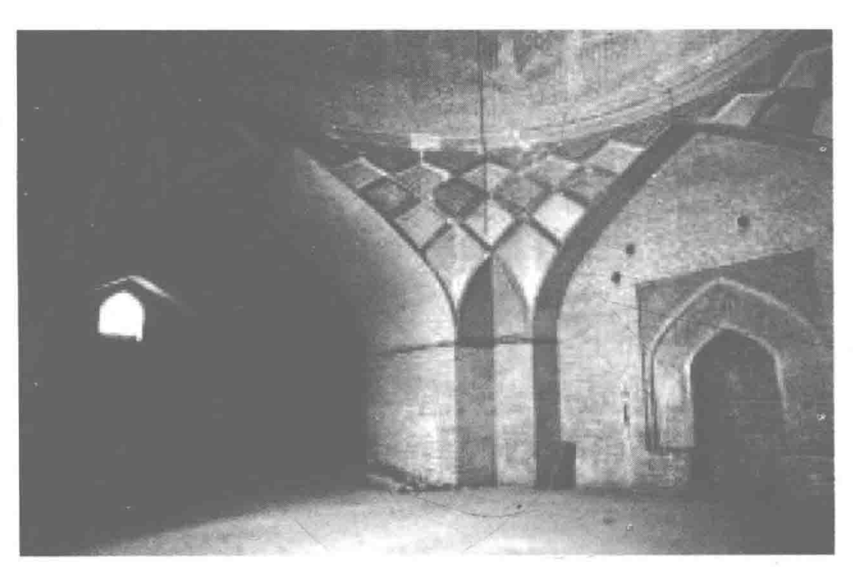


图 22　圆顶内室与耳室，南向（M. Ritter 摄于 1997 年）

《梨俱吠陀》的历史背景*

米歇尔·维策尔（Michael Witzel）、后藤敏文（Toshifumi Gōtō）著
刘震译

《梨俱吠陀》

《梨俱吠陀》（*Ṛgveda, RV*）是人类最早的文学里程碑之一，是印度保存下来最早的文献。《梨俱吠陀》的诗歌展现了古代印度最早的宗教诗歌创作，它们的产生远早于佛教和印度教。它们是后世的基础，不仅是对仪式而言，而且对整个的思想发展来说亦然。并且它们在当今的很多仪式中还被使用着，比如在婚礼和葬礼中。

《梨俱吠陀》的1028首诗歌是以古老的印度雅利安语（吠陀梵语）于大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写成的，不过在主题和形式上，可以追溯到印度雅利安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甚或印度日耳曼时代。它们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古代伊朗文献——《阿维斯陀》（*Awesta*）有很近的亲缘关系。

《梨俱吠陀》诗歌由传统意义上的吟游诗人，同时也是祭司，不使用文字根据复杂的、经常可追溯到印度日耳曼史前的模式而创作的。

《梨俱吠陀》的诗歌主要为诸神而作，但也赞颂国王，甚至是隆重祭

---

* 本文译自 Michael Witzel und Toshifumi Gōtō, unter Mitarbeit von Eijirō Dōyama und Mislav Ježi, *Rig-Veda, Das Heilige Wissen, Erster und Zweiter Liederkreis,* im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und Leipzig: Verlag der Weltreligion, 2007, pp. 425-440，是这部《梨俱吠陀》新的德语译本注释的一部分，题目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典的富有的资助者。最重要的神祇是因陀罗（Indra）——战神和经常提及的、针对Vṛtra的神话战争中的胜利者。后者是类似于龙的鬼怪，会把水流困住。除因陀罗之外，还会召唤火神阿耆尼（Agni）、太阳神苏利耶（Sūrya），朝霞乌莎（Uṣas）或者一群暴风神马茹特（Marut）。仪式的中心经常为苏摩（Soma）——一种醉人的饮料，在攀谈中，它也会人格化为神祇。

《梨俱吠陀》之名

Veda意为"知识"（das Wissen），从动词词根*vedii/vidi*而来，德语词*wissen*亦与之有关联。*Rig*来自*ṛc*一词，后者意为"赞歌、诗节、诗句"。*Rig-Veda*即"以诗句构成的（神圣）知识"，根据印度本土传统，自古以来这些诗歌就归于一定数量的仙人（Ṛṣi）。

不过，后期的印度传统认为，这些仙人应该只是"听闻"了永存的文本，即使《梨俱吠陀》明确显示了众位仙人自己作了这些诗歌。仙人"看过"（*dhī*、*dṛś*、*paś*）他的诗节，他未曾"听闻过"（*śru*）。

公元前1300—前1000年间，印度雅利安种族取得绝对优势，其俱卢族（Kuru）首次结集该文本，诗人们可能仿效了始祖仙人（今阿富汗）的"真实"作品，自己作了新诗，或者从本身的诗人传统以外的素材中取材。他们经常在意于通过直呼族民或者使用一种特定的叠句——某种程度展示其版权页，来区分其所属的氏族。

关于历史、社会和考古背景

产生地域：阿富汗和旁遮普

《梨俱吠陀》的诗人家族在印度次大陆西北，大约在喀布尔和德里之

间，完成了诗作。一些诗歌还显示出阿富汗较远地带的起源，时而又显示中亚，甚至印度雅利安人的前印度居住地的记忆。这些地理的叙述主要通过文献中所提到的河流而显见，而北印度的平原风光几乎不能提供什么定位依据。

此外阿富汗的山脉经常被提及，还有一次提到了雪山，即喜马拉雅远方一座出产最好的苏摩（*maujavatá*）的高山。提到冬天寒冷的气候显示了《梨俱吠陀》阿富汗—旁遮普的故乡。

产生时代：青铜时代

在某种程度上，《梨俱吠陀》的故乡可被准确地定位，但确定其产生的时间则更为困难。清楚的是，这是青铜时代的文献，因为铁器（黑色金属）要到后《梨俱吠陀》文献里才被提到。同时，根据考古发现，铁器加工要到约公元前 1000 年在次大陆的西北才有。另一方面，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米坦尼（Mitanni），有古印度雅利安的语言残留，其断代为公元前 1450 年，比《梨俱吠陀》更早。在米坦尼的印度雅利安语里，《梨俱吠陀》所用的 *medhā*（“智者”以及“祭祀”）一词为更古老的 maz[h] ă 所 取代。因此，《梨俱吠陀》诗歌的绝大部分比米坦尼文献来得晚。可惜考古工作至今还未能为断代提供更多的依据。

《梨俱吠陀》产生于某个时段，大约有五个世代那么长，依照文本中提及的诗人和部族首领的名字可以显见。部族中以补卢（Pūru）和婆罗多（Bharata）为首。特别是婆罗多的国王 Sudās（RV VII 18）和他的两位家庭祭司（Purohita）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众友（Viśvāmitra），而后是那位或许是从东伊朗迁徙而来的瓦希施塔（Vasiṣṭha）。他们俩在今天的印度还是很流行，在数量众多的庙宇里和圣地的造像中，根据传说，那些圣地与他们有关。

考古和语言史的背景与“生活态度”

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考古背景，《梨俱吠陀》的解读首先依据文本自身，这对梵语语文学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次，与近缘的古代伊朗琐罗亚斯德的《阿维斯陀》文献的对照，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同样地，还可以对照其他印度日耳曼的语言材料。（更远的、欧亚背景的，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或者中亚的来源，至今却未能充分利用。）通过深入的语文学观察，《梨俱吠陀》诗歌——如果解读正确的话——为我们提供了几乎是唯一的，但内容丰富的、有关青铜时代印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信息源。这些文献传递了很多信息，有关该时代宗教、诸神世界和神话，以及其盛大的公开仪式，还有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及印度雅利安人（Ārya）物质文化的轮廓，同样还有他们对宇宙和自然的想象。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有关最古老印度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的叙述。尽管《梨俱吠陀》是一部祭司文献，但它包含了格言和众多与日常生活和本地自然有关的东西。作为吟游诗人的产物，该文献自然还提供很多细节，涉及到诗歌理解、诗人竞争和他们富有的资助人与资助、单个诗人性格特点和《梨俱吠陀》时代的社会。

关于地理

从阿富汗经过旁遮普直到德里地区，《梨俱吠陀》地貌特征是高山和平原。

中印度的文底耶山（Vindhya），以及北印度东部的低地，或者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还未被提及。

印度洋大概还未被人所知。然而一个词经常出现，后用来指称海洋（*samudrá*）。不过，它在《梨俱吠陀》中首先只是意为“水的聚合”或

者“湖”。因此所有的水流交汇处都可以此称之，比如旁遮普的几条河流，还有那些在沙漠中断流的河流处生成的三角湖（或者更小的水体）。

《梨俱吠陀》时代或大或小的湖泊（*samudrá*）之外，在世界的尽头还有神话中的河流或海洋（参见 *Saramā* 传说，X 108），在天上或者地底下。雨从中而产生，所有的河流汇入神话中的世界尽头。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梨俱吠陀》的牧人是否直接遇见了印度洋。

众所周知，诸如印度河、象泉河、恒河或者阎牟那河流经了北印度的广袤平原。在第 X 书的第 75 首诗歌里，有 18 条河，有意思的是它们按照由东向西，而后是由北向南的顺序以《梨俱吠陀》中的名字排列。[①] 有时，又说有 99 条河流，其中较小的河流也算在内。

和后《梨俱吠陀》时代一样，这些河流构成了北印度平原上部族之间的天然的分界，此外就别无界标了。

气候与自然

对一个像《梨俱吠陀》中的印度人那样极度依赖畜牧业的民族来说，自然环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阿富汗和旁遮普西部，人们依赖的是时不时的降雨（特别是山区）、雪的融化和河流。这里季风降雨很少，四季分明。

相反，在旁遮普东部直到恒河地区却以典型的印度季风为主，伴以强烈的、不可预测的夏雨（约从 6 月中旬至 9 月）。这种以三季（寒、热、季风季）为特点的风光，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印度自然。

---

① Gaṅgā（恒河）、Yamunā（阎牟那河）、Sarasvatī（Gagghar-Hakra）、Śutudrī（象泉河）、Asiknī（Ravi）、Marudvṛdhā、Vitastā（Jhelum）、Ārjīkīyā、Suṣomā（Soan）、Tṛṣṭāmā、Susartu、Rasā、Śvetī、Sindu（印度河）、Kubhā（喀布尔河）、Gomatī（Gomal）、Krumu（Kurram）、Mahatnu。

在《梨俱吠陀》中，总是说到带来生机的雨水（和带来雨水的暴风神马茹特们），它使牲畜赖以存活的牧草生长。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寻找水源和为此作战。水、阳光、牛、子息、长寿和在天堂的一席之地，是印度雅利安人——Ārya，正如他们自称的最高愿望。这些占据了《梨俱吠陀》诗歌的大部分。

居住的形式

大部分雅利安人是牧民，故而不得不一直为寻找新的草场而四处迁徙。因此，对于《梨俱吠陀》时代的人们来说，“套上挽具”远征（*yóga*）与安营扎寨（*kṣéma*）是两种典型的生存形式。因此，人们在迁徙队伍（*grâma*）中赶着沉重的、四个轮子的、牛拉的货车，上面载着轻型的两轮战车，从一个宿营地到另一个。从后来的文献可知，在这样的迁徙中，两天赶路与一天休息交替进行。

在寻找草场和水源的途中并非总是平安无事的，一个像 *saṃgrāma* 这样的概念已经显示了，字面上的意思只是表示两支迁徙队伍的“碰头”，但也有“战争”的意思。还有一个类似的词 *gáviṣṭi*——“寻牛”，却根本上描述了牧人的抢劫行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梨俱吠陀》时代的社会是以持续不断的氏族、部族，以及同原住民之间的大小战争为标志的。

操印度雅利安语的吠陀部族以饲养家畜为特征：在战车前所挽的和用于比赛的马享受最高荣耀。第二位的是牛，其数量可衡量一个氏族的财富。此外还蓄有山羊和绵羊。骆驼和猪也被提到，但次数很少，同样还有原产于南亚的鸡。

野生动物有羚羊、象（*hastin*，“有手的”）、野水牛或者野牛、鸟类（诸如野鹅、鹰、雕和鹫），更有海豚和鳄鱼。在荒野（*áranya*）——与居住地（*nítya*、*grāmyá*）相对，它们明确地作为活物被描写过。

农耕者多为操非印度雅利安语的、有固定居住地的原住民，对此有很多并非源自印度伊朗语和印度日耳曼语的农耕术语为证。只有少量的词语，如大麦或谷物（*yáva*）已经从印度日耳曼的史前继承下来。正如后《梨俱吠陀》的文献所示，半游牧的战士干脆抢夺定居居民的收成（主要是小麦和大米），同时他们自己仍饲养牲畜和抢夺牲畜。那些借词，包括在日常宗教领域的词汇，却让这两组人群紧密联系起来。印度雅利安人甚至有可能在安营扎寨之处（*kṣéma*）自己种植其传统的谷物——大麦。一处暗示可能为，经常提到的烧荒之火，无疑被用于开垦牧场。

社会

所谓的《梨俱吠陀》五族，事实上分作很多较小的部族和氏族，他们始终结成新的、松散的联邦和同盟，同样迅速瓦解，甚至互相交战。五这个固定数字——一个强大的部族在中央，四个方位各有一个小部族——展现了一种宇宙学的理想。当然五族指的是 Anu-Druhyu（“骗子”）族、Yadu-Turvaśa 族和补卢族的大联盟。不知何时，较小的部族婆罗多一度曾属于补卢族，因为婆罗多的国王也可称作“补卢”。尽管婆罗多族起初的地位很边缘化，但他们在 Sudās 的率领下，与其他重要部族的战争（RV VII 18）是《梨俱吠陀》中主要的政治事件。在著名的“十王之战”——Sudās 在因陀罗的帮助下战胜了他的对手之后，婆罗多族定居于一个水源丰沛的地方，在娑罗室伐底河（Sarasvatī）的上游，更在阎牟那河的西边，也就是说在后来所谓的“俱卢之野”（Kurukṣetra）。娑罗室伐底河由此在《梨俱吠陀》中骄傲地被称为最强大的河流，尽管印度河的水量大得多。

直到后《梨俱吠陀》时代，婆罗多仍为最重要的部族，甚至今天的印度联邦共和国还以此命名：Bhārat。在旁遮普中部的这场战争成为史诗

《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婆罗多的大（战）”中印度民族战争的模板。

在《梨俱吠陀》中，迁入的雅利安人和原住民（*dásyu*、*dāsá*）之间的持续冲突，被比作 Deva 神和 Asura 神的竞争。后来，大约从《梨俱吠陀》X 90 开始，这一比喻又被三个雅利安种姓和首陀罗（Śūdra）之间的敌对关系所取代。这四个种姓在后《梨俱吠陀》的新年仪式（Mahāvrata）中相对而立，当宇宙的狂欢时节过后，时间和社会被重新排序。

社会由三个种姓（*várṇa*）构成：部族的贵族和武士（Rājanya 及 Kṣatriya）、祭司（Brāhmaṇa）和自由的部族部从（Vaiśya）（特别是在 RV X 90 中如此），还有在雅利安种姓之外的、起初大部分应从当地的居民中产生的、地位低下的首陀罗。首陀罗这一概念，至今仍被用来称呼印度社会的低种姓。

在持续变换的部族结盟中，共出现 30 个族名，将其一一甄别是很困难的。从父系的大家族中，部族互相组合：最年长的男性，一般是祖父或者父亲，同所有的印度日耳曼地区一样，是“家长”（*páti*、*pátir dán*、*dámpati-*、*dámūnas*、*gṛhapáti*）；排在其后的是家庭主妇（*pátnī*）。由于异族婚配的姻亲系统，她总是出身自另外一个氏族——另外一个 *arís*（氏族部属）。Aryaman 神因此直到今天仍是婚姻的保护神。作为一个共同体，一个氏族在一个车队里（*grâma*）带着仆人、手工业者和家奴（*dāsá*），从一个定居点（*viś*）迁徙到另外一个，在那里人们迅速建起了非常简单的、但有一扇固定的房门的茅屋。

考古

尽管《梨俱吠陀》中的印度雅利安人显然栖息在旁遮普地区，但他们的根肯定还在次大陆之外。然而中亚（大夏［Bactria］：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马雷［Merw］：南乌兹别克斯坦）和旁遮普地区相应时段（前1500—前1000）的考古发现还是太少。

但是我们知道，近来研究发现了大约公元前2400—前1600年大夏和马雷重要的青铜时代的高度文明，通常称为Bactria-Margiana考古综合体（BMAC）或者沩水（Oxus）文化。非印度雅利安文化给我们留下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没有文字的印章，以及四方形的巨大城堡遗址。来自北部草原，大约是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①]区域的印度雅利安人被认为与中亚诸文化（如BMAC）在很长时间内有过持续而重要的联系。正如古代伊朗语、吠陀语和吐火罗语的例证，数量众多的、来自农业、定居方式和宗教的词汇被吸收进来。这一词汇表中的一些，在吠陀语和伊朗语中已经明显地带有方言色彩，也就是比大量的印度雅利安语的借词晚近。其中还包括像吠陀语Aditi（未捆扎的）以及阿维斯陀语Anāhitā（未束缚的）这样的借译，对应的是经常在雕塑中表现的BMAC文化的"大母"。

然而直至今日我们还未能知晓，那些操印度雅利安语的部族以哪条路线经过阿富汗迁徙至南亚。人们虽然在南塔吉克斯坦发掘出了一些该时代的居住地，但至今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尚无与此相关的发现。总的来说，我们至今几乎没有什么能给《梨俱吠陀》中的描述带来新认识的发现。答案更有可能会在很少被研究的西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山脉中出现。然而我们仍希望，印度雅利安人典型的火祭和苏摩祭或者战车能够尽早被发现。如前所述，他们并不是用这些脆弱的、适合于平地的战车"进入了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而是拆散了装在牛车上运输的。

① Sintashta——固定的印度雅利安居住地，在南乌拉尔，公元前2000—前1600年，著名的是在Kurganen（Tumuli）发现的马的骸骨。在1968—1986年间发掘，被称之为最早的印度雅利安居住地。

事实上，几十年前已经在斯瓦特（Swat），现在又在契特拉（Chitral，皆在西北巴基斯坦）发掘了居住地。“犍陀罗（Gandhāra）—墓葬文化”提供了第一次考古发现，证实了马匹在南亚的使用，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的器物。这到底是有关操印度雅利安语的部族（大致如美索不达米亚人同卢卢比人［Lullubi］、加喜特人［Kassiten］和米坦尼人）或者只是关于以马拖曳车和战车，还不得而知。但是大致通过提及喀布尔河（在 RV 为 Kubhā）、斯瓦特（在 RV 为 Suvāstu）和犍陀罗族，西北部（犍陀罗）经常在《梨俱吠陀》中出现。

波伦山口南面和卡契（Kachi）平原上，也就是在印度低地和基达（Quetta）之间，有较早时代，约公元前 1800 年的考古发现。主要是马的骸骨和马的泥塑。众所周知，马是一种草原动物，不会生活在炎热的南亚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尽管人们不能绝对地将马的发现与印度雅利安人的出现等同视之，但这也不失为一个很接近的证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总是在车队（迁徙队伍）里四处迁移的印度雅利安人在其营寨里只留下了很少的痕迹。在考古的视角下，这些是不能与早期印度城市的大垃圾堆相提并论的。后期的吠陀文献说道，人们出于神秘的原因不喜欢在营寨处留下什么东西，并且烧毁祭祀之处（正如至今仍然在喀拉拉 [Kerala] 的大吠陀祭祀里所发生的）。

我们期待考古活动能发现《梨俱吠陀》中提到的本地农耕者的村庄及城市的居住遗址。它们是大哈拉帕（Harappa）或者古印度文化原址上的发展，范围包括几乎整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交界处。这是一种青铜时代的城市文化，产生了那些大城市，诸如巴基斯坦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或者在印度古贾拉特的朵拉维那（Dholavira）和洛塔（Lothal），与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曼（Oman）有活跃的贸易。由于后来未知的气象及其他原因，这一文明在公元前 1900 年左右消失了，为本地乡村的农耕文化所取代，正如《梨俱吠陀》中所出现的。

如前所述，《梨俱吠陀》中可以发现一整串来自乡村生活、农耕和宗教的词汇，它们可能从中亚传入，正如吠陀语是同古代伊朗语和吐火罗语的比较所得出的。与之相对，另外的词汇源自《梨俱吠陀》中的旁遮普本地居民，它们通过其非印度雅利安语的语音形式和结构可以辨认出来。在不久的将来，还需要对此做更加具体研究。

尽管有这一可见的影响，《梨俱吠陀》中，具有定所的当地居民明显地被放在印度雅利安人的对立面，比如，人们称之为 *dásyu*——敌人，人们可以夺走他们牛群。

因此，人们对那些从阿富汗迁徙来的操印度雅利安语的部族（Ārya）做如下的设想：一些部族，他们早已经在阿富汗凉爽的山区有了夏季牧场，在他们南游和印度文化毁灭之后，没有回到其传统的阿富汗的冬季牧场，而是进入了旁遮普，分布在所有适宜畜牧、不太干燥的地区（*dhánvan*），而本地的居民在水源丰富的地方继续从事农耕。伴随着后继部族的不断涌入，旁遮普逐渐“吠陀化”，该过程最终扩展到整个北印度。众所周知的是语言、宗教和文化作为“精英装备”很容易地被继承，当这些在社会和政治上显得有用，并可成就名望时。这不是一场巨大的、至今未有考古证据的入侵，而是未经组织的诸部族的单独迁入。然而结果是一样的：北印度人变成了印度雅利安人，这就是我们不幸地从《梨俱吠陀》的古老文献中得到的。

对弄清问题，考古至今还只有很少的贡献，基因研究也只得出了民族和部族迁徙的依据。

综上所述，在《梨俱吠陀》中所谓的部族和民族是青铜时代的畜牧部族，迁入了南亚。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很快传播到了西北印度，后来到了整个次大陆。在那里他们到处与现有的本地农耕文化混合，继承了社会和宗教面貌。对此，《梨俱吠陀》中有数量众多的语言和内容上的端倪。

丝绸之路上的拜占庭钱币*

史葆恪（Bartłomiej Sz. Szmoniewski）著　李鸣飞译

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纽带，而钱币则是构成丝绸之路交流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丝绸之路不仅用于丝绸交易，一切东方异国能够提供的奇珍异宝都通过这一纽带进行交易，包括香料、宝石以及自然资源等。除了物质财富，还有文化、宗教和艺术等各方面的精神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①] 在地图上很难指出一条固定的道路认定其就是丝绸之路，因为交通道路的形成仰赖各方面因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地理因素。[②] 这些因素之一就是自西向东的商队所遵循的方向和路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沿着这些道路我们发现了包括拜占庭钱币的各种货币。[③]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代，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早期（330—717），丝绸之路上西边最重要的目的地就是君士坦丁堡，东方则是隋唐时期的长安（西安）。[④] 在这两个伟大帝国，拜占庭帝国和中国之间有无数的政治体、城

---

* 本文译自 "The Byzantine coins on the Silk Road – some comments", *Serica – Da Qin. Studies in Archaeology Philology and History on Sino-Western Relations (Selected Problems)*, G. Malinowski, A. Paron, B. Sz. Szmoniewski, (ed.), Wrocław, 2012, pp..41-50。作者史葆恪为波兰科学院考古与人类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译者注

① 刘欣如 2010。

② 荣新江 2006；汉森 2012。

③ 阿拉姆 2004，271；汉森 2011，2012。

④ 汉森 2012。

邦、绿洲等，他们的存在增强了丝绸之路的活力。[1]

从丝绸之路出现开始，沿着这条贸易通路，共存着各种各样受到了中国和希腊影响的货币传统，通常刻写着当地的独特文字。[2] 其中我们发现了一种钱币，最初由罗马帝国发行，在分裂之后则通行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

在亚洲发现了大量的拜占庭钱币，至于我们所关心的丝绸之路的拜占庭钱币，在考古和历史方面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亚西部和东部的发现，在喀什噶尔以东和喀什噶尔以西发现的钱币之间有一条明确分界线，这成了全面考察这一课题的障碍。大部分人主要研究中亚东部，即喀什噶尔以东地区的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3]

本文主要梳理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准备的另外一篇文章则详细考察亚洲发现的拜占庭钱币。

关于中亚西部（喀什噶尔以西）所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主要参见米歇尔·曼森（Michail E. Mansson）（1951； 1972），爱德华·埃勒沃拉赞（Eduard Rtveladze）（1996），瓦伦蒂娜·拉斯波波娃（Valentina Raspopova）（1999）和亚历山大·奈马克（Alexander Naymark）未发表的博士论文。[4]

米歇尔·曼森是首位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他写了一篇从钱币史料的角度研究中亚和拜占庭帝国关系的专题论文（1951）。通过对可用材料的分析，把拜占庭钱币流入中亚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395

① 汉森 2012。

② 蒂埃里 2000a；海伦·王 2004，阿拉姆 2004，汉森 2012。

③ 参见罗丰 2004，113—155；汉森 2012。

④ 出于不可控的原因，作者本人未能看到亚历山大·奈马克的原文。本文中提到的信息来自林英的引用林英（2003a，2003b，2005，2006）。

年之后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开始，到突厥人于 6 世纪中期在中亚建立政权为止（1951, 94）。第二阶段从 6 世纪下半叶突厥人在中亚建立突厥帝国开始，直到 8 世纪初阿拉伯人入侵此处为止（1951, 98）。第三阶段从 8 世纪初开始，持续到 9 世纪发生的银币危机。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一直到 12 世纪。曼森认为拜占庭钱币构建了一个模式，各种当地货币系统都乐于效仿，并在此基础上或精细或粗略地对其进行复制。[①] 支持这一产生于 1950 年代的理论的，是发现于阿汗加兰（Ahangaran）（塔什干地区）的独一无二的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的古罗马金币索里得（solidus）。曼森在 1972 年的论文中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曼森这一看法，即拜占庭钱币对中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被之后的学者接受并进一步发展。

爱德华·埃勒沃拉赞有两篇关于丝绸之路和中亚拜占庭钱币的文章，写于 1990 年代。第一篇文章中，他介绍了对于沿丝绸之路中段所发现的钱币进行的新的时间分界，他把钱币流入中亚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3 世纪，第二阶段为 4—7 世纪，这个阶段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的 4—5 世纪和晚期的 6—7 世纪，第三阶段为 7—8 世纪。[②] 拜占庭钱币主要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出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先简短地介绍了钱币发现的背景。他倾向于认为这些钱币用于货币流通，因为他们没有孔洞，也没有其他用于装饰作用的因素。金币被用于货币流通，这是已经由中文史料中对东突厥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记载所证实的，尤其被阿斯塔纳墓葬中的发现所证实，这一发现由卢博·拉什尼汗高（Lubo-Lesnichenko）发表。[③] 根据埃勒沃拉赞，文献中提到的金币主要指拜占庭的古罗马金币索里得（solidus）以及萨珊王朝银币迪拉姆（dirham）。还有与此类似的论文，作者是海伦·王（Helen Wang 2002，2007）和林英

① 曼森 1951。
② 埃勒沃拉赞 1998，5。
③ 卢博·拉什尼汗高 1994。

（2003a），本文中还会进一步介绍。爱德华·埃勒沃拉赞（1999，25）总结了拜占庭钱币对中亚的影响，他提出四点：第一，拜占庭的古罗马金币索里得填补了中亚市场上没有金币这一空缺，因此是真正的支付手段；第二，它成为当地金币的模型，而当地金币最终也进入了货币流通；第三，它成了制作仿制品的灵感来源，这些仿制品用于首饰或护身符，亚洲的基督徒移民亟需此类装饰物；第四，拜占庭钱币的图形对于粟特（Sogd），赭时（Chacha）和石汗那（Čagīnīgān）硬币的图像有很大冲击。最后作为总结（1999，25—27），他还提出了钱币流入中亚西部特定地区的三种方式。第一种被称为草原路线，从黑海地区开始，经过伏尔加河下游、花剌子模、哈萨克斯坦南部直到中国。沿着这条渠道，硬币流入哈萨克斯坦南部、吉尔吉斯和东突厥斯坦。第二条则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部分，从拜占庭帝国出发，经过地中海东部、伊朗、中亚直到中国，沿着这条路，最早的标明为5世纪中期和6世纪的拜占庭钱币流入中国。第三种是所谓的高加索丝绸之路，[1]连接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主要经行粟特商人，主要有莫氏采瓦雅·巴尔卡（Мощевая Балка）墓葬的发现作为证据支持。[2]

拜占庭钱币和中亚仿制品（薄片币）也出现在弗拉季斯拉夫·克鲁鲍特金（Vladislav V. Kropotkin）的文章中，他严谨地证明了曼森1951年论文中的观点，并且提供了更多发现。[3]在老马鲁发现的罗马晚期和拜占庭早期的硬币以及一个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的金币，这一发现由理查德·霍布斯（Richard Hobbs 1995，97—100）进行了刊布和讨论。Natasha Smirnova也提到那里的青铜币：一些罕见的拜占庭青铜币发现于马鲁（2004，http://www.britac.ac.uk/events/2004/asia-smirnova.cfm）。

Valentina Raspopova 在《片治肯特的金币和薄片币》（*Gold Coins and*

---

① 耶鲁萨林斯克耶 1963；2012。

② 耶鲁萨林斯克耶 2012，317—370。

③ 克鲁鲍特金 1962，46-51。

Bracteates from Pendjikent）（1999）一文中批判性地回顾了对从撒马尔罕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城市遗址中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在细节分析的基础上，他发现八枚金币中只有两枚是正品，其他都是薄片币和仿制品。作者认为，后者的原型是629年之前发行的真正的拜占庭钱币。[①] 大部分情况中，现存金币都发现于寺庙或私宅中。某些情况中它们是一些相对比较简朴的墓葬供品的一部分。[②] 瓦伦蒂娜·拉斯波波娃认为，仿制品说明只有很少的正品流通，或者压根没有。而仿制品的出现证明了中亚地区对此有需求。[③] 中亚地区仿制的可不仅仅是拜占庭钱币，在不同的时期这里也仿制中国硬币，中国硬币还作为当地青铜币的模型。开元通宝币就是一例，从7世纪中期开始，粟特就仿制和流通这种钱币，后来他们自己的钱币也在此基础上铸制，带有文字印章和铭文。[④] V. 拉斯波波娃(Raspopova)（1999，457）批评了叶夫根尼·宰莫（Evgenii V. Zeimal）的观点（1996，174），后者认为拜占庭钱币主要是粟特的基督徒带去的，他们特别喜欢它因为它可以作为宗教象征，与此相反，她认为聂思脱里派教徒"移居到粟特，仇视拜占庭皇帝，因此他们很难喜欢后者的肖像"（拉斯波波娃1999，457）。上文提到的曼森的1951年文章（1951，96，101）首次把拜占庭钱币及仿制品和中亚的基督徒群体联系起来，并且将其消失与基督教社团数量的减少相联系。[⑤] 瓦伦蒂娜·柯赞科娃（Valentina I. Kozenkova）也把拜占庭钱币的扩张与中亚的基督教移民群体相联系。在她1967年的文章里，讨论了一个出土的东罗马帝国皇帝赫拉克利乌斯和赫拉克利乌斯·君士坦丁尼（君士坦丁三世，613—641）

---

① 拉斯波波娃 1999，456。

② 拉斯波波娃 1999，457。

③ 拉斯波波娃 1999，456。

④ 阿拉姆 2004，176。

⑤ 关于基督教在亚洲的分支聂思脱里派的重要地位，参见保尔 2001，130；关于其在中国的地位，参见科尔多西斯 2008。

的仿制金币，这个金币发现于安集延（Andizhan），在费尔干纳河谷，靠近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地方，出土地层显示属于10—12世纪。学者认为，除了交易途径外，还有一种这些硬币流入中亚的可能性，即拜占庭钱币可能被基督教商人群体借贷，用于在6—13世纪建设他们的社团。[①] 瓦伦丁·史可达（Valentin G. Shkoda）研究过一个仿造拜占庭金币制造的铜币，他着重于讨论硬币表面的三个十字架与东基督教文化圈的相似性，他把它考定为叙利亚—巴勒斯坦6—7世纪出品。[②] 他接受柯赞科娃的解释，引用了曼森文中的例子（1951, 103），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住在七河地区（Semireche）（zhetysu）的基督教农民与拜占庭钱币上特殊的基督半身像相联系。他相信纪念的功能是次要的，因为拜占庭钱币流入的直接原因还是与拜占庭帝国的贸易往来，硬币本身和他们的仿制品连同萨珊硬币构建了国际化通货。[③]

拉斯波波娃总结了上述文章，倾向于金币用于货币流通的观点，这一点被与德拉克马和第纳尔有关的蒙恰特佩（Munchak-tepe）银器上的铭文所证实，该银器系6世纪物品。拉斯波波娃认为上述第纳尔即拜占庭金币或其仿制品。[④] 在综述了中亚的其他发现物后，作者指出这些发现物缺乏考古背景，可能是从亚洲其他地方带来的。在片治肯特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所在时段是皇帝狄奥多西二世（401—450）统治时期和赫拉克利乌斯与赫拉克利乌斯·君士坦丁尼共同统治时期。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具有长期流通的特点，因为在发现它们的墓葬中，铸币时间和放置时间可以相差二百年之久。[⑤]

亚历山大·奈马克在他的博士论文（2001）里有一章专门分析拜占

① 柯赞科娃 1967，268-269。

② 史可达 1983，198。

③ 史可达 1983，198-199。

④ 拉斯波波娃 1999，456。

⑤ 拉斯波波娃 1999，458。

庭钱币的发现。有目录和学者对中亚西部发现的银币地点的分析，林英在她的文章（2003a; 2003b）中引用了这部分，这份目录在她的书（2006, 116—134）里重印了，书名为《唐代拂菻丛说》。奈马克文收录了41个来自中亚的硬币和薄片币，其中28个是金币，6个是铜币（其他的无法确认质地），金币中22个是古罗马金币索里得的仿制品，还有一个是铜币的仿制品。[①]

在中亚东部（喀什噶尔以东地区）和中国北部，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拜占庭钱币，并且研究越来越深入广泛，出现了大量成果。讨论在现代中国地区的拜占庭钱币发行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成果如下：西方学者有格尔德·柯尼希（Gerd G. Koenig 1982），弗朗索瓦·蒂埃里（François Thierry）和塞西尔·莫里森（Cecile Morisson）（1993，2001），弗朗索瓦·蒂埃里（2000），叶夫根尼·宰莫（1995；1996），瓦莱丽·汉森（Valerie Hansen 2012），中国学者有：夏鼐，徐苹芳，罗丰，康柳硕，郁离子，陈志强，林英。[②]

在欧洲，格尔德·柯尼希是首位研究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本土出现和发行的学者，他将其与广泛分布的萨珊帝国银币相比较（1982）。在硬币分布的基础上，作者再现了这些硬币流入的可能状况，并且关注了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和萨珊银币在数量上的差异。他还注意到把硬币放在死者口中的现象，并且同意夏鼐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风俗。

宫川尚志和阿努尔夫·考劳兹（Arnulf Kollautz 1984）的文章表达了另一个历史视角的观点，作者倾向于认为存在拜占庭帝国和中国的长距离贸易，证据就是在政权中心发现了大量拜占庭钱币（1984，15—19）。

---

① 林英 2003a，5、7。

② 参见罗丰：《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载《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2004；陈志强 2004；林英 2003a、2003b、2007。

然而这种贸易被认为是通过中亚的商人——粟特人实现的，这种观点被另一事实所证实，即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后，硬币的流入就中断了。另一个在论文中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柔然公主叱地连的墓葬中出现的拜占庭钱币，[①] 这一问题主要在拜占庭帝国、西突厥帝国和中国在6世纪中期的相互关系背景下讨论。[②]

弗朗索瓦·蒂埃里有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2000b），详细讨论了所谓的“冥河司渡卡戎的金币”（Charon's obol）之风俗，即把硬币放在死者口中，主要出现在中国西北部。作者不同意夏鼐的汉文化圈传统风俗说，他指出，虽然在中国本土会在死者口中放置玉石，甚至珍珠、中国硬币、金片和银片，但除了拜占庭钱币外，从未有过放置金币或外来硬币。这种风俗叫作“饭含”，意思是放在口中。法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考察，他对比了阿斯塔纳墓葬群周边地区居民的仪式风俗，在突厥人、高车人、哌哒人和柔然人中追索这一现象的根源，但都没有发现。根据蒂埃里，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放置金币在死者口中的现象为当地特有，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但由于缺乏5世纪之前的资料，所以不能明确这个现象的来源。

弗朗索瓦·蒂埃里还和塞西尔·莫里森合写了一篇专题论文，细致讨论了在今天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作者在1994年列出了一个包含27枚金币的目录，到2001年出版的中文本中已经增加到36枚。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详细地展现了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在欧亚大陆上的东西交往，指出了拜占庭钱币流入今天中国地区的多种可能途径。

文章认为在今天中国地区发现的有限的4—7世纪拜占庭钱币和薄片

① 关于更多信息，参见林英2011年的新作。

② 宫川尚志，考劳兹1986。

币不太可能与两个帝国的直接贸易有关，在这条分布线上的中间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太重要的交易。与之相比，萨珊钱币被大量发现，尤其是在中国西北部发现的大量钱币显示萨珊钱币与拜占庭钱币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大多数出土于贵族墓葬，因此这篇论文认为其作用主要是作为装饰品、舶来品、名望的象征而非直接用于交易的钱币。宰莫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分析了东突厥斯坦的钱币流通，强调出土于塔里木盆地的拜占庭钱币并不具备通货功能。[①]

中国学者中，夏鼐、徐苹芳、罗丰、康柳硕、郁离子、陈志强、林英等都讨论过拜占庭钱币这一课题。本文只列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成果。

夏鼐关于中国的拜占庭钱币的文章为这一领域打下了基础，[②]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提到他的文章。在他首次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夏鼐就倾向于讨论中国和拜占庭帝国在中世纪早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的证据就是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在他的文章中讨论了关于这些钱币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其铭文、年代以及盖印的地点。他还试图讨论中世纪早期钱币流入时的中国—拜占庭关系，并且探讨现代中国地区的西北部区域出现的把钱币放在死者口中的风俗来源。

2003 年，林英发表了两篇文章，分析今天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钱币流入的两个渠道，第一是西突厥帝国，第二是粟特。根据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分析，她认为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部分拜占庭钱币是作为外交礼物，由西突厥帝国赠送给高昌国的（2003a，5）。它们并非用于交易的通货，而是作为收到礼物者的政治地位的象征（2003a，5）。作者还分析了拜占庭帝国和西突厥帝国之间的来往，并且重构了硬币流入的图景。她提出突厥人控制的欧亚草原是一条非常便捷的运输带，而且他们对金

① 宰莫 1995，470-471。

② 林英 2003a，2003b；罗丰 2004，151—156。

子的特别嗜好进一步推动了用贵金属制作的硬币的流入（2003a, 8）。林英还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拜占庭钱币出现的背景，即粟特商人的活动。这一论题在她的《粟特商人和来自中原的拜占庭硬币仿制品》（Sogdians and the Imitation of Byzantine Coins from the Heartland of China，2006）一文中得到了更详尽的阐述，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了和亚历山大·奈马克类似的观点，包括后者对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在喀什噶尔以西的发现的分析。

林英的观点之一是，把金币放置在墓穴中或死者口中这一传统在粟特人中也有，跟中国本土和喀什噶尔以东的情况相同，这一点很难让人同意。作者从奈马克的中亚西部的 41 枚发现物目录中引用了三例说明这一点，但这三例在当地并不典型。这里我们应该提到上文引用过的蒂埃里的 2000 年的论文，其中说明在中亚以西，古代及中世纪早期墓葬中，把硬币放在死者口中这一现象极为少见。[①]

林英的另一篇名为《中国的古罗马金币及丝绸之路沿线的货币文化》（Solidi in China and Monetary Culture along the Silk Road，2005）的文章总结了关于硬币的研究，她把丝绸之路东段和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正的古罗马金币索里得，表面有可辨识的肖像和符号，重量在 4.4—4.54 克之间；第二类是古罗马金币索里得的仿制品，特点是重量和肖像等都与所仿正品相似；第三类是薄片金币，一面有印章，特点是非常薄，重量不到 2 克。[②] 然后她从发现地点和年代等角度分别讨论了三类钱币。第一类由于是真正的古罗马金币，因此埋藏于公元 576—612 年之间。这一类全都发现于墓葬。第二类和第三类从 6 世纪中期到 8 世纪中期（北齐末年到唐代中期）。发现地点和第一类相似，但何家村窖

① 蒂埃里 2000b，326。

② 林英 2005，387—388。

藏金币除外。[1]

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的发现集中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尤其是靠近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周边地区。最常见的是单独发现，不过宁夏固原史家墓的情况不一样，这里一下子发现了 5 枚。[2] 中国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上的这些拜占庭钱币并不是用于长距离贸易的通货，与之相反，只不过是用于政治宣传的工具。不同种族的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些钱币，他们在其中加上了他们自己的象征性含义，然后这些含义又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在最后的舞台上有了独特的意义（2005, 390）。这些文章有的是以英文发表的，连同奈马克的目录和齐斯（A. Kiss）的文章都在林英（2006）书中以中文版出版。

2004 年，两位中国学者关于在今天中国地区发现的拜占庭钱币和仿制品的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最详尽也最具批判性的文章由罗丰所写，收在他的名为《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的书中。这部书包括了作者之前关于硬币和仿制品的研究。在他 2004 年的著作中，他详细综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列出了详尽的目录和具有图像研究意义的材料。他认为已知历史背景的金币数量共为 48 枚，其中 11 枚发现于中国新疆，其他的是在中原地区。[3] 除此之外，作者还试图考订 32 枚正品金币和 15 枚薄片币。[4] 在喀什噶尔以东发现的仿制品与正品的主要区别是重量不足古罗马金币索里得的 4.5 克，[5] 此外印制的皇帝肖像颇为拙劣，不似原型，或有错误拼写显示出仿制者对拉丁字母的无知。[6] 罗丰

① 汉森 2003，19。
② 林英 2005，396。
③ 罗丰 2004，117—120。
④ 罗丰 2004，146。
⑤ 罗丰 2004，120。
⑥ 亦见林英，迈特里希 2005，70—72。

认为，中原地区和新疆的拜占庭钱币是作为装饰用来避邪的，这一点由其上多至三个孔证明，这些硬币并不用于交易通货。[①]

陈志强收集了所有已知的中原地区钱币，包括并不清楚其发掘背景的那些，一共有 56 枚硬币和仿制品。其中有 53 枚金币、2 枚银币，还有 1 枚铜币。[②]作者在文中简要论述了对硬币的研究，还有目录和他们的分析。他认为这些数量有限的拜占庭钱币尽管只能展现出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交往关系史上非常有限的一角，但我们不应该因为发现的硬币数量不多而忽视其对这方面研究的意义，实际上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可能频繁得多。然而他倾向于拜占庭金币及薄片币确实用于国际贸易的观点。

郭云艳于 2007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研究成果综述。作者提到中国发现的 90 枚硬币和薄片币，不过其中半数并无发现背景。在综述了最重要的一些关于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的论著后，作者认为对于这个复杂的课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对中亚东部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的背景解释的研究。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一论题。[③]林英分析了多件吐鲁番文书，考订了和拜占庭金币同时出现的“金钱”一词，例如大谷文书 1040 号。[④]海伦·王（2007）注意到在 551 年前后，阿斯塔纳墓葬的一份清单中，金子和银子首次以钱币形式出现，她认为这一现象与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有关。567—590 年间，墓葬清单中此类钱币逐渐消失并且被各种类型的纺织品替代。

---

① 罗丰 2004，118、121—123。

② 陈志强 2004，295。

③ 例如卢博·拉什尼汉高 1994，255-6；林英 2003a；Wang 2004，2007。

④ 林英 2003a.

总结

中亚和中国中原地区发现的拜占庭钱币是罗马帝国与亚洲国家在公元 1 世纪中持续交往的结果。这一时期的金币奥雷（aurei）和银币第纳尔（denarius）在亚洲不断被发现，在印度半岛发现的尤其著名[①]，在亚洲其他地区也有较少数量的发现品，在这些区域，它们被用来交换像丝绸、宝石、香料这样的奢侈品。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罗马金币的最东端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一个叫作穆德祖（Mudzum）的地方（该窖藏包括 300 罗马第纳尔，所属时代可上述溯公元 1—2 世纪，属于维斯帕先［Vespasian］到科莫多斯［Commodus］时期），[②] 和中国山西省（19 世纪末发现，包括 25 枚罗马钱币，属于 1 世纪）。[③]

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后，金币持续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入周边国家，拜占庭帝国还延续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传统继续向东扩张。

拜占庭钱币流入丝绸之路西部和东部的节奏是一样的。喀什噶尔以西（中亚西部）发现了狄奥多西二世（401—450）[④] 到提比略三世（698—705）期间的钱币。[⑤] 我们可以观察到，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在这些地区长时间流通，因此钱币的发行时间和他们被放入墓葬的时间可以相差 200 年之久。[⑥]

---

① 埃勒沃拉赞 1989，8。

② 宰莫 1996。

③ 埃勒沃拉赞 1998，8。

④ 埃勒沃拉赞 1999，22。

⑤ 埃勒沃拉赞 1999，23；曼毕杜拉 1999。

⑥ 拉斯波波娃 1999，458。

在中亚东部，最古老的古罗马金币索里得可以追溯到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408—450），最新的则属于8世纪中期。[①]值得注意的是，最旧的钱币在被放进墓葬之前已经使用了超过一百年，[②]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金币在这位皇帝活着的时候就被放进墓葬了。[③]

很难精确回答，拜占庭钱币流入中国是因为两国的直接贸易，还是因为粟特商人把他们带到了四面八方。如上文所述，的确有一些学者同意前一种观点。但目前为止还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即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易中起到了通货作用。绝大多数钱币看上去被修饰过，或者特意打了孔，从一个到三个都有，这显示出这些金币有超出通货之外的功能。金子是一种非常值钱的贵金属，同时它还是舶来品，表面有异国符号，与中国钱币不同，这些都给钱币增加了象征性意义。

在中亚西部，有大量拜占庭钱币的仿制品，这显示当地对拜占庭金币的需求。中国中原地区发现的金币和薄片币主要发现于粟特贵族的墓葬中，范围不广，限于皇族高官。[④]在今天中国的西北边境之内，阿斯塔纳墓葬群中，拜占庭钱币和薄片币在比较简朴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并不只限于在粟特移民社群中。[⑤]看起来它们具有舶来品的特征、具有象征性意义，或源于相信金币可以用来辟邪，或用于宗教实践，但我们只能猜测，[⑥]因为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们都能被复制。

发现钱币和薄片币的地点根据丝绸之路的不同段落有所区别。在喀什噶尔以西，拜占庭钱币及其仿制品在以下地点被发现：房屋、寺庙、文

---

① 罗丰 2004，147。

② 阿拉姆 2001，275。

③ 阿拉姆 2001，276。

④ 林英 2003b，10。

⑤ 林英，迈特里希 2005，71。

⑥ 罗丰 2004，149。

化设施或藏骨堂。在喀什噶尔以东，主要发现于墓葬，在塔里木盆地的墓葬中它们大多数被放置在死者口中。在中国地区它们通常是陪葬品，不过何家村例外。整个丝绸之路上都没有发现多少银币，喀什噶尔以东只有一枚铜币。不过最近在山西发现了一枚银币，但这枚银币并没有考古学背景。拜占庭银币数量很少可能是因为萨珊银币太多了，因此对拜占庭银币的需求就没有对金币的需求那么大。

在这篇简短的综述中介绍了一些关于丝绸之路上的拜占庭钱币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关注最多的问题是：钱币流入亚洲的渠道以及对其作用的解释。大多数观点是一致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以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整个亚洲的历史交流和长距离政治经济交往为背景来探讨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Alram M.

2001 Coins and the Silk Road. Monks and Merchants, in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ed. by Juliano Anette and Lerner Judith, New York, pp. 271-291.

2004 From Rome and Byzantium to China: Coin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ransoxiana, History and Culture,* Tashkent, pp. 175-181.

Ball W.

2000 *Rome in the Ea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郭云艳

2007 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综述，《中国钱币》2007（4），第55—61页。

Hansen V.

2003 The Hejia Village Horde: A Snapshot of China's Silk Road Trade, *Orientations* 34 (2), pp.. 14-19.

2011 The Place of Coin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in the Silk Road Trade,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 83—113 页。

2012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

Hobbs R.

1995 Roman Coins from Merv, Turkmenistan,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4 (1), pp. 97-102.

Иерусалимская А.А. (A.A. Ierusalimskaia)

1967 О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в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About the North Caucasian "Silk Road"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 pp. 55-78. (in Russian).

2012 Мощевая Балка., Необычны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 на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ом шёлковом пути (Moshchevaya Balka: A Monument to the North Caucasian Silk Road),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in Russian).

Koenig G.

1981 Frühbyzantinische und sassanidische Münzen in China, in *Geld aus China* (Rhein. Landesmuseum Bonn, Ausstellungskatalog), Köln, pp. 90-108.

Kordosis M. S.

2008 *T'ang China, the Chinese Nestorian Church and《Heretical》Byzantium (AD 618—845)*, Ioannina.

Козенкова В. И (V. I. Kozenkova)

1967 Новый источник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вязей Византи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 pp. 266-269. (in Russian).

Кропоткин В.В（Kropotkin V. V.）

1962 *Клады 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монет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ССР*（Inventory of Byzantine coins in URSS）, Москва. (in Russian)

Liu Xinru

2010 *The Silk Road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林英 (Lin Ying)

2003a Western Turks and Byzantine gold coins found in China, *Transoxiana* 6, http://www.transoxiana.org/0106/lin-ying_turks_solidus.htm

2003b Sogdians and the Imitation of Byzantine Coins from the Heartland of China, in *Ērān ud Anērā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ch Marsh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Compareti Matteo, Raffetta Paola, Scarcia Gianroberto, Venice, pp. 389-401.

2005 Byzantine Gold Coin found in China and the Monetary Culture along the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3 (2), pp. 16-20.

2006 《唐代拂林丛说》，中华书局。

2011 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钱”,《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第371—377页。

林英，迈特里希（Maitelixi/Michael Metlich）

2005 洛阳发现的利奥一世金币考释,《中国钱币》2005（3），第70—72页。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Е.И.（E. I. Lubo-Lesnichenko）

1994 *Китай на Шёлковом пути*（China on silk road）, Москва. (In Russian)

罗丰

2004 《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北京，第113—154页。

Мамбетуллаев М.М. (M. M. Mambetullaev)

1999 Византийская индикация из Куюккала Северный Хорезм [Indication byzantine de Kujuk-kala (Khorezm du nord)], *Нумизматика Централной Азии,* Ташкент, pp. 29-31. (in Russian).

Массон М.Е (M. E. Masson)

1951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Византи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по данным нумизматики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Central Asia according to numismatic data), *Труды САГУ* XXIII, Ташкент, pp. 91-104. (in Russian).

1972 Золотой медальон византийского облика из Ахангарана (ещё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Византи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Golden medallion of Byzantine Origin from Ankhangaram More on the ques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Central Asia),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7, pp. 29-38. (in Russian).

Miyakawa H., Kollautz A.

1984 Ein Dokument zum Fernhandel zwischen Byzanz und China zur Zeit Theophylakt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77, pp. 6-19.

1986 Das Grab der Prinzessin Ch'ih-Ti-Lien, einer Enkelin des Anagaios (ana-Kuei der Jou-Jan) : Ein Dokument für die Beziehungen von Byzanz zum Westtürkenreich und zum Weireich Chinas in der Mitte des 6. Jh,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79, pp. 296-301.

Naymark, A.

2001 *Sogdiana, Its Christians and Byzantium: A Study of Artist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Middle Ages, Dissertati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Thierry F., Morrison C.（F. 蒂埃里和 C. 莫里森）

1994 Sur les monnaies byzantines trouvées en Chine, *Revue Numismatique* 36, pp. 109-145.

2001 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中国钱币》4，第 10—13 页。

Thierry F.

2000a Entre Iran et Chine: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Sérinde de 1er au IXe siècle, in *La Serinde, terre d'échanges,* ed. by Cohen Monique, Drège Jean-Pierre, Giès Jacques, Paris, pp. 121-147.

Thierry de Crussol F.

2000b Obole à Charon et rite *Fanhan.* A propos des monnaies déposées dans la bouche de morts de la nécropole d'Astana, in *Kontakte zwischen Iran, Byzanz und der Steppe in 6.-7. Jh,* ed. by Bálint Csanád, Budapest, pp. 323-329.

Raspopova, V. I.

1999 Gold coins and bracteates from Pendjikent, in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ed. by Alram Michael, Klimburg-Salter Deborah E., Wien, pp. 453-460.

Rong Xinjiang

2006 New Light on Sogdian Colonies along the Silk Road: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Northern China, *Berichte und Abhandlungen* 10, pp. 147-160.

Ртвеладзе Э. В (Э. В Rtveladze)

1998 Монеты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Coins on the Silk Route), *Нумизматика Централной Азии* 3, pp. 5-38. (in Russian).

1999 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монеты и индикации из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Les monnaies de Byzance en Asie Centrale et leur indication), *Нумизматика Централной Азии* 4, pp. 22-28. (In Russian).

Smirnova N.

2004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numismatics of pre-Islam Merv, http://www.britac.ac.uk/events/2004/asia-smirnova.cfm

Шкода В.Г. (Skhoda V. G)

1983 Подражание византийской монете из Пенджикента [Imitation of Byzantine coin from Penjikent], *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44, pp. 196-201. (in Russian).

Wang H.

2004 *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 Including catalogue of the coins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London.

2007 Money in Eastern Central Asia before AD 800, in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ed. by Cribb Joe, Herrmann Georgina, London, pp. 399-409.

Е. В. Зеймаль (Zeimal' E. V.)

1995 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Money circulation in Eastern Turkestan), in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Хозяйство,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ed. by Литвинский Борис А. Москва, pp. 430-473. (in Russian).

1996 Geldverkehr in Osttturkistan, in *Weihrauch und Seide:Alte Kulturen an der Seidenstraße,* ed. by Seipel Wilifried, Wien, pp. 173-174.

评蒙译《圣武亲征录》*

亦邻真著　曹金成译

本文所评论之书是 *Boγda baγatur-un bey-e-ber dayilaγsan temdeglel*，巴根那（B. Baγan-a）蒙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79 年版，共 136 页。

所谓 *Boγda baγatur-un bey-e-ber dayilaγsan temdeglel*，指的是元代汉文史书《圣武亲征录》。将作为研究 13 世纪蒙古史重要文献的这一史书译成蒙古文，不失为有益大众之事。但对于这一工作来说，首先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草率对待，胡乱翻译，就会使此书失去其历史价值。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译本中，则缺少学术研究起码的努力。显然，这只是为了急于出版而忽视了其他方面。考虑到有益于阅读该译本的广大读者，同时也能对以后的彻底修订有所裨益，故在此提出一些已见，望诸位明鉴。

应该说该译本的标题是有问题的。所译 *Boγda baγatur-un bey-e-ber dayilaγsan temdeglel*，不是蒙古语式的，也不是历史上的习惯译法。元代，曾用汉语为成吉思汗上尊号为"圣武皇帝"，后又追谥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但在蒙古语中却从未使用过这样的称号，只是称作 Činggis

---

* 本文初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1983 年第 2 期，第 90—98 页，后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9—245 页。为便于读者检核，译者做了一些注释，放在脚注中；亦邻真先生原注，则依原文格式保留在正文中。本译文经乌兰老师前后两次耐心阅改，所出现的波斯文原文，由张晓慧女史据《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录入并转写，在此一并致谢；当然，错误之处则由译者本人负责。——译者注

qan 或 Činggis qaγan。因此，“圣武”在历史上习惯的蒙古式译法不是“boγda baγatur”，而应该是“Činggis qaγan”。因硬译而产生的所谓“boγda baγatur”这一新称号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强塞入现代蒙古语中。1955 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中，《圣武亲征录》之名被逐字直译为 *Boγda baγatur bey-e-ber dayilaγsan temdeglel*。喀尔喀人不精通汉语，不足为怪，但在我国却生搬这一译名，显然是不妥的。反而将 bey-e-ber dailaγsan temdeglel 依蒙古语式的说法译作 čeriglegsen čedeg、čerig ayan-u bičig 等，倒是合适的。

蒙译者写有《前言》(第 1—4 页)。在这篇简短的文字中多次提到蒙古族的史籍，所出错误不止一处。把《红史》(Ulaγan Debter)、《青史》(Köke Debter)、《青年之宴》(Jalaγus-un Qurim) 视为蒙古史籍 (第 1 页)，是错误的。《红史》是 1346 年左右吐蕃搽里巴万户长公哥朵儿只撰写的藏文史籍，题为 Hu-lan deb-ter 或 Deb-ter dmar-po。这部史书中包含了关于元代的若干信息。另有《新红史》(Deb-ter dmar-po gsar-ma) 一书，是 1538 年[1]班钦·索南查巴撰写的藏文著作。《元朝秘史》(下文简称《秘史》) 中出现的《青册》(Köke Debter) 不是史籍，而是记载分封属民情况的户籍档。至于 17 世纪蒙文史书中提到的《青史》(Köke Debter)，则仍是藏文史籍，即 1478 年软奴班撰写的《青史》(Deb-ter sngon-po) 一书。所谓《青年之宴》，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于 17 世纪撰写的著作，更不是什么蒙古史籍。这些书籍于今俱存，有些早已出版问世。1981 年，民族出版社就出版了《红史》的藏文本，完全不是《前言》中所说“只知其名，但迄今未见其书”(第 12 页) 的情况。

蒙译者对《圣武亲征录》一书缺乏研究理解，未能正确阐释该书与《秘史》、《金册》、《元史》、拉施特《史集》(O. 斯米尔诺娃俄译本，

---

① 原文的初刊与再刊皆作“1536 年”，当为印刷之误，实应作“1538 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 年，下同）之间的关系。《元史》在编纂时主要以《圣武亲征录》、《秘史》为基本史源文献的说法（第 3 页），不符合实情。

《圣武亲征录》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史书。经过对史源文献的研究，多数人认为此书可能是王鹗等人所撰。1303 年，即忽必烈之孙元成宗铁穆耳在位时，在《圣武亲征录》和其他史书的基础上编成了《太祖实录》。《元史》卷一《太祖本纪》（成吉思汗史）则径直抄自《太祖实录》，且于抄录时可能几乎全部誊录。明初匆忙编纂《元史》时，编纂者们对《圣武亲征录》、《秘史》等书，既无闲暇对照研究，也缺乏兴趣。所以不能直接说《圣武亲征录》就是《元史》的史源文献。《前言》中首先提到《史集》，然后提及《圣武亲征录》，还“与此并列”地提到了《金册》（第 2 页），这属于条理不清的理解。《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的《成吉思汗纪》与《圣武亲征录》大致相同，只是在叙述介绍上内容更加丰富。拉施特明确说自己著作的这一部分依据的是《金册》。所以《金册》应先于《史集》成书。然而《圣武亲征录》的资料准备，大致完成于忽必烈汗初期的 1262—1263 年，那么汗廷内的《金册》（金字所书史书）就应该是依据此书用蒙古文撰写而成的。《金册》后来被从大都（北京）送给在波斯的旭烈兀后裔伊利诸汗，拉施特因此得以利用。由此可知《金册》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史源，而《史集》又以《金册》为史源。由于这三部史书之间相同之处非常多，所以将《史集》与《圣武亲征录》进行对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如下文所述，这一重要步骤在该蒙译本中完全被忽略摒弃，则是令人遗憾的。

下面讨论一下译文本身。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对专有名词胡乱而错误地翻译，已经严重降低了该蒙译本学术研究的水平。为了论述简单明了，以下逐条展开讨论。

"Angqan-u boγda yeke qaγan-u ner-e Yesügei"（第 12 页）。原文作：烈祖神元皇帝讳也速该。——元代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所追赠的谥号，没有蒙古语译名。顶多将其汉语读音用蒙古语音译即可。所译 Angqan-u boγda yeke qaγan，既与其汉语原义不合，在蒙文史书中也找不到出处。下文又将"烈祖"译为 Angqan-u ebüge qaγan，则与前面的译文未达成一致。

"Angq-a nige uγsaγan-u Taičiγud aimaγ-un noyan Bilge"（第 12 页）。原文作：初，族人泰赤乌部居别林。——汉语原文为泰赤乌部住在其他森林中之意。《史集》说泰赤乌的"其中有些人属于槐因–亦儿坚，意即'森林部落'，因为他们的禹儿惕在森林里"（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4、85 页）[①]。蒙译者依据王国维错误的笺证而误译。王国维以毫无根据的猜测改"居"为"长"，以为"别林"即"想昆·必勒格"，将普通名词当成了专有名词。想昆·必勒格是成吉思汗高祖之弟。从其拥有契丹之"详稳"（突厥语：Sänggün，汉语：将军）的称号来看，必勒格可能是辽时之人，其生活年代远早于成吉思汗。

"Altan qaγan"（第 12 页）。原文作：阿丹可汗。——误。《史集》清楚地记作 Adāl khān（ادال خا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25、26、38 等页[②]），这与汉字音译完全吻合。阿 =a，丹 =dal。元代汉语音译时存在以音节末辅音 n 替换音节末辅音 l、以音节末辅音 m 替换音节末辅音 b 的惯例。

"Todoyin"（第 13 页）。原文作：脱端。——亦误。《秘史》（第 72 节）作"脱朵延"（Tödö'en），罗桑丹津《黄金史》（乌兰巴托，1937 年，下文简称《罗氏黄金史》，第 1 册，第 33 页）作 Tödegen。Todoyin 之写法于史无征。

---

① 此处译文据《史集》汉译本，见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08 页。

② 汉译本见第 28、30、47 等页。

"Čirq-a"（第 13 页）。原文作：察刺海。——《秘史》（第 72、73 节）作"察[舌]刺[中]合"（Čaraqa），《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5 页①）亦然。应译作 Čaraq-a 或 Čaraqai。

"Tutayičar"（第 13 页）。原文作：秃台察尔。——《秘史》（第 128 节）作"札木[中]合 因 迭兀 绐察[舌]儿"（Jamuq-a-yin degü(degüü) Daičar）。因此应译为 degü Daičar。

"Öireg bulaγ"（第 13 页）。原文作：玉律哥泉。——误。《秘史》（第 128 节）作"斡列该不剌[中]合"（Ölegei bulaq(-a)），《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5 页②）作 اولاكاى بولاق（Ūlākāy Būlāq）。

"Noyaqan"（第 14 页）。原文作：那也勤。——误。此为部族名 Noyakin。

"Nekün tayiǰi"（第 14 页）。原文作：捏群。——"tayiǰi" 为妄加之语。此捏群是亦乞列思氏人，与也速该之兄捏坤太子不是一人。

"Araγ-ud turγaγ-ud"（第 14 页）。原文作：阿剌兀秃剌兀。——误。《秘史》（第 129 节）作"阿剌屼屼[惕] 土[舌]儿[中]合兀的"（Ala'u'ud Turqa'ud），《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6、88 页③）作 الاووت توداوت（Alāvūt Tūdāvut）。在古代蒙古语中，与被修饰词相适应的形容词可以具有复数形式。Alaγ-ud 是 Alaγ 的复数形式。

"Tübge nidün, Mulqalqu qunan-nar"（第 14 页）。原文作：秃不哥逸敦木忽儿好兰。——皆误。《史集》作 موتور قوران（Mūtūr Qūrān），还指出是客列亦惕部的一个分支（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7、123 页④）。照此看来，应为 Tübegeyid（Tübeged）-ün Muqur quran。将《秘史》（第 202 节）中所

① 汉译本，第 109 页；波斯文作 جرقه（Jarqa）。

② 汉译本译作"斡列该-不剌黑"，见第 110 页。

③ 汉译本译作"阿剌兀惕、秃儿阿兀惕"，见第 111、114 页。

④ 汉译本，第 112、167 页。

见抹罗合、忽难等千户长之名随意移至此处，不当。

"Dilen"（第 14 页）。原文作：迭良垓。——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7 页[①]）波斯文写作 DRNGY，当复原为 Derenggei。

"Doγrad"（第 14 页）。原文作：朵忽兰。——误。此姓氏部落名应据《秘史》的正确写法作 Doqolad。[②]

"Negüdei"（第 14 页）。原文作：捏古思。——应作 Negüs。Negüdei=Negüd+ei。意为"属于 Negüs 或 Negüd 氏族的"，用作人的姓或名。

"Unǰin"（第 14 页）原文作：嫩真。——误。应作 Nünǰin。Nünǰin，《秘史》汉字音译为"温真"[③]，因明人把未标识点的 n 当成元音的字冠而致误。对照《史集》，"嫩"是正确的。[④]

"Qutuγtu mungqur"（第 14 页）。原文作：忽都徒忙纳尔。——mungqur，误。据《秘史》（第 48、49 节）和《罗氏黄金史》（第一册，第 19 页），作 Qutuγtu münggür 才正确。[⑤]

"Qotala qaγan"（第 14 页）。原文作：忽都剌可汗。——误。据《秘史》（第 48、51 等节）和《罗氏黄金史》的写法，应作 Qutula qaγan。[⑥] 此名不能像普通词汇"qotala olan"（众人）中的 qotala 那样，按第四元音来读，而应当按第五元音读作 Qutula。

"Jöči"（第 14 页）。原文作：拙只。——应按《罗氏黄金史》之写型

① 汉译本，第 113 页。

② 此处原刊作 Doqolad，再刊作 Doqolon，为前者之形讹。Doqolad，《秘史》第 46 节有"朵中豁剌歹"（Doqoladai）一名，为该部男性姓氏形式。

③ 见《秘史》第 122 节。

④ 汉译本译作"嫩真"，见第 113 页；波斯文作 نتجين（Ninjīn）。

⑤ 《秘史》汉字音译蒙古文作"中忽秃黑秃蒙古儿"。

⑥ 《秘史》汉字音译蒙古文作"中忽图剌中合罕"。

COCI 作 Joči。

“Qunggirad aimaγ-un Tašinggi baγatur”（第 14、15 页）。原文作：兴吉牙部塔降吉拔都。——误。不是 Qunggirad，而是 Kinggiyad。不是 Tašinggi，而是 Taki 或 Taqai。“降”字为衍文。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8 页[①]）。

“Saγan”（第 15 页）。原文作：雪干。——误。即 Sükegen 氏族。见《秘史》（第 126 节）和《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8 页）[②]。

“Jaγuri”（第 16 页）。原文作：照烈。——误。应按《秘史》（第 43、44 节）作 Jegüreid（沼兀[舌]列亦[惕]）。

“Očan ǰarmas”（第 16 页）。原文作：斡禅札剌马思。——误。应按《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9 页）作 Očal ǰalamas[③]。

“Ölei baγatur”（第 16 页）。原文作：玉律拔都。——误。《史集》（同上）作“Ölög baγatur”[④]。

“Taqai daru”（第 16 页）。原文作：塔海答鲁。——daru，误。应作 Taqai dalu。见《史集》（同上）[⑤]。

“Qudun qurǰan”（第 16 页）。原文作：忽敦忽儿章。——《秘史》（第 148 节）作“[中]豁团斡[舌]儿昌”（Qodun orčang），《史集》（同上）作 قودون اورجانك（Qūdūn Ūrjānk）[⑥]。因“忽儿章”之“忽”是以 h 辅音开头的 u，所以绝对不能写作 qu。在古代蒙古语中，arban、ači（ači tusa [恩惠]

---

① 汉译本译作“轻吉牙惕”，见第 114 页；波斯文作 قينكقيات（Qīnkqiyāt）。

② 《秘史》作“速格该”（Sükegei）。《史集》汉译本译作“雪干”，见第 114 页；波斯文作 سوكان（Sūkān）。

③ 汉译本译作“斡札勒-札勒马黑”，见第 115 页；波斯文作 اوجر جلمق。

④ 汉译本译作“玉律把阿秃儿”，见第 116 页；波斯文作 اولوك بهادر（Ūlūk Bahādur）。

⑤ 汉译本译作“塔海-答鲁”，见第 116 页；波斯文作 طغاى دالو（Ṭaghāy Dālū）。

⑥ 汉译本译作“忽敦-斡儿长”，见第 116 页。

之 ači）、odon 等词，虽然读作 harban、hači、hodon，但在畏兀体蒙古文中只写作 arban、ači、odon。在古代畏兀体蒙古文中，字符 A 除了用作元音的字冠外，还记写辅音 h 和 n 。以字符 A 记写 h 音，是回鹘文古老的惯例，蒙古人开始借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时即继承了这一惯例。

"Širegetü ebügen"（第 17 页）。原文作：失里哥都也不干。——Širegetü，误。《秘史》（第 149 节）作"失儿古额秃 额不坚"（Širgü'etü ebügen），《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90 页）作 ŠYRGTWEBWKAN（Šīrqtu-ābūkān）[1]。《罗氏黄金史》（第一册，第 108 页）作 Širgetü ebügen。哪一种写法都与 širege sandali（桌椅）之 širege 无关。这个老人是征宋主将八邻部伯颜的曾祖，《元史》卷一二七记作"述律哥图"。[2]

"Lujuγan"（第 17 页）。原文作：钞鲁罕。——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91 页）波斯文作 JAWRQH，据此应作 Čaγurqan。[3]

"Delenggüd ǰalayir aimaγ"（第 17 页）。原文作：朵郎吉札剌儿部。——Delenggüd，误。当据《史集》（同上）作 Dolanggid。[4] 此为札剌亦儿十氏族之一。

"Süišingge"（第 17 页）。原文作：荽胜和。——误。《史集》（同上）作 طولاقوت سینکوت（Ṭūlāqūt Sīnkūt）。[5]"荽"为"妥"之讹。

"Ibegei"（第 17 页）。原文作：叶别该。——误。《秘史》第 130 节作"额别该"（Ebegei）。"叶"字与当时蒙古语的前元音 e 相对应，并不音写元音 i。

---

① 汉译本译作"失儿怯秃-额不干"，见第 118 页。

② 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099 页。

③ 汉译本译作"札兀儿罕"，俄译本注认为原文作"ǰāūrqeh"，见第 119 页；波斯文作 جاورقه（Jāvurqa）。

④ 汉译本译作"朵郎吉惕"，见第 119 页；波斯文作 دولانکقیت（Dūlānkqīt）。

⑤ 汉译本译作"秃剌忽惕-辛古惕"；俄译本注作"tūrāqūt-sīnkūt"，见第 119 页。

“Šigür”（第 17 页）。原文作：失丘儿。——误。《秘史》第 130 节[1]作“失乞兀舌里”（Šiki’ür），显然是将 ki’ü 汉译为了“丘”（kiu）。

“Keresü”（第 18 页）。原文作：乞列思。——误。《秘史》第 131 节作“乞舌鲁额薛”（kirü’esü）。此词是个古代蒙古语词汇，指系马所。

“Jayisang wan yan šiyang”（第 18 页）。原文作：丞相完颜襄。——“丞相”，当依《秘史》132 节作 čingsang（“丞相”），这一点《罗氏黄金史》亦可为证（第一册，第 80 页）。此处的 ǰayisang 出于译者的随意而译。完颜，《秘史》和《罗氏黄金史》（同上）作“王京”（Ongging），宜据此来译。

“Quratu šitügen”（第 19 页）。原文作：忽速图失秃。——Quratu，误。从北京图书馆所藏 1500 年优良的抄本可知，“速”为“剌”之讹。《秘史》第 133 节作“中忽速秃失秃延”（Qusutu sitü’en）。

“Čautuquri”（第 19 页）。原文作：察兀忽鲁。——误。《秘史》134 节作“札兀惕中忽舌里”（Ja’ud quri），与《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93 页[2]）完全一致。《罗氏黄金史》（第一册，第 82 页）将此官称误作 Čaγ-un törö。任何史书中均未见 Čautuquri 之写法。

“Qaliγutu naγur”（第 19 页）。原文作：哈连徒泽。——误。《秘史》第 136 节作“哈舌澧汸秃 纳浯舌剌”（Ariltu na’ur(-a)）。此 Ariltu 读作 hariltu。《罗氏黄金史》（第一册，第 83 页）虽误作 Arγalitu naγur，但仍可见 Ariltu 之痕迹。

“Yeke keger-e kemekü γaǰar”（第 19 页）。原文作：大川。——误。此“大川”指广阔的草原，是普通名词，非地名。当据《史集》（第一卷第

---

[1] 原文的初刊与再刊皆作“139 节”，当为印刷之误，实应作“130 节”。

[2] 汉译本译作“札兀惕-忽里”，见第 122 页；波斯文作 جاووت قورى（Jāvūt Qūrī）。

二分册，第 93、94 页[1]）译作 tala-a-yin ǰam（草原的路）。

“Wang qan”（第 19 页）。原文作：汪可汗。——《秘史》与《罗氏黄金史》俱作 Ong qan（王[中]罕）[2]。“王”这一汉字，13、14 世纪以畏兀体蒙古文写作 ong。例如，Ön nam ong（云南王）、Si ning ong（西宁王）等。不用说，当然应据蒙文史书作 Ong qan。

“Jaq-a qambu”（第 19 页）。原文作：札阿绀孛。——qambu，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109 页）载：“札阿”是地区（wilāyat）之意，“绀孛”意为大异密，合起来意即“一地区的大异密”[3]。不能将此 gembü 与 qambu lama（堪布喇嘛）之 qambu 混淆。古代蒙古文中存在把舌根塞音 γa 写作 ge 的惯例。例如，把“阁”（当时读作 γau）写作 geü 等。因此“绀孛”当写作 gembü，而读作 γambu。《罗氏黄金史》（第一册，第 111 页）之 gembü 亦可为证。

“Tümed tübeged”（第 19 页）。原文作：土满土伯夷。——Tümed，误。Tümed（土默特）这一部落名当时并不存在，是明代才出现的。源于 Tubas 之名的 Tumad（秃马惕）部被当成 Tümed，始于明末蒙古史家们的误会。至于此处所谓 tümen Tübeged 是指 Tübegen 部人口多。《秘史》（第 150 节）作“土绵秃别干”（tümen Tübegen）、“斡栾董[中]合亦惕”（Olan dungqayid）。

“Sögeqai”（第 21 页）。原文作：雪也该。——误。《秘史》第 151 节作“速客该者温”（Sükegei ǰe’ün）。Sögeqai 的写法违背了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

“Kerülün mören”（第 21 页）；怯绿连河。——现在虽然写作 Kerülün，

① 汉译本译作“草原的路”，见第 123 页；波斯文作 راه بيابان（rāh-i biyābān）。

② 见《秘史》第 144 节。

③ 此句译文转引自《史集》汉译本，第 145 页。“札阿绀孛”，波斯文作 جاء كمبو（Jā’ Kambū）。

但当时是作 Kelüren。在突厥语中 Kelüren 意为“清澈的”，后来音节换位而成 Kerülün。当据《秘史》和《史集》作 Kelüren。[①]

“Uγča aγula”（第 21 页）。原文作：莫那察山。——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111 页）作 مونجه（Mūnja）[②]。《秘史》第 177 节作“木[舌]鲁彻薛兀[勒]”（Müruče se’ül）。据此来看，在将 Müruče 用汉字音译为“莫那察”（mo no ča）时，本应为 lo 的音被变成了鼻音 no。此 Monoča 在《史集》所利用的《金册》里留有痕迹，被用波斯文写作 MWNJA。由此可知《圣武亲征录》至《金册》、《金册》至《史集》间接流传的过程。总之，不可以作 Uqča aγula。

“Yeder altai”（第 23 页）。原文作：也迭儿按台。——Yeder，误。《秘史》第 161 节作“额垤[舌]儿”（Eder）。以“也”记写字 e 音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也先（Esen）、也可赤（egeči）等，蒙译者本应对此知晓才对。《罗氏黄金史》（第一册，第 121 页）中 Eder 写作 AADAR，或是 Eder 之讹，或是原样照抄的早期的写型。古代蒙古文有 a、e 皆写作 AA 的惯例，例如，AAKA：eke。

“Boγorči noyan”（第 23 页）。原文作：博尔朮。——虽然后世有 Boγorči 的写法，但这里还是以遵从其汉字音译原文和《秘史》作 Boγorču 为好。[③]

“Muqulai wang”（第 23 页）。原文作：木华黎国王。——误。作 Muqali güi ong 才对。把 Muqali 写作 Muqulai 是后来的非正规写法。“国王”（güi ong）是 13 世纪初期成吉思汗赐给木华黎的称号，随意将其替换为

---

① 《秘史》第 151 节作“客鲁[舌]涟”（Kelüren）。《史集》汉译本译作“怯绿连河”，见第 147 页，波斯文作 كلوران（kilūrān）。

② 《史集》俄译本注作 mūnǰā，见汉译本第 148 页。

③ 《秘史》汉字音译蒙古文作“孛斡[舌]儿出”（Bo’orču），见第 163、172 等节。

wang 是不对的。见《秘史》与《史集》。①

"Dörben örlög"（第 23 页）。原文作：四将。——当据《秘史》（第 163 节）译作"朵舌儿边 曲鲁"（Dörben külüg）。

"Ituryan"（第 23 页）。原文作：亦秃儿干。——误。《秘史》第 177 节作"亦都舌儿坚"（Idürgen）。《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114 页）作：YTWRGAN②。用"干"字记写 gen 音，是当时的普遍规律，而从未以"干"记写 γan（qan）。

"Üjen taqu"（第 23 页）。原文作：盏塔兀。——属随意之译。这一人名不见于《秘史》，《史集》作 YTQW（同上）。因此根本不存在复原为 Üjen taqu 的可能性。

"Ulaγan qus"（第 23 页）。原文作：忽剌阿胡。——qus 误。《秘史》第 163、177 节作"忽剌安中忽惕"（Hula'an qud）。qud 为 qun（陡峭的山峰）之复数形式。

…… ……

从开头到结尾，该蒙译本几乎每页都有诸如此类的错误。在此不能逐一罗列。不得不提的是，大量致误的专有名词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地名和人名。例如，其"河西"之译"He si"（第 35 页），③当据《秘史》等蒙古史书作"Qašin"（中合申）。按蒙古文惯例，在音译指称西夏国土的汉语名称"河西"时，缀加音节末辅音 n 而成"Qašin"。大蒙古国的都城"Qara qorum"（哈剌和林）也被误写作"Qara qorin"（第 70 页）。"qorum"是突厥语词汇，意为"石砾"，译成"qorin"则犯了常识上的错误。当时赫赫有名的花剌子模人牙剌洼赤（Yalavači）被随意写作

① 《秘史》汉字音译蒙古文作"木中合黎国王"（Muqali gui ong），见第 206 节。《史集》汉译本译作"木华黎国王"，见第 154 页；波斯文作 موقلى（Mūqalī）。

② 《史集》俄译本注作 ītūrkan，见汉译本第 154 页。

③ 见《秘史》第 150、177、249、250 等节。

"Yaruγači"（第56、71页）。畏兀儿部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Barǰuq art iduq qud）被误写作"Idegüd"（第48页），实际上应作"Iduqud"或"Iduq qud"。撒儿塔兀勒之地著名的首领罕·篾力克（Qan melig），被误写作"Qan maliγ"（第62页）。与蒙古语一样，在突厥语中也绝不能将发音的刚、柔置于不顾。该蒙译本第135、136页所列蒙古诸汗之名，也大多不对。例如，"Ayurbalbadar-a"（第135页）是"Ayurbarwada"之误。"Γandabal"（同上）为"Sodibala"之误。"Alǰibal"是"Arakibaγ"之误。"Ayurbarwada"，汉译名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其蒙古文写法见搠思吉斡节儿（Čoski odsar，又作Čoyiǰi odsar）《入菩提行论疏》（Bodi čari-a awadar）蒙译本跋文。"Sodibala"，汉译名为"硕德八剌"。当时"德"字读作"dii"。"Arakibaγ"，汉译名为"阿剌吉八"，藏语意为"羊粪"。"Usqar"（页135）为"Usqal"之误。假如参照过《罗氏黄金史》等蒙文史书，当不会犯此类错误。见于这些蒙文史书的明代蒙古诸汗的名称，也被写错了不少。"Asqai"（第135页）为"Aǰi"之误。"Asqai"之写型不见于蒙文史书，是蒙译者在误读汉名"阿寨"（ǰai误读为sai）的基础上随意译写出来的。"Aγabarǰi"（第135页），应据大多数蒙文史书写作"Aγbarǰi"（阿噶巴尔济）。"Mongγol kel"（第135页）[①]为"Margürgis"（马儿苦儿吉思）之误。蒙译者截取由《蒙古源流》满译本间接所译错误的汉译名"蒙古勒克哷青吉斯"，再随意译写而成。"Mandulai"（第136页）为"Manduγulun"（满都鲁）之误。另外，谓成吉思汗至林丹汗传三十三代（第136页），误。这是一种按人头蛮算，不分兄弟、父子，有一名就算一代得出的错误结果。实际上只有二十二代。

总之，如果不非常谨慎地对待该书蒙译本中专有名词的话，就会跟着

---

① 此处页码为译者所补加，此文的原刊与再刊皆未标出，由孛儿只斤·额尔敦巴特尔老师代为查阅，特此致谢。

蒙译者缺乏责任的写法不断出错。评价这部蒙译本时，不得不给出可信度过低的结论。

此外，语句的翻译也不是那么贴切，不过比起专名之误对读者造成的麻烦，这方面的缺欠就属于小毛病了，故在此不再赘述。